

〔美〕 麦高登 著

Gordon Mathews

杨珺 译

Nicole Yang

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

香港重庆大厦

Ghetto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Chungking Mansions,

Hong Kong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香 港 重 庆 大 厦

Shatto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美] 麦高登 著 杨玘 译

Chunqing Mansions,

Hong Kong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 / (美) 麦高登著；杨场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8

ISBN 978-7-5675-3270-0

I. ①香... II. ①麦... ②杨... III. ①城市社会学—社会调查—香港 IV. ①C91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87539 号

GHETTO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Chungking Mansions, Hong Kong

By Gordon Mathews

Copyrights © 2011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S.A.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9-2013-589 号

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

著 者 [美] 麦高登

译 者 杨 场

责任编辑 顾晓洁

封面设计 卿 松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苏州工业园区美柯乐制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32 开

印 张 10

字 数 184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3270-0/C·232

定 价 42.00 元

出 版 人 王 培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谜文库 | 世界是一个谜语

前 言

重庆大厦汇聚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有南亚和非洲的商人及避难者，印度的临时工，还有囊中羞涩的各国旅客。本书将要描述的重庆大厦是一栋代表“低端全球化”的摇摇欲坠的大楼，位于香港旅游区中心，并与加尔各答、拉各斯、达累斯萨拉姆等地区紧紧相连。尽管许多香港人认为重庆大厦像一个神秘世界，被错放在城市中心，但它的存在正是拜香港所赐。我在此简述香港的地理历史背景，以明晰重庆大厦的周边环境。

香港于 1841 年成为英国殖民地，直到 1997 年才回归中国。在殖民时代，香港成为中国与外界交流的口岸，英国公司曾经在此停靠船只，以便运载鸦片进入中国内地，之后又以最低关税在此进行自由贸易。香港人口渐渐全球化，虽然以华人为主，但也包括了许多其他族裔的人。十九世纪末的书籍记载香港的闹市“满是英国人、德国人、英印混血、广东人、来自加尔各答的美国人、孟买的帕西人、巴格达的犹太人”^①，这种景象与今日的重庆大厦并没有太大差别。另一处十九世纪末的记载评价香港“可谓是最国际化的城市，在街道中随处走上一个小时，就能见到各族人士，比在五旬节看到的还多；各肤色和宗教

^① Norman 1895, 17；引用自 Sandhaus 2010, 17。

信仰的人们摩肩接踵、和平相处”。^①这也是重庆大厦现在的样貌，只不过如今出现了一些种族之间的紧张关系和歧视现象。^②

香港在历史上曾是一个贫瘠之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批国人迁至香港，令当地人口迅速增加。香港在七十年代是工业生产的中心，在八十年代末成为中国货品集散地。同一时期，异于内地的香港本土意识和身份认同渐渐形成。^③九十年代的香港已经较为富裕，人均收入比中国内地、甚至其曾经的殖民者英国还高。2007年，香港的人均收入以购买力计算已经是美国人的93%，远远高于多数欧洲国家，并且是内地人均收入的八倍^④，当然香港同时也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地区之一。这也是为什么重庆大厦这个“边缘地带”一样的角色，在香港显得如此不协调的缘故。香港人对重庆大厦的不屑或恐惧，源于“我们香港人已不再是发展中地区，香港已经很富裕了，为什么这些非洲人和南亚人还要来我们的新居呢”。

同样道理，书中也记录了重庆大厦的一些商人对中国内地人的不满，不论是非洲人、南亚人，还是香港人，他们都对从北方而来的中国内地人有一丝不安。尽管来自内地的有钱人在香港随处可见，中国内地经济也越来越有超越香港的趋势，可是香港人仍视内地为经济较劣等的地区。虽然重庆大厦是一个异类的孤岛，但它也是一个人们得以生活工作的地方，属于香

① Smith 1883, 48 ; 引用自 Sandhaus 2010, 121。

② Welsh 1993, 378-86 ; Tsang 2004, 47-55 ; Kuctal. 2003。

③ Mathews, Ma, Lui 2008, 32-39。

④ *Economist* 2009, 29, 132。

港的一部分。南亚人和非洲人来到重庆大厦白手起家，其经历无异于许多到香港创业成功的中国内地人。即便如此，这些移民族群并没有太多的相互理解和同情。

香港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历史对重庆大厦的形成有很大影响。自早期殖民到现在，香港出现越来越多的南亚人^①。如果没有这一群南亚人，1962年建立的重庆大厦不可能成为如今的国际市场。我曾陪同一位目光犀利的记者参观重庆大厦，他指出，这个地方除了有各种族裔之外，还余留了一些英国殖民的色彩。确实，我们能在大厦见到很多东非人和南亚人，部分原因在于他们会讲最常见的国际社交语言——英文，这也是重庆大厦中的通用语。殖民色彩也可能来源于，即便在今日，持这些国家护照的人比较容易得到无需签证逗留香港的便利。

过去几十年中，全球媒体都在关注香港的去殖民化，以及回归中国后的“香港故事”。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到香港社会自回归之后一直保持稳定，它有一套自身的法律系统和出入境管制，其内部行政系统大致上也能独立运行。香港长久以来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比如政府常常被贴上商业化的标签，特别是那些与地产商千丝万缕关联的官员等等，依然存在。大厦在1997年后有几个显著变化：非洲商人在2000年左右开始来到香港，国际难民也大批到来；重庆大厦本身的修缮和保安系统有所提升；许多中国内地游客也会来重庆大厦住宿……不过这些变化与香港回归没有什么关系。一些大厦内的小贩常跟我说：“重庆

① White 1994。

大厦依然如故。”

重庆大厦坐落在尖沙咀，位于九龙半岛顶尖处。香港主要由四个地区构成：离岛，包括香港国际机场所处的大屿山；港岛，也是香港金融中心和旧区之所在；九龙，比港岛稍微低档一些，人口也稍微密集一些，但却是香港旅游中心，也是最拥挤的地区；新界，连接中国内地，香港一半以上人口的居住地。这几个地区加起来才不过一千平方公里，加上香港的公共交通系统四通八达，住在重庆大厦的人出发去香港各地耗时一般不超过一个小时。

这里稍稍描述一下香港的几个地方。深水埗，一个以工薪阶层为主的地区，在重庆大厦以北三公里，有许多廉价的裁缝店。非洲商人常常特地去那里订制批量的衣服销售至非洲市场；国际避难者也会去这些地方买二手货，因为物价比重庆大厦的货品还便宜。湾仔，一个夜生活丰富的地方，从尖沙咀越过维多利亚港即可到达；有些重庆大厦的人会跑到那里寻求女人和酒精，不过他们多数人在金钱上捉襟见肘，只能做白日梦罢了。锦田，通常是一个许多游客参观的新界小镇，但重庆大厦的商人去那里购买香港人报废或遗弃的二手汽车零件。还有位于中港交界的罗湖，商人们在这里过境，去内地南部的商城和工厂购物，临时工则去那里更新签证。重庆大厦的商人住在香港各个角落，但不论他们从事什么行业，以上是他们最常去的几个地方。

本书第一章将更加详细地描绘重庆大厦的地理环境，这里先勾勒几笔——重庆大厦位于游客众多的弥敦道36-44号，毗邻

高档的半岛酒店和假日酒店，走几步路即可抵达簇新炫目的购物城，步行十分钟是旅游地标天星码头，每隔几分钟就有一班客船渡过维多利亚港。重庆大厦周围遍布港铁接驳口，每五分钟就有一班列车驶往中港边界，总路程大约四十分钟。从这几句简短介绍已可显现重庆大厦在香港的中心地理位置，它正好安插在高楼林立的黄金地带，周围遍布世界上最贵的楼市。也是这种地理环境之下，重庆大厦冠有“黑暗中心”的名头。^①

^① 关于重庆大厦在香港移民环境下的讨论，可以参考 Knowles 和 Harper (2009, 116-31)。

目 录

地点

- 关于重庆大厦 003
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 010
重庆大厦为何存在以及为何值得关注 015
大厦 022
历史 036
业主立案法团 045
生意 049
我的亲身经历 062

人群

- 商人 073
业主和经理 083
临时工 093
避难者 100
家庭佣工 106
性工作者 108
瘾君子 112
游客 116
不同人群如何互动 122

商品

- 重庆大厦中的商品流通 135
- 贩卖商品 139
 - 占买家的便宜 145
 - 仿冒品 148
 - 制造商和中间商 153
 - 手机店的骗术和辛酸 156
 - 各色商人 161
 - 商人之间的代沟 168
 - 商人的技巧 173
 - 中国内地的诱惑 177
 - 海关险境 180
 - 商品和商人的意义 195

法律

- 无处不在的法律阴影 201
- 法律界线里外的冲突 204
- 警察的角色 211
- 签证与居留权 221
- 避难者与法律 227
- “真假” 避难者 232
- 避难者的生活 239
- 避难者的待遇变化 256

未来

重庆大厦不断变幻的想象	265
重庆大厦如何改变人们	269
文化身份认同	275
在全球的意义	282
重庆大厦的未来 / 世界的未来	293

参考书目 297

译后记 307

地点

Address

关于重庆大厦

重庆大厦是一栋十七层高的破旧大楼，内有大大小小的廉价旅店和商铺，与周边的旅游旺区形成鲜明对比。这栋大厦可谓是最全球化的大楼，南亚和非洲撒哈拉以南的生意人及临时工来此淘金，也有国际避难者来此寻求庇护，游客则来找廉价住宿和探险。各种社会背景的人在大厦里休憩，在食品摊档旁争抢座位，在手机铺讲价，在走廊过道间穿行。每晚大约有4,000人留宿于重庆大厦，我在不同旅馆邂逅了129个不同国籍的人，从阿根廷到津巴布韦，包括不丹、伊拉克、牙买加、卢森堡、马达加斯加，甚至有马尔代夫的人。

重庆大厦位于弥敦道的黄金地段，某著名旅游书籍称它“拥有从游客兜里吸金的能力”。^①如果你从马路对面望过去，会见到令人眼花缭乱的楼群，底层各色各样的商铺，包括假日酒店、电器铺、商场门面、时装店、牛排店，还有一些酒吧。尤其当你夜晚来欣赏著名的弥敦道霓虹灯美景时，就跟香港明信片相差无几了。然而，耀眼夺目的高楼中有一栋朴素、甚至可以说是杂乱和腐朽的楼宇：尽管它的底层商场似乎已经脱离大厦本身，与其他艳丽的商场无异，但入口开在外面。在这些底层商场之间有一个不可言喻的黑暗入口，乍眼看上去好像另

① Haper 和 Storey 1999, 171。

属别处，你跨过马路走近这个入口，看见那附近站了许多跟一般香港人不一样的人，他们也不像是弥敦道的购物者。假如你是华人，进入大楼后可能反而觉得自己是少数民族，茫然不知所措。假如你是白人，也许会下意识地捂紧钱包，不安之中还带有第一世界国家的愧疚。假如你是女人，可能还有点不自在，因为你周围有一百多双虎视眈眈的男性的眼睛。

如果你从附近么地道（Mody Road）的港铁出口出来，转一个街角来到重庆大厦，会对大厦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你首先见到一家 7-Eleven，那里晚上总有一大帮非洲人站在过道中喝啤酒，或是聚在店门口。附近还有一些印度女人穿着灿烂夺目的莎丽，假如男性瞄她们一眼，她们就会报价，然后跟着走几步以确定该男子是否对她们的性服务感兴趣。当然，招引来的还有其他诸如蒙古、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女人。还有一些南亚的男人，他们会向你兜售西装订制服务，“特价西装，只给您这个价”。然后后面可能跟上来一群卖假表的人，提供各种名牌手表的膺品，价格仅为正品的一小部分。一旦你流露出一丝兴趣，他们就会带你走进附近大厦的阴暗小巷。

你穿过距离重庆大厦大门大约三十多米的么地道，如果来的时候，会见到一群贩子替大厦内几十个咖喱餐馆当托儿，类似中介。你最好要么不理睬他们，要么赶快决定跟着一个托儿去其餐厅，不然会被贩子党团团围住。如果你是白人的话，会有一个年轻男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凑到你耳边小声问：“来点大麻？”你若想再问下去，说不定还能问出其他的什么药来。到傍晚时分，你踏上重庆大厦门口的台阶，一些南亚裔的旅店托

儿会跑来说“我能给你一间好住处，才150港币”，另一个中国男人马上背对着南亚人说：“这些印度旅馆很邋遢的！来我这边住吧！我们这里干净得很。”——干净或许是干净，价钱也高了一大截。

你终于逃离了这些夹攻，然后发现自己摔进了重庆大厦的人流漩涡，也许你一生都没见过这么多人簇拥在这么一小块地方。眼前的景象非同寻常：穿鲜艳长袍、嘻哈服装或不合身西装的非洲人，头戴无沿平顶小帽的虔诚的巴基斯坦人，穿伊斯兰教黑色罩袍的印度尼西亚妇女，穿中短裤挺着大啤酒肚的老年白人，还有一些仿佛是来自上一个年代难民的嬉皮士。尼日利亚人大声喧哗，年轻的印度人把手搭在彼此的肩膀上谈笑风生，还有一些中国内地人看起来掩饰不住对这一切的惊讶。你很可能还会见到南亚人推着手推车，搬运三四个标有“拉各斯”或“内罗毕”的大箱子，非洲人拉着塞满了手机的行李箱，还有掌柜们贩卖着各种各样地球上能找得到的东西，从咖喱角(samosa)、手机卡、剪发服务、威士忌、房地产、电源插头、自慰器到鞋子。排队等电梯的人什么肤色都有，他们都等着去一百多家不同的旅店。

看到这种景象，你也许觉得奇怪：“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多人来重庆大厦做什么？他们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地方？”这些正是我研究重庆大厦的初衷。1983年，我作为一名游客第一次来到重庆大厦，逗留了几个晚上。1994年，我搬到香港居住，每隔几个月来重庆大厦吃一次咖喱，试图去了解另一个世界。2006年，我开始正式对重庆大

厦做人类学的研究，尽己可能去了解这栋大厦的一切人和事，理解它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角色。过去三年半中，我至少每个星期在重庆大厦睡一个晚上，一有时间就钻到此处（这里离我所在的大学大约三十分分钟火车车程），为了解答以上的问题，更为了思考重庆大厦在世界上的重要意义。

我在过去几年里找到了一些答案，以一次典型的半夜经历为例。那个时间，印度性工作者已出来招揽生意，她们对我不加理会，因为她们知道我不是顾客，只有几个新来的性工作者一见到我是白人就想抓住机会捞一笔，老一辈的则告诉她们别费力气了。一位兜售假表的贩子透过墨镜向我打招呼，他由于在南亚遭遇警察的缘故已经半盲了。他说那边的警察把他的眼皮贴起来，逼迫他盯了一天的太阳。他担心国际难民署（UNHCR）在仲裁其案件和命运的时候会不相信，因为他手里没有证据。他在此非法打工，盼望攒够钱以支付角膜移植手术。他一边留心附近有没有便衣警察，一边尽可能地招揽生意，他说：“白人是最佳顾客，他们买得比谁都多。”但这个月生意不太火，他连付房租的钱都赚不到，更不用说手术费了。不过他的眼睛究竟是被家乡的警察弄瞎，还是先天性，或是其他什么意外，尚无定论——毕竟他说的话我无法核实，但今晚遇见他算是一件好事。

多走几步，一个饭馆的托儿热情地迎接我。我已经两个月没见过他了，他一直以游客身份在香港非法打工，不久前回了一趟印度老家加尔各答。他自豪地掏出上个月出生的宝贝儿子的照片给我看，但同时表示自己很高兴能回到香港，“毕竟我

要供养整个家啊！虽然……我很想念家人，但香港的薪水高很多……所以……”。他感慨道，自己挣来的钱好多都花在用手机打电话回家上。

在重庆大厦入口，我遇到一位已经六个月没见的尼日利亚商人。他说自己没能早日返港是因为汇率实在是贵得离谱，兑换不到需要的美元数额，“不过我现在终于回来了，之前订下四千元手机，还以为自己不能过来拿货，还好终于赶上，我又能赚钱了。”他过两天又要飞回家，走之前会仔细检查每一部手机。我第一次结识与他同行的朋友，那个人即将去中国内地南边，他拿到中国签证后说：“在中国内地买衣服比在香港划算得多，我能按自己想要的款式订做三万件衣服。”这两个尼日利亚人都很担心波动的汇率会削损利润，更不用提他们祖国海关变化多端的关税，以及在重庆大厦等地被骗的风险了。他们说“赚钱难啊”，其他很多商人都这么认为。

再走几步，我见到一位印度朋友站在警岗附近，他白天在一家香港的大公司工作，晚上回到重庆大厦帮家人打理旅馆。他现在的烦恼不仅是时间不够，还有他的香港女朋友，他的家人根本不肯接受这对情侣。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应该选择女朋友还是家人——此时此地，除了等待别无它法。接着我邂逅了一位来自西非的朋友，他最近在中国内地南方做起了生意。与其他我见过的非洲商人不一样，他以20万美元的在港投资申请到了香港身份证，精明的他把这20万用来租用和翻新一家位于重庆大厦的电子产品店铺，希望其他的非洲兄弟和穆斯林朋友会来光顾。他的妻儿最近也搬到香港，他认为香港是一个他们

能扎根的新家，“香港值得信赖”。当然，我不清楚他能否把那二十万赚回来，特别是现在低迷的经济已经影响了包括重庆大厦的全球市场。但这个人虔诚地相信，只要自己一直做一个诚恳的穆斯林，就一定能在大厦里功成名就。

再走几步，我见到一位只见过一次面的年轻南亚人，他说自己已经失业并陷入绝望了，“我还能做些什么？我一点儿钱都没有，家里的人还都指望着我啊！”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否属实，不过他确实看上去惊慌失措。我不了解这个人，但还是塞给了他100港币并祝他好运。我并不想扮演上帝的角色，但还能怎样？好多人都有跟他相似的遭遇。我再来重庆大厦的时候，就没见到这个人了。事实上，我从此都再未见到过他。

以上所述的人们都是重庆大厦的常客，也是本书主角。在第一章，我将重庆大厦作为一个地点来进行探究：包括它为何存在，它所代表的意义，其建筑风格和历史，以及相关组织架构。在第二章，我将详细描述重庆大厦中的不同人群，包括非洲和中国内地的商人、南亚掌柜、国际难民、性工作者、瘾君子、游客，还有我追随其中的一些人所进行的访问和记录。第三章会描述经转这栋大楼的货品，以及商贩和买家如何通过自己的全球网络销售这些货物。第四章将探讨约束大厦内所有事物的法律网络，特别是那些过着边缘生活的避难者。最后，我试图找出大厦对里面的人和对世界本身的价值，并预测其未来的发展变化。

这本书讲述重庆大厦以及其中的人们，但此书也与“低端全球化”相关。重庆大厦作为这种全球化的中心支点，连接着

世界上许多其他类似的支点，包括曼谷、迪拜、加尔各答、加德满都、坎帕拉、拉各斯、内罗毕等等。低端全球化与多数读者心中联想到的“全球化”一词很不一样——低端全球化并不涉及像可口可乐、诺基亚、索尼、麦当劳这类大型企业，也没有所谓的办公大楼、律师，或宏伟的财政预算。相反，低端全球化中的商人很可能只是用自己的行李箱，或是租用一些集装箱和货车去运送货品，他们越过边界，尽可能地躲避法律和版权的干涉，他们的世界由金钱主宰。这些个体离乡背井去其他地区寻求更好的机会，不论是通过打临时工，还是以避难者和性工作者的身份。这就是今时今日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全球化的主要形式。

重庆大厦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展现出无穷的经济力量和人力物力，但与周围发达国家的经济规模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了。离大厦仅仅十分钟车程以外，香港尖沙咀和中环商业区集中了财富和高端全球化成果，残旧不堪的重庆大厦相比起那些办公楼，可谓两个世界。这本书不仅仅讲述重庆大厦的故事，也讲述世界关系网的非凡之处。

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

重庆大厦是一个令许多香港人却步的地方。这里有几则从中文博客和聊天室摘录的典型评论：“我每次路过（重庆大厦）都好紧张……总觉得自己进去就会迷路或者被人绑架”^①；“我不敢去，里面好像有许多色狼流氓”^②；“我看见一群黑人、印度人站在一栋大楼前，我抬头一看是‘重庆大楼’，如传说中那样真的是黑成一片，因为全是一团黑的人在里面”^③；“今日我和同学去吃咖喱，是我第一次去重庆大厦，好像去了另外一个国度。咖喱还不错，但是我刚进去还是很怕……因为爸爸警告过我不要进去”^④。如以上评论所指，一些香港华人，特别是年轻人，对重庆大厦的兴趣主要是为了光顾高层的咖喱餐厅，不过更多人还是害怕走进这栋大厦。

这种恐惧心理可以放大至整个香港地区，在许多发达国家

① IrisC 的 Flickr 网站，“Chungking Guesthouse”，2008 年 2 月 4 日，<http://www.flickr.com/photos/pahud/2242268104/>（2009 年 3 月 6 日查阅）。

② Li-jing Zhu, Annie Gu 网站，“Chungking Mansions”，2008 年 6 月 28 日，<http://anniegwj.spaces.live.com/blog/cns!503FF852A409141B!7073.entry>（2009 年 3 月 9 日查阅）。

③ C. C. Chiou 网站，“Chungking Building/Complex”，2008 年 6 月 16 日，<http://blog.udn.com/minfengchiou/1963100>（2009 年 3 月 6 日查阅）。

④ Lailing，“Chungking Mansions”，2007 年，<http://lailing.motime.com/post/661599/> 重庆大厦（2009 年 3 月 7 日查阅）。

的评论家话语中也显而易见。以下几段话摘自一些欧美记者的网络评论：

有些家长的孩子们在亚洲背包旅行，家长最担心害怕的就是重庆大厦……世界上最锦绣繁华的一个城市，却有这样一个藏污纳垢和鱼龙混杂的廉价住处，更不用提它里面有多少潜在的火警和健康问题了。^①

重庆大厦是独一无二的地方，我能在一个戴眼镜的喀什米尔老板那里同时买到性玩具、周杰伦的盗版光碟、一本全新皮质封面的《可兰经》，他居然还能用五种货币找钱给我。我还能在重庆大厦的走廊过道和楼梯间，买到飞往孟买的打折机票、两千支 Tag Heuer 牌子的伪劣手表，或买一张能不限时数致电尼日利亚拉格斯的电话卡……你能消失在这个地方。^②

重庆大厦为背包旅行的人提供非常廉价的住宿，同时也是许多非法活动的庇身之所，包括容纳非法逗留的人。这是个罪恶滋生的温床，有毒品交易、性交易等等，世界上所有的丑

① Hamish McDonald, "Vice HQ Gets Facelift, but It's Only Skin Deep", Age, 2005年5月11日, <http://www.theage.com.au/news/World/Vicc-HQ-gets-facelift-but-its-only-skin-dcep/2005/05/10/1115584956620.html> (2007年9月27日查阅),

② Karl Taro Greenfield, "Hope and Squalor in Chungking Mansions", World Hum, 2007年8月13日, http://www.worldhum.com/features/travel-stories/hope_and_squalor_at_chungking_mansion_20070813/ (2007年9月27日查阅),

恶行径你都能在重庆大厦找到……就个人来说，我只会去那里吃咖喱。^①

重庆大厦的昭彰恶名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它曾经是许多西方嬉皮士和背包客的逗留地。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初，这个恶名继续蔓延。1994年王家卫拍摄《重庆森林》，讲述了发生在重庆大厦里的后现代爱情故事，再次加强了大厦的黑暗象征，扭曲了其真实面貌。实际情况是，香港华人在九十年代初一般不会来重庆大厦，即使到了那种地方也不可能有电影所表现的行为。然而，这部电影准确地抓住了那个年代重庆大厦的面貌特写，而这种恶名延续至今，主要因为后续不断有大批南亚人和非洲人来到重庆大厦，在有点种族主义的香港华人和某些发达国家的人眼里，与那些来自穷国的同胞打交道还真的是让人为难。

许多香港人和发达国家的人对重庆大厦感到害怕，主要因为他们觉得好多来自发展和落后地区的人想来香港抢夺财富。文初所征引的文字夸大了重庆大厦的危险性——有些香港警察向我坦言，比起许多其他同样大小的本地楼宇，重庆大厦里面的犯罪率小得多，因为重庆大厦位处中央，而且那里经常有保安和警察出没。但那些引言仍然反映了部分事实，即重庆大厦位于香港，但它不属于香港。它仿佛是一座来自发展中地区的

^① Gossip Cafe 匿名留言，2002年7月11日，<http://www.securework.com/hk/viewforum.php?f=3>（2007年9月27日查阅，网站现已关闭）。

外星孤岛，降落在香港的中心地带，这才是令大家畏惧的地方，而并非什么犯罪问题所导致。这也是我为什么将此书取名为“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

边缘地带（Ghetto）一般定义为“由于社会、法律、经济压力的原因，一群少数民族集中居住在城市中的一个地区”。然而，重庆大厦只是一座大楼而非地区，其中的居民也不仅仅属于一个少数民族，而是包括了各种各样民族背景的人。当然，重庆大厦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边缘地带，特别因其居民都是非白人及非香港华人的少数民族，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被香港主流经济排除在外。本地人由于对发展中地区所知甚少而产生惧怕，所以重庆大厦也因社会歧视而被隔离开来。对许多像上文引述过的人来说，重庆大厦是香港社会的他者。而对居住在世界上一个最富裕社会的本地人来说，重庆大厦就如香港的一颗“黑色的心脏”^①。

可是重庆大厦就算被看作是一个边缘地带，也不算典型。大厦中多数人作为低端全球化的工人和零件，其生活样貌还是十分资产阶级的，他们代表了南亚和非洲发展中国家的努力奋

① 一些人曾将重庆大厦与1993年清拆的九龙城寨联系在一起。九龙城寨与重庆大厦相隔几公里，是一个从未完全被英国殖民政府管制的地方，在二十世纪一度是香港嫖娼贩毒和其他犯罪活动的滋生之地。城寨被警察控制之后，又长期陷入了黑社会的控制中。对当局来说，重庆大厦从未离谱得像过去的九龙城寨一样，把这两个历史时期不同的地方拿来比较也不恰当，不过，九龙城寨和重庆大厦都被多数人看作是香港的“他者”、香港的“黑色心脏”，从这方面来说二者确实有相似之处。

斗的中产阶级。香港人或许觉得重庆大厦是一个连地狱都不如的危险之地，一些来此住宿的游客说不定也这么想，但是对于许多工作生活在大厦里的人来说，“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是他们的希望之光，是逃离发展中地区穷苦生活和通往锦绣前程的机会。在重庆大厦工作或做买卖的南亚人及非洲人，不论持什么宗教信仰，不论是穆斯林、印度教徒、锡克教徒，还是福音基督教徒，都在这里活脱脱地体现了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辛苦工作，努力攒钱，加上多多少少一点运气，一定能让他们买到幸福之号的船票。^①

但究竟为什么重庆大厦这样一个“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一个位于香港的发展中国家孤岛，会存在于世界上呢？

^① Weber 1976。

重庆大厦为何存在以及为何值得关注

对于这个问题有三个答案：第一，这座大厦价格低廉；第二，发展中国家居民能比较容易进入香港；第三，中国南方渐渐成为以制造业为主的重要地区。

第一个关于重庆大厦为何存在的实际原因是，那里的饮食起居都很便宜。许多发展中地区来的人都会对香港的高物价发出感叹，但位于市中心的重庆大厦的住宿价格却格外廉价，一间单人房一晚上才 100 港币，在这里吃饭和购物也算是香港最便宜的了。为什么这里与外面的物价差这么大？

一方面，重庆大厦的物业所有权并没有统一，长期以来物业管理机构十分薄弱，令大厦一直处于修缮不佳的状态，直到近年才有所好转。但这并不是充足的理由，因为香港有太多楼宇在过去几十年里都没有统一的物业所有权，却没有出现像重庆大厦这样破破烂烂的景象。所以说重庆大厦的廉价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

下文将详细探讨重庆大厦的历史背景，现在先列出几个因素。这栋大楼一开始就有许多南亚人，其人口逐年增加，而由于香港社会对南亚人有许多偏见，所以这个地方在香港人心中被贴上了黑色标记，于是大楼物业价格一直很低迷。上世纪七十年代，大厦因为被写入《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 而突然开始小有名气，许多嬉皮士和背包客前来入住重庆大厦的廉

价旅店，于是许多本来住在大厦里的华人开始将物业改建成小旅馆，每个旅馆有十几间狭小的房间。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大厦里经常发生火警和停电。2000年初，非洲商人开始大批抵达重庆大厦，和以往的嬉皮士一样，在最廉价的住处扎堆。这些因素使物业所有者能够以便宜的单位价格获取最大利润。正因为重庆大厦“腐朽”，才能如此廉价，才能与周围的发达区域共存，而且还不分伯仲。你随便去加德满都、加尔各答、达累斯萨拉姆问问香港哪里最便宜（我亲身试验过了），都能很容易得到“重庆大厦”这个答案。

重庆大厦之所以能在香港存在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香港有较为宽松的签证条例^①。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访客必须在抵达之前申请签证，不然坐不上飞机。即便他们到达了目的地，如果被发现没有申请签证，也会被立刻遣返回国。香港比较特别，访客即便没有签证，也可以在港逗留十四天、三十天或是九十天。于是，许多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商人来香港并不事先申请签证。即便只有三十天甚至是十四天的逗留期限，他们也足以来重庆大厦查验货物，购买商品和进行贸易，在时间充裕的情况下回国。

一些商人只在香港逗留，还有更多人会去中国内地。他们在香港能很快申请到内地签证，如果找中港旅游中介就更加快捷。进入内地后，他们造访各类批发市场，购买货物，返回香

^① 香港签证政策相对独立。一般来说，本书中提到的警察、政府、和法律都由香港政府而非中国政府执行。

港。货物通过他们的行李箱或者经转海运和空运送回老家，运送方法取决于货物的质量及价格，运输过程不过几天到数周而已。来往香港的国际航班比来往内地的要频繁一些，尽管近年来内地的国际航班越来越多，但是许多商人还是宁愿先到香港，再转车去其他地方。重庆大厦既廉价，又是一个结算和信息交流的主要地点，所以自然而然就成为商人的第一站了。

最近几年，香港政府加强了入境管制。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孟加拉、加纳和尼泊尔等国家的公民，入境时都须出示签证。这个变化主要由于有些人频繁地在港进行毒品交易和其他违法活动，其他则是由于出现太多来自这些国家的人申请国际避难。类似的管制对重庆大厦有很大的影响，最近几年大厦内的尼日利亚人、加纳人和孟加拉人少了许多。然而，许多留在重庆大厦等着申请联合国难民署或是香港政府避难待遇的人，只好无限期地逾期逗留。因为香港有越来越多的国际避难者，政府受到各界压力，因而再次收紧入境规定。不过直至今日，此类规定还未见实施，所以重庆大厦仍然受惠于这一项不寻常的政策：香港这个发达地区的政府向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人敞开大门，虽然只是几天，但已经让重庆大厦之存在获得足够动力了。

第三个原因是中国特别是南方省份的经济崛起并成为世界工厂。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商人蜂拥而至，在重庆大厦或在中国内地购买中国制造的货品，包括二手和伪劣仿冒的手机、衣裳、建筑材料、家具，甚至是漩涡浴缸（我听说东非的有钱人和政府官员特别喜欢买这种浴缸），还有蛋白石精品（它们在澳大利

亚被挖掘出来，通过重庆大厦运往中国内地南部进行雕琢，然后再运回澳大利亚，卖给中国游客)。正如历史上的角色，香港仍然担当着中国对外贸易的门户，现代国际商人既能去中国内地购买商品，也能通过香港的中间商买中国制造的货物，这些货物的价格和质量普遍比较低下，却是发展中国家消费者能够负担得起的货品。

重庆大厦因上述三个原因而存在，但它为什么值得我们关注？为什么我要写一整本书讨论它？最简单的理由在于它囊括了世界上各种背景的人物。这些人如何互动交流？甚者，重庆大厦如何教会我们今日全球化社会的运行法则？

如之前所说，我是一位人类学家，而人类学的学科特点就是民族志——一种针对一小群人们互动和生活方式的记录，这些详细的记录往往基于几个月至数年的田野考察。全球化作为一种庞大和抽象的领域，常常成为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但是人类学家也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譬如 Arjun Appadurai 和 Ulf Hannerz^①，他们的功劳主要在于通过民族志表现出全球化的抽象性，如何在特定的地点形成了特定人群的生活方式。

数以百计的民族志阐述了全球化对于世界各地人群的影响，但甚少有文章提及全球化的交汇处。这些交汇处不是国际机场或大都会酒店——虽然这些也是全球化的空间，但其中的人们并不会互动。我所说的交汇处是世界各地来的人们在商贸和娱乐中一定会进行交流的地方，在人与人层面上体现和印证“全

① Appadurai 1996 ; Hannerz 1996。

球关联之强化”。^①描写全球化交汇处的民族志，能显示我们耳闻目见的全球化，表现出有血有肉的人如何在文化互动上交流取舍，此等文章较为稀罕。

重庆大厦恰恰是这样的交汇处。虽然《孤独星球》声称“或许世界上再没有像重庆大厦一样的地方”，但我们不一定要把这栋大厦看作多么的独一无二。^②纽约市、伦敦的布里克斯顿或威尔斯登、日本东京的六本木，还有许多类似的地点，都能反映全球化的方方面面，它们的许多特点在重庆大厦中也能见到。^③相比之下，重庆大厦不仅仅是全球化的一个中心，它是一种特定的全球化形式的载体，即我之前提到的低端全球化。

我对低端全球化的定义为，人与物品在低资本投入和非正式经济（半合法或非法）情形下的跨国流动，其组织形态常与发展中国家联系在一起。在低端全球化之下，非洲商人提着塞满几百个手机的行李箱回到家乡，南亚临时工给家里捎去几百美元的应急钱以及超乎想象的经历和故事。虽然跨国公司是各种新闻报纸财经版的主要讨论对象，但它们对普通老百姓意识层面上的影响微乎其微。而对于在重庆大厦工作和生活的人来说，许多小商贩和非法工作者带来的货品、想法，包括媒体都对人们产生了深远影响。

世界各地有许多低端全球化的市场，比如曼谷、加尔各答、

① Inda and Rosaldo 2002, 2。

② Fallon 2002, 198。

③ Blommaert, Collins, Slembrouck (2005) 讨论了位于比利时根特 (Ghent) 的相似全球化地区，无疑也是世界许多全球化地区之一。

内罗毕，也包括巴黎、伦敦和纽约。有一些市场可能远在阿根廷、巴西和巴拉圭交界的埃斯特城，^①也可能在临近重庆大厦的广州越秀区和三元里，亦或是义乌之类的中国内地城市。在本次研究中，我与研究助理去过许多上述地区，花几天到几周的时间与当地商人倾谈，我们去过广州、加尔各答、迪拜、内罗毕、蒙巴萨、达累斯萨拉姆、坎帕拉和拉各斯，在多处地点的民族志纪录中寻找将重庆大厦与亚非发展中国家相联的低端全球化网络。

近年来的民族志研究者经常强调，单一地点的民族志已经无法满足人类学家对世界的了解，多地点的民族志才是我们寻找世上各种事物关联的研究方法。^② 尽管研究不免受到时间和资金的局限，但我们尝试以重庆大厦为基地，寻找其经济网络。单是一座重庆大厦就可以写出全球性的民族志，我们的旅程让我们对于大楼与其中的物品交易和交流有更深层次的理解，推导出它在发展中国家之间有怎样复杂的联系作用。重庆大厦向世界各地延伸出连接线，而世界也就由这一座大楼反映出来了。

重庆大厦仿佛是一个被浓缩的环境，让我们观察到世界和它的交流。在这样的弹丸之地，有如此多样的族群和多层次的文化交流——从谈生意到探讨哲学，从印度煎薄饼到性，可以和各种文化背景的人谈天说地。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世界上实在找不出与重庆大厦类似的地方了，只有它能在很小的空间里

① Ribeiro 2006。

② Marcus 1998 ; Hannerz 2003。

集中表现出低端全球化的特点。我们需要了解重庆大厦和其中的人们，因为这栋大厦中的全球化本质上是世界上大多数人们所经历着的全球化。重庆大厦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同社会背景的人怎样相处？他们如何塑造各自全球化的生活？他们都去哪些地方，做什么事情？他们的跨国旅程、技巧和方式是什么样？他们如何理解自己的跨国生涯？这本书将一一解答这些疑问。

大厦

重庆大厦不同寻常的地方在于，虽然它是全球化交汇处，实际上也不过是一栋单独的大厦而已，而人类学家甚少单独研究一栋楼。Gelberto Velho 曾描写位于里约热内卢科帕卡巴纳的一座大楼，居住在其中的白领居民如何摆脱污名；Laura Ring 也探讨过巴基斯坦卡拉奇的居民，一栋公寓楼里的家庭成员如何保持和平共处的关系；Theodore Bestor 写的地点与重庆大厦有些类似，位于日本东京的筑地鱼市场。^① 尽管有这些值得注意的例子，人类学家还是常常忽略楼宇，因为很少有一栋单一建筑独具研究价值，而重庆大厦正是一个例外。

大厦底座有两层——按照英国人留下的惯用语，即地下以及一楼（下文中我也沿用此英式用语）——这两层楼大约 85 米高，58 米宽，主要用作零售和批发类型的购物商场。二楼有一个高档精品商场被隔开独立运行，名为“重庆森林”，它虽然是重庆大厦一部分，却是全然不同的世界，来购物的人从拥挤的弥敦道上通过扶手电梯进入商场，其唯一与重庆大厦相连的后门永远紧闭着。2009 年开始运营的这个商场属于重庆大厦底座，但完全被割裂开来。三楼以上有三栋建筑一直延伸到十七楼之高，人们可以从楼梯间步行上去，不过大家一般会从地下

① Velho 1978 ; Ring 2006 ; Bestor 2004.

挤电梯上楼。^①

这几座楼都有天井，形状不一，大约4.5米长、2米宽，从三楼一直通到十七楼。这些天井的设计理念倒是不赖，能从外界带入新鲜空气，让狭小拥挤的内部公寓得以通风；但是从楼顶的天井向下望那暗无天日、垃圾满地的穴洞，心里又别有一番滋味。曾经有一个作家带着一点夸张语气说，“就像窥视地狱一样，那里有重庆大厦倍受压抑的情感！”我1983年第一次以旅客身份住在重庆大厦，挂在窗外杆子上的衬衣掉进了其中一个天井里，后来有时想起，不知道那件衣服至今是否还在那个地方，可我没那个兴趣去查看（一些清洁工在天井底部打扫除，也许我的衣服早被捡走了）。

人们经常把重庆大厦与美丽都大厦相提并论，美丽都大厦距离重庆大厦以北一个街道，也拥有很大一批南亚居民和旅店，住宿价格相对贵一些。美丽都大厦的生意没有重庆大厦那么繁忙，主要顾客是欧洲背包客和中国内地游客，而非发展中国家的商贩，所以不是此书探讨的重点。但这两座大厦建筑上的区别值得一提。

重庆大厦使用了香港六十年代常见的本地建筑设计，包括两层的底座建筑及位于其上的多座大楼。最近有一份针对重庆

^① 人们常常以为重庆大厦包括了A、B、C、D、E五座，但其实B座和C座属于同一栋大楼，D座和E座也是如此。因此，重庆大厦实质上只有三座楼。其中A座在建筑构造上比其他几座楼宽敞，走廊空间也有两倍大，所以A座旅店最多，生意也最兴旺。大厦里一共有五个独立电梯，分别服务于A、B、C、D、E五座大楼。

大厦的调查报告显示，其设计与当时香港许多其他建筑类似。^①但是，与几乎同时期建造的美丽都大厦相比，重庆大厦的特征更加突出。虽然美丽都大厦有非常相似的建筑设计，但它三楼的天井更加宽敞明亮，这个宽敞的空间一直延续到顶楼，四周的公寓围绕着这个天井。每一层楼上的旅店和其他商铺通过走廊连接到一起，共用宽敞的空间。而重庆大厦就不一样了，其中三座建筑以及五个独立大楼各自为政，人们必须返回到地下，才能转换电梯去另一座楼。

重庆大厦常常被描述为一座迷宫，其建筑结构足以说明缘由。我们可以用一句“你不能从这里直接走到那里”来描述重庆大厦错综复杂的大楼关系，一个人能迷失在重庆大厦里面。我认识几个旅店伙计，我从来没见过他们离开旅店或狭小的周边空间——他们也许在少数情况下去底层，但一旦他们身在大厦高层，我就得搭五至十分钟的电梯去那里找他们。救护人员、消防员和警察也难免要在电梯间等待，这是一个大厦的安全隐患。

你从弥敦道到达重庆大厦的门口，先一眼看见大约八个货币兑换商铺，门面大小和声誉好坏不一。尽管其中几个店铺张贴出价格诱人的广告，但其兑换率可谓全港最差。当然也有几个提供香港最好的兑换率，包括国泰航空空姐在内的不少人都去重庆大厦的店铺兑换货币。现在，许多货币兑换商铺和大厦内的其他店铺做起了汇款业务，汇款渐渐成为主要盈利来源，

① Jaggi et al. 2008。

非洲及其他地区的商人通过这些重庆大厦的店铺与中国内地的联系人相互汇款——这生意利润颇为丰厚。

你漫步经过货币兑换店，来到信息栏，边上站着一位保安，他主要负责为迷路或困惑的香港华人指路。重庆大厦的保安处是讲理，但是不怎么会讲英文，而重庆大厦中的许多国际人士又不会讲粤语，因此保安对那些人的帮助不大。在你现在所处的位置，走廊左右遍布各种店铺，两端垂直延伸有四条走廊，同样挤满了人和商店。中间两道走廊有五个电梯口，各自通往A、B、C、D、E五座大楼，从早到晚都有几个到十几个人排队等电梯，特别在有許多旅店的A座。每部电梯最多只能载七八个人，如果电梯里正运载去往高层的货品，那么可站进去的人数就更少了。如果电梯发出超载警报，最后进入电梯的人就要扭转一下身体，或是移动一只脚摆放的位置，警报才会停止响闹，每一个在重庆大厦待久了的人都知道这个诀窍，以免自己还要等下趟电梯。

底层一百四十多家店铺贩卖的货品让人眼花缭乱，拿2009年的重庆大厦来说，其中大概有十几家电话卡店，提供拨打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和巴基斯坦的廉价电话卡。另外还有五家网吧和十二家餐馆，包括名为“旁遮普快餐”和“拉合尔速食”的小食铺，诸如此类的食肆只有几张桌凳，菜肴价格相当便宜。当然，其中也有两家餐厅装潢了玻璃门面，显示其档次较高，这一层的餐厅不时提升食品种类和质量。曾有一家24小时通宵营业的体育酒吧，许多非洲顾客好笑地问为什么要在凌晨两观看板球赛，后来酒吧确实很快停业了。2009年大厦里开了几家

土耳其-巴基斯坦餐馆，以迎合吃不惯南亚辣味菜肴的非洲商人，餐馆生意十分红火。

还有大概十五家手机铺和三十家服装店，有些服装店零售嘻哈风格的衣服，但是大多数批量贩卖西方和非洲风格的衣服、鞋子。另外还有十五家手表店，多为批发类型；还有十家左右零售和批发电子产品的店铺；三家南亚影碟商店；有一家礼品店不仅出售佛像和瑞士军刀，还在门外走廊摆摊卖色情刊物，如果突然有人想找文学类读物，也能在此找到相关的高级书刊；有几家货运店铺，还有十几家专卖罐装饮料、果汁和南亚糖果的铺子；有一些铺子也做威士忌的生意。这些商店往往有很高的流动率，但有时却有令人惊奇的寿命。我知道有四家店铺的老板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就一直在大厦里做生意了。

重庆大厦一楼大约有一百二十家商店，与底层相比多出了许多手机店。当然也有其他的商店，包括货币兑换店、旅行社、莎丽销售店、网吧、理发店，还有人迹罕至的中国餐馆及其它几家食肆、一家伊斯兰书店。大约八十家的多数店铺主要批发手机——回收的、二手的、翻新过的、假冒伪劣的——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来自非洲的买家。大厦一楼比底层安静，却是重要贸易发生的地方，成千上万的手机在此达成交易。

手机贸易是相对新出现的经济现象，大概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开始。仅在我做田野考察的最后三年中，重庆大厦底座两层的商店及生意已经变化莫测。2006年9月，底层和一楼一共有四十七家主要经营服装生意的商店，但是到了2009年4月，数量下降到三十三家。2006年9月，有七十九家手机店，至

2009年4月，数字升到九十八家。也许其中有店主们的羊群效应心理在作怪，然而趋势更反映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消费者需求的变化，他们对手机的需求甚于手表、珠宝和衣服，手机可**谓是通往现代化的经济生命线。**^①

正如我之前所说，重庆大厦里你什么东西都能找到，从旅店到清真烧烤，从价格各异的威士忌到性、电脑修理、卫星电视、装置在钢笔和眼镜里的隐蔽摄像头、文具、生活日用品、洗衣服务、药品、国际避难方面的法律咨询服务，还有基督徒和穆斯林的精神食粮等等。一位阅读量很大的采访对象说：“重庆大厦有一套自给自足的生态系统。”一个人可以数星期甚至数月都不用离开重庆大厦，因为生活所需的一切东西几乎都能在大厦里找到。

在这个生态系统里，劳动分配明显与种族相关。重庆大厦里许多商铺业主是过去四十年里移民到香港的中国内地人。这些业主极少造访重庆大厦了，而把经营权交给南亚人，最近也开始有中国内地新移民经营店铺。虽然重庆大厦里有许多非洲面孔，但没有多少非洲人在店里当掌柜，主要因为非洲人很少有在香港合法居留的权利。一些在香港生活了几代的南亚裔人有居港权，也有的南亚人在1997年香港回归和英国殖民结束之前拿到了居港权，从那以后，南亚人就通过这些亲戚获得居港权。重庆大厦里虽然有许多南亚人持旅游签证或避难者身份工

① “Mobile Marvels: A Special Report on Telecoms in Emerging Markets” *Economist*, 2009年9月27日。

作，但他们一般能较为安全地避免入境处警察审查，因为有许多其他在大厦内工作的南亚人有合法居留权。可是非洲人在大厦里太显眼了，他们没有多少人能合法居留香港，所以大厦底层几乎没有什么商店聘用非洲人。当然也有很多例外，但简单说来，重庆大厦底座两层的种族景象是这样的：香港华人业主，南亚裔的经理和职员，还有非洲及世界其他地方来的顾客。

让我惊奇的是，重庆大厦底座两层的开放式商场并没有形成一个社区。尽管大厦里的一些重要新闻会迅速传开（“我听说今天下午C座发生了抢劫案”），但是很少有店主对大厦本身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每一个族裔群体在不同程度上自成一体，比如旁遮比人也许认识其他的旁遮比人，可是他们对十米以外开店的中国人或是在拐角做生意的菲律宾人毫无认知，当然也会有一些例外，社交能力强的店主通晓大厦内的事物。有许多人并不知道周围发生什么事情，特别是那些坐在被玻璃墙围起的店铺里的人，这些店主完全被隔离在里面了。我认识一位底座商铺的华人店主对避难者和非洲人颇有不满，但在他与世隔绝的小店里，他从来没遇上那群人。我还认识其他几个华人店主，说自己从来没吃过南亚食物。南亚人和非洲人更愿意参与多文化间的交流，但也有一些人不太清楚重庆大厦的整体情况。多数店主都被局限于离自家店不超过十米的范围，这个范围是他们最了解的重庆大厦小世界。

每一个小世界都有自身独特的运行策略和故事。我举几个例子，曾经有一位经营百货商店的香港华人，主要业务是向在附近海港口岸的水手贩卖大瓶威士忌，因为他们每人回到船上

只能带一瓶酒水。但随着几年前海港贸易的削减，他将小店里很多陈列架改成一行行鞋架，贩卖鞋子给非洲商人，于是他的店铺里现在既卖威士忌，又卖鞋子。还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菲律宾女人，嫁给了一位更加年长的巴基斯坦男人，并像母亲一样无微不至地照料他的店铺。周一至周六，她售卖南亚食品，主要是茶，多数卖给将她小店变成公共广场的索马里避难者。到了周日，她就开始卖菲律宾食物给那些周末终于能够享受假期的菲律宾佣人。

另有两位年迈的香港兄弟经营着一家电子产品店，贩卖廉价但并非仿冒的货品，他们没办法跟附近的店铺一样卖假货，经常惋惜自己的店子生意不好、人烟稀少，并对大厦中香港裔店主数目逐渐减少而痛心疾首，“像我们这样的越来越少了”。还有一位曾经经营旁遮比小食摊的店主，倾家荡产把生意搬进崭新的店面，结果闷闷不乐地看着新店门可罗雀。他问我：“你不是大学教授吗？为什么你不去叫记者和摄像师来给我的餐厅拍些相片？”值得庆幸的是，虽然我没有帮上什么忙，但最终还是有有一些客人开始光顾他的小店。以上这些都不过是我这些年听说的有关重庆大厦的几个经营故事而已。

现在让我们移步到楼上。重庆大厦所有大楼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众多的小旅馆，每间旅馆大概有六至十二个房间（当然也有几间较为大型的旅馆），重庆大厦里这样的旅店总共有九十间左右。

每天晚上，大厦可以给访客提供超过一千多张空床。所有旅店房间都狭小得令人瞠目结舌，其大小当然也因价格而异。

房间里一般只放得下一张床，另外有一个隔开的盥洗室，坐厕顶上就是洗浴的莲蓬头。大一点的房间也许有一个床头柜之类的摆设，或是有两张床。多数客房有一个吊式电视机和空调，有的还有电话机，地板铺有瓷砖，让屋子看起来更像洗手间了，不过也确实能避免蚊虫滋生。更加廉价的客房没有铺瓷砖，所以许多重庆大厦墙缝里会有蟑螂钻出来，幸好我至今只在铺瓷砖的客房里见到过一只蟑螂。

在过去几年里，我渐渐适应了这些子宫一般狭小的房间，但仍然对一件事耿耿于怀，就是许多房间没有窗户，或是唯一的窗户朝向那永远黑夜般的天井里，睡在房间里的人永远不知道白天与黑夜的区别。由于火灾的可能性，我总是在床头放一个手电筒，但我从来没使用过它，入境处警察上门来查住客身份的时候，我也从来不起床应门——我听说过这些搜查行动，但从未亲身经历过。

重庆大厦的电视机是多数客房的关键陈设，它们与香港其他酒店的电视机完全不一样。这里的电视机有十六个频道，有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的独立频道，也有BBC以及许多非洲人会观看的法国第五电视台，还有一些香港人和中国内地人看的中文频道。这些电视频道对重庆大厦影响颇深，每个国籍的人多多少少将生活沉浸在相应的节目中。在大厦隔壁的假日酒店，客人能观看CNN和HBO，但如果要看南亚国家的电视台，就必须到重庆大厦才能找着，大厦旅店老板和伙计对家乡发生的新闻事件了如指掌。旅客进入一间客房打开电视机，就能通过出现的频道节目判断上一位住客的国籍。

一般来说，旅店不采用具有种族歧视的市场营销策略，不过仍然会较为针对某些类型的顾客。有些旅店为了吸引更加有钱的游客和商人，大张旗鼓装修一番。这些店的单人房每晚收费 180 至 300 港币甚至更贵的价钱（一般来说在四月份和十月份价格上涨，主要因为届时召开广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虽然这些客房也很拥挤，但一般打理得还算干净整洁，有些豪华客房有更加奢侈的设施，包括挂在墙上的画、平板电视机、冰箱。有的旅店买下邻近的私人单位，将其改装成非正式客房，以在该店供不应求时接纳旅店访客。其中一些旅店主要瞄准中国内地游客，因为有越来越多中国内地游客来重庆大厦住宿。也有一些旅店主要做西方游客的生意，其中有一间背包客最爱的便宜住所，在那里，时光仿佛倒退了三十年一样（有几个住客一直在那里待了好些年）。2008 年，我第一次发现有几家旅店开始接受信用卡付款，同时在网上颇受欢迎——有些旅店的网站对自己位于重庆大厦的信息轻描淡写，甚至略过不提。

有的旅店特别针对省钱意识强的小商人，这类旅店常年不作维修，而且还提前宣传店里有四十公斤的称重器，可供商人称量自己的行李箱，以免超出航空公司限重规定。购买手机和衣物的小商贩特别担心行李会超出航空限重，所以称重器专为他们而设。附带独立浴室的单人房在这些旅店一般收费每晚 100 至 150 港币，不少商人三三两两地挤在一个单人房里过夜。

我曾住过许多旅馆，总体感觉还算朴实实用，只有两次令人气馁的住宿经历，令我不得不在天亮前离开客房。其中一次，我向旅店经理要一双拖鞋，以便在浴室和厕所合二为一的狭小

空间里使用——其实旅店一般都应该提供拖鞋的，经理居然脱下自己脚上的拖鞋给了我。在这些廉价旅馆里，职员们一般就睡在大门边地板上，有些回来得比较晚或是清早出发的住客还会被睡着的职员绊倒。

有的旅馆主要面向长期逗留的租客，其客房就更加昏暗廉价了。这里面有些旅馆有合法经营的标识，但大多数都没有。许多租客会找一两位同伴合租一间分担租金。一个普通公寓大概有六间房间和十五位租客，随着租客签证过期或是存款日益削减，有些旧面孔的租客消失，又有新面孔出现——在少数情况下，当然也有一夜致富的商人搬去更加舒适的住处。

除旅店外，大厦内还有旅行社等其他生意，旅行社专门办理几小时内就能获取的中国签证，其他生意包括服装批发，贩卖猫眼石之类。大厦内有几百个公寓属于私人住宅，其中有多少实际上是旅店就不得而知了，也有一些为国际避难者或瘾君子提供帮助的政府部门和慈善机构。

在重庆大厦的高座楼层，大约有十二家声名在外且合法经营的南亚餐厅，还有一些供应非洲菜的无牌经营的餐馆。最负盛名和顾客最多的餐馆，往往就是那些派人在重庆大厦门口招揽顾客的。令人称奇的是，这几间餐馆是重庆大厦中唯一几家看起来有香港风格的餐馆，因为其服务生往往会说粤语。同样说粤语的顾客在此享用菜肴，与他们在香港其他地方吃饭毫无分别。这几间餐厅同时也是重庆大厦内唯一能招揽到许多香港本地顾客上门的。没那么出名的其他众多餐馆只能吸引各自同乡背景的客人，不论是孟加拉国人、南印度人、尼泊尔人还是

非洲人。供应非洲菜的几家餐馆主要由嫁给非洲人的香港女人打理，她们在门口安装摄像头，以防入境处官员来搜查逾期逗留的客人。重庆大厦中大批非洲商人为大厦生意的繁荣作出贡献，但是他们只能在大厦里的无牌餐馆找到可口的非洲饭菜，真是一种讽刺。

重庆大厦底座被几条水泥通道围绕，通道里有一些硬纸板棚屋，十几个瘾君子就住在那边。通道中有几家生意门面，包括几家南亚的小百货店，一家手机修理铺，还有一家远近闻名的货摊，供应一种非洲人称之为“雄狮之泪”的酒，以及一种倒在泡塑杯子里的印度威士忌，只卖5港币一杯。非洲和南亚裔的商人及过路客喜欢在这里待上几个小时，也常常有穷困潦倒的人到此消费，这里也是唯一一处我被人威胁过的地方，同时也是唯一一个我知道有人倒毙的地方。但这里也是重庆大厦内社交活动最频繁的地点，与友善的陌生人交谈在此被视为常态——这就是重庆大厦的酒吧。

酒吧旁边有一条狭窄的走道通向重庆大厦以外的地方，这是许多南亚搬运工使用的主要通道，他们用小推车把打包好的商品推到外面的货车上，将客人和货物一起送到机场。通道外另一个方向有一座隐蔽的公园，名为讯号山公园。游人爬上山坡就能见到一栋建于1907年的讯号塔，一座令人回想起英国殖民时代的砖构建筑。^①行人从重庆大厦背后的小巷走出一百米距离，就能来到树木荫庇犹如置身森林的人行道。

① Wordie 2007, 26。

重庆大厦门口的弥敦道与其后巷的景象截然不同。弥敦道上行人川流不息，大厦门口大约三十多米的范围内，集中展现了各种文化冲击：来自非洲和印度的穆斯林摩肩接踵，穿梭于那些光顾附近酒吧、精品店、餐厅的香港顾客之中。在任何一个深夜，路边都有二十来个非洲人坐在弥敦道人行道的栏杆上，另外有二十个南亚人坐在已打烊的商店门口台阶上，还有一些旅店的香港老板仍在招徕顾客，有穿着短裙的香港姑娘抱紧男朋友的手臂，紧张地走过这些奇怪的人群，还有一些欧洲游客喝得酩酊大醉，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

对许多香港人来说，在星期六晚上十一点路过重庆大厦，仿佛出国旅游一般，他们有千万个不解。我见过一个年轻的非洲男人，他跟一位素昧平生的香港女人表白说他爱她，结果那个女人惊吓着逃离了那个地方。我还曾听说一个年轻的印度穆斯林对见到的不道德现象很愤怒，喊道：“有些女人简直一丝不挂！如果你想跟她们要电话号码，说不定她们还真的会给你呢。如果让我的家人见到这幅景象，我必定恨透自己！”——但是，他们继续凝视那些女人。香港人如此害怕深夜的重庆大厦，很大程度上与这些不懈的凝视目光相关。

这个场景的转角处是么地道，7-Eleven 店是非洲商人们交流生意秘诀的集中地。在 2007 年，有个非洲生意人对我说：“大家就在这里认识彼此，我们非洲人在这里帮助其他同在异乡的弟兄，这里是我们的酒吧，也是我们的办公室。”美丽都大厦就在这间 7-Eleven 店同一个街区的北面，再北边一些的路对面就是九龙清真寺，重庆大厦中许多穆斯林都去寺里朝拜。最临近

的麦当劳位于重庆大厦西边，重庆大厦的商人住客也经常光顾附近的超市。这些地点与各种著名观光地标一起，组成了重庆大厦的周边环境，但重庆大厦最真实的环境是整个世界。

历史

关于重庆大厦有一些零星的重要事件的新闻，但除此之外并没有与之对应的历史文献，所以这节主要是一篇关于大厦的口述历史。重庆大厦建于1961年，许多资料表明它在最初几年是一座高档的建筑。一位研究香港地产的学者告诉我：“重庆大厦从第一天起就已经闻名尖沙咀，就其高度而言，它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可谓十分高档——那个时候的尖沙咀并没有什么高楼大厦，所以重庆大厦算是鹤立鸡群。”早期的重庆大厦底层有一间带扶手电梯的商场和一间夜总会，还有一些高级珠宝商铺。甚至听说有几位香港本地明星和英国军官住在大厦里。^①

当然，我也从另外一些人口中听到对重庆大厦早期很高档说法的质疑。有一位曾在1962年至1964年间住在重庆大厦的英国人说：“那里一点也不高档……它的环境破旧不堪，建造得很廉价。”

另一位六十年代中期在重庆大厦度过童年时光的著名香港作家，向我描述大厦在那个时代像一个“垃圾堆”。重庆大厦逐渐与周围环境的发展脱节，第一个原因就是它低劣的建筑质量——这并不让人惊讶，因为香港仔六十年代初本就是一个贫

^① Richard Cook, "Miles Apar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97年9月28日。

困的社会。^①第二个原因是，我们所看到的大厦建筑设计导致其成为一个兔子笼。

重庆大厦一开始就有大量的南亚居民。前面我采访的那位英国人说：“我们住在重庆大厦的时候，大部分商铺由中国人经营，但也有许多印度商店……我估计有20%的商铺由印度人经营，他们比起安静的中国人来说较为显眼。”南亚人在十九世纪中后成为尖沙咀一景，因为当时香港殖民政府雇佣印度人作警员和士兵。^②重庆大厦附近的九龙清真寺始建于十九世纪末，1964年在弥敦道现在的新址重建，距离重庆大厦两个街区，这无疑导致了大厦内穆斯林人口的增加。

六十年代末，越南战争对重庆大厦造成了一定影响：尖沙咀周边成为美国官兵造访的红灯区。根据一位当时在重庆大厦附近工作的警察描述，美国军人站在大厦门口寻找妓女。作家许素细在她的小说《中国墙》(*Chinese Walls*)中写到重庆大厦，在重庆大厦昏暗如穴的门口，九岁的小说主人公看到有个妓女招徕美国水手，感到十分新奇。^③到了1969年，背包客和嬉皮士开始出现，一位美国人向我描绘了1969年的重庆大厦：

那里就是一个廉价大旅馆，住客来自欧洲、美洲和澳洲，特别是学生，还有一些嬉皮士和瘾君子……我最记得的是咖喱

① Mathews, Ma, Liu 2008, 27。

② White 1994。

③ Xuxi 2002, 5。

摊和私人住户里的印度餐馆……重庆大厦是一个阴暗得让人担心的地方，我害怕的倒不是被人攻击，而是火灾。大厦里有很多大楼，就像一个迷宫。

在六十年代末，重庆大厦确实经常发生火警。根据一位警察的说法，“救火车很难开进重庆大厦里，因为紧急通道都被堵住了。”

七十年代的重庆大厦成为背包客圣地。许多原本住在重庆大厦的香港华裔家庭渐渐搬去别处，将物业的日常经营交给上海人和其他新移民到香港的中国内地人，因为其物业价值已经略低于香港其他地方。这段时期，重庆大厦的私人住宅逐渐变成旅店，以获取可观的利润。

颇受欢迎的旅行指南《孤独星球》在这个转化过程中有着重要影响，其主编托尼·索勒的《鞋带上的东南亚》(*Southeast Asia on a Shoestring*)介绍了重庆大厦，引起众多西方年轻游客的注意。这本书初版是1975年，其1981年版写到一个“香港廉价住宿的魔力词汇——重庆大厦”。^①但这句话给重庆大厦1960年左右设计的电力系统带来了负担，设计之初香港只有少数人使用空调和电视。但当私人公寓被改装成旅店，每个房间都需安装独立的灯、空调，也许还有电视，就要用更多电力，因此让大厦变得更加危险。

1983年末，我作为一个青年旅客，在重庆大厦住了一个星期

① Wheeler 1981, 47; 原文为斜体字。

期，身边是成群的欧洲和日本背包客。大家住在宿舍一样的旅店中交流自己的旅行经验，比如去新德里和泰国的哪里观光，怎样拿到缅甸签证。我记得自己当时惊奇于客房的狭小和其他旅客的好色（一位年轻的英国女人向我发牢骚：“你是我遇见第一个承认自己已婚的男人。”——我当时独自旅行），还有尖沙咀黄昏时美妙的鸟叫声。一位在八十年代中期旅行的澳大利亚人告诉我，那时的重庆大厦有一股“淘金热”，许多旅店门口张贴招聘广告，雇人把黄金塞在肠子里，从香港偷运至尼泊尔，而当时尼泊尔严禁个人拥有黄金。1985年末，尼泊尔警方逮捕了一批这样的青年旅客，命令他们不停蹲跳，直到肠子里的金子全部掉出来为止，有些人甚至被监禁了很久。然而旅行的老前辈说淘金热依旧继续。^①

火灾仍然不断发生。最令人瞩目的事件发生于1988年2月，重庆大厦十一楼发生火灾，一个丹麦旅客尝试抱着床垫跳楼毙命，另外九个人则受了伤。^②大厦过去也曾经常发生火警，但这一次却引起全球媒体的关注。自这一场火灾后，众人呼吁重庆大厦采取更严格的管理制度。当时的报纸头条有：“频频受危的高楼迫切需要政府行动”，“重庆大厦仍是一个火灾牢笼”，以及

^① Caroline Dewhurst, "Gold Smuggling Rings Exposed"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87年2月8日。

^② 网络上有几篇报导称一共有11个人在火灾中丧生，但此类报导不实。

“翻新工程未能提升重庆大厦火警安全”。^①到1993年7月，大厦电力系统终于无法承担超负荷的支出，导致爆炸和停电，整座大厦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没有水电供应。^②香港公众的强烈要求终于令大厦增加颁发旅店执照的规定——1994年，大厦中有61家旅店停业，新的旅店很快替代了这些被停业的旅店。^③

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重庆大厦异乎寻常地未曾受到华裔黑社会势力的侵蚀，而当时的尖沙咀周边地区显然处于街头黑帮的掌控之下。1994年曾有一群黑社会分子企图炸毁重庆大厦里的一间夜总会，幸好被警察及时制止（我听说那间夜总会在地下室，虽然和重庆大厦相连，但人们无法从大厦内进入夜总会），但这仅仅是我所听说的唯一一件跟黑社会有关的事件，我认识的采访对象中也没人提及华裔黑帮的存在。^④巴基斯坦帮派倒是较为猖獗——北印度的极端印度教徒摧毁了巴布里清真寺，重庆大厦的巴基斯坦黑帮就开始不停骚扰信仰印度教的店

① “High-Rise Menace Needs Urgent Action by Govt” *Hong Kong Standard*, 1988年8月30日；Mariita Eager 和 Jimmy Leung, “Chungking ‘To Remain a Fire Trap’”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92年6月18日；Samantha Rosich, “Facelift Fails to Improve Fire Safety at Chungki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92年2月9日。

② “Chuhnghing daaihah yuhngdihn yuhnchiu fuhhoh chuhngpou dihnsin jaahmmouh gungsi sihngjip” [Chungking Mansions Exceeds Power Load ; No Company Agrees to Do Electrical Wiring], *Ming Pao (Hong Kong)*, 1993年7月27日。

③ “Guesthouses Feel the Hea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94年10月16日。

④ Charlotte Parsons, “Court Told of Nightclub Bomb Plo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95年11月1日。

主，从南亚裔人经营的生意里抽取保护费。^①在二十一世纪初一个黑帮头目被捕后，以上现象销声匿迹，人人都说重庆大厦最近几年没有任何有组织的黑社会活动了。有个巴基斯坦店主跟我说：“为什么会有人来收保护费呢？他们单单靠卖手机就能挣更多钱了！”

1997年，住在重庆大厦天台的一百多个尼泊尔人遭到驱逐，一个在重庆大厦工作的保安向我描述了当时的情形。这些尼泊尔人多数是廓尔喀^②的子孙或是其亲戚，廓尔喀当时受聘于香港殖民政府，他们中许多人在香港回归后搬回了尼泊尔，但也有一些留了下来，在重庆大厦楼顶的帐篷中生活，还接驳大厦的电力系统以使用电器。以前警察没办法驱赶这些人，因为楼顶属于私人用地，并且尼泊尔人也没有什么犯罪行为，所以大厦管理人员和私人保安只好强制将尼泊尔人赶出天台，其中发生的冲突显然未能见报。结果，许多尼泊尔人离开了那个地方，如今只有少数几个人住在重庆大厦的后巷里。

九十年代，媒体常常报道警察对大厦进行突击搜查，几十甚至一百多人因未出示合法证件而被捕，这些人来自孟加拉、

① Greg Torode, "Hong Kong Muslims Threaten Hindu Shopkeeper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92年12月9日; Edward A. Gargan, "Smell It, Taste It: All the Spice of Life" *New York Times*, 1997年8月30日; Adam Luck, "Terror Gang Stalks Chungking Mansion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01年1月28日。

② 廓尔喀兵是英国从尼泊尔招募的雇佣兵。曾长期驻扎香港，号称是驻港英军的“拳头部队”。——编注

印度、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和其他国家。^①而那些仅仅是在重庆大厦中发生的有规模的移民搜查，至今还在进行。在二十一世纪初，重庆大厦中曾有一名旅店店主、一名旅店职员和一名性工作者在不同事件中被谋杀。^②

背包客数量在九十年代逐渐减少，但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泊尔背景的南亚人却越来越多，在签证政策较为宽松的英国殖民统治时代更是如此。世纪之交，一个新移民群体出现在重庆大厦：非洲人。他们受到香港和中国内地商机吸引，将这里的商品卖到家乡发财。重庆大厦底座两层商铺开始反映出非洲顾客的需求，从手表到非洲风格的衣物和廉价手机，各种各样非洲顾客“必备”的商品。在2000年左右，大多数进驻重庆大厦的人都来自非洲。到2007年，越来越多内地游客被旅馆网站上的便宜价格所吸引，来到重庆大厦，特别是在国庆节等节假日，有的旅馆里全部是中国内地顾客。他们住在重庆大厦，因为这里离尖沙咀维多利亚港很近，可以步行去看烟花表演。

① *Ming Pao*, "Chuhnghing daaihahh kauchah 103 yahn" [Illegal Workers Common in Chungking Mansions; Authorities Arrest 103 People], *Ming Pao* (Hong Kong), 1993年7月21日; Magdalen Chow, "Police Raids Criticised" *The Standarl* (Hong Kong), 1995年6月7日。

② Tommy Lewis, "Hostel Owner Found Dead in Chungking Mansion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01年7月28日; Marcal Joanilho, "Stabbing Murder at ChungkingMansion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02年3月25日; Sara Bradford, "Man Jailed for Lying to Protect Murderer of Woma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04年5月21日。

2005年之后，重整旗鼓的重庆大厦业主立案法团致力于翻新整座大厦，行动包括安装两百多个监视摄像头，聘请穿着制服的保安，以及提供定期垃圾收集服务——有些记者从此举看到了重庆大厦的希望曙光，而另外一些人则对此持怀疑态度。^①接下来几年里，大厦犯罪率显著下降，特别是火灾之类的事件相比以往也少了许多。有位重庆大厦保安组的管理者跟我说：“十年前这里火灾频发，几乎都发生在餐厅厨房里。现在每间餐馆都有烟感探测器，一旦有火警，控制室能立刻通过探测器了解情况。”^②他说现在虽然仍然存在火灾的隐患，但比过去小了许多，另外重庆大厦如今也装有若干复杂的防火装备。

就如今而言，重庆大厦多年积累的若干复杂问题依然存在。火灾仍有发生，即便规模很小且无人丧生。我接下来将谈到的重庆大厦业主立案法团，努力改善旅馆增多带来的问题，比如电力系统不堪重负。许多人都说重庆大厦比十几二十年前更加适宜居住了，然而不论重庆大厦再怎么翻天覆地改造，它永远不可能成为像其他香港购物商城一样的建筑，只能继续保持其特有的国际化风格，包括它的破旧外貌。

这本书描述重庆大厦中的人们在某一特定时期的样貌，即2006年至2009年这一时期。书中所有的信息，从手机价格到国际避难者的待遇，不免受到研究时期的局限，这些信息在两年或

① Martin Wong, "Facelift Raises Chungking Mansions From Vice to Virtu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08年4月28日; Chandra Wong, "Chungking Mansions' Facelift Only Skin-Deep"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05年4月29日。

② 可参考 Incorporated Owners of Chungking Mansions 2008, 52。

者十年后也许完全不同。从更广阔的视野看，二十年后的重庆大厦是否会成为世界旅游的一个标志，或成为香港二流购物的商场，还是成为罪恶之都，或明日黄花，犹未可知。

业主立案法团

重庆大厦一共有 920 位业权持有人。据重庆大厦业主立案法团王经理所说，大厦在 2008 年有 549 位业主持有住宅、371 位业主持有商铺。70% 的持股人是华人，有的出生于香港，但大部分来自中国内地，剩下的 30% 持股人则为南亚裔。

2007 年 4 月，我和两个研究助理一同参加了重庆大厦业主立案法团一周年晚宴，并与一桌华人坐在一起。宴会厅里有十二桌筵席，每席十到十二位来宾，但只有一桌是非华裔的，其中包括一位非洲裔和六七位南亚裔来宾，他们全部都会说粤语。香港最富有民族多样性和最少华人的地方，其周年晚宴却是单一民族的华裔主导。晚宴继续进行，演讲者均以粤语讲话——粤语虽然是香港主流语言，但绝不是重庆大厦中所使用的主要语言，人们进到大厦最常听到的是英文或乌尔都语，也有可能是普通话、印地语、斯瓦希里语、法语、孟加拉语或旁遮普语。

晚宴即将结束之时，业主们开始用带有口音的粤语合唱《狮子山下》，一首象征香港人身份认同的歌曲。这些中国内地移民用一首歌宣告自己的香港人身份，而歌曲中的香港是八九十年代的香港，跟如今的香港也算有一定联系，但现在的他们却常常看不起中国内地新移民；^①他们基本上在宣告：“在多

① Mathews, Ma, Liu 2008, 63-66, 73-76.

年挣扎奔波之后，我们终于成为香港人了。”但讽刺的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却是许多香港人不敢去的地方。他们的香港人身份基于一座非洲人和印度人喜欢去的大厦，同样也是香港人引以为耻的大厦，这就是讽刺之处，也是重庆大厦众多矛盾面之一。接下来的几年周年晚宴大同小异，但在2008年和2009年变得更加多元文化，还提供重庆大厦南亚餐馆的自助餐。我在宴会中与各种各样的人长时间聊天（他们多数是大厦中较为出名的业主，比如高级警官和本地政客），我从未在重庆大厦中碰见过他们。

重庆大厦业主立案法团主席是孜孜不倦的林惠龙女士，她组织集中了这些赴宴来宾，也组织了近年改善重庆大厦的力量。身宽体胖、爱笑和精力充沛的林女士年过六甲，年幼时在福建长大，1979年第一次来到香港。她最初在一家电子工厂工作，然后从1988年起在重庆大厦经营一家旅店，成为重庆大厦的固定资产拥有者，并于1994年成为重庆大厦业主立案法团主席。英属香港政府最后一任总督曾参加当时重庆大厦新电力系统的开幕式，自那以后，再也没有行政长官造访重庆大厦。林女士义愤填膺地说：“难道他们就不珍惜香港最国际化的重庆大厦了吗？”近年来，她一直致力于在大厦内安装摄像头，提升防火系统和清洁服务。

林女士与我有错综复杂的关系，一部分原因在于语言不通（我的粤语跟她的英文一样糟糕），另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对大厦的观念不一样。林女士是支持翻新重庆大厦的活跃人士，并为其达到今日的成功做出不懈努力。但同时，由于她主要关注

大厦内的合法商业活动，忽略了许多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她不认同非法劳工在支持重庆大厦运作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也不理解避难者和迷幻药在重庆大厦中占有的重要位置，特别是为什么大麻市场的主要买家是白人而不是非洲人。我常告诉她，如果非法劳工在重庆大厦里消失，整个大厦就会灭亡，成为与香港其他购物商场无异的地方，因为非洲人会因物价攀升而离开。她却提醒我要顾及重庆大厦中每一个人的需求，暗示我没有对香港华裔业主的权益表示足够关注。她并不晓得自己某些言论有种族主义倾向，我在后来一些记者和作家的电话交谈中了解到，她对他们说南亚裔人的旅店很肮脏，顾客们应当住进华人开的旅店。不过同时，她对我十分慷慨大方，从各方面支持我的研究。

重庆大厦的许多店主对林女士抱有极大的敬意。如一位香港华裔店主所说：

我们都很喜爱那位女士，她组织大家做了很多好事。过去电梯破旧不堪而且很拥挤，有时候还卡在楼层之间，令人沮丧，但现在的电梯完全不同，虽然体积还是很小，但至少是新的，这已经是巨大贡献。甚至男厕所也被翻新了，如今包括电灯、电梯和厕所等等的公用设施十分完善，这对每个人都好。还有，闭路摄像机令大厦更加安全。她能让每一位业主愿意替翻新工程付钱，真令人佩服。

有些人却不看好业主立案法团，特别是南亚人。有个南亚

店主说：“管理委员会就像一个华人黑帮，控制一切不说，还只替其他华人争取生意合同。”也有一些人认为林女士利用业主立案法团主席的职务，扩张她自己的业权。针锋相对的意见反映了真实存在的民族矛盾，特别还加上语言沟通障碍。我听说有一些南亚店主唠叨：“为什么我要听她的话？她连英文都不会讲！”当然，这些冲突也许源于大家对有权利的业主的嫉妒之心。林女士让重庆大厦成为一个更适宜居住和工作的地方，确实功不可没，尽管她身上留有一些以华人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最新版的《孤独星球》（香港）描述她有着一种“明代皇帝的政治正确性”。^①

^① Stone, Chen and Chow, 2010, 242。

生意

虽然重庆大厦大厦缺少一个有力的中枢神经，缺少一种社区观念^①，但大厦中各种生意的运行多多少少符合社区形式，拥有资产的人和租用资产的人有着巨大差别。我对南亚裔业主的了解超出我对华人业主的认识，因为华人业主很少出现在重庆大厦，所以我的信息主要来自南亚人。

拥有资产的人近年来眼见他们的资产成倍增长，掌管一家著名楼上餐厅的南亚店主告诉我，他在大约五年前以 150 万港币买下了店铺，其市价到 2007 年已升到 250 万港币。另一个人说他想要买一间 80 平方米的公寓，其价格在几年间从 80 万港币升高到 140 万港币。他记得当时问了一个重庆大厦中较出名的南亚商人：“为什么你要买入这些资产？”那人回答：“正因为它太值钱了。”但有另外一个旅店经理告诉我：“买产业要很多钱才行，很多很多钱！400 万，500 万，才一间公寓。所以还是租比较划算，15,000、20,000、17,000 港币就行了……”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比如 2009 年末的金融海啸，业主比租客能更轻松地渡过难关，因为他们的花费较少，储蓄较多。租客要面对连续几个月入不敷出的艰难情况，有些甚至要被迫关门歇业。在 2008 年，重庆大厦底层商铺的租金是：小摊档大概每月 8,000 港币，位置较好

① 但是 Bodomo (2007) 描述重庆大厦为一个社区。

和店面较大的商铺则每月 40,000 港币。

有些重庆大厦业主和店主大声抱怨周围店面可以赚取更丰厚的利润。有个手表店店主说：“我见过这里有的人很快就飞黄腾达了，但是我做自己的本分生意，却挣不到钱。”的确，在重庆大厦里不做一点游走在法律边缘的事情，不是赚不到钱，而是比较困难（这同样适用于香港其他的小本生意）。底座和一楼的几个商铺贩卖内地仿造欧洲和日本产品的伪劣品，以及包括手机和电脑（我曾见过卖原产新货手机的天真店铺，它们不了解市场运作，几个星期后很快就歇业了）在内的其他一些东西。这些商品的顾客主要是非洲商人，他们一般都知道买的是什么货色，所以不会投诉。此类生意和许多其他重庆大厦内的生意一样，雇佣持旅游签证和避难者身份的临时工，给的薪水不过是同等工作的合法香港居民薪水的九牛一毛（即月薪一般在 3,000 到 3,500 港币，而非 5,000 到 8,000 港币的合法起薪），临时工毫无怨言地接受这个薪酬，因为还是比他们家乡的月薪要丰厚许多，这些人还要抽取薪水中的一部分汇款回家。楼上有些餐馆无牌经营，并安装有摄像监视以避免接待会带来麻烦的顾客，有的旅馆则拥有额外的无牌照房间，以避免官方程序，应对供不应求的繁忙季节。

这些逾越法律界限的生意，恰恰令重庆大厦成为世界低端全球化的中心。只有在低端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重庆大厦中的商业活动究竟如何进行。我现在从自己所知的角度，描述一个小食摊所反映的经济学。小摊档每月租金 23,000 港币，相当昂贵，因此小食摊很难通过聘请合法用工维持下去，以一

位有经验的香港居民身份的厨师为例，月薪就要大概 8,000 至 10,000 港币。于是这间饮食摊档聘请了八位持旅游签证的佣工，他们每年必须在家乡印度停留至少 180 天，并且一旦被捉到在港非法打工，就可能受牢狱之灾。这个摊档的消费价格在每餐 20 到 50 港币，每日估计有一百个顾客光临。因此，小食摊每月平均收益 10 万港币，减去付给佣工的工资、食材成本和租金，店主在淡季每月也许能赚 2 万港币，在旺季每月能赚 3 至 4 万港币。虽然这个收入水平是非法佣工薪水的十倍，但在香港小生意圈里一点也不算过分。如果店主被迫雇佣合法工人，小食摊的消费价格就要翻一番，导致大部分老客户流失，因为客户们都是数着一张张血汗钱付账单的。

一家旅店的经济学也大致相同。一位旅店店主告诉我，她的旅馆拥有九个房间，平均每月盈利 3 万港币。她的旅馆在重庆大厦中较为高档，每个房间收费 200 港币，一般情况下入住率达 75%。所以这间旅馆每晚盈利 1,400 港币，另外还要减去相应的成本。旅店聘请了一位菲律宾工人，以便随时与顾客打交道，还要做客房清洁和洗衣服务，工人的月薪为每月 3,500 港币。这间旅馆的运作同样有赖于半合法或非法的劳工^①，如果没有这些劳工，旅店价格将骤然升高。如同一位店主说的：“如果我们不聘请非法劳工，我们的生意就做不下去啦！”

① 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家庭佣人是香港社会的一部分，人口大约是 220,000 人，主要受聘于香港中产阶级雇主。这些佣人理论上应该在雇主的家中工作，但他们也有一些人被请去重庆大厦里打理旅馆。

当然也有一些商贩，坚持说他们的生意既高档又合法。我认识一个旅店老板，是一位香港华裔男人，自己单枪匹马做所有清洁工作，有时还会在凌晨一点站在重庆大厦门口招揽顾客。十分反常的是，他特别希望见到非洲裔和南亚裔的商人对其高价旅馆望而却步——每个房间 250 到 300 港币一晚。他用酷似林女士的腔调跟我说：“我要把重庆大厦变成一个为高级客户服务的地方！”不知道他的生意还能在重庆大厦维持多久，或者反过来说，有他这样业主的重庆大厦还能维持多久。

于是我们要问，重庆大厦中为什么有的生意成功，有的生意失败呢？重庆大厦的生意流动率很高，主要因为虽然近年来租金有所升高（自从 2009 年经济危机后就一直在升高，也由于许多内地人不断投资的缘故），但租金还算便宜，所以公司和个体能较轻松进入市场，即便歇业也不会造成太大损失。与我交谈过的许多店主感叹非洲人再也不是稳定的顾客群体了，“他们以前常常一住就是一个星期，可是现在他们待一两天就去内地做生意了”。一个电子商品批发商说：“现在的非洲人可以轻而易举进入中国内地，内地的商品虽然有些质量不太好，但是价格更加便宜……现在甚至有来往亚的斯亚贝巴和广州的直线航班，很多非洲人乘坐那个航班，就不必来香港了。”

经营成功的生意（至少在 2009 年经济危机之前，旅店、餐馆和绝大部分手机铺都做得不错，但是任何类型的零售店生意都非常差）有以下两个要素：一是对市场的充分了解，二是有随机应变的灵活性。这是生意经入门，但我常常惊讶于这么多店主和经理（特别是刚来香港的内地人）不明白重庆大厦的本质，

比如他们竟然会销售最新上市的手机，或是对重庆大厦的多种族背景毫无概念，这种生意从一开始就被判了死刑。

随机应变的生意确实改变了许多。楼上的餐馆通过吸引香港华人顾客而生存下来，它们在九十年代的顾客主要是英国人、背包客和南亚顾客。这些餐馆驾轻就熟地不断变化宣传技巧，包括派人站在重庆大厦门口招揽顾客，减少餐馆菜肴的辣味以取悦香港人胃口，渐渐对其顾客群体实现了成功转型。最近，旅店通过网络吸引来更多新顾客，许多中国内地和欧洲来的人完全不知道重庆大厦是怎样的一个地方，仅仅因为价格便宜而来到这里。

让我们现在来听听两位在重庆大厦工作的香港华人的故事：一个男人在重庆大厦的旅店长大，另一位女人在底层餐馆工作。^①

Andy Mok

我家在重庆大厦经营着一家旅店，赚很多钱。香港回归前，每个双人床房间每晚盈利 400 至 500 港币。我们一间公寓有十个房间，每晚都住满了顾客。当然，我们记账的时候必须写另外一套数字。顾客里有许多菲律宾佣人和泰国人，他们有些是同性恋，有的则要在周六和周日与她们的男朋友约会，所以我

^① 这些人名与本书中出现的其他人名为化名。

们给他们提供两三个小时的钟点房，又可以捞一笔。这就是为什么有许多香港华人和印度人都想来开旅店，因为你不需要有任何特殊技能，唯一要做的就是努力工作。我妈说，既然开旅店能挣这么多钱，为什么还要辛辛苦苦拿硕士学位、去做中学教师呢？

我母亲在1982年从上海移民到香港，当时替亲戚打理重庆大厦的旅店，存下一笔积蓄后在1985年自己开了家旅店。重庆大厦的生意人总是有些关系的，我们彼此认识，既是竞争者又是合作伙伴。我这边的客人太多了，就分一些给你；明天你也一样会帮我的忙，以此类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会替客人记电话留言，有时因此还能拿到小费。有一回，一个非洲男人在浴室里洗东西，发出许多噪音，我就跑去问他在干什么，结果他拿来给我看，他居然在洗未经雕琢的钻石！有些商人发财了，不需要再住在重庆大厦这样的地方，但是他们还是会来这里，并要求住在从前住过的房间，因为他们觉得这样能带来好运。另外，他们住在重庆大厦可以跟其他人交谈，易于交换信息。

香港人对重庆大厦感到恐惧，一部分原因可能是1988年在A座十一楼发生的严重火灾，当时我就住在那一块，我当时还是小孩！因为浓烟，有一个丹麦游客爬到窗户外面，结果摔死了。在那次火灾之前，香港政府从来不在意重庆大厦及其火灾隐患，可是从那之后，人们开始觉得重庆大厦是一个危险的地方。自从1988年的媒体报道，特别是国际报道之后，就出现了公众关注和检查。火灾之前，曾经有印度人因为火灾而受伤，

但大家毫不在乎！终于，规定变得严格了，所有旅馆要定期做防火检查，这都是新措施。现在每个角落都有防火警钟。

我们遵守着一些潜规则，不论是华裔还是印度裔的业主，一般不会把房间租给香港华人。我们租出房间之前，顾客必须先注册，如果有香港身份证，那就“不好意思，再见”。因为我们担心有一些华人黑帮会乘虚而入，向我们收取保护费。如果你是一个走进重庆大厦的本地华人，会特别显眼！你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藏起来！即便是美国陆军犯罪调查司的人，或是便衣警察，我们也能一秒钟内能认出他们。

尖沙咀警察的确似乎不愿意触动重庆大厦这一块地方，就算有一百个警察半夜突击搜查重庆大厦，也不能找到什么东西，因为他们一走进来，目标人群马上就溜走了。警察往往只在媒体和公众面前摆摆架势而已。重庆大厦中有许多常住居民，警察不可能敲开每一间公寓进行检查，不然会激起民愤。因此警察只去查看持牌经营的旅店，而那些无牌的非法旅店没有任何标记，所以警察怎么找也找不到。非法佣工也可以安安稳稳地躲在那边，因为这些非法旅馆看起来就跟普通民宅一样，警察不会进去搜查。警察不喜欢重庆大厦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的英文水平不高，重庆大厦的许多居民也不是很会说英文，去找一个会各种语言的翻译又不太可行，所以警察会避免这种难题。但总体而言，重庆大厦中甚少发生冲突，每个人都安静本分地赚自己的钱。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在这里也从不打架——这里没有国籍，只讲钞票。

旅店店主最担心的事情就是顾客不付钱。有的客人可能只

付了一晚上的费用，结果却待了一个星期，你自然害怕他们溜走。我们最喜欢客人们安静地留宿，准时付房费，仅此而已。我们拒绝接收只拿了一个包、穿着邋遢的客人，只要我们觉得他们付不起房钱，就不会让他们留下，当然我们也可以让他们预付一切费用。如果客人是白人，穿着得体，持欧洲护照，那我们就一点儿也不用担心了。我们固然会说“你要先预付房费”，但他们或许会说“噢，我现在暂时还没有港币，能不能这些再付”，那我们还能怎么办？

我们最讨厌来自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和非洲国家的客人，因为他们喜欢自己煮饭。我们的厨房是供自己家人使用的，但那些人都想进来使用！有时他们有许多朋友来探访，有时客人之间还打架。我们这儿曾经有一个酩酊大醉的白人跟一个黄种人打架，我们最恨这种事情了。另外，我们也不想接收停留过久的单身女性，如果她只是睡几个晚上那还过得去，但如果是两三个星期，一般来说这个女人是妓女。如果她们带顾客过来，我们就说“不行，你必须走”。吸烟倒是可以，吸毒？不行，他们也得走。我们驱赶客人的方式就是帮他们打包好行李，虽然不会强迫他们付完住宿的剩余费用，但会把他们的行李送去另外一家更加廉价的旅店。那家旅店会接收他们，因为缺少顾客。以前有一个美国人，从美国拿社会救济，那个时候还没有电子邮件，所以他经常写长长的信件寄给家里，并会送我许多美国邮票。可是这个人吸毒成性，所以我妈决意让他离开。我们一起打扫了他的房间——结果我们毫无疑问地知道他做了什么，他刚刚经历离婚，所以跑来香港重新思考人生。

香港人对重庆大厦不够重视，他们应该重视它——这里是全球化的例子！政府应该保护这栋大厦。我有点担心重庆大厦二三十年后是什么样子，它会不会被拆掉？这里有这么多业主，情况很复杂，而政府只求这里没有犯罪、没有非法劳工，只有和平与和谐……可是这里已经很和平很和谐了！这个地方很安全，有时室内存在犯罪问题，比如性工作者和顾客之间的蒙骗和谋杀事件，但这都是个人问题，而不是重庆大厦本身的问题。旅客们也只想做生意，不希望犯法，当然也就最不想见到警察被卷进来。本地人也害怕走进重庆大厦，他们在此无处藏身，本地人特别害怕非洲人！

我记得坐在自家旅店的大堂里，发现一个土耳其人和一个美国人以及其他几个人观看二战电影，电影里的美国将军说了一些愚蠢的话，结果土耳其人和美国人就开始吵起来。土耳其人问，为什么美国人总是干涉中东事务，那个美国人强调“不，我们并没有”。结果他们最后达成一致意见：“为意识形态争执是一件蠢事，我们都是世界公民，所以应该尊重彼此。”这正是全球化的意义，你我之间并没有太多差别，也即重庆大厦价值之所在。

Amy Liang^①

我是一个香港华人，离过婚并且年过三十。如今我管理这家餐馆，而且很高兴自己善于此道。我在早年工作时积攒下了一笔钱，在一段时期内都还能维持下去。但我不会永远做这一行，不然很快就会破产！

这间餐馆里有些巴基斯坦员工，他们一天五次去清真寺做礼拜，简直疯掉了！嗯，也许不是疯，但他们确实太虔诚了。他们的工作态度却截然不同，根本不会把工作看做是最重要的事情，他们的头脑也真是简单天真。有一次，厨师没有通知我，就自己去清真寺了，我当时很生气，但后来渐渐发觉他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我开始做这份工作之前，曾经来重庆大厦给一位经营手机铺的印度朋友帮忙。当时我从深圳带了一些银首饰和小饰品，放在他的商铺里贩卖。一次我们走进重庆大厦的一家餐馆，有两个巴基斯坦男人盯着我们看，我的印度朋友特别不喜欢那些挑逗我的眼神。他说那两个巴基斯坦人属于低种姓，所以不希

① 另外一个故事关于一个刚来重庆大厦的餐馆经理，她用粤语讲述，我的研究助理 Maggie Lin 帮忙记录她的故事。

望我跟他们相处过多^①。但是我对此很好奇，于是还是跟他们聊了起来，以了解重庆大厦中有什么商机。他们其中一个人后来就是我的老板，他很多年前来到香港，并在重庆大厦贩卖手机，赚到第一桶金；后来渐渐有拓展生意的野心，在经济危机前在大厦里买下五个店铺。他现在没有多少资金支持自己的生意了，需要别人帮助，所以我现在帮他打理生意，朋友们都说我疯疯癫癫，还在这里免费打工。

我老板性格比较强硬，喜欢控制周围的一切，不过他确实也应当这么做。他把商铺一部分租给了一位好朋友，结果那个朋友的生意进展缓慢，无法付清租金，于是我老板就收回了那个店面。

生意归生意，他不可能将其跟友情混杂在一起，他有时候给我发短信，说这令他感到寂寞。我一见到这些短信，对他工作态度的怨气就消散了。一次，他对我和另外一个巴基斯坦男人聊天的事情很不满，误以为我邀请那个男人来家里过夜，其实我当时只是问他是否在吃药，希望他休息得好。老板变得非常生气暴躁，还问我是不是喜欢那个男人，如果是，他就要把那个人转移去另外一个店铺，我回答说他误会了。他不喜欢见到我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给顾客，但我却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不过是友好的举动——我从来不会跟顾客约会呀。此外，虽然

^① 重庆大厦大多数南亚族裔都否认种姓与之有任何关联，一个印度男人说：“这里大部分印度人都是穆斯林，所以跟种姓没有什么关系。”他强调说自己不清楚周围的南亚人属于什么种姓，但我采访到的这几句话表明种姓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还是有影响的。

我不拿薪水，但我不论在餐馆里做什么，还是有一定自由的，这也是我享受其中的原因。

我在这里碰见过许多事情，经历超乎自己的想象。我曾经见过非洲人来餐馆吃霸王餐，那个男人吃完了盘子里的食物，告诉我他钱不够付帐单，不过愿意付一半的价格，但其实他点菜的时候肯定能看得到价格啊！他说下次会再给钱，结果却再也没有还钱，而这个人居然依旧跟其他朋友一起来餐馆吃饭。我把之前的事情告诉他朋友，结果那些朋友们为他买单。老天，不过是几十元钱的事情！后来他又来餐厅吃饭，再次企图不给钱就离开，还掏出100美元钞票，说他没有港币。我开始检查他的美元，结果他生起气来，马上抢回钞票。我告诉他如果没钱，我可以请他吃这餐饭，但他必须提前告诉我，不应该吃完了才拒绝买单。他说：“我不要你请我吃饭，我有足够的钱买下你整个餐馆！”这些商人在香港混得太不容易了。

有的男人想要跟我搭讪，方式很直接，昨天还有个男人跟我说“我爱你”。如果你喜欢高大健硕的类型，那这里有许多这样的人。Maggie（作者的研究助理），你得小心警惕，在重庆大厦男人的眼里你就像一块糖果！他们都对你感兴趣！你想知道他们要什么吗？他们多数人想找你结婚，以便拿到香港居民身份。

我来这里工作的第一个月里，一个印度女人和一个尼泊尔女人被入境处捉住了，她们都是香港居民，但是仍在申请工作签证的等候名单上，她们假结婚嫁给了年迈的香港“丈夫”，但却在家乡各自有自己的男朋友。入境处官员来了两次，第一次

只是查探地点和两个女人的踪迹，第二次就把她们和我全抓起来了。不过后来事情很快就平息下去，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她们在餐馆打工。

几天前有一个新来的巴基斯坦男孩开始在餐馆打工，他说自己有一个待嫁的妹妹，他是来赚钱给她做嫁妆的。他偷渡到香港，躲在一艘船的货仓里，由于遇上台风，他三天三夜没有食物和水。我很想帮他，给他争取到这里的工作机会。被入境处捉起来的两个女人跟我说过：“太太，你应该自己开一家餐馆，我们来给你打工。”我有时还会想自己应不应该这么做，我待在这里很高兴，在重庆大厦学到了很多，但同时也为许多类似的故事而伤心。

我的亲身经历

如之前所说，我从2006年6月起开始研究重庆大厦。虽然重庆大厦在香港是一个黑暗另类的地方，但我从第一天的研究就发现，多数人乐于跟过路的陌生人聊天。然而，当我连续几个星期出没于此，出现了一个问题，许多我遇到和访谈的人都不相信我是一个人类学家。虽然很少有我碰到的人参与违背道德伦理的勾当，但我问到他们的事情常常有违法性质。于是我很快开始学会如何应对这个问题，开始向见到的每个人派发印有我学术职位的名片。虽然社会上有些名片有造假嫌疑，但我名片上的信息却没受到过怀疑。很快，我在重庆大厦里有了一个标准称谓，“教授”。在许多民族志田野中，这本应是一个灾难，在重庆大厦却成为神来之笔。南亚人、非洲人和华人都视我为值得尊敬的人物，而且我拥有了出言不逊的权利。按照一个采访对象的原话：“我当然是非法的了！你是一个教授，所以你不会告诉警察，我心里清楚得很！”我很庆幸，在一些境况下受到蔑视的教授，居然能在重庆大厦广受尊重。

我也庆幸自己是白人，虽然这可能在其他境况中导致不利结果，但在这项研究中却令我受益匪浅。如果我是华人，很可能被认作是政府间谍。假如我是南亚人，可能被看成是潜在的商业竞争对手，我曾经认识一个在美国受教育的南亚研究生

尝试研究重庆大厦，结果没能找出什么信息。

我的基本研究方法就是在重庆大厦里“闲逛”。我在白天黑夜跟不同小食摊的顾客聊天，来回穿梭于走廊间，站在大厦入口，或在不同的楼栋上下游走，跟每一个碰到的人聊天。我在许多楼层的餐馆中，跟南亚店主一起喝茶，或是留在他们的小食摊档；我在重庆大厦拐角处的 7-Eleven 和非洲人一起喝啤酒。我每个星期去基督教励行会，基督教励行会是重庆大厦众多非政府组织之一，组织国际避难者一起讨论国际时事。有时我或研究助理做正式录音采访——本书中的口述资料正是此类访谈结果。更常见的情况是，我们非正式地与人聊天，然后在楼梯间或附近的公园里把记得的对话复述录音下来，我们也会把这个举止告诉采访对象，他们都不在意，某些情况下他们要求掩饰自己的身份，以免被认出来。我在本书中均做到掩饰和保护受访者的身份以及其提供的信息，除非他们是公众人士。

我是一个糖尿病患者，每天至少需要替自己测量四次血糖含量，还要给自己注射胰岛素。这种行为有时候带来喜剧效果，因为有一次我偷偷摸摸地（至少我自己认为是）给自己测量血糖含量，结果身边聚集了一队南亚人和非洲人，他们排队想让我给他们测量血糖。我偶尔产生胰岛素反应，第一征兆就是沉默不语和感到迷惑，接着抽搐不止。有时深夜里，我坐在旅店房间，疑惑着自己是谁、身在何处，直到终于意识到自己急需糖分，然后立刻喝掉床边的汽水。

多数情况下，这种胰岛素反应不会影响到我在重庆大厦的

社交活动，仅有一次例外。2007年4月，我在重庆大厦抽搐昏倒在地上，然后被抬进救护车送至医院。这件事对我的研究有一定影响，因为某些保守派的穆斯林以为我当时喝醉了，我花了许多时间向他们演示自己的胰岛素和血糖测量器，试图告诉他们我之前生病了，后来他们终于相信了我的话。

研究重庆大厦的另一个难题在于性别，重庆大厦是一个异乎寻常的男性主导的地方。虽然有一些女性非洲商人做服装生意，最近也有更多来自中国内地的女游客，但是直到最近几年，大家还会假设大厦里的年轻女性是性工作者，或者希望引起男性注意的女人。以前我认识许多女研究生和女传媒记者对重庆大厦感兴趣，我就带她们参观。在香港或西方国家，一个男性与不是他妻子的女性一同出现不是什么大事，但这种行为在一些南亚人和非洲人看来，意味着我与那些女性存在某种亲密关系。

我当时知道有这种假设后很惊讶，但是正如许多其他文化误解，我开始责怪自己居然事先没有预料到这一点。有一次，一个欧洲记者来重庆大厦见我，尽管我早已警告她不要穿得太少，她还是很清爽地出现在大厦里，我跟她聊了两个小时，然后独自回到旅店房间。夜半时分，我房外突然出现嘈杂的敲门声，一个声音大喊：“警察！警察！”我打开门，看见七个看起来很生气的穆斯林男人站在门外。当他们瞧见我是一个人后，又开始羞怯地解释道他们只是想查看我的房间，看看我退房后能不能让其他旅客住进来。事实上，他们当时在查看我的行为是否道德。

如之前所说，我在研究过程中大概雇用过十个研究助理，其中五位在数月间做了较大规模的研究，还有两位跟随他们在重庆大厦认识的商人一同旅行：Jose Rojas 跟着手机商去到尼日利亚，Maggie Lin 与女服装商人去了肯尼亚。这些研究助理都是最近几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我选择他们是因为他们有一定的都市背景，也因为他们想体验重庆大厦——一般而言，是他们选择了我，而非我选择他们。这些研究助理看到了我所忽略的领域及我的周遭环境，包括从事服装贸易的非洲女商人，还有南亚店主的孩子以及他们如何适应香港社会，还有讲粤语的店主和保安的经历，甚至包括尼泊尔瘾君子的生活。

研究助理们做出了超乎想象的贡献，并从头到尾体现在本书中。然而，他们有时也遇到各种麻烦，特别是性别问题。我的研究助理大部分是女性，在某种意义上反映出人类系学生的人口结构，但是重庆大厦里主要是男性，所以研究助理们有时难免遭遇令人尴尬的男性思维假设。一位助理被一个巴基斯坦男人请去吃午餐（一个她本应拒绝的邀请），结果那个男人吻了她，她震惊了；还有一位助理不幸与一位巴基斯坦男性握了手，后来长期收到一系列电子邮件，里面全是他对她至死不渝的爱恋。因此，Amy Liang 在之前的访问中给我研究助理 Maggie 善意的警告，在实际生活中一点也不夸张。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文化现象：相对于香港，某些非洲社会的性观念比较开放，人们更加直接地追求伴侣；但是在诸如巴基斯坦等保守派穆斯林国家，一旦女性听到男人说话后微笑

了，或者更甚，居然还跟他握手，就可能表示出她喜欢那个男人。我的女性研究助理在重庆大厦一般比较安全，但有时却遇上令人不安的事情。曾有一位助理恼羞成怒地告诉我：“难道重庆大厦里每一个男人脑子里只有性吗？”我后来明白聘请女性研究助理要格外小心，因为她们有可能受侵犯。

2007年，我第一次在香港历史博物馆做关于重庆大厦的公开讲座，后来我的文章被刊登在《时代》杂志亚洲版。^①这引来一轮媒体关注的热潮，众多报社记者和电视节目打电话找我做访谈，或是请我带他们参观重庆大厦。我对此想法比较复杂，一方面，重庆大厦在过去几十年里有很多负面新闻报道，这次关注热潮大致正面，可以令重庆大厦业主立案法团宽心许多，同时也能促使我宣传重庆大厦（林女士告诉我，虽然那篇时代杂志文章只有两段文字，却造就了她人生的巅峰）。但从另一方面讲，许多香港和内地记者不敢跟重庆大厦的人交谈，反而集中采访我这个做介绍人的白人教授，我越来越不喜欢跟这类人说话。有一次，两个天真的华人作家想来写一段关于重庆大厦的历史，还受到重庆大厦业主立案法团的热烈欢迎。他们请我介绍一些重庆大厦的居民给他们，我努力尝试跟一个非洲避难者聊天，而那两位作家却缩在背后一言不发，结果那个避难者一肚子怒气爆发了出来：“去你妈的！你想要我们张口，就得付

① Liam Fitzpatrick, “Best Example of Globalization in Action: Chungking Mansions, Kowloon, Hong Kong” *Time, Best of Asia edition*, 2007年5月7日, http://www.time.com/time/specials/2007/best_of_asia/article/0,28804,1614524_1614473_1614447,00.html (2007年9月27日查阅)。

钱！”他说得对，我不应该在这种毫不自然的紧张环境下跟他谈话，我之后向他表示了歉意。

我可以控制记者对重庆大厦的报道（比如对他们说“不行，你不能使用我介绍你认识的人的名字；他们不希望身份被公开”，而当我觉得不自在或被激怒的时候，我会表示“我再也不能介绍你认识其他人了，你自己在重庆大厦里走一圈，看能跟谁交谈吧”），但是电视节目工作人员却是潜在的梦魇，因为镜头里出现的面孔很难全被掩盖掉，任何被拍摄到的在柜台边的非法劳工都可能遭到起诉。我答应做电视访谈的原因在于想正面宣传重庆大厦，但有时却导致尴尬的遭遇。有一次特别严重，一位反应迟钝的华裔电视主持人被误认为是便衣警察，有个非洲人一见到他掉头就跑，恰好三十米开外站着个真警察，马上跟了上去，还好并没有抓获那个非洲男子。幸运的是，这些事件没有造成什么影响，据我所知也没有任何一个受访者因为媒体而受伤害。但自那以后，我一般会停止接受任何电视访谈，因为意识到虽然电视可能给重庆大厦带来正面影响，但也存在一定危险性，而我一直跟记者保持联系（他们的一些文章很优秀）。^①

如上所有媒体报道中，我认为香港普罗大众清楚知道重庆大厦中有非法劳工，那里售卖着伪劣手机，有些人贩卖毒品和

^① 关于重庆大厦与非洲之间的深入探讨，见 Peter Shadbolt, “Where Africa Goes to Buy Its Mobile Phones” *Financial Times*, 2009年1月31日, <http://www.ft.com/cms/s/2/4609c212-eb64-11dd-bb6e-0000779fd2ac.html?ftcamp=rss> (2010年2月12日查阅)。

性——我并不否认这些议题，但我更倾向于诚恳地在重庆大厦的正面形象和环境里讨论以上事件。的确，重庆大厦的人大致认为过去几年重庆大厦因为媒体关注，正在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但是我仍然担心，毫不知情的官员会拿着一份报纸或电视报道说：“天哪！重庆大厦里有非法勾当！我们赶快关闭这个地方！”

我认为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令重庆大厦的人们受益，我很看重与他们的友谊，也同样看重给缺钱的人提供金钱帮助。但是，我从这项研究得到的收益超出了他们所获得的，我写这本关于他们人生的书，有助于我自己的职业生涯，而他们许多人向我讲述故事，相比之下却没有获得多少回报，除了得到我的友谊和感激之情，以及这本书。我周末和闲暇时的晚上会来重庆大厦，其他时间我可以回到大学舒适的公寓，而他们却生活在拥挤不堪和肮脏的地方。有一位我熟识的避难者曾经开玩笑问我：“为什么我不能过你这样的人生呢？”我没有回答，只是不自在地挪动了一下身体。

我希望我在重庆大厦的出现、正在进行的此项研究和这本书能缓解这种不平等，增加香港人和国际社会对重庆大厦和其中人们生活 and 故事的好感。可我不敢肯定，也许会有无法预料的结果，比如说大厦物业价格上涨，然后发展中国家的商人渐渐离开，而大厦逐渐变成和香港其他购物城一样的地方。重庆大厦的演变一定会发生，不可能由我个人控制或影响。因此，我稍有不安，虽然这种不安并没有阻止我写这本书。

我在此书中赞叹重庆大厦的非凡之处，以及其中和平相处的多元文化。这是一个令人惊奇的地方，它应当受到香港和世

界的褒扬。然而与此同时，许多在重庆大厦中发生的事情不完全合法，我将在接下来几个章节中详细描述。我认为虽然大家都知道重庆大厦存在不合法之处，但却不清楚它的奇妙，这也就是我希望通过此书表达的想法。

人群

throng



商 人

我将在第三章集中讨论商品和做相关贸易的商人，这里首先大致勾勒一下这些商人及其活动的境况。一年到头，商人是重庆大厦中最常见的人群，每年十月份和四月份的交易季，大厦所有旅馆几乎都住满了商人。大部分商人来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除了一二月份中国农历新年假期、中国南方的工厂春节休假，一年到头都有许多人来重庆大厦。过去几十年里，越来越多的非洲商人来到中国南方做生意，一般从香港或内地进货，然后运回家乡贩卖。这些商品可谓各式各样、琳琅满目：手机和服装最常见，另外还有手表、电子产品、电脑、游戏机、建材、二手车及零件，还有其他数之不尽的产品。有很小一部分商人做反向的生意，从家乡携带宝石拿到香港和内地贩卖。香港的商品比内地贵，但从香港购置的商品被认为更值得信赖，特别是电子产品和手机——然而这种现象似乎在逐渐改变，内地产品和商贸水准有所提高，因此更多商人开始进军内地。重庆大厦销售的商品几乎全是内地制造，不论它们包装上说是产自何方，不过手机商品有所例外。

有些商人在家乡申请商务签证来港，来自香港限制免签国家的人必须如此，但其他大多数商人直到抵达香港国际机场才申请入境资格。如第一章所述，他们也许能获得逗留香港十四天、三十天或者九十天的免签入境资格，取决于他们来自哪个

国家以及兜里钞票的多寡，还有他们以往在港逗留记录。来过香港并且没有逾期逗留记录的人相比那些初次来港的，往往能在入境处获得更为宽松的审核。有的商人在生意期间留宿于香港，手机商贩也许在大厦里停留一个星期就走了，也有的商人留在香港只为了办理中国内地的签证，然后直接从重庆大厦外坐火车去中港边界。有些商人每年只来几次香港和内地，但也有的人常年马不停蹄，每隔一两个星期往返于香港、内地和家乡。

不断引来商人的是中国内地如聚宝盆一般的廉价商品基地。商人们采购中国制造的**商品运回家贩卖**，主要因为他们祖国不生产这些商品，至少产品价格无法达到如此便宜的地步。商人们买卖手机，通过放在行李箱里运回家。在埃塞俄比亚和阿联酋等航班规定下，每个行李能装 32 公斤的东西，许多商人由于频繁飞行记录拥有额外行李重量配额，因此就可以携带更多货物，较富有的商人甚至付钱以携带更多货物。商人们一般在行李中携带较为精密的手机、电子产品或真空包装的轻便服装。还有的商人独自租用或同他人一起租用集装箱，运送较为昂贵的诸如地板砖和汽车零件等商品。

商人们需要决定何时去中国内地，这趟旅行可能既富饶又冒险，当然他们也可以去被认为更加安全可靠的香港。但总而言之，这些商人的经济活动有较高风险，不仅在中国，而在整个全球贸易网。有一种风险是，他们在内地或香港可能会受骗，根本没办法把货物运回家；另一种风险是他们计算错误，购买的货品在家乡根本卖不出去。还有一个情况，商人在中国内地买

了冒牌货，可能会被他们国家的海关人员没收（商人们买的许多东西都货真价实，但也有一些是假冒伪劣产品），惹来麻烦，必须缴交罚款才能解决，但也有的人幸运地利用贿赂逃过一劫。一个尼日利亚商人告诉我，他每次带商品回家能赚60%的毛利，但要用其中一半钱贿赂政府各级官员。这种贿赂情况在各国情况不同，但由于十分常见，海关规定又含糊不清，因此商人把货物运回家的一路上充满了风险。

很多非洲及南亚国家的银行，不提供香港或内地银行可兑换的信用卡和其他贸易工具，所以许多商人只好在兜里揣着几万美元钞票——金额高达五万甚至十万。一个东非商人告诉我：“你见到的商人都是手拿钞票来这的！香港可谓是亚洲做生意最安全的地方，我认识的人里没有谁被抢劫过。”我见到有些非洲人手里拿的钱比一些美国人一生拿过的钞票总和还多，这些非洲人自由自在地穿梭于看起来很太平的重庆大厦中（但其实在2009年里，大部分商人使用汇款业务）。

你常常能瞧见重庆大厦中有人离开柜台，手里还拿着几千美元钞票，虽然他们可能在其他地方间接受骗，但手中的钱还算是安全在握，只有少数完全不设防的人遭受不幸。重庆大厦中流传着一个人人皆知的故事（故事也许属实，但我从来没听说谁自称是受害者），一个非洲商贩在内裤里藏了5万美元钞票，叫了一个华裔性工作者来到旅店房间，他洗澡的时候，性工作者发现了他放在抽屉里的钱，数额能让她家人十年衣食无忧，于是她把钱全部拿走，跳上每五分钟一班的火车去往内地边境。非洲男人发现钱不见后，马上冲出去找人，可是再也见不到那

个女人，也找不回自己的钱了。

绝大多数商人是男性，只有少数几个女商人做些服装生意。商人们大部分在其本国社会属于较富裕阶级。如之前所讲，并非所有商人都是非洲人，尽管非洲人是主要人群。还有许多商人是主要做服装贸易的印度人，还有的是做手机和电子产品生意的东欧人和俄国人，另外有也门人、菲律宾人、沙特阿拉伯人及法国人——我见过太多来自不同国家背景、涉足各种令人惊奇生意的人。但是非洲商人依旧是重庆大厦里最显眼的人群，这种情况在中国内地南方亦是如此。

我有时会邂逅初次来港的非洲商人。我曾经非正式地带着两个坦桑尼亚女性商人一同游览夜晚的香港，她们对高楼大厦和火车表示惊愕：“我从来没见过火车能用电力行驶，我家乡的火车都用汽油。”她们还特别讶异地盯着“移动的楼梯”——电梯，因为她们只在祖国机场见到过类似的东西。然而，这些商人并没有脱离当今世界的先进科技。

在整个旅行过程中，她们不停打电话给远在达累斯萨拉姆的朋友们。一位向我解释：“对，我正在把在香港的所见所闻描述给朋友，包括移动的楼梯和购物商场。香港怎么有那么多购物商场？香港人为什么要买这么多东西？”——我没有办法简单回答这个高明的问题，之后我跟她们热烈讨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

香港每年庆祝十一国庆节，成千上万的人在这天簇拥在维多利亚港两岸，观看烟花表演。我听说有些非洲商人听到巨大的爆破声，然后望见外面摩肩接踵的人群，还以为身边发生了

战争、香港遭到轰炸，于是马上跑进电梯里躲避。

这类非洲商人大多与香港没有太大关系，除非他们的生意延伸到深水埗或香港其他商品批发市场。重庆大厦附近转角处的 7-Eleven 店里，有时候会有一点种族歧视现象。我见过香港华人走进那间 7-Eleven，只为盯着非洲人整整三十秒，然后什么都不买走出来。很多年轻商人尝试结识香港女孩，但甚少成功。他们有些人尝到苦果后才发现，除了遭受种族歧视之外，他们用来追求非洲女性的方式在香港人看来太过气势逼人，也许这也令很多香港人更加害怕非洲人。

总而言之，非洲商人在香港活得不容易。他们在一个 95% 人口是华人的地方十分引人注目，即便他们没有遭受种族歧视，也会在香港环境中产生“他者”的异样恐惧。所以非洲人在重庆大厦或是 7-Eleven 这些地方聚在一起，只有在这些地方他们才有一个团体的安全感，跟彼此相同的人社交。其中有些非洲商人比较天真，勇敢无畏地离家到异国寻宝。很多人失败后身无分文，结果再也没有回来；也有的人赚够钱成为了定期旅行的商人，每年几到十几次经过重庆大厦；只有一小部分特别有运气的人能捞到大钱。

我在香港认识的非洲商人在全球形成巨大的贸易网络——线路既漫长又复杂，从商人家乡和非洲邻国延伸至迪拜、曼谷及其他东南亚目的地，也延伸到香港、中国内地南部，然后再绕回去。我和研究助理跟从一些商人走出重庆大厦，顺着他们的贸易网络旅行。

许多在重庆大厦留宿的非洲商人会去中国广东省，那里

是距离香港最近的工业区，其他目的地包括义乌等中国内地城市。^①在广东省省会广州，非洲商人分布在几个不同社区，其中一个是天秀大厦及其周边，天秀大厦是一栋出口商品给非洲人和中东人的高楼，附近聚集了许多穆斯林商人。另外一个社区在三元里，很多尼日利亚的伊格博商人聚集在这里，他们定期去广州圣心大教堂参与伊格博语的礼拜。重庆大厦不同之处在于，广州的非洲商人按照自身背景不同而去不同地方做生意，而且一般住在市郊的公寓和旅店——广州并没有一个像重庆大厦这样各族群住在一起的地方。此外，广州的非洲商人不太说英文，他们多数人能用几句简单的普通话交流，或是聘请一些年轻的中国女孩做翻译——我听说她们常常是大学生——她们替广州许多批发商场提供翻译服务。

相比香港，广州的非洲商人贫富差距更大，合法与非法的界线也宽松一些。但是，有些在内地非法逗留的尼日利亚人和其他非洲人不时涉足毒品交易，把毒品从非洲运至中国，或是在广州街头贩卖毒品，这在香港则非常罕见。原因可能是广州的非洲人口庞大，估计有两万人，有些数据甚至更庞大^②，即使有几个非洲人逾期逗留也不会被发现。从另一角度看，广州也有很多名利双收的非洲和中东商人，许多人有资本跳过重庆大

① 见 Le Bail 2009。

② Evan Osnos, "The Promised Land; Letter from China" *New Yorker*, 2009年2月9日; Yang Dingdu, Pan Wang, Liu Wanli, "Burgeoning African Community Tests China's Engagement with World" *Xinhua*, 2009年10月5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09-10/05/content_12183718.htm (2010年1月17日查阅)。

厦，直接联系内地南方的工厂下订单，其贸易关系维持多年，有的商人还持有长期中国签证。

还有的非洲人是经纪人，算是“跑腿的”，他们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替非洲朋友讲价调解。我曾经去过一家高级的巴西烧烤餐厅，每周六有超过一百个非洲生意人与他们的经纪人在那里狂欢。我还曾在位刚果经纪人的高层广州公寓里留宿，公寓配套设施之奢华绝对能让广州人羡慕不已。有的经纪人可以在中国合法居留，拥有优惠的签证政策或娶一位中国太太，但是他们仍然需要定期更新签证。他们经常每隔三十天定期往返广州和重庆大厦之间，以更新中国签证。然而也有一些没什么好损失的商人，铤而走险逾期逗留，无限期地停留在广州，冒着被捕后要坐牢和被遣返的风险（我听说，特别是他们不愿意付钱贿赂警察的情况下）。

除广州以外，重庆大厦的非洲商人还常提起迪拜，特别是迪拜那里一个名为德以拉（Deira）的商业区。2009年，我在迪拜认识了一些非洲商人，他们穿行于东非、香港和中国内地的路线上，一位赞比亚商人说他经常在德以拉街头碰见在重庆大厦认识的非洲商人。贸易路线上的不同地点各有优劣之处，一位坦桑尼亚商人评论道：“中国商品一般比较便宜，许多中国制造的产品从中国运到这里（迪拜）贩卖。尽管这里的酒店价格比重庆大厦昂贵得多，但有时你也能在本地找到便宜货。”一个尼日利亚的手机商认为，虽然迪拜有很多欧洲制造的库存手机，售价也很廉宜（因为这些手机是被使用不超过十四天被退回的货品），但香港和内地贩卖的中国制造的手机质量略胜一筹。

非洲商人选择迪拜有几个缘由。有的人因为自己申请中国签证时遇上了麻烦，也有的还没有踏上这条通往中国的路线，尽管他们做梦也想去香港和中国内地经商，现实中他们还是需要先留在更近而且文化差异较小的迪拜，迪拜的伊斯兰文化较明显，有许多索马里店主在那里经营生意。一个商人告诉我：“对，我想去中国，但是听说你去了中国后，说不定会一无所有，所以必须小心谨慎。”

我在迪拜的一个网吧坐了一下午，认识了一个想去中国买伪劣电子产品的赞比亚商人，他想跳过中间商直接购买货源。他坚持说对方的中国公司必须有网站，但是一般在网上只能搜索到欧洲原厂网站，怎么可能找到贩卖伪劣商品的公司。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劝他，一个制造伪劣产品的公司不可能在网上做广告，他应该去找这些公司的“影子”。这个商人可能留在迪拜做生意会比较成功（尽管他在迪拜的供应商最清楚货源位置），他也可以去重庆大厦和广州，就可以更加接近货源。

我的研究助理 Jose Rojas 曾去到尼日利亚的拉各斯，跟随几个他在重庆大厦认识的尼日利亚商人体验其日常生活。他发现拉各斯的许多店铺依赖于源源不断船运而来的中国货物，每隔两天就有新到的轮船载来重庆大厦的货品。主要购买日本货和欧洲货的尼日利亚有钱人对中国产品不屑一顾，但大部分尼日利亚人会买这些商品，因为负担不起其它产品的价钱。

与 Jose 一起从香港出发的商人受到拉各斯许多年轻人的敬仰，因为那些年轻人陷于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然而，商人们都知道自己挣的钱不算多，而且手里攒着用来买货的钱往往不是

自己的钱，而是他们尼日利亚、香港或中国内地的老板的钱。Jose 还跟着商人们在坑坑洼洼的路上旅行，从拉各斯到奥尼查，常常见到路上有士兵设置路障，向贩卖冒牌衣服的商人收取过路费——Jose 自己也被勒索了。由于尼日利亚经常停电，国内腐败案件频发，所以国内没有制造手机、衣服、发电机等等商品的能力。尼日利亚依赖于中国进口商品，但包括衣服在内的部分商品却被尼日利亚政府列为违禁品。

尽管有的中国产品是违禁品，却在尼日利亚境内随处可见。拉各斯服装市场的大街小巷里，商品陈列在印有中文字样的塑料袋上，中国工厂用这些塑料袋包装服装成品。总而言之，Jose 发现虽然商人们在香港生活艰苦，但回到尼日利亚的生活更加难捱，也许这就是为何许多尼日利亚年轻人都想离家碰碰运气，即便不是去那些遥远的异乡，至少也要去一次像重庆大厦那样亲切熟悉的地方。商人们不愿意在香港或中国内地永久居留——他们更加渴望去欧洲或美国的梦想之都——但他们至少会在中国尝试发家暴富或至少赚一笔钱，让他们最终能永远离开尼日利亚。

我的研究助理 Maggie Lin 跟随肯尼亚的女性商人，从重庆大厦经过曼谷到达蒙巴萨和内罗毕。她们有的人从服装生意中获得了丰厚利润，已经开始在肯尼亚经营其他业务，包括理发店和小巴服务。在肯尼亚国内失业率高达 40% 的情况之下，她们受许多肯尼亚同胞的敬佩。有的女商人显然属于肯尼亚的中产阶级，她们拥有汽车，并雇有很多职员，而其他商人只能望洋兴叹。一位在肯尼亚挣扎生存的女商人告诉 Maggie，她想在

自家土地上盖一座新房子，把上层楼房出租给其他人，自己和家人住在底层。房子建造完毕后，她希望能凑齐资金，在中国购买从领带到沙发等各种货品，装满一整个集装箱运回售卖，从中获利。

Maggie 看到旅游纪念 T 恤、卡其裤，还有非洲女性围在身上的传统服装基科伊和康茄（同时也是游客喜爱的纪念品），这些是肯尼亚唯一本地生产的服装。尽管进口产品需交税，但是大部分服装来自国外，“中国制造”的标签充斥着奢侈品店和街头小铺。Maggie 的采访对象说，虽然中国生产的服装有比较时尚的设计，但由于顾客担心其质量，他们需要极力说服顾客，说这些服装很值得买。当然，不是所有中国制造的产品质量都很差，有一些产品质量极好，但多数商人在中国主要购买最便宜的产品，所以才令肯尼亚顾客把中国货与质量差联系在一起。

以上是重庆大厦中一些商人的贸易路线和故事，让一座香港的大厦与全球的许多地点连接在一起。

业主和经理

我现在把目光投向重庆大厦中的华裔、南亚裔业主和经理。如今重庆大厦的多数业主，自七八十年代从上海和福建来到香港，他们在重庆大厦买下能负担得起的最便宜的物业。重庆大厦的族裔多样性犹如万花筒，但却甚少见到这些华裔业主。然而，他们和子女的人生可谓一出“香港梦”：他们刚到香港和重庆大厦时有不同程度的资金问题，但经多年辛苦劳作之后成为较为富裕的阶级，可以供养孩子读到大学取得文凭，成为会计或教师，正如第一章所提到的 Andy Mok。

这一群业主的子女与重庆大厦常常毫无瓜葛。一位在重庆大厦长大的大学生告诉我：“如果我来写重庆大厦的故事，我会描述贫苦的中国内地移民如何通过买房产和多年努力变成有钱人。故事跟非洲人和南亚人没有任何关系，应该是一个内地人在香港拼搏的经典成功史。”这个大学生的描述缺少了其他我在重庆大厦耳闻目睹的景象，但有一定真实性。然而，这种拼搏故事仅到第一代子女为止，因为像 Andy Mok 这样的人离开了让他们父母成为中产阶级的重庆大厦。现在一些老一辈的华裔业主守在原处，然而许多人最终把物业卖给内地新移民或是南亚人。

许多留在重庆大厦的华人业主与周围环境隔绝开来，但也有少数业主能很好地适应新的文化氛围。大厦底层有一个经营

纪念品店铺的老人，一边精心摆设卖给西方游客的各种旅游纪念品（佛像和玉龙），另一边则摆卖给中国人的纪念品（瑞士军刀和各种吊饰），他能说不错的六国语言，我很惊奇能用日语跟他互相介绍各自的家人，然后转用西班牙文聊他在国外的旅游经历，我又看到他用普通话和法语跟不同的旅客讲话。另一个香港华裔男人在楼上经营旅行社，他会讲法语，所以有一大群非洲顾客找他办理签证，甚至让他帮忙购买服装。虽然重庆大厦的通用语言是英语，但这些人另外花功夫用其他语言跟顾客打交道，无疑争取到更多客源。我还认识一些华人店主借钱给常客，直到客人在非洲把货品都卖出去了，才收回全部款项。店主们明白这种行为有一定风险，但能令常客多多光顾。

重庆大厦的许多商店经理是南亚人，祖上已经在香港居住了数代，体现出香港自十九世纪中开始出现南亚人的悠久历史。^①举个例子，一个六十多岁的巴基斯坦服装店店主出生的时候，巴基斯坦仍隶属印度并拥有颁发英国国籍的权利，这个店主在1985年搬来香港创业，现在他四个女儿全部在英国生活，而独子则在中国内地做生意。另一些重庆大厦的服装商人也说，近年来生意越来越难做，因为很多顾客都跑去中国内地寻求便宜的货源，这个高龄的巴基斯坦店主仍然坚守在这里。

很多南亚裔经理能说流利的粤语，但仍然在香港感觉受到歧视，所以他们与香港的关系十分复杂——只有少部分人认为香港也许能成为自己的家园。然而，如果比较他们早年生活的

① White 1994。

南亚和暂时生活了几十年的香港，多数人仍然梦想最终能定居英国、加拿大或美国。一个经理告诉我，他不想与香港有任何联系，他希望为了下一代成长能移民加拿大。

他们可能把离开香港的梦想寄托在孩子身上。一位年轻的印度男人告诉我：“我父亲二十年前开始在重庆大厦经营餐厅，他希望我在香港的时候能够帮忙，但是他不想让我留在香港，而是让我去欧美拿商科学位，以便能在那边拥有更好的生活。”另一位较年长的巴基斯坦男人说：“我在重庆大厦经营旅馆，但我儿子在伦敦当医生，女儿在美国读书。”——追求更好的未来，不仅仅是他们逃离重庆大厦的理由，也是逃离香港的理由。

这些南亚店主与其他的香港华裔店主没有很大区别，后者中有大约一百万人持国外护照，“以防万一”需要移民出国的选择。^①可是，这些南亚人不像香港华人，他们对于以华人居民为主的香港有一种被隔离的感觉。在重庆大厦中，许多人讲印地语、乌尔都语、尼泊尔语、旁遮普语或者泰米尔语，他们吃南亚菜肴，买南亚的食材、影碟、杂志和送给妻女的莎丽，他们花时间看电视的印度台、巴基斯坦台、尼泊尔台，并联系远方的南亚亲友。他们中有许多人是虔诚的穆斯林：有好几次我在做研究的时候，一些信仰伊斯兰的店主把我拉到一旁，让我在YouTube上观看人们在麦加围绕克尔白天房朝拜的景象，同时播放可兰经的唱诵。然而，他们中许多人不再将南亚看作自己

^① Niall Fraser. “Expat Population a Myster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03年2月9日。

的家，特别是其子女一代，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印度男人说：“我从来没去过印度，印度对我来说就是外国！我会在那里迷路的！我生长在香港，也会老死在这里。”

重庆大厦里有一间电器铺，门口总是站着一个十五岁大的巴基斯坦男孩（我的研究助理 Amy Feng 和 Ingrid Tang 特别喜欢这个男孩，此处描写来源于她们二位），男孩三岁的时候随父亲一同来到香港，放学后也一定会来父亲的商铺。他在香港长大，能用粤语会话^①，他说“我的朋友都是华人”。但他没有学习书写及阅读中文，只会用英文读写，这反映了香港针对南亚族裔教育的特别之处。^②南亚人在香港一般接受英文教育，虽然有的课程用粤语教授，但中文写作并不是重点。

在香港出生的二十三岁巴基斯坦男人管理着另外一家店铺，他也会说流利的粤语，但不会读写中文。他从本地学校毕业之后，先在一间汽车展馆工作，但很快就辞职，他说：“我工作得比那个华裔女孩更快更好，但他们在三个月试用期后却偏重用她。”类似的故事解释了为何南亚人会在重庆大厦安家落户，因为它不像香港的其他地方，南亚人在重庆大厦能和同胞一起工作，不会因为他们非亚裔或不讲粤语的身份受到歧视（非

① 这个男孩希望长大后做医生或警察，但他不会写中文，很可能在将来的香港社会屡屡受挫。

② 香港政府从 2005 年起开始将南亚裔学童转至粤语学校，但令某些南亚父母震惊的是，主流南亚群体宁愿让孩子接受英文教育。^③

③ 见 Tam 2007；Elaine Yau, “Minority Repor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09年10月16日。

亚裔或不讲粤语的情况并没让生活在香港的白人遭受窘境，但绝对让南亚人备受歧视，特别在香港一直以来“白色人种至上，棕色人种低贱”的种族格局之下)。以下是两个南亚男人的口述故事。

Johnny Singh

我从2002年开始在重庆大厦做生意，现在我已四十岁出头，生意大不如以前。现在我只能花钱，存不下多少积蓄。我有一个手机铺和一个手表店，顾客来自非洲和印度。我与每个人友好交谈，如果我对顾客恭敬客气，他们就会从我这里买东西。我从不以高价或贱价卖出产品，我只依照市场价卖，并且乐在其中。我刚刚在英国待完十天，过几个星期又要去印度，不过那边的市道好像也不太好。香港最适合做生意了，比印度和英国等其他国家都好些。重庆大厦很不错，这里每个人都想捞一笔钱。这里什么国家的人都有，所以你总能把东西卖出去。

我进驻重庆大厦之前，曾在大厦外开了一家公司，从1997年开始经营，一共持续了五年。那时候我什么都卖，每个月能有5万至10万港币的利润。我向重庆大厦的店主供应中国工厂制造的产品，印度人那时还不能申请签证进入中国内地，所以他们会从我那里进货。那时候钱很好赚，我买了辆宝马车，兜里有1,000万美元！但是后来顾客们就开始自己去中国内地进货了。

我在家乡买了一处物业，一座位于旁遮普北部的农场。我在那边有很多产业——简直可以直接退休了。父母不想让我再回来香港，就跟我说：“就留在旁遮普吧！我们老了，你留下来，我们给你买房买车。”我答道：“我还有妻儿，不能留在家乡。你们再给我五年时间去香港做生意，然后我就回家。”一年前我拥有六家店铺，但现在只剩下两间了，生意越来越不景气，我的经济损失超过200万港币，我已经尽力了。我一个哥哥替一家香港企业打了二十五年工，那家公司上个月倒闭，他现在也丢了饭碗。

我出生在香港，我已经在香港生活超过三十年。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我在印度住过十年，六岁那年我被送回印度，直到十七岁才回到香港。我的父亲是一名香港警察，他在1986年退休后回到印度。对，香港是一个华人社会，我在这里觉得自己像是局外人。但是我一踏进重庆大厦，我就不再觉得自己是外来人了，仿佛回到家里一样。各种不同背景的人都来这，有印度尼西亚人、马来西亚人、印度人、斯里兰卡人、孟加拉人、非洲人、欧洲人，什么样国籍的都有。外面的世界很不容易，但重庆大厦是我们共同的家！

我已经决定要带儿子一起回印度。他现在在英文学校读书，可是我很想让他学会我的母语旁遮普语，我想让他了解印度文化。我真不想让他继续留在香港，学英文还可以，但是为什么要学粤语？没人需要学粤语！我自己的同学都说旁遮普语，他们还说如果我回到印度，他们一定会投票选我做村长。在香港这个地方，你可以赚钱过上好生活，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我渴望落叶归根回

到印度，我是一个锡克人，但是却因为要配合香港习俗而摘掉头巾、剪掉头发，连我兄弟都批评我不戴头巾。

香港存在歧视问题。我会讲粤语，而且在香港长大，但是我曾经被供应商玩得团团转，他们不给我发来至关重要的货物，于是我告诉他们：“你看，我不是货车司机，我拥有这些店铺！”你一旦开始说粤语，中国人就害怕起来，如果他们以为你不会粤语，就会讲你的坏话。我去年跟他们吵架，还被打。如果我是个华人，警察会花更多精力替我解决问题，可是我不是华人，所以他们一点也不在乎。当时那个警察跟我说：“如果你觉得这里不安全，那就去英国。”他们居然那样跟我讲话！

至于重庆大厦……两三年后会有更多中国内地人来这里开店，所有的巴基斯坦人和印度人将一个接一个离开重庆大厦。就算没有生意，租金也会持续上涨。也许非洲客户会更信任华人，多于信任印度人或巴基斯坦人，可能因为他们以为华人都有工厂的缘故。对，以后说不定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全部消失了，只留下非洲人和中国人。

Fahad Ali

我在过去差不多二十年期间不断造访重庆大厦，因为我哥哥曾经到过这里，而我只在这里一间手机铺工作过八个月。我现在快三十岁了，我认识许多大厦中的人，以及在他们之前来过的人，还有再之前来过的人，甚至再再之前的人！我认为重

庆大厦日新月异，但是生意没有变得更兴旺——二十年前的生意好很多——不过，现在更多人进重庆大厦了，也有更多人了解这座大厦，大家对这个地方的印象好了一些。在九十年代，大家都怕来这里，因为那个时候有毒品和黑帮问题。现在这里的人都很和平友善，所以大家就不担心了。

我这间手机铺批发零售都做，我没有非洲大客户，但是我哥哥有。有一些非洲商人在哥哥那里下订单，然后他把手机运送给他们。那些商人正经可靠，可是我们这里很多商店经理跟非洲人做生意有不好的经历，有些人甚至损失过百万元。当你已经跟某人做了很长时间的生意，你会相信他，你会给他贷款额度，并说：“你可以下次再付钱。”那时他就会下一个庞大的订单，却不付款，而且再也不会出现了——你再也见不到他第二面。

没错，中国内地的生意人也开始进驻重庆大厦，他们尝试过，不过却很失败，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仍然是主流商铺经理。有些人认为我这么说很愚蠢，但是我告诉他们：“千万不要买中国内地的手机。”我不能给那些手机做任何保证，也许它们明天就坏了！这种情况在黑人那里经常发生，你给他们提供一个价位，他们马上砍一半价钱，我说“400港币”，他们就说“200港币”，那你就只能给他们中国内地手机了。^①

我另有一份工作是广告设计。我曾经在一家大型广告公司工作，可是现在香港的设计市场不太景气，所以我现在早上个人经营设计公司，下午和晚上在这间手机铺打工，看看自己是

① “中国内地手机”在这个情况下指中国内地制造的欧洲或韩国手机品牌的仿制品。

不是能做这一行。香港的贸易行业很好，所以我才做这个！今日的重庆大厦，很多人说生意不好，赚不到钱，但是你根本见不到有空荡荡的店铺。重庆大厦正在给香港创造收益，我认识的很多店主都很富有！

我两个月前新婚，娶了一个香港女孩。我的妻子皈依了伊斯兰教，她在我们结婚之前就已经皈依了，不过她不是为了我而皈依，而是为了她自己，我可没有强迫她成为穆斯林！如果她准备好了，自然会信教。我认识身边有四五个中国女孩信了伊斯兰教，我替她们感到高兴。至于我妻子，我从来没有告诉她应该皈依，从来没有。皈依不应该源于其他人促使你去信，而是由你自己理解后做出的行为。

我有很多华人朋友，但是我一点粤语也不会说，我没有一点语言天分！但是我们既然在香港生活，这里就是我们的家。我不会讲粤语并不会阻碍我在香港找工作，对，也许我的性格有些帮助——我尝试对身边的人礼貌友善。有一些愚蠢的香港华人歧视他人，比如一见到我就捏着鼻子，我只是朝他们微笑，每个国家都有好人和坏人。我也有一些华人朋友害怕来重庆大厦，他们知道我在这里工作后觉得很奇怪！欧洲人反而不怕来重庆大厦，只有本地华人怕。

我们总是希望重庆大厦越来越好。天气像今天这么热的时候，生意不太好，我们就希望能有中央空调。人们去许多其他购物商场逛街，因为那里很凉快，但是没有人会因为那个原因来重庆大厦！我真不喜欢大门外的那些托儿（向弥敦道上的行人派发重庆大厦餐馆的菜单），他们不应该站在那里，因为他们

把顾客都吓跑了，管理员拿他们没办法。如果有五十个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站在外面，而且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正确与人交谈，难道你觉得会有华人愿意进大厦吗？华人是否进来完全取决于这座建筑及它的名声。

为什么管理员不阻止那些人嚼槟榔叶和吐痰呢？^①我讨厌那些行为！他们在印度可以做，但这里不是印度！你看到那堵墙上的红印了吗？就是他们吐痰造成的！稍微有点理智的人都不会做这种事情。有的时候，我很受不了临时工和避难者，就是因为他们有这种行为，他们糟蹋了我们的声誉！生意也受他们这种人的影响！而且他们很多人抢了香港居民的饭碗。

警察来这里保护我们，但有些警察很坏。你在这里是一个白人，而我是一个棕色肤种的人。警察先生跟你说话的时候，他们脸上带着微笑，但是他们和我讲话就一脸怒气，那个时候我真想踹他们一脚。经过机场入境处的时候，我对工作人员说：“刚才你对白人还露齿微笑呢，为什么你现在要对我怒目相向？你可否解释一下？”他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重庆大厦是我的客厅，我在这里跟其他人见面交谈。在整个香港地区，这里是唯一一个各种国籍的人相聚一堂的地方。如果没有了重庆大厦，这些人可以去哪里呢？假设它被拆掉，也许我们可以跑去占领隔壁的假日酒店！

① 槟榔叶是一种南亚人普遍喜爱咀嚼的食物，重庆大厦中许多小食摊都会贩卖。

临时工

拥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南亚人可以拥有自己的物业，他们常常雇佣其他没有这么好条件的南亚同胞，也就是持旅游签证来港的印度人。这些临时工是重庆大厦的劳动军主力，他们的职业包括店铺职员，还有餐厅的托儿、服务员及洗碗工，还有旅店的托儿、清洁工及经理，或者货物搬运工。他们进入香港机场时获得十四天免签，并可以两次延期不定天数的期限，一年内可以在香港逗留不超过180天。相比持香港居民身份证的本土居民，这些临时工的薪水很少，每个月只赚3,000港币。我有时听临时工们说：“为什么其他人可以赚取高我工资一倍的钱？只是因为他有香港身份证，而我没有！”有些商铺经理则跟我提起雇佣持旅游签证的临时工有风险，包括雇主可能需要缴交高额罚金，所以工资低有一定道理。

在香港长期居住的南亚居民主要来自旁遮比、印度南部、巴基斯坦和尼泊尔，但是临时工主要来自同一个地区——基德布尔，一个位于加尔各答的穆斯林社区。加尔各答的人来到重庆大厦，主要因为飞来香港的机票比去其他提供工作的地点更便宜，而从诸如孟买等印度西部城市飞去杜拜则最便宜。重庆大厦的临时工主要来自基德布尔的原因很难总结（重庆大厦确实存在大量穆斯林，也许是一个因素），但是人际关系是一个关键，有人说：“我表兄弟告诉我他在重庆大厦找到了工作，所以

我也来这边。”临时工来香港，主要因为他们在加尔各答很难找到待遇好的工作。我访谈的一些年轻印度男性娶了教师和公务员，但他们在香港赚的钱比妻子多得多。

临时工在香港处境危险，因为他们一旦被发现非法打工，就可能被起诉、坐牢、甚至被禁止再次进入香港^①。然而，他们也特别难被捉到。只要有人入境处警察踏进重庆大厦，站在大厦前的看守和友人就会打电话通知，大批非法劳工就会突然从柜台消失，或者混进游客和商人之中。由于香港华人在重庆大厦很显眼，而且便衣警察也容易被辨别出来，所以临时工被捕的几率非常小，尽管有时仍然有几个毫不警惕或倒霉的工人被捉到。

没有这一群非法劳工，重庆大厦中的许多生意都没办法维持。如果手机铺、小食摊和旅店只聘请合法劳工，人力成本将翻倍，价格也将成倍增长。许多非洲及南亚商人每顿饭、每晚住店都分毫必省，如果价格上涨，他们就不会再来重庆大厦，大厦也将消失。非法劳工确实受到剥削，一位工人生气地说：“老板每个月付我 3,000 港币，我每天工作十五个小时，每月才只赚 3,000 港币——一点儿都不好！”他说自己要支撑九口之家，但是香港的前景比加尔各答好很多，所以他每年必须回来。

临时工在某些意义上也算是商人，他们回印度的时候在行李里装满了货品，多数是四十公斤以下打包好的服装，他们回

^① Martin Wong, “Officers Go Undercover to Nab Illegal Worker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06年12月27日。

香港时则运来诸如豆菜和印度米等食品，以折扣价卖给重庆大厦的餐馆。他们一般乘坐孟加拉航空，有时航班起飞会推迟 24 至 48 个小时，但还是值得的，因为香港到加尔各答的来回机票不过 3,000 港币，比其他航班都便宜。在香港国际机场，这些临时工收到需要他们运送的真空包装的服装。他们通过来回香港运送服装和食物赚得利润，足以支付 50% 至 80% 的机票费用，我听说那些服装被销售至印度各地。

许多临时工梦想拥有自己的生意，但一个商人起步资金至少要 1 万港币，2 万港币则更保险。由于许多人肩负供养家庭的责任，很难凑齐这么多钱。有一些临时工偷偷地到我面前说：“如果你能借给我 6,000 港币，我就能买足够多的手机，赚来的钱我们平分，而我就不需要再做这行了。”我拒绝此类请求，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许多工人缺少基本生意头脑。

还有的人问我成为避难者的利弊之处，这点我之后将详细讨论。还有的人问：“请你告诉我，有什么办法让我拿到香港居民身份？”一般来说，答案是不可能，除非他们能娶到一个香港女孩。我认识一位魅力超凡的年轻临时工确实有一个交往多年的香港女朋友，但当他求婚的时候，她说：“噢，不，我喜欢你，但我不可能嫁给你！”结果，他赢取香港身份证的机会一去不复返。他生气地说：“她居然只是想跟我玩玩！”

有些临时工只来过一次香港，之后再也没回来，因为他们觉得工作节奏令人精疲力尽，或是重庆大厦中的道德标准挑战了他们的伊斯兰信仰。但多数工人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回来，慢慢积攒下回家及经营生意的费用，以完成他们在香港漫长的

梦想，或者攒钱在家乡买下物业——如果他们不离乡背井，是不可能买下那些物业的。

我曾经跟着重庆大厦的一个临时工在加尔各答待了一周，观察他做生意和会见基德布尔的亲朋好友，从而更加了解基德布尔和重庆大厦的关联。让我惊奇的是，他和重庆大厦的工人朋友将服装包裹带过海关时困难重重，海关人员用厌恶的目光盯着他们。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印度人自己可以做服装！我们不需要中国的衣服！”于是他们让那些人一直等到下午，才让他们通过一扇限时开放的窗口通关，一旦有航空旅客经过，这扇窗口立刻关闭。连续三天，我们必须搭计程车回到机场，而我这个朋友见到花费日益见长，人也变得越来越消沉绝望。

让我惊奇的另一点是，虽然我从未到过基德布尔，但它仿佛是一个失落已久的家园：短短几天内好几次有人叫住我：“喂！我在重庆大厦见过你！还记得我吗？欢迎来到印度！”仿佛整个重庆大厦转移至基德布尔的街头——眼前不时有一个年轻自豪的归国者，骑着光鲜亮丽的摩托车穿街走巷，受到其他几个男孩的瞩目。

第三个让我惊奇之处是我朋友的经济状况。他每个月拿3,000港币的薪水，每年只赚取六个月的工资——在香港标准下可谓一文不值——但却足以让他负担两个姐妹和他自己的婚事，每个婚礼都有超过千人参加，另外还让他买到了一台仿佛是一颗肝宝贝的摩托车，并很快能支持大家族兴建家园。重庆大厦令他成为了加尔各答的“重要人物”，也许他在香港不是什么人物，不过是一个餐厅的托儿，但他对家人来说是名副其实的英

雄。我与他父母交谈时，发现他们虽然表面谦逊，但是一提到儿子的成功就情不自禁微笑起来。我这个朋友令家里从基本果腹的情况提升到奢华的生活，拥有了摩托车、音响、水质净化器及室内装修。家里另一个儿子曾经也去过重庆大厦工作，但却忍受不了工作的艰辛，现在在一个加尔各答的电话公司工作，赚取的工资在印度标准来说还不错，也能帮补家用，但却远远不及兄弟的收入水平。

以下是另一位在重庆大厦打工的临时工口述的故事。

Ahmed Aziz

我往返香港和加尔各答之间已经超过一百个来回了，我在重庆大厦替一个旅店经理工作了六年。在那之前，我和生意伙伴来香港做贸易。父亲给了我20万卢比（大约4万港币），让我经营生意。头两年生意很好，但是后来我的伙伴把钱一卷而空，从我这拿走50万卢比后消失了。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个人，也许他回印度南部的马德拉斯了，马德拉斯那么大，我在那里又没有亲戚，所以不可能找得到他。我找过警察，但是一位当警察的朋友告诉我不可能把钱要回来，于是我这次只好回香港打工。

没错，持旅游签证来回十分困难，香港入境处一点都不傻，他们知道有些人来香港是为了做生意或打工。入境处允许某些人逗留十四天，有些人却只有七天或者四天，有些人一天也拿

不到。你能去中国内地申请两次延期，最多停留四十二天，之后必须回国。我去中国内地入境处的时候总是很紧张，你必须出示钞票，有时候是5,000港币，有时候是1万港币。我需要更新签证的时候就去找老板，他给我一些钱以便出示给入境处的职员看。他很信任我，知道我不会拿着他给我的钱逃走！当我往返印度和香港的时候，我会携带货品以抵消一些旅行费用，比如从印度带莎丽来香港，再从香港带电子产品去印度。有时我能从中赚取丰厚的利润，400美元利润几乎能支付全程机票钱，有的时候则赚250美元，这取决于价格变动。

我每个月的薪水是3,000港币，包含住宿，主要工作是替老板的旅店招揽顾客。警察从不骚扰我，因为我有合法的签证和护照，他们以为我只是一个旅客，我从早上十一点到半夜或凌晨两点站在外面招揽客人——每天晚上我只有六至七个小时的睡眠时间。有时我一天能招来四个客人，有时五六个。我一眼就能辨认出顾客群：马里和贝宁来的人一般要选便宜的房间。尼日利亚人很危险，如果房间价格是每晚100港币，他就会掏出80港币说：“我没钱！好啊，你去叫警察来！”日本人和韩国人则比较喜欢选干净的房间。

我的妻子在基德布尔一个幼儿园当教师，我四岁的女儿也在那里。我想给我的后代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妻子每个月赚3,000卢比，大概600港币左右，只有我在香港赚的五分之一而已。我是长子，一共有四个弟弟和三个妹妹。一个弟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在水资源管理处工作；第二个弟弟在印度工作；还有一个弟弟在读大学。在加利福尼亚的弟弟赚钱最多，我第

二多。我每个月给妻子 220 港币，给父亲 2,500 港币。我会在香港再多工作一年，然后就回印度。父亲拥有一家餐厅，他已经年迈了，所以我会替他打理。

基德布尔的许多居民没上过学，但是我在学校念完了书。我毕业后在一家工厂打工，但是它突然倒闭，发生抗议示威——印度有那么多政治党派，有那么多问题。不过，我还是情愿让家人住在印度，而不是香港，因为香港文化不好。那些印度尼西亚女人，在这里有一个男朋友，那里又有一个。^①我喜欢印度人，他们只爱一个对象！对，也有很多性工作者是印度人，但是她们是性工作者，本质不一样！我爱我的祖国，她真伟大！所以我想在一年内回国，那该有多好啊！现在许多公司到印度开张生意，印度再也不是穷国了。

① 他指印度尼西亚家庭佣工，她们会在周日假期来重庆大厦。

避难者

香港在 2009 年大约有六千个避难者，大部分来自南亚及非洲国家，他们中许多人集中在重庆大厦。第四章将集中阐述避难者的情况，但我会在这里简单描述。如之前所提，香港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中是一个特例，因为它的边境政策较为开放。除了少数国籍人士需要提前申请签证来港以外，大部分国家的人可以到达香港国际机场直接获得十四天、三十天、九十天的逗留期限。这令香港这个旅游胜地易于到达，不过这也同时让香港像磁铁一样吸引来国际避难者。就算有些人需要提前申请签证进入香港，过程也并不复杂，只有非常少数的人在机场被拒入境，虽然入境之容易与他们之后在香港的生活好坏无任何联系。一个索马里男人听见我傻傻地问他问题，摇摇头说：“为什么我要来香港？因为我就知道他们会让我进来！”

许多避难者在进入香港几天至几周后造访国际难民署，他们在香港有一间办公室，避难者在这里正式申报避难身份。国际难民署大约用三年或以上的时间审核案例，之后还需要额外时间进行上诉。也有很多避难者寻求香港政府的帮助，即签署禁止酷刑公约（CAT）。然而，签署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与避难者的身份无关，所以国际难民署才涉足。许多申报案例的审核

长达数年之久^①，只有很小一部分避难者能拿到难民身份，能在第三国寻求定居，比如加拿大或美国。大部分避难者用以上方法无限期停留在香港，等待命运。

在2006年和2007年，没有身份证明的避难者可能被无情的警察随时逮捕，但到了2008年，避难者可以申请证明其避难身份的文件——尽管避难者被捕后可能面临入狱数周，不过能每月领取1,900港币的最低政府津贴。如此低的救济金在香港很难生存，但是对于来自非发达国家的人来说已经很慷慨了。我听说有雇主肆无忌惮地在南亚张贴广告，告诉工作应聘者在香港会有待遇优厚的工作，一旦到达，可以先申请避难者身份。

有些避难者寻求庇护，为了逃离在家乡受到的宗教、种族或政治迫害和酷刑，其他避难者则是为了来香港寻找经济出路。前者一般被认为是“真”避难者，后者则是“假”的。但事实上，这两个避难者类型的区别比较模糊——我认识好几个避难者在他们的祖国被不同方式威胁，觉得自己必须逃离，但是却不符合获得难民身份的具体条件。

在重庆大厦中经常可以见到经济避难者打工赚钱，因为即便他们被捕遣返回国，也不会失去很多东西。然而政治避难者不会打工，因为如果他们不幸被遣返回国，将面临牢狱之灾和皮肉之苦，甚至可能死在家乡。即便是这种区别也不太清楚，

^① 有律师告诉我，只有在国际难民署提交申请才能成为避难者，才能获得被考虑成为难民去其他地方定居。签署禁止酷刑公约不符合以上申请条件。然而，由于许多避难者不知道有这个分别，我将他们全部统称为“避难者”。

也有些经济避难者选择不打工，觉得依靠微弱的救济金生存更容易，可以花时间写作或者玩耍。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有些政治避难者打工，尽管这将让他们有被遣返的风险，但是他们觉得自己必须汇钱给家里的亲人。

令我惊讶的是，有好多次重庆大厦的雇主认识我几个月后说：“其实我是一个避难者。”打工的避难者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被入境处逮捕也有各种不同的风险。有些人，特别是南亚人，安全地在底座和一楼的铺子里工作，因为他们的面貌跟持合法旅游签证的同胞差不多，也跟那些有香港居留权的幸运的南亚雇主长得很像。有几个南亚性工作工作者也是避难者，因为这样她们就能无限期在香港逗留和打工。非洲避难者则需要小心警惕，我认识有几个人在旅店工作，这样他们不容易被发现。他们的老板宣称：“我只不过想帮助一个可怜的避难者，所以给了他一处睡觉的地方，我可从来没给过他钱。”（这个比喻可谓是恰如其分的讽刺，因为这些人的薪水非常低，可能每个月只有2,000至2,500港币。）

还有的人站在重庆大厦外，成为兜售假表和订做服装的推销员。这十分危险，不过他们已经是辨认便衣警察的专家了，还未等警察靠近，他们就一哄而散。早在2009年初，香港有一个法案决定允许避难者打临时工，结果导致来港避难者人数骤然上升。在2009年末，法案修改，警察涌进重庆大厦逮捕了十几个非法劳工。这样一来，重庆大厦底座和一楼的非法劳工遭到清除，直到局势安定下来，他们才返回工作岗位。

不打工的避难者往往在重庆大厦的一个基督教非政府组织

消磨时间，有时也在香港其他的福利组织帮忙。特别是那些没有工作只是等待的避难者，所有人都面对着数年的等待和渺茫的未来。在过去四年里，我在重庆大厦的基督教励行会给避难者教书，名义上教高级英文，但其实是讨论时事和人生哲学。我经常惊讶地发现，班里有的学生在他们祖国是名人（有几个人在网上是热点人物，有一个人早前曾作为一个政治选举发言人出现在 CNN，在被警察捉到之前逃离出国），他们真是既聪明又爱发言（引用一位学生的话：“教授，你在这件事情上的观点犯了五个错误，让我逐一向你解释。”），他们许多人也真的很不开心。

他们的忧愁主要来自如今生活的苦闷无聊和不确定，完全取决于他们无法控制的官僚系统，他们的人生没有着落。一个男人说：“我已经三十多岁了，也算有才干，可以工作。但是我在香港不能打工，我在香港就是个废人，只不过是一个乞丐。”这种痛苦也来源于他们在家乡遭受过的苦难和罪责。一个人怎样才能克服折磨？另一方面，一个人如何解释自己需要离乡背井到香港来等各种捉摸不透的问题？一个人如何向自己解释抛妻弃子的理由？

我认识的避难者不顾一切地想证明自己的避难申请正当合理，真实的避难者理当如此，他们的人生依赖于可以决定他们命运的官僚。但对于那些只是来香港寻求经济利益的人也是如此，他们必须拼命让自己的案例看起来无懈可击。我认识几个老练的避难者，他们能流利背诵那些获得难民身份的假避难者的名字（“他只是很会说故事，仅此而已！”），他们还能背诵

一串没能获得难民身份的真避难者的名字（“他们怎么会否决这个人？那些联合国职员疯了！他们像黑社会一样！”）这些人的人生就取决于这些连自己都怀疑的评判标准，其象征毫无疑问——他们仿佛是摇号机里的彩票，赢了的人就能获得新生。不过就如彩票一样，他们赢的几率非常低。

我曾经造访熟识的避难者的家人，一次在东非，一次在南亚。我的南亚避难者朋友有强烈的原则，并固执己见，我很难理解他为何要做出某些行为，但同时他在信仰上却也十分真诚。我去他家见过他的家人，包括他的父母和姐妹，我把他的信件带了过去。这家人乡土味很浓，不爱说话，尽管他们见到儿子的信使十分高兴。我通过一个翻译，从这位年过花甲的父亲口中了解到他儿子的故事：“我儿子的问题主要是他拒绝参军，很多人贿赂官员以免参军，但他却不愿意贿赂别人，他按照自己的原则做事……我已经因为他不参军而丢掉了几份工作，但我还是敬佩他的行为。”

他的儿子曾被捕入狱，政府官员用电击及其他刑具折磨他。他告诉我，他儿子的中学老师说过：“他很聪明，但是为什么那些人要这样对待他，而不这么对待其他人？”这个儿子曾经三次逃跑到邻近国家，可是每次受到亲朋好友的招引又回国了，但每次他又会被捕受刑。最终他成功逃离了家乡，跑到几千里以外的香港。可是在香港，让他拒绝参军的原则同样让他在找工作的过程中遇到挑战，因为他打工将有非法性质，他会睡不着觉，辗转反侧地思考着自己的处境。在我探访他父亲一年之后，他的父亲去世了，儿子仍然无限期地被困在香港。

我也去过另一个避难者朋友在东非的家。我在他的表弟家留宿，他的表弟是一位替执政党工作的年轻政治家，他说：“对，我表哥曾受到威胁，因为他是反对党成员。你要越界，他们才会杀掉你。他肯定是越过了那条界线……但是我不知道，因为我不能跟他谈话，我的电话受到监控。”这个朋友的另一位亲戚是颇有权势的政府部长，我与他一起共进晚餐和长谈，他很亲切感性，但是不愿意支持他一手带大的这个朋友。我在香港的这位避难者朋友仿佛是一个怪人，莫名其妙地误入歧途，因为反对政府而倍受煎熬。

后来我有机会见到这位朋友的妻儿，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她们特地还穿上了最好的衣服，我给她们带去了许多礼物。我还见到这个朋友的哥哥，他讲话绘声绘色，很有意思。我提到曾经在报纸上读到几位著名人士严厉批判当地政府的言论，为什么我的朋友不能像他们一样言论自由？这位哥哥说：“他们都是名人，政府不敢关押或杀害他们，因为他们太出名了。但是我弟弟一文不名，警察可以轻易除掉他。”确实，在第二天，一个普通的异见分子被警察杀害了，这种事情刊登在报纸上。我离开那里的时候，凶案的罪魁祸首仍然没被找到。我的避难者朋友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沦落至重庆大厦的。

家庭佣工

一些家庭佣工在重庆大厦工作，有的菲律宾佣工受聘于住在重庆大厦和其他地方的亲戚，这些亲戚在大厦的旅店里做经理。不过我想讨论在周日来到重庆大厦的成百个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家庭佣工。每到星期天，数以万计的家庭佣工从香港各地涌入香港商业区中环，在那里吃喝玩乐，和友人聚会。^①有的佣工也到重庆大厦来，为了一尝重庆大厦的美食，南亚菜肴比她们在雇主家里吃的中国菜更对胃口。她们也爱购物，重庆大厦的商品在香港可谓最便宜的了，特别是手机、电子产品和服装。另外也有一些人来吸引男人，年轻佣工希望每周至少能有一次被人看作具有魅力和美貌外表的女性，而不仅仅被看作是家庭佣工。有的女人穿上最漂亮的紧身衣物，她们很多人在重庆大厦有南亚和非洲男朋友。

我在过去几年与她们有很多聊天的机会，但比较有印象的是一个星期天早上，我在重庆大厦中和几个印度尼西亚家庭佣工的谈话。她们当时都在等待自己的男朋友：一个是沙特阿拉伯人，一个是巴基斯坦人，另一个是印度人。这些女人快活地谈论她们的“合约男友”——双方恋爱关系只限于两人同在香港的这一段时间。男友们付账单，而她们则提供陪伴和性爱。

^① Constable 1997, 1-3。

不过这些恋情不断发展着，这三个女孩中有一个不希望见到男朋友，因为他们会吵架，她的朋友劝说：“你不要再想他了！忘了他吧！”但是她哭了，显然没办法忘记。有印度男友的女人接到男朋友的电话，发现他居然身在监狱——他是一名避难者，被发现没有身份证明文件，前一天已经被捕了，于是告诉女朋友这周末不要来找他了。

她们中说话比较多的女人告诉我，来香港打工在印度尼西亚会有不好的名声：“意味着你根本不是什么好女人。”她家住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农场，她汇钱给家人支付燃油和日用品消费，但是她说自己不可能再回去那个农场生活，她会在城市经营自己的生意。她的鼻子上有一个（临时的）鼻环，头发也染成橘红色——确实很难想象她会回到保守的农业社会生活。另外两个女人都愿意向我展示手机里与男朋友的合照，可是这个女人却不愿意。原来她一共有两个男朋友，一个印度人和一个华人，而且她在印度尼西亚还有丈夫。这些女人说他们的雇主根本不知道她们有男朋友。我问她们如果怀孕了怎么办，她们尴尬地笑了起来，其中一个说：“我们都知道有一种强力药很管用。”

性工作者

在重庆大厦工作生活的人大约有 85% 至 90% 是男性，他们大部分年轻力壮，而且只是短暂停留在港。所以并不意外地，重庆大厦吸引来各种国籍背景的性工作者。直到最近几年，重庆大厦还流行着一个假设，任何穿着时髦出现在大厦里的年轻女性就是性工作者。九十年代末，我一个样貌姣好的研究助理曾在在大厦做研究，她经常惊讶地发现，许多男人以为她毫无疑问是性工作者，都问她：“多少钱？”最近几年，我另外一个女学生穿着裙子，在一天下午访问重庆大厦，结果无意中听到一个店主用粤语（他以为她是菲律宾人）说：“噢，今天那些女孩来得真早，不是吗？”

不过这个假设到现在已经无效，可能主要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内地游客在重庆大厦留宿，他们中有许多穿戴光鲜的年轻女性，她们来之前对重庆大厦一无所知，只是事先在网上订了房间。为了保障这些年轻游客不受骚扰，重庆大厦的保安管理很严格，开始将面熟的性工作者拒于门外。在半夜后尤其如此，大厦的前门半掩，只留有一扇小门。我有时候回重庆大厦比较晚，会有一名性工作者尾随我，尝试进入重庆大厦，结果被保安叫住，还问我：“她是跟你一起的吗？”

也确实有一部分性工作者住在重庆大厦的公寓里，我听说的一个比较可信的数字是六十到八十个人，不过她们一般不会像多

年前那样，重庆大厦里找陌生人的生意，只会很隐蔽地在货币兑换店附近招揽客人。重庆大厦也有一些不同的商店替顾客介绍性工作。我几年来多次在旅店遇见性工作者，发现住在附近房间的女人专做这一行，不过尽管相隔如此之近我也常常不知情，直到后来有人告诉我。曾经有一个做旅店经理的朋友，在我踏踏实实睡了一晚后，好笑地问：“难道你不知道隔壁发生了什么情况吗？”

重庆大厦外的景象截然不同，有时性工作者特别积极地招揽顾客。在重庆大厦前的弥敦道上有一些华裔性工作者，主要是持临时逗留签证的中国内地女人。在弥敦道与么地道的交叉拐弯处有各种国籍的性工作者，我曾经与她们许多人交谈过，她们自称来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蒙古、坦桑尼亚和肯尼亚。在么地道 7-Eleven 附近，有几个到十几个穿鲜亮莎丽的印度性工作者，正如第一章所提到过的，这些女人往往来自印度南部，特别是一个叫喀拉拉邦的地方。与我交谈的女人一般比较年长，她们经常宣称自己被丈夫抛弃了，为了赚钱抚养小孩来到重庆大厦。她们告诉家人自己在金奈旅行，或是在孟买做文职工作，然后自己偷偷飞来香港。香港法律规定，只要她们没有逾期逗留，就不会被警察询查。然而，有时她们还是会遭到逮捕。

这些性工作者一般不会把顾客带进重庆大厦，而是去附近的美丽都大厦，那里比重庆大厦稍微贵一些，人也没那么密集，不

过晚上一样阴森，没太多保安把守。^① 这些女人的价钱一般为每小时 100 港币，每晚 600 港币，但这也因顾客而异，对白人顾客的收费显然更高，因为他们常常比较有钱。我常听说在旅店 里召妓像叫外卖一样简单，有人告诉我：“选择很多，从金发的 年轻欧洲人（1,000 港币）到华裔上班族女郎（500 港币），最 便宜的性工作者是菲律宾人和印度尼西亚人（250 港币全套服 务）。”^②

在重庆大厦附近采访性工作者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原因 显而易见：她们大部分人在某种程度上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可耻， 或者觉得我是一个潜在顾客。就算有时我正式付款——以便进行 采访，我从未在其他采访中给过钱——我也很难从访谈中得到 什么（在此我引用其中一段访谈：“我并没有做这一行，为什么 你要问我这些问题？……没错，我喜欢白人，因为他们会付 更多钱。”）。这是我在重庆大厦最不了解的一群人，我只较为熟 悉其中的某些人。有一位东非女人住在重庆大厦，做性工作已

① Nishika Patel, “Badlands on the Heart of the City” *The Standard*, 2007年12月4日。

② 一位典型的印度性工作者会将一半收入用来交旅店房租，另外 25% 交给看管 她的老鸨，所以剩给自己的收入其实很微薄。这些女人们显然并没有受到黑帮控 控，如今的重庆大厦也没有什么黑社会活动，不过她们有老鸨的照看——当我采 访性工作者的时候，老鸨们会每个小时打电话过来，以确定一切顺利——就我所 见所闻，黑社会并没有参与其中。

价格范围令人不适地反映了十九世纪人类学家摩根和泰勒所说的社会阶级，也映 射出整个香港社会的情景。来自不同社会的性工作者分布在香港不同地区，尽管 她们在香港其他地方的价格可能略高于重庆大厦周边，但她们有着相似的价格 标签。

有两年，她的工作地点不在重庆大厦，而是在更加高级的湾仔酒吧街。她每个月小心翼翼地汇钱给家里人，自己回家更新签证之前也会打包服装带回去。她计划在三年后结束性工作，回国自己做生意——到那个时候，她应该就有资本做生意，说不定能幸运地实现成为中产阶级的愿望。

瘾君子

主流媒体仍然将重庆大厦刻画成充满非法药品的地方。也许在二三十年前，重庆大厦确实有大范围的毒品问题，那个时候它还是一个背包客天堂，不过现在毒品问题已经不常见了（除了酒精和南亚人从小食摊买的槟榔叶）。欧洲人和非洲人有时会吸大麻，他们偷偷地从游走在重庆大厦内外的南亚贩子那里买到大麻。主要的瘾君子与尼泊尔人有关，大概有四十个尼泊尔海洛因瘾君子在大厦附近，他们许多人睡在位于重庆大厦的后巷，以及楼梯间的硬纸板小屋里。

这些人是廓尔喀的儿子，廓尔喀八九十年代曾在香港英军服役，所以拥有香港居留权。这些三四十岁的儿子们在尼泊尔有妻儿，但是他们抛弃了父母包办的婚姻，显然他们被寄予太多厚望，大家希望他们能在香港创造巨大财富，结果他们宁愿变成瘾君子，把拿到的香港政府津贴花在海洛因而非住房上。

重庆大厦中的其他尼泊尔人和南亚人也会蔑视这一群人，一位年轻的印度人评论道：“我每天拼命工作，盼望能留在香港生活。他们已经有居留权了，但是却白白浪费，真是娇生惯养的有钱人！”另一个人说：“他们青少年时就一直有优越感……他们不怎么工作，不喜欢做‘低下的工作’，所以变成了瘾君子。”有好几个基督教慈善机构曾经尝试帮他们戒毒，但一位在这种机构工作的社工告诉我，这种努力让人受挫：

他们的问题在于受到很多家人给的压力，家人希望他们能在香港有成功的事业，但是他们根本没办法达成。他们的家人在尼泊尔比较富裕，但由于这些人身在香港，所以被期望有更好的生活，但是他们不行。他们在这里的社交圈子完全就是其他的瘾君子，所以他们根本无法逃离，除非向神祈祷，多数人还是会复发毒瘾。他们所有的朋友都吸食海洛因，所以他们终究会重拾旧习。

因为持香港身份证，他们可以每月领取香港政府大约 4,000 港币或以上的津贴，用来买毒品和酒水。一天下午在重庆大厦背面，我透过一个人的硬纸板住所，居然看到他在阅读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我当年将此书列为人类系研究生理论课的阅读书目。

重庆大厦的商人经常对这些瘾君子多有抱怨，特别因为其中有些人在大厦中小偷小摸。人们忍受他们的行径，部分原因在于重庆大厦附近的小巷是公众财产，与重庆大厦本身不同。我在第一章提到，尼泊尔人曾在 1997 年被大厦保安从重庆大厦顶楼赶下来，小巷与屋顶不一样，不属于重庆大厦。除此之外，人们保持着应该让人继续生活的态度，所以容忍这些瘾君子，而大部分的瘾君子一般在其他地方进行偷窃，并无大害。

对于某些住在重庆大厦的人来说，海洛因是一个令人无法抗拒的诱惑。我认识一个香港华人正在戒毒，并皈依了伊斯兰教。他告诉我，重庆大厦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在于让他接

触到能提升自我信仰的伊斯兰教，而缺点是上瘾君子和引诱他回归吸毒之路的力量。最终，毒品还是赢了。

以下是这些男人中的一个名叫 Ocean Chen 的自述，由我的研究助理记录下来。

我出生在香港，父亲是一个廓尔喀。我曾经从香港回到尼泊尔上学，并开始吸食类似海洛因的毒品——那是一个值得炫耀的行为，让我能看起来有气魄、有钱，而且很酷。我在尼泊尔和香港因为贩毒而数次入狱，我比较喜欢尼泊尔的监狱，而且有时甚至会想念当时的生活——我那时有好朋友，也能吃到好吃的，甚至每天都能吸食毒品。但是你要知道，我付出了许多，包括我的爱人、家庭，甚至我整个人生。

我结过两次婚，第一任妻子是尼泊尔人，当时是包办婚姻。我们结婚的时候举办了盛大的喜筵，然后我们回到我家居住，在尼泊尔算是很好的生活了。但是婚姻并不幸福，我觉得很闷，又重新开始吸毒，而且还被判入狱23个月。我的妻子提出离婚，让我全家丢尽颜面。父母将我送去戒毒中心，我戒毒后找了一份导游工作，因为我英文不错。

当时我能成功戒毒，因为我与一位小我十二岁的漂亮姑娘堕入爱河。我们结婚后，父母决定把我们送到香港开始新生活。我有香港身份证，但我最终发现妻子嫁给我只是为了逃离尼泊尔。我在香港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园艺工作，一切都很顺利，开始新的人生，但是妻子向我提出离婚。她遇见了一个英国男人，并决定要跟着他去英国。我以前天真地以为会有女孩爱上

我这样一个曾经吸毒的人。哎，那种感觉痛苦万分，于是我又开始跟朋友一起吸毒。也许我仍然爱着她，不过也许只是一个借口，但毒品确实让我忘掉了忧伤……父母让我回尼泊尔重新开始，但是我大部分朋友都在香港，在小巷里的人都是尼泊尔人。在这里生活很艰苦，特别是下雨的时候，雨水不停滴进来，但是至少我能免费在此生活。

我又开始吸毒了，我越来越虚弱，丢掉了工作。后来我找了一份在夜总会当保安的工作，但是我需要更多的钱，于是开始偷建筑工地的电子设备——你看，我腿上有一个被狗咬留下的疤痕。我也开始向欧洲及非洲客人贩卖大麻和可卡因。我曾经两度被送往戒毒中心，但只要一出来，就回到重庆大厦。我已经别无选择，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而且我吸了这么多年毒，已经无法工作了。

我在重庆大厦的时候很开心，能有免费的住宿和免费食物（从一家基督教非政府组织领取），而且我能跟别人说母语，让我有家的感觉。我告诫年轻人要戒毒，因为他们还有机会从头做人，而我却不行。你要知道，我挺满意现在的生活。我有一次去教堂，因为给我们提供免费食物的传教士一直要我们去。牧师开始谈论生活品质：要简单生活，也必须爱上帝。

我喜欢重庆大厦的另一个原因在于，能够跟不同国家的人做朋友。你知道，我们一起吸大麻的时候不分国籍。我几天前还刚刚认识了一个欧洲朋友，一位来自荷兰的游客，他在自己的国家可以合法吸大麻，我把他带到附近的公园玩，一起吸大麻，感觉真好。

游 客

重庆大厦有如此多样的人群，商人们四处奔波寻求买卖，托儿大声招揽客人，性工作者诱惑着潜在顾客，还有毒贩小声叫卖他们的大麻，另外还有一个人群就是游客，是重庆大厦最大的群体。他们来重庆大厦的主要原因是这里便宜，重庆大厦仍然是背包客天堂，尽管没有三十年前的盛极一时，但是与隔壁的假日酒店相比，它的房间价格不过是假日酒店的十分之一甚至二十分之一。还有些旅客想来这个地方探险，特别是日本人和欧洲人，他们也许从之前的背包旅游经验或《孤独星球》之类的英文旅游书了解到重庆大厦，类似的日文旅游书包括《走遍全球》。

如今，网络让许多游客找到重庆大厦（也许介绍重庆大厦的最大的网站用日文，向日本游客提供了很多好的旅游建议，不过最近越来越少有日本游客在重庆大厦留宿）。^①游客人群既包括寻求香港最廉价住宿的人，也包括那些寻求某种特定冒险的人（一个三十多岁的英国人告诉我：“所有网站都警告我千万不要住在重庆大厦，然后我就明白了我一定要来这里。”）从另一个角度看，住在中国和其他地方的南亚人会来重庆大厦体验家的感觉——电视节目、餐厅、录像带和杂志摊都让他们想起了

^① <http://www.chungking-mansions.com/index.html>。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家乡，这在其他东亚地区都无法体验到。

相比起刚才讨论的几个人群，游客在重庆大厦中没那么显眼，主要因为他们不像职员和商人那样长期留在大厦中，他们早上离开，晚上才回来。然而，他们在某些晚上占满大部分旅店客房，特别是在一些中国内地公众假期里，包括劳动节及国庆节。游客人数在过去几年逐渐攀升，归功于越来越多游客开始在网上预定客房。我曾经向阿根廷人提供去哪里找香港姑娘的建议，与美国人一起叹息乔治·布什做过的种种蠢事，跟埃及游客一起谈论伊斯兰的本质，与不丹人谈他们国家的“国家幸福指数”，同日本人一起考虑他们是否应该离开日本去其他国家生活，与英国人探讨他们国家橄榄球队的成败，还与马尔代夫群岛来的游客分享全球升温会让他们国家淹没的担忧。我在重庆大厦的各种旅店找到了来自 129 个不同国家的人，他们大部分是游客，从世界各个角落来到这里。

在网上预订旅店的一些游客往往备受惊吓，一个中国内地游客用粤语告诉我：“我从来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非洲人，太吓人了！”她在网络上找到旅店，被其便宜的价格所吸引，不过网页并没有提及其所在的具体大厦，这里有超乎她想象的种族多样性以及奇异之处。另一位中国内地游客向我抱怨：“我想吃中国菜，但是这里根本没有中国餐馆。^①为什么一间都没有呢？香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吗？”我给他的回答是，香港确实是中国的一部分，但重庆大厦不算是香港的一部分，它更像是香港心脏

^① 其实重庆大厦一楼有一间中国餐馆。

部位的一块发展中国家的岛屿，要不然为什么这里的价格如此便宜？他看起来很困惑，问我重庆大厦附近有没有可以去的迪斯科酒吧。

不仅仅中国内地人体验到这种困惑。曾经有一位年轻的哥伦比亚女人住在我留宿的旅店，她显得有点害怕，不敢出去，所以跑到我面前问：“这个地方总是这样吗？”我告诉她是的，但是人们可以安全地到处走动，她还是不能全信。如此恐惧一部分与性别有关：年轻女性或许被大厦中的多数男性以令人不安的目光注视。一位非洲女人愤怒地告诉我：“我一辈子都没这样被人盯着看！”当然，尽管被男人直接注视，年轻女性一般不会受到男性动物的“捕食”。我与几个马来西亚的男游客聊天，他们停留香港不过几天而已，他们本来只是觉得会住在廉价旅店，结果却被眼前的景观吓到。我问他们中的一个，回到马来西亚后会对重庆大厦有怎样的描述，他说：“还行，但是我永远不会带女朋友来这里……这里对穆斯林女性来说真是可怕！”

在我遇见的精神受创的旅客中，中国内地人和美国人居多。但近来，有更多经验丰富的中国内地游客，如同欧美和日本游客一样寻找冒险。我见过一对来自上海的夫妇，他们说没有见到旅游书描写的“老鼠从天花板上掉下来”的景象，感到失望。我解释说自己也从来没在重庆大厦中看到过老鼠（但是在大厦外的巷子里见过一只），除非有很好的运气，他们应该也不会见到老鼠。

再说说几位令我印象深刻的游客。曾经有个日本男人沉迷于重庆大厦的“种族混乱”景象，他在东京的一间著名经纪公司

司工作，来香港既是度假也做投资。一个人如果在日本投资对冲基金，就要交 20% 的税给政府，但他说在香港就不必，这种投资不需要缴任何税款。他在星期五下午来到香港，然后去一家大型香港银行投资，然后用接下来的两天时间沉浸在重庆大厦的世界中。他说：“我来回东京和香港的机票大约 6 万日元，所以如果我要投资 100 万日元，就很值。而且周末我还能留在这个精彩万分的地方。”

正如上文提到的更大经济背景下的印度临时工人，这个日本人是香港政府自由经济政策的受益者，他不是我遇到的唯一一个商人旅客。我认识一些印度尼西亚人来香港旅游，但会在回程的路上携带中国制造的伊斯兰披肩，以补贴他们的旅程花费。我也见过印度和拉丁美洲的旅客用同样的方法运回电子产品，比如手机。他们偷偷地在行李中塞二十个中国制造的手机回国，然后卖给朋友及熟人，让香港之旅有不小收获。

大厦中还有一些进行心灵旅游的旅客。我遇见过几个欧洲人，他们刚刚在香港北部乡下地区完成了十天的佛教内观禅修，其间必须一直保持沉默。禅修课程最后一天要求他们探寻印度精神，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当然也有囊中羞涩的缘故），他们来到了重庆大厦。有一个欧洲人在我们交谈完毕后，双手合十念道 namaste，一句在重庆大厦伊斯兰教气氛下不合时宜的南亚佛教语。另一位欧洲人说，静默提升了他的精神境界，但当他面对重庆大厦的景象时，却由衷地笑了——似乎在这么多天静默沉思后，他对眼前人们的劳碌奔波感到惊奇。

大厦中还有一些梦想家，他们来到重庆大厦，因为这里是

发达地区中住宿最便宜的地方，而且他们相信成功就在未来等着自己。一位年长的阿尔及利亚-加拿大作家喜欢写间谍小说，给我看他那些让人无法阅读的章节，希望我能提一些英文语法上的建议，但是我完全不知道如何回应。他还不时向我借几百港币，有的时候会还钱。他梦想能靠间谍小说赚到百万钱财，但是我只能告诉他，我并不爱读间谍小说，所以我也无法预料他的未来。由于他持加拿大护照，能很容易地每隔九十天更新香港逗留签证，所以他能把香港当作自己的家。

有一个显然超过六十岁的新西兰人告诉我，他已经在香港住了一个月，还会再留几个星期。他声称有一位好朋友是驻中国的菲律宾大使，几天后会有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人来找他谈话，谈谈如何集齐资金——他说自己是金融家，为了找乐子才住在重庆大厦。他似乎羞于揭示他人生的真实部分，因为显然他在吹牛。

一位土耳其的中年男人看起来仿佛是来自西方六十年代的嬉皮士，他向我描述了他穿越亚洲的旅程，以及他要写一本关于伊斯兰的书的计划，结果我们所在的小食摊的职员用乌尔都语嘲笑道：“为什么教授要跟一个傻瓜讲话？”他不是傻瓜，而是一位梦想家，正如重庆大厦中的许多其他人一样。重庆大厦川流不息的年轻商人、持旅游签证的工人、避难者，只是这些人的梦想更合乎逻辑而已。如今谁的生活不依靠梦想呢？重庆大厦的人们更加如此，由于它如此廉价，所以成为许多国际梦想家的最后住所。他们在此逗留，正是因为口袋里的钱不多，他们的道路能在这里走得更久远。

梦想家和孤注一掷的人并不只限于旅客。我曾经和一位坦桑尼亚人在重庆大厦后巷喝威士忌，他告诉我他在达累斯萨拉姆因为醉酒问题而屡次被开除，但他还是有酒瘾，为了最后拯救他一次，富裕的家人把他送到香港，看他是否能在贸易上做出一番成就。我还遇见过一位新加坡来的印度裔餐馆老板，因为觉得自己在一争吵中害死了另一名印度人，于是拿着大笔钞票逃到香港，因为自己头顶悬着一项杀人罪名，所以梦想以后能去加拿大避风头。我只见过这两个人一面，但他们与其他类似的人一样，都是重庆大厦的一部分。

不同人群如何互动

我们已经了解了重庆大厦中的所有人群，另一个关键是理解这些不同种族和不同追求的人群如何进行互动。

人们职业活动中的互动与他们的角色紧密相关。餐馆的托儿四处派发菜单，不停找机会招揽顾客；手机铺的销售商毫不厌倦地阐述不同手机的功能特点；旅店老板给客人展示房间，并与他们讨价还价；正如我们所见，大部分来重庆大厦的生意人是非洲人，大部分游客是中国内地人和欧洲人，也包括日本人、澳大利亚人和世界各地的游客；除了少数例子以外，店铺老板、旅店和餐厅的经理是南亚人或华人，只有一小部分是菲律宾人。因此，这些在重庆大厦出现的不同人群间的交流必定有种族间的互动。

一个群体的人不可能只与有相同种族、语言、国籍的人进行交流。只有少数华裔店主留在自己与世隔绝的店铺里，只与华人顾客打交道，也只有很少部分的非洲商人只做其他非洲同胞的生意，少数南亚临时工每天负责洗碗盘、打包手机或清扫客房，不与其他种族的人有来往。许多顾客只在旅店登记入住的时候，与店员说过几句话，然后也许就与重庆大厦的种族景象没有任何瓜葛了。除旅客之外，不同职业和种族背景的人之间一般都会进行交流。

种族之间的交流全都十分实际，比如非洲人在底座的南亚

小食摊尝试找到合胃口的菜肴。如第一章所提，重庆大厦中只有很少非洲餐馆，所以许多非洲人只好吃南亚菜，但南亚菜不完全对胃口，所以他们必须向店主说清楚自己的食物里不能有辣味。我常常见到非洲人问店主的第一句就是，那些南亚食物是不是牌子上说的清真食品，然后再问他们能吃的是哪几种菜式。重庆大厦底座或一楼的小食摊，大概有九张椅子和四张桌子，也许同时会有五个不同国籍的人坐在一起，他们不一定认识彼此，坐在一起主要是因为没位置了，而各自都需要吃饭。有时候他们开始交谈，然后就会变成友人，也可能开始产生争执。

此外还有南亚、华裔店主及非洲批发客户的交涉。我将在第三章详细描述这种复杂的交涉，单单靠这些交涉就能赚取或损失巨大财富。如果一个非洲人看起来不太懂关于手机的资料信息，有时就会被骗。曾经有一个巴基斯坦店主咯咯地笑道：“那个人真笨！我把十四天手机^①当作新手机卖给他，立刻就多赚了4,000港币！”而非洲手机商小心翼翼地计划如何表现得知识渊博，看起来对手机的了解远超过巴基斯坦、印度或华人手机卖主，才能拿到最低买入价，于是他们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甜言蜜语，什么时候应该开玩笑或表示愤怒，什么时候要妥协，或者什么时候要坚持说：“最低价！最低价！”——直到他们拿到卖家能够给的最低售价为止。精明的非洲商人知道如何在外

①“十四天手机是被买家退货库存的欧洲手机，一般售价为新手机价格的50%至60%。”

国手机商面前自我表现——他如果要避免损失钱财，就必须知道这些规则。^①

这些交流一般以英文进行，英文就是重庆大厦的通用语。重庆大厦反映出令人着迷的语言用法，不同的人使用他们最熟悉的语言进行交流。我见过讲非洲语言的人，他们见到同胞十分欣喜，比如豪萨人或卢奥人，而有些其他非洲国家人听不懂他们说的语言，就像旁遮比人可以跟孟加拉人交流，却忽略了其他的南亚同胞一样。一般情况下，讲印地乌尔都语的人可以跟大部分南亚半岛的人交流，而会讲斯瓦希里语或法语的人也能与许多东非和西非的人沟通。在更高的一个层面，他们都会英语。不会说英语的非洲人一般不会集中在重庆大厦，而是去广州的天秀大厦或其他地区，在那里法语和普通话一样流行。

偶尔有一些其它语言出现在重庆大厦。一天晚上，我在一个小食摊吃晚餐，结果跟一个孟加拉人和一个喀麦隆人说起了日语。那个孟加拉人住在日本，正在那边上大学，而坐在我们附近的喀麦隆人曾经在日本生活数年，于是加入了我们的谈话。我们的谈话引来完全不同背景的人，孟加拉人、喀麦隆人和美国人用我们看起来不像会说的语言聊天。我曾经跟索马里和伊拉克的商人聊天，结果他们俩发现彼此在过去十年都曾住在瑞典，于是开始用瑞典语聊天，把我撂在一边。

我也曾见过日本游客在纸上写汉字，以便能与中国商人

^① 关于互动中自我展示的复杂性，见 Goffman (1959, 1967)。Goffman 的分析可以很好应用于分析重庆大厦的微观互动方面 (Mathews 2007)。

和旅店经理进行沟通。还有许多店铺经理会多国语言，比如之前提到的纪念品店店主。对于一些华裔和巴基斯坦店主，法语尤其有用，因为他们能和西非及中非的客人交涉。然而，尽管这些其他语言不时起到一定用处，英语仍然是重庆大厦的通用语——伴随着人们用计算器讲价的常用手法。

过去几年，我在重庆大厦见到或者听说了一些令人叹为观止的种族间互动。一位西非手机商遇到另一个巴基斯坦手机商，对方介绍自己是“侯赛因”，西非人瞪大了双眼，马上跑走了，显然他误以为那个生意人是前伊拉克独裁者或其鬼魂。一个穆斯林手机店经理告诉一个信基督教的非洲顾客：“朋友，你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你却给我带来这么多麻烦，我必须重写收据。我们同样信神，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那个基督徒沉默不语，但之后他告诉我：“他的神不是我的神。”

我见过十几个来自不同非洲国家的人，一起目不转睛地观看电视机里的曼联队赛事，一个非洲球员踢进一球后，大家立刻陷入狂喜状态，而旁边的印度店主则强忍着不露声色。我还曾见过一个香港华裔手机商，不断被尼泊尔瘾君子欺负，被迫交出“啤酒费”，尼泊尔人脸上挂满了笑容和威胁，不管是酒精作用还是装腔作势，他们知道从这个华人身上很容易捞钱。这个华人也是个酒徒，而且在那天晚上喝得酩酊大醉，但也没有醉到不知道维护自己的形象，于是给了那些人每人10港币，然后告诉我：“他们是我的朋友，所以我当然会给钱。”

种族间的关系活灵活现地体现在雇佣模式中。经理们常常优先聘请他们自己种族或国籍背景的人。我认识一位尼泊尔旅

店老板，他只聘请尼泊尔人。他的一个下属告诉我：“老板以前聘请过印度人，但是印度人骗了他。”我问他：“难道尼泊尔人从来不会骗你的老板吗？”他面露恐惧地解释道：“噢不，我们绝对不做那些事！”

有的经理也会雇佣不同国籍的人，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经常互相聘用，主要因为印地语和乌尔都语几乎是同一种口语，尽管这两个地区的人往往憎恨彼此。还有一些经理以宗教背景为主要考虑因素。我知道有一个非洲餐馆的老板表明一定要聘请印度穆斯林，因为他们有同样的伊斯兰信仰，他认为这是最重要的相同之处。雇佣关系往往更侧重于现实情况，而非种族背景。正如之前所说，大厦底座和一楼有几个南亚避难者被聘为店员，因为他们不太会被警察询查和被要求出示身份证。另一方面，华人旅店也许会以低薪聘请非洲避难者，主要因为警察不太容易逮捕这些人，因为旅店中有很多客人是非洲人。这一切与种族怜悯无关，只是经商的实际考虑罢了。

长期的种族间交流常常发生于商人与顾客之间，或商人与附近的店铺经理之间。例如，许多巴基斯坦手机商有几十个固定的非洲顾客，他们也许一年内见面不止六次，每次都买数百个手机。这些顾客和商人除了做生意以外并不太了解彼此，但是他们互相建立起信任关系，为生意打下重要的基础——尽管我们通过 Fahad Ali 的口述，知道这并不能排除潜在的欺诈行为。

而对于一些附近的店铺来说，一个华裔店主经营电子产品的店铺旁边，比如有一个印度杂货铺或巴基斯坦手机店，他们之间的交流就不可避免了。如果这些店铺有直接的竞争关系，

那么它们之间就产生一种紧张关系，或者伙伴关系。我认识一个南亚服装批发商，每天去附近的九龙清真寺做五次礼拜——每次他要走的时候，并不关店门，而是请走廊对面的华裔服装批发商帮忙看店，而那个女人也感到有义务帮忙。当她需要离开自己的店铺，也同样请他帮忙。还有一个例子是，一个印度锡克教手机商与一个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对家相互暗中较劲，他们的店铺只相距两三米，这种仇视也许主要来自商业竞争，而非种族问题，虽然他们也会用种族主义意味的言论表达出来：“你居然崇拜有八个手臂的神！”听说那个穆斯林（不合时宜地）冷笑了一声。

有时，种族间的交流变成恋爱关系。有一个西非避难者娶了香港华人作妻子，我问他是怎么遇到她的，他说自己在非洲就已经成为日本创价学会的信徒，有一次去了香港的创价学会的庙宇，结果邂逅了另一位信徒并娶了她——一个被许多日本人鄙视的日本宗教，居然让一个西非人拿到了避难者渴望的“仙丹”，即娶到香港本地人，我听说过许多类似的故事。在重庆大厦一间狭小旅馆的过道里，我认识了一位年轻的日本女性以及她的肯尼亚未婚夫，她的家人在昂贵的半岛酒店准备会见他（因为他无法申请到日本签证），这对年轻的恋人在见家长前紧张地来回踱步。家人同意了，他们才能结婚。后来家长确实同意了，于是二人结婚；一年后，她离开了他，独自返回日本。

种族关系跨越了许多人的生命历程。我的研究助理 Maggie Lin 见到一位非洲妇女走进服装店，怀里抱着只有七个月大的女儿，她把女儿交给华裔店主照顾几分钟，许多附近的店主走

过来跟这个小孩玩，抱着哄小孩，他们都能叫出小女孩的名字。那个华裔店主知道女孩的妈妈把所有的钱都花在运货回非洲，而眼见天气逐渐变冷，便送给女孩一袋衣服作礼物。另一个研究助理 Rose Rojas 看到两个南亚小孩在重庆大厦的后巷里玩耍，一个骑着摩托车，一个骑自行车，有一个非洲人在附近的威士忌酒吧喝酒，看到那辆摩托车被放在一边，就开玩笑地把它藏了起来，小男孩感到十分疑惑，非洲人从背后把他抱了起来，带他去摩托车那里。他们以前从未认识过彼此，也没有说一句话，各自捧腹大笑，然后小孩又继续回去玩耍了。

也有一些让人伤心的故事，我曾与一些加纳朋友到医院探望得了重病的印度尼西亚家庭佣工，她只有二十多岁，身体一侧已经瘫痪，眼睛也盲了。由于她在重庆大厦的加纳男朋友死于艾滋病，尽管那个香港华裔医生在我的询问下不愿透露病情，她的诊断似乎显而易见。加纳朋友们每天探望她，直到数周后她病情稳定，被送回印度尼西亚等待死亡。这些加纳人探访的一个原因是他们视她为老朋友（“她曾经多么迷人啊！”），另一个原因是内疚，因为她的艾滋病来自一个加纳人，他们不可避免地意识到这个问题。

以上例子让我们感觉到人类之间超越种族界线的温暖。不过，更多的种族间交流也许会导致仇恨。我们已经在 Johnny Singh 和 Fahad Ali 的话里看出，他们抱怨不时遭遇香港华人的种族歧视。确实，我认识重庆大厦中的几个香港华裔店主，他们的种族偏见经常让我退缩。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重庆大厦的大部分人多少对其他种族抱有成见。南亚人告诉我，他们认为非洲人

“智商低”及“天真”；而非洲人说南亚人“只会计划和思考怎么做生意”；印度人认为巴基斯坦人“总是喜欢打架”；东非人则说尼日利亚人不可信：“如果你发现有尼日利亚人住在你隔壁房间，赶快换房，不然尼日利亚人会施法害你。”

生意往来产生的成见也许较为准确。一个巴基斯坦手机商说：“马里人特别容易受骗。而尼日利亚人就太精明了，你说不定还要倒贴钱给他们。”一个店主的妻子说：“美国人、加拿大人、欧洲人都很有礼貌，但是印度人和非洲人就不是！”一个香港店主告诉我：“我不喜欢跟美国人打交道，因为他们气势凌人而且要求多多，尽管也有一些很开朗大方的。我不喜欢印度人，因为他们总是压价。我喜欢欧洲人和日本人，他们会付我要的价格。”一个长期在重庆大厦经商的西非人说：“香港人讨厌非洲人，我不知道他们脑子里在想什么，也许只有钱。非洲人互相帮助，但是我们不太跟印度人讲话，他们也只想着生意，而且印度人很害怕黑人……我是一名基督徒，我们害怕喜欢打架的穆斯林，他们的想法很固执。”

有时候，成见也会被突然打破。一个非洲穆斯林避难者告诉我，他曾经在清真寺被一个巴基斯坦穆斯林骂得狗血淋头：“你根本不知道伊斯兰是什么！你来清真寺完全是为了吃免费的食物！”^①那个非洲穆斯林立刻背诵起可兰经的经文，他显然比那巴基斯坦人更了解伊斯兰，巴基斯坦人惊愕不已。我曾经与

^① 在斋戒月，九龙清真寺与其他的清真寺会在日落后提供免费食物，给予那些做了一天斋戒的人们。

四个非洲人在重庆大厦高座的印度餐馆吃饭，当店主派发餐厅名片的时候，只递给了我，没有给非洲人，他们立刻大声抱怨起来，直到他们也拿到了卡片——店主以后应该再不敢犯类似的错误了。

一个经营旅店的中国内地人发表了一番言论，让我，甚至让她自己都感到惊讶：“我最喜欢的顾客是西非穆斯林，因为他们很老实，从来不会骗你，真好！日本人也很好。我特别不喜欢一些内地人，他们咄咄逼人！”另一个中国内地旅店店主也提起，非洲商人一般能把客房保持得干净整洁，而携带小孩的内地人简直是恶梦，因为他们宠坏了孩子，小孩干什么都可以。因此尽管成见到处都有，但它确实在某些情况下提供了事情发生前的预警。

重庆大厦中的人际关系就算不是特别友善融洽，也可谓十分和气。重庆大厦里有一些群体来自互相发动战争的社会（特别是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或者来自信仰冲突的背景（重庆大厦里有许多穆斯林和基督徒，另外还有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然而，这些人并没有像家乡的人那样相互打架——他们也许有时拌嘴，但争吵很快就结束了，因为重庆大厦的主基调就是赚钱。有一个巴基斯坦人当着印度人的面跟我说：“我不喜欢他们，他们也不是我的朋友。但是我在这里为了赚钱，他们也一样，我们可没精力打架。”

不过重庆大厦并不是一个乌托邦，有时也会有人突然打起架来——锡克人与穆斯林，穆斯林与基督徒，巴基斯坦人与非洲人，巴基斯坦人与印度人，尼日利亚人与东非人，还有其他

的群体——不过这些争执并不常见。总而言之，相比较这些商人和工人来自的社会，重庆大厦有一种令人赞叹的祥和气氛。正如刚才巴基斯坦人所讲，重庆大厦的一般态度是，在追求利益的大背景之下，种族及宗教的矛盾只不过是令人分心的闹情绪而已。^①我有次在重庆大厦听到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印度人和一个非洲人乘电梯上行时打起架，电梯下行时他们已经手挽手变成了好朋友。这也许是真也许是假，不过至少听起来像那么回事。

正如种族冲突在重庆大厦被调和了，贫富差距的阶级冲突也是如此。重庆大厦中穷人和富人之间有巨大的鸿沟，比如店主和临时工之间，以及大商人和小贩之间，但是大多数人将这种差距看作是真实的人生，而非社会不公的体现。有一个年轻的非法劳工向我吐苦水，抱怨其餐馆老板：“他能赚上万元（事实上，大概每个月4万港币），却只在想来餐馆的时候才来。”不过他告诉我，他梦想能做生意赚钱，然后像老板这样开餐馆，剥削像他自己这样的年轻人。

我认识一位避难者，在亲戚经营的手机店里非法打工，每个月拿2,300港币的薪水，而那家店铺每月赚10万港币，几乎全部利润都落入他亲戚的腰包。这位避难者的梦想就是能离开亲戚，自己做生意，成为富豪，他说：“我认识另一个避难者，上个月他卖手机赚了10万港币，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

^① 这与 Stoller (2002) 关于纽约非洲街头小贩的描述一致，即他们都将注意力放在希望赚钱养活家人，而不是关注政治、族裔和宗教上的差异。

尽管社会系统存在各种不公现象，但是大家都不去质疑这个系统，只看到系统中自己相对于其他人的具体处境，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原因是，来到重庆大厦的人就算是受到迫害成为避难者，他们至少还是有足够钱飞来香港，这是他们许多同胞所不能企求的，彰显了这些人在祖国的精英地位。重庆大厦可谓是“第三世界国家成功人士的俱乐部”，包括那些大厦中最落魄的人群，不管他们在香港曾受到何等蹂躏。

重庆大厦中的穷人几乎不可能变成富人，非法劳工可能永远也拿不到香港居留权，或者攒足钱变成商人，避难者也很有可能申请失败，正如香港其他 90% 的避难者一样。但同时，穷人和富人一起支撑着重庆大厦的资本主义。在这一层意义上，重庆大厦与香港其他地方、中国内地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地区并无两样，它也表现出巨大的贫富差距。不过重庆大厦有一些可见的不同之处：它不同于不露声色的企业剥削，重庆大厦中剥削者与被剥削者认得彼此的面孔，被剥削者不寻求反抗，而是向剥削者看齐。

这正是重庆大厦中人群相互联系景象，我在本书前两章描述了重庆大厦的地点及其中的不同人群，接下来两章将探讨途经重庆大厦的商品，以及约束其流通的法律，最后一章将讨论大厦及其中人物的意义。

商品

commodity

重庆大厦中的商品流通

假如重庆大厦的走廊里没有搬来运去的货品，重庆大厦不可能成为低端全球化中心，事实上，它能将中国内地产品转移卖到非洲和南亚等发展中地区。这些商品如何流通？有哪些人买卖这些商品，他们又如何做生意呢？

正如第一章所提，重庆大厦的商人体现了低端全球化这一现象，这种全球化不是通过大型跨国企业进行，而是通过个体商人进行，商人之间以信任作为经商基础，他们需要承担高风险，自己携带货物游遍世界。这种商业移民并不是前所未有的新现象——海地和加勒比海地区就有许多“非正式贸易进口商”，巴拉圭的埃斯特城有很多街头小贩，巴黎有刚果商人，纽约街头也有非洲摊贩。^①不过，在如此密集的地方进行着大量商业活动，也确实比较独特。

人们很难摸清重庆大厦的具体贸易额。我根据2007及2008年的贸易活动粗略估计，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有20%的手机销自重庆大厦。据我所知，手机店铺平均每月销售15,000至20,000个手机，这个数据是一年里每家店铺各异的销量平均后的数字，较有规模的手机店也许一个月可以卖30,000个手

^① Ulysse 2007 ; Browne 2004, 56 ; Ribeiro 2006 ; MacGaffey and Bazenguissa-Ganga 2000 ; Stoller 2002.

机，小店则可能每月只售出 5,000 到 10,000 个手机而已。由于重庆大厦中的商业竞争十分激烈，所以一切信息都很敏感，店铺职员只能将这些数据偷偷告诉我，数据也合理可信。在 2007 及 2008 年期间，重庆大厦大约一共有九十家手机店。我们假设每家店铺的平均月销售量为 18,000 个手机，大厦每个月就售出 1,620,000 个手机，即每年销售 19,400,000 个手机，而 2007 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已注册的手机一共有 126,000,000 个，其中包括有的人多次注册号码。^① 因此，可以推断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有 20% 的手机销自重庆大厦。

有手机商告诉我，这个百分比太低了，因为还有大批中国南部生产的手机通过重庆大厦转运到非洲及其他地区，它们储藏在重庆大厦及周边的仓库，然后商人将其安排运往其它地方。如果我们把这些手机计算在内，那么重庆大厦运往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手机数量一定更多。总而言之，途经重庆大厦的手机贸易在全球发展中国家手机贸易中有举足轻重的角色。^②

至于其他类似服装和手表的商品，其货物途经重庆大厦的百分比一定小得多，但数量也不可小觑。服装、手表及电子产品的信息比手机更加难获得。由于这些商品产地来源的多样性，

① Richard Ling，私人对话。

② 由于大部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设有很好的陆上通信线路，用手机比用固定电话好很多。虽然许多非洲人仍然需要使用附近的电话亭打电话，但长期来拥有一部手机较为经济实用，因此手机市场在非洲蓬勃发展。在 2009 年经济危机之后，我所知的重庆大厦中的手机成交量骤然下跌，我听说在 2009 年末，手机店平均销量少于每月一万个。

几乎没有拿到此类信息的方式。重庆大厦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中是一个重要枢纽，但其枢纽数据则只能任君猜想。

在全球各地，商品流通过程能超越政府掌控，到达令人讶异的地方，经过世界各地码头的商品只有5%受到检查。^① 在发展中地区，这种政府控制的缺失在于某些政府无法调控经济，这些政府想要控制但却无法做到，因为它们的公民轻而易举地就可以逃避开去。而在香港，这种情况的发生不是因为政府没有能力控制，而是因为政府不愿意管。

香港一直以来被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时报》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系，其经济发展最不受政府官僚掌控。^② 不过香港自由经济之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神话：事实上地产商和其他商业巨头极大地影响了政府的决策。^③ 然而，自由经济确实一直是香港的主流价值观。^④ 虽然政府在许多领域上调控经济——例如它对街头小贩的规管^⑤ 和对大规模制造伪劣产品的禁止——不过香港总体来说是自由放任经济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化身，这种经济下的政府不做主导作用，而是让经济如野马一

① Nordstrom 2007, 117-22。

② InvestHK, The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http://www.investhk.gov.hk/pages/1/163.html> (2009年11月16日查阅，网站现已关闭)。也可参考 the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http://www.heritage.org/index/> (2010年7月16日查阅)。

③ Philip Bowring, "Economic Freedom? It Depends Where You Stand"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2006年1月9日。

④ Mathews, Ma, Lui 2008, 15-17。

⑤ Smart 1988。

样地自由运作。

按照以前的说法，香港是一个夹在两个第三世界经济地区中间的第一世界岛屿：一边是快速发展的内地，但它仍然缺乏完善的经济制度，另一边则是非洲国家。重庆大厦本身也就成为了第三世界经济的化身，由于其独特的位置，它的存在得益于所处的第一世界地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

贩卖商品

在第一章中，我描述了重庆大厦中诸如旅店及餐馆等生意如何运行，接下来这一小节将特别讨论贩卖商品的生意。重庆大厦的商店贩卖各色各样的产品，每一种产品都有其独特的销售方式。底层的纪念品店必须在每个小时或每十几分钟里售出产品，电子产品零售店与行李箱店也一样——他们都依赖源源不断的客源。另一方面，手机和服装批发店不用依赖那么多的顾客——每个星期大概有十几个客人，每个客人购买几百件西服或手机，就足够支付租金并盈利——不过如果那些顾客几个星期都不出现一次的话，店铺生意就砸了。一个手机批发店的店主告诉我：“我每天大概有 25 到 30 个客人问我手机的价格和型号，我只要在一天里做成一笔交易，生意就算不错了。”我在此主要描述商品的批发销售情况，因为正是它令重庆大厦成为发展中国家贸易枢纽。

为什么这些店主要在重庆大厦开店？正如第二章所提，特别对南亚人来说，重庆大厦也许是香港少数几个能让他们自在生活工作的地方之一。一个拥有香港居留权的巴基斯坦人可以在重庆大厦一楼开一家手机店，与周围的巴基斯坦同胞一起像在家乡一样生活，不论他们是竞争对手、朋友还是陌路，因为他在香港其他商业环境没有家的感觉。出于这个原因，巴基斯坦人占据了重庆大厦绝大部分的手机贸易，他们在 2008 年经营

着重庆大厦 80% 的手机店——这个比例在之后几年内由于中国内地人的到来有所下滑。

还有一些人来重庆大厦开店，因为这里跟他们的贸易对口。一些中国内地服装店店主在中国有自己的生产工厂，其他有的人则与经营工厂的亲戚有联系，于是可以制造非洲买家钟爱的廉价服装，那些廉价产品在其他欧美市场并不流行。这些商人在重庆大厦开店，因为买家更加信任香港的商店，而且重庆大厦有川流不息的发展中国家顾客，这在香港其他地方很罕见。

另外也有人奔着廉价租金来到重庆大厦，没有落户香港其他地方。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生意与重庆大厦的主流经济活动毫无关联。我曾经访问过一位贩卖蛋白石的商人，他在重庆大厦高层有一间办公室。他从澳大利亚进口蛋白石，然后运到中国深圳制作成各种成品，再送到他在香港的办公室，最后运回澳大利亚卖给游客，这些游客一般是中国内地人，他们想在澳大利亚买到那里特产的蛋白石，但是由于澳大利亚的人力成本比中国高很多，所以这些游客很讽刺地在澳大利亚买到了中国加工的蛋白石，而这些正是拜这名男士所赐（重庆大厦中还有许多生意跟他的一模一样）。他在重庆大厦已有二十四年，办公室可以开在香港其他地方，不过出于租金考虑，一直留在重庆大厦。他在澳大利亚的批发买家，或许根本不知道重庆大厦代表着什么，所以他就派职员到附近的豪华酒店，亲自接买家来重庆大厦的办公室。

贩卖不同批发产品的商店有不同的经商模式。有十五家手表店贩卖特别廉价的手表，经常批量销售以一美元一只手表的

价格成交。重庆大厦门外有许多手表贩子不停地小声嘟囔：“要假表吗？”特别是白人，他们被看作是最可能成为顾客的人群——比如买一只劳力士假表，买家只需要付原价的一小部分价格，400至800港币而已。不过这些贩子与重庆大厦无关，他们的商店隐蔽在附近大厦中。重庆大厦的手表生意主要是廉价表批发，以成百上千的数量销售出去。

另外还有大约三十家服装店，正如刚才所讲，这些许多店铺与中国内地的工厂相连，尽管手表和手机制造也有类似情况，但服装尤为如此。做高级品牌服装贸易的商人一般买卖处理品，比如缝纫出错或有瑕疵的衣服，或过季服装和样品，甚至是无法通过某些国家海关规定的衣服。这些货品途经的路线有时能让人啧啧称奇。比如，一件衣服一开始也许被大型英美百货公司订下，其布料和其他制材也许来自孟加拉等国家，然后在中国或马来西亚加工，成品被运到英美后变为处理品和过季服装，结果只能被卖回香港，由非洲商人购得。

香港的服装卖家最头痛的问题，就是要与边境另一边的中国南方卖家竞争。不像电子产品和手机，重庆大厦的人普遍信赖中国内地服装，只要购买时仔细检查衣服的包装是否完好即可。与中国内地竞争的是香港深水埗的工人阶级，深水埗位于重庆大厦以北大约三公里处，是一个专门为非洲市场批发服装的地方，其商铺往往是中国内地工厂的出口贸易店。有的非洲商人告诉我，深水埗的价格常常比重庆大厦低廉许多——他们在重庆大厦留宿，但却不在那里买货。我在重庆大厦认识一些服装商，他们因为要在这么差的市场做生意而郁郁寡欢。

重庆大厦中最常见的商铺就是手机店，一共有一百家左右，手机产品也往往是他们销售过的最复杂的商品。手机店一般有各自的主打产品：有些是中国内地品牌的手机，比如极泰(G-Tide)或 Orion；有的是中国制造的无牌手机；有的是中国制造的冒牌货，比如“Sory-Ericssen”；有的是中国仿造欧美和韩国品牌的仿冒手机^①；有的是十四天手机，主要产自欧洲，被买家退货返仓的手机，最终被卖到香港和重庆大厦，转销给发展中国家的顾客；还有二手手机。

任何一家手机店都有种类繁多的手机产品。底座商店一般把二手手机放在玻璃展示柜最底层，这些手机没有原厂包装；十四天手机可以鱼目混珠卖给媚俗的客人，所以被放在玻璃柜较高的抢眼位置；玻璃柜顶层有中国产的新手机和欧洲及韩国牌子的仿冒品。这些不同种类的手机都可以在商店里找到，但我很快就会讲到，买家必须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产品，不然就会被屡占便宜。

总而言之，重庆大厦中的许多产品是发达国家繁荣产业的废弃物或仿冒品，被卖到发展中国家，我们将在之后讨论其意义。现在要说明的是，重庆大厦中的批发卖家都向我表明，他

^① 许多评论员把“仿冒品”和“伪劣品”作为同义词。在此书中，我将二者区别开来：我用仿冒品指那些与真货很难区分开来的产品，而伪劣品则试图取得一点法律保障，所以制造过程中有一些变化，比如将品牌名改一个字母，与真货不完全相同。为何十四天手机先被卖到香港，而非直接货运至非洲批发销售？我并不完全清楚，不过由于许多商人将不同手机类型打包购买，把十四天手机与中国产品牌及中国伪劣手机混在一起，所以香港依然是非洲商人购买手机的好去处。

们只不过提供顾客需要的东西，不求多也不求少。如果客人想要看起来闪闪发亮的新产品，他们就会拿给客人；如果客人要仿冒品，他们也有；如果客人只要以次充好的便宜货，他们也拿得出来。卖家追求满足批发商做生意的需求，从开出的合理价格也能获益颇丰，他们并没有什么其他宏伟的目标，因为他们忙于应付以赶上变化多端的重庆大厦市场。多少商人用贩毒和武器交易赚来的钱买手机洗钱？这种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一定存在，但是我认识的卖家绝口不提这个问题，他们不过是做生意的。如果“肮脏钱”被广泛定义为“从合法经济以外赚取的金钱”，那么重庆大厦里过手的钱几乎都很“肮脏”，不过那些买家和卖家可不认为那些钱“肮脏”。^①

这些卖家因为与周围其他人的相互维系而存在——假如某人隔壁开了一间有独立仓库的新店，而且有一些很好的批发客户，那么这个人的商铺很快就会倒闭。卖家也受惠于全球化的力量，假如中国内地收紧非洲人的人关控制，也许会令香港的市场突然蓬勃发展，重庆大厦的店铺可以乘机大发横财，因为去不了中国内地的非洲商人一定会来香港买货。从另一角度看，如果香港收紧人关规定，则会有相反的结果。如果货币兑换率改变，比如2008年100港币从兑换106元人民币降到只能兑换96元人民币，就会造成很大影响。假设美元货币在非洲国家流通不顺，如同2008年和2009年情况，许多商人就宁愿留在家乡，香港本地生意也会转差。2008年石油价格下跌，影响

^① 这个定义来源于 Nordstrom (2007, 93)。

了尼日利亚外汇，国家货币奈拉兑美元的兑换率在一个月內从 118 升至 168。当时尼日利亚的商人停止来港，重庆大厦的许多商販苦不堪言。重庆大厦中的本地与全球密切相连，远处发生的事情能从多方面影响到这里的生意，全球各地的生意也同样与本地相关。

占买家的便宜

重庆大厦的批发店一直有相互冲突的经商理念：如果要拓宽客源，商店多多少少要在做生意的时候老实一些，被占了便宜的顾客不会再次光临。从另一角度来说，很可能从愚昧无知的顾客手中骗走大笔钱财，商家对于这种诱惑也常常无法抗拒。一位非洲手机买家告诉我：

在重庆大厦贩卖的手机，从外表看不错，有索尼和其他品牌，但是里面一团糟……你很快就知道哪些商店好，哪些不好。你如果从不好的商家进货，把手机卖给自己的顾客，手机五六个月之后就坏了，顾客会找你抱怨——我认为重庆大厦有80%的商铺有时会骗钱。

当我把以上言论告诉几个手机店店主（我让一些重庆大厦的商人阅读这一章节，以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们都大声辩驳，一个人说：

我们手机商怎么会骗顾客呢，这些商人知道他们买的是什么货色，谁也没骗谁！非洲人一点也不笨！如果一个商人从我这里买了500个手机，我们就会给他一定保障，我们对这500个手机负责，我会让这个商人仔细检查每一个手机。如果有任

何问题，我们会把手机收回来。

商贩们认为以上所述的商人太天真或者太懒惰了，他们也许并没有仔细检查买到的手机。

不过，这些商店确实在许多方面尽显狡猾姿态。2007年有一个巴基斯坦商人跟我说：“我们变换手机外壳，然后重装，把它当作新手机卖给你。你对此一无所知，但是我们自己清楚。”^①买家被骗的几率高吗？对重庆大厦的手机零售商来说，“大概有50%的销售涉及以收取高额价钱来欺骗买家，但在批发销售中这种情况不超过5%。他们都很聪明，都知道的”！这个手机商继续说：“根据买家的国籍背景不同。比如，坦桑尼亚人非常落后，但尼日利亚人就很超前。我们把进价为30港币带摄像头的手机，以300港币卖给坦桑尼亚人，他们不像尼日利亚人那么了解科技含量。”他说如果一个国家的消费者对科技有一定专业知识，那么商人就不那么容易被骗，他们来到香港的时候应该已经具备了专业知识。

如果店主拥有店铺业权，或者店铺房东从不现身，欺骗动机则显而易见，因为赚来的钱直接落入店主腰包，当然欺骗也可能发生在店里只有一个店员工作的情况下。一位年轻的巴基斯坦男人，在店里售卖中国内地产的新货和仿冒品，他说老板

① 到2008年，重组——也就是替换十四天手机外壳及其他部件、更换母板——已经变得更加专业化，所以这个商人所描述的欺诈也没以前猖獗了。更广义地说，手机市场的演变如此之快，重庆大厦商人在一个时期的策略，也许一年后完全被摒弃，因此我这几页的讨论不免局限于过去的一段时期。

给了他一张价格单，上面有手机的出售底价。他把赚取多于底价的钱纳入自己囊中，没有人会问他问题。他告诉我：“你看，我是穆斯林。我不想骗任何人，因为真主就在我眼前。”然而，他也表示自己会经常从顾客那里多拿点钱，以赚取外快。

他还说如果自己要价过高，顾客就会去其他店铺进货。他对这件事的道德评判是“你可以骗钱为生，但是只能骗一点点。如果你要得太多，就会失去顾客”。在重庆大厦的世界里，手机产品不像那些大厦里卖的电脑，手机没有价格标签，我听说这是因为市场变化太快。当然，这也无疑令价格随买家对手机的认知深浅不同而波动。

仿冒品

以上所述的“欺骗行径”，一般歪曲产品的价格或质量，但大家一般不会故作正经把仿冒品说成是真货，重庆大厦的商铺充斥着各种假冒伪劣产品。我们首先来看手表，已经有真表、仿冒表、伪劣表的区别——例如，我曾在重庆大厦买到 10 港币的“Seciko”手表，是真正 Seiko 手表价格的五十分之一。正如十年前一个东非商报专栏作家所写：“天才晓得怎么区分‘Citizien’和真正高质量的 Citizen 手表，区分‘Smatch’和真正的瑞士 Swatch 表，还有‘Sekico’和 Seiko 手表。”^①

几个非洲商人告诉我，他们会给较亲的家人和海关官员捎去真表，但是不可能为顾客去买真表，因为没有一个人买得起 Seiko 或 Citizen 真表。所有商人都表示他们不会把产品当做真货来销售，但由于顾客一般不太会区分真表和仿冒品，所以这种说法站不住脚。顾客也许从来没听过这些手表仿冒的品牌——他们不过想买便宜的手表，而这些商人卖的就是廉价表。

服装贸易有另一种情况。我听说重庆大厦中任何一个商人，可以轻易拿到足够多的仿冒服装，正如一个商人说：“如果你想要一千件阿玛尼外套，他们就能给你弄到手，他们会打电话给

^① Sam Mukalazi, “Buyers Duped as Fake Goods Flood Uganda” *East African*, April 9–15, 1999.

相关的中国工厂。”一般来说，这些产品仿冒的是标签，而不是设计或工艺。尽管他们贩卖的衣服与高级品牌店的标签相同，但是制作上很不一样，商铺店主一般也不怕被人起诉。不过许多商店仍然拒绝把衣服出售给白人，因为他们大多认为白人特别关注知识产权问题。我见过一些西非商人，他们常常穿着中国制造的显眼服装做广告，衣服是其他非洲市场衣服的仿冒品，没有任何品牌标签，所以这种仿冒行为也就不会被起诉。

手机仿冒品是一个更令人关注的问题。对于手表和服装等产品来说，店主从来不会把商品当做真货来销售。手机零售商和批发商互相交谈的时候，从不提起手机是否是“真货”，批发的时候也从不提“仿冒品”等字眼，而说是“中国制造”；如果受质疑的手机标有诺基亚、三星或索尼等品牌，那么其意味不言而喻。^①我一次见到手机商贩卖某种手机的时候先以高价开卖，比如一部手机 500 港币，如果对方表示无意购买，就会再降价“200 港币如何”，突然降价如此之多，立刻显现出手机的真假——买卖双方对此心照不宣，但是大家都知道为什么价钱能降得这么快，这条真假之线已被逾越。

仿冒手机不一定就是垃圾——如果手机是 A 货，而不是 B 货和 C 货仿冒品，说不定能正常运作好几年，寿命可以和正牌手机一样长，这些不同规格的手机都能在商铺中找到。手机店职员都明白，如果买卖手机的时候要写收据，一定不会写手机

^① 讽刺的是，包括诺基亚等许多牌子的正牌手机也在中国制造，但是在重庆大厦，“中国制造的诺基亚”指仿冒品。

的品牌名称，以免他人追踪到他们的店铺。

我有时会听到店主们评论道：“哦不，我店里从来不卖仿冒手机，不过那边那间店，他们卖的都是仿冒品！”然而在2007年，尽管许多商铺在陈列柜中展示的都是崭新的中国品牌手机，但事实上他们贩卖诺基亚、三星、苹果手机的仿冒品。一个店铺职员告诉我，他的老板警告他不要卖手机给华人，有些商铺也不敢卖东西给白人，除非这些想买手机的人明显来自俄罗斯、乌克兰或其他较为贫穷的国家，因为他们害怕遇上便衣警察（香港警察主要是华裔，只有少数是英国人和南亚裔）。有人说：“没有谁害怕警察，因为警察不常来此处，不过你还是得留个心眼儿。”

2009年，海关人员来到重庆大厦派发传单给众多店铺，语重心长地告诫：“请勿售卖假冒伪劣产品。”当时店主们都不清楚警察是否会进行搜查行动，还是只给一下温馨提示（我写了这句话的一年后，发现应该是后者）。警察及法院至少起诉过两家贩卖仿冒手机的商店。你在重庆大厦里可以展示仿冒手机，仓库中也可以放几百个手机的存货，但是不能摆太多，以免令人起疑。2009年末，诺基亚公司的代理人开始对重庆大厦的二十一家手机店提起法律诉讼，他们雇佣的便衣侦探在那里找到贩卖诺基亚仿冒手机的证据，不过有好几间重庆大厦的手机店表示对方证据不足，因为他们早就对这些侦探提高了警戒心，所以没提供多少信息。

有些手机是伪劣品（以我的定义而言），其名称与正牌商标的名字有稍微一点不同，比如“Nokla”或“Sory Ericsson”等等，

为避免遭到起诉有一点保障。一个手机店店主跟我说：“是的，这里有 Nokla N-95 型号的手机，因为版权问题所以在中国制造，不过它的制作与真正的 Nokia N-95 一模一样，只有一个字母的差别。”还有一些产品也修改字母，除了名字和外形稍有改变，其他方面与正牌产品几乎毫无区别，只有专业人员才能看出差别。一个手机商人告诉我，他从来没在这个问题上被人骗过：

你能从手机的外壳、包装盒及配件看得出它是否是仿冒品。如果你递给我一个手机，我能在一毫秒内告诉你它是不是仿冒品。你可以从其重量入手，因为仿冒品比真货轻一些。至于外壳、配件和说明书，多多少少有一些区别。真货的说明书会提供注册网址，但是仿冒品就没有。真货的包装盒上也许打印了网址，仿冒品没有。另外还有编码，当然也许仿冒品也印了编码，但是这个编码肯定是假的，你可以试着打电话查询编码的真假。

正如以上所述，人们很容易凭手机重量辨别产品的真伪——比如一只诺基亚仿冒手机，重量一般比正牌手机轻 40%，因为它用的中国制材料比较轻。但是到了 2009 年，中国手机制造商越来越专业化，有许多工厂开始制造更加重的手机，令产品与欧洲原产品无法区分开来。除了重量以外，大家还可以检查 SIM 卡上方的公司编码，一般能从字体的拼写上看得出手机真伪。另外，人们还可以打开手机外壳查看母板，仿冒品的母板配置有很不一样的特征，也能显示手机是否是仿冒品。

一个人不能单凭价格判断手机的真假。比如，我们不能说2,000港币的手机就一定是真货，500港币的手机就是仿冒品，或者说450港币的手机是真的，150港币的手机就是假的。实际情况是，价格范围很宽广。基本上，中国制造的仿冒手机比欧洲和日韩产的手机便宜很多，但是也有一些是中国制造的旧型号，也许只售150港币，也有一些仿冒品的价格十分高昂——完全取决于仿冒的手机型号和仿冒手机的质量。只注重手机的真假也许有一点扭曲事实，因为我们可以见到商铺里有各种各样的手机种类。

到了2008年，中国制造的本土品牌手机越来越多——相比之下，仿冒手机和二手手机市场逐渐缩小，中国制造的本土手机质量日益攀升。2009年发生了另一种变化：中国品牌手机在某种程度上让步给十四天手机，因为中国手机一直有耐用性差和电池寿命短的问题。2009年秋天商人们估计，重庆大厦中售出的60%手机是十四天手机，其余大部分则是中国品牌的手機。这种现象令手机卖家越来越“合法化”，因为市场对仿冒手机的需求逐渐减少。^①

① 唯一仍然猖獗的仿冒品是手机电池：由于正牌手机电池很贵，许多手机店把十四天手机的原装电池掉包成中国产的仿冒电池，然后单独出售原装电池。顾客也许不知道，旧型号手机的原装电池与仿冒电池质量差不多，但这种区别在新型手机十分明显。

制造商和中间商

重庆大厦的批发商铺受到被中国内地制造商替代的威胁，内地制造商接二连三来到重庆大厦开拓店面，顾客也渐渐遗忘重庆大厦的老店，他们自己跑到内地进货了。内地商品的质量出名的差，特别是手机及电子产品。不过中国产手机越来越优质，包括另外销售给商人的仪器设备。总而言之，中国内地作为商品原产地对重庆大厦是一种威胁。重庆大厦的批发商人代表了中间枢纽——他们贩卖的大部分商品在中国制造，然后散播到世界各地。重庆大厦的角色正如香港本身在全球的角色——它是中国内地和世界之间的贸易中心——然而，许多商人都抱怨现在的生意越来越难做了。

商人们都爱发牢骚，不过重庆大厦的批发商铺确实因为中国内地的竞争而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一个重庆大厦的香港华裔女商人说：“这里的中小型公司没有未来，他们只会进口中国内地的产品卖给其他国家，从中获得蝇头小利。只有较大型的公司能生存下去。”她认为，重庆大厦充当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中间商的余地越来越少，今后香港的未来也是如此。

一个香港华裔服装商人说：“因为内地发展很快，香港服装产业已经几乎没有发展空间了。内地的服装产业已经有世界一流水平。”一个巴基斯坦手机店店主说的话也回应了之前 Johnny Singh 的观点，他认为重庆大厦会越来越像中国内地，因为香港

颁布新的签证条例后，中国内地人可以在香港做生意并定居下来，他说：“中国内地人可以从他们的工厂直接进货，售价比我们低很多。以后就不需要我们这班巴基斯坦人（中间商）了。”

从另一角度看，重庆大厦的其他商人不停抱怨中国内地人做生意的方法，认为他们根本不可能在重庆大厦有所作为。有一个手机店店主曾经在中国内地住过四年，他说：

中国内地人的问题是他们能答应任何条件，直到他们拿到你的订金为止。他们一旦拿到钱，之后就给出他们想给的任何货色。你虽然有合同在先，但是合同对他们来说不值一文，就像一张厕纸……我搬到香港，就是为了逃离让人头疼的中国内地。

重庆大厦有一个鞋商也有同样的牢骚：“中国内地制造的鞋子太小了，非洲人都想要大码鞋，所以他们下订单买大一些的鞋子，中国人说好，但是他们实际运到非洲的鞋子可能小得多，不符合非洲市场的需求。”他如今在香港购买香港人在广东的工厂制造的鞋子，这样他才能拿好的鞋子卖给非洲客人。

当一个人去到广州，就会发现有许多地方酷似重庆大厦，比如天秀大厦和迦南服装贸易城，那里的非洲商人景象比重庆大厦还要熙熙攘攘。在2008年奥运和2009年签证搜查之后，

广州的非洲人数量又有上升趋势。写作本文之际，广州的非洲商人仍然比香港多得多。如果今后也如此，那么重庆大厦作为低端全球化中心的未来就不太明朗了。

另一方面，如果中国内地的生意经仍然如香港商人所描述的那样无序，那么重庆大厦作为低端全球化中心的角色也许还会继续。我在2010年5月修订这一章节的时候，重庆大厦的非洲商人，特别是手机买家，数量比两年前少了许多——如今的商人更有可能去了中国内地，当然也有一些人因为经济危机留在非洲家乡。一个手机店的商人告诉我：“没错，很多非洲人都到中国内地去了，因为他们想在那边创业，但大多数人是因为拿不到香港签证才去的。^① 如果他们有签证，还是会回香港，因为他们能信任从这里买到的手机。”

^① 我在2009年从几个重庆大厦的商人口中听到这句话——许多人说中国内地开始允许大批非洲商人进入，以防他们去香港，同时香港入境处更加限制入境规定。

手机店的骗术和辛酸

我曾在 2007 年长期驻守在一家手机店，一年多后，我的主要采访对象 Mahmood 返回巴基斯坦。六个月后，那家店铺就结业了。店铺只有一个洗手间大小，玻璃柜外靠着两张凳子，我还在那里的时候，店里有四个职员：Mahmood 的亲戚是老板，他工作的时候不停寻找手机批发货源；另外有 Mahmood，每天负责管理店铺；还有两名持旅游签证的印度工人，他们花时间将外国手机解锁，以及包装已经售出的手机。两名印度人必须每四十天回一趟加尔各答，这些持旅游签证员工的任务之一就是从中国内地带来仿冒手机。有一个人告诉我，他试着在做生意的时候看起来很有自信，这样中港边境的海关人员就不会没收他携带的商品。

这家店铺 90% 的客人都是非洲人，余下 10% 的顾客来自欧洲、阿拉伯国家或印度和巴基斯坦。欧洲人一般要买具体几种手机型号，那些型号在他们的国家有畅销市场。最让 Mahmood 头疼的是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他说：“要是他们知道我的手机进货价是 250 港币，那他们就要出价 249 港币买下。”他说尼日利亚、印度、巴基斯坦来的顾客都想要最新款手机——他们也许会购买中国制造的手机，可能是真货，也可能是仿冒品，要有最新的各种功能，以便向朋友们炫耀。另一方面，其他非洲国家的消费者只求买到可以使用的手机——这就是他们想要的

商品。总而言之，Mahmood 说非洲人比南亚人更好应付；有一些非洲人很天真，但也有的人很“疯狂”，他提到有一次，一个非洲商人走进商店，在计算机中打出一种根本不存在的诺基亚手机型号。Mahmood 说那个男人只不过在逗他玩。

这里会描述几次 Mahmood 与客人砍价的过程，我先讲讲一些零售交易的情况。有一个顾客，一个西非女性，进来寻找一种给自己用的手机。Mahmood 首先向她展示了一部 450 港币的手机，那是一款十四天诺基亚手机。她说太贵了，于是 Mahmood 又拿出 90 港币和 190 港币的两部手机，都是真货，不过因为只有法文显示，所以很便宜。那位顾客不知如何选择，一是因为手机语言的问题，二是因为她根本不了解手机市场，于是 Mahmood 给了她好几种选择，说：“这个手机是这个价位，那个手机是那个价位，你想要哪一种？”

另一笔交易中，一个法国人想要买三部西门子 C62 手机。Mahmood 立刻问他知不知道另一部类似的手机，客人表示他从没听过，结果 Mahmood 马上明白这个人不太了解手机，于是他知道能要价多少。法国客人买下了三部手机，却不知道比自己比原本售价多付了 30% 的钱。

还有一次交易中，Mahmood 向一个东非买家展示了一只售价 280 港币的手机，买家要六部手机，但是说：“不，不，价钱应该是 200 港币！” Mahmood 答道：“不可能，我进货价才 249 港币。”客人带着厌恶的表情离开了，然后 Mahmood 告诉我：“其实我进货价只不过 140 港币，他明天会回来的！这只是游戏的开始，最终我会以 180 港币的售价卖给他。这个男人今天才刚

从非洲坐飞机到港，为什么不玩玩他呢？”Mahmood 说如果买家够聪明绝顶，他只能在每个手机上赚到 10 港币的利润；如果买家什么都不懂，那他就能赚每只 70 至 80 港币的利润。

批发贸易涉及的金额更大，也更加复杂，令人难以捉摸。我曾见过 Mahmood 工作的时候尝试向一个喀麦隆商人销售 3,000 个手机，如果交易成功，他的店铺就可能赚到 6 万港币。如果每个月能做成几笔这样的交易，店铺就能获益匪浅。不过，每达成一笔这样的交易，就有一百多笔交易失败。

手机市场变化多端，Mahmood 经常担心跟不上最新潮流，他督促亲戚留心最新款型，不然店铺生意不保。Mahmood 告诉我，2007 年中的流行机型是中国内地的重组手机。一般人很难辨认这种手机，不过有一种方法，就是检查手机上的螺丝是否松懈，但是这种检查方法并不完美。Mahmood 说一只旧款诺基亚手机可以当作十四天手机以 150 港币售出，如果当做重组手机卖，就只有 100 港币而已，所以卖家能把重组手机当做十四天手机出售而获益颇丰。

如果买家不知道什么是重组手机，那么 Mahmood 就自然而然地会将它掺杂在十四天手机中一起卖出去，他以牛奶兑水打比方，说：“如果你把两杯水和一杯牛奶搅浑在一起，这种骗术太招摇了，如果你只在牛奶里兑 20% 的水，那么大多数人不会察觉。”在道德上来说，他认为做这种事很合理，因为店铺卖了许多十四天手机，尽管我听有人说他的店铺多是卖重组手机，而非十四天手机。Mahmood 说，即便聪明绝顶的非洲商人有时也分辨不出重组手机，曾经就有一位被他骗得晕头转向，因为

Mahmood 告诉制造商，把重组手机的螺丝拧得特别紧，手机看起来好像从未被打开过一样，那位尼日利亚买家进货后，拿到非洲集市贩卖——所以据 Mahmood 所讲，这个买家不会受到什么负面影响，因为几个月后手机坏了，也不会有谁知道或抱怨。

Mahmood 也担心每星期及每月的客流量。2007 年的一月和二月是淡季，因为中国内地的工厂放假过春节，这种情况年年如一。商店在二月份只售出 2,200 个手机，但在三月份情况突然好转，头十天就已经卖出 6,000 个手机。三月初的某日，一位大客户来到，那是一个肯尼亚女人，她一般每月购买 1,500 至 2,000 个手机，店铺中专门有个员工替她跑腿，到中国内地的手机工厂拿货。另外，一个加纳商人因为签证问题无法来香港，结果他不能来买在 Mahmood 店里订的 7,000 个手机，于是店铺损失了本来可获利的 175,000 港币。

生意在六月中旬骤然下跌，Mahmood 认为这是因为店铺不是主要经营中国制造的仿冒手机——不是怕触犯法律，而是他的亲戚无法兼顾那么多事情，Mahmood 说他亲戚总是和情人鬼混，没时间管理店铺。这个亲戚开始常常辱骂 Mahmood，说他很懒惰，这令他十分沮丧。2007 年夏天，商铺仍然没有转型贩卖中国产手机，而是开始贩卖二手手机，以符合相应的市场需求。二手手机的运作与一般手机相同，寿命一般比中国产的手机更长。商铺在七月份一共销售了 16,000 个手机，主要卖给几个大客户，但是比起重庆大厦的许多其他手机店来，这家店铺的利润少得可怜。

秋天出现了新的变化，新趋势一直持续到下一年，新产的

中国产手机越来越便宜，质量也越来越好，批发商能以 60 至 70 港币购买中国制造的彩屏手机。这个潮流令许多经营手机店的巴基斯坦人焦躁不安，但并不包括 Mahmood。巴基斯坦人垄断了重庆大厦中十四天手机的销售，但是中国内地的工厂开始进驻，贩卖他们本厂生产的手机，给出的价格也更具竞争力。然而，这些手机有一个问题：他们到底有多长寿命？六个月后，这些中国制造的手机是否还能运作？如果仍然可以用，那么假设 Mahmood 的店铺不赶快改变商业策略，那么他的生意就会受到重挫。

但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之际，Mahmood 的父亲在巴基斯坦突然病重过世，他必须立刻回国，带上自己在香港积攒为数不少的一笔钱。在 Mahmood 离开后，如之前所说，他经营的店铺很快也结业了。

各色商人

我在重庆大厦见过各式各样的商人，这里有一些我的研究助理在 2006 年至 2007 年记录的文字：

在五月与十二月之间，一个来自坦桑尼亚的手机商每月都要来一趟中国。这几个月是非洲的手机销售高峰期，他在广州购入手机，然后坐火车把手机带到香港，最后将货物作为额外包裹，一并乘飞机带回坦桑尼亚。他说每公斤能打包 7 个手机，每趟旅程平均携带 700 个手机，乘坐飞机前缴付额外超重的货物。除去机票和超重费用以及住宿费，他声称自己每次旅行能赚 500 美元的利润。

有一个塞内加尔商人从刚果购买宝石，然后到德国、曼谷和香港贩卖，他已经连续五年做这行生意了。他展示用 Goma 手机在刚果拍摄的照片，他说刚果特别危险，“你随时会被杀”，他还说自己曾经在那里被人持枪抢劫。

一位来自班加罗尔的印度商人做买卖 Leica 相机的生意，他从许多印度城市买入相机零件，然后卖到香港。他尝试向我销售一款 Leica M-6 的相机，说：“这是二手的，不过 99% 完美。”他说自己可以出价 25,000 港币，其他商人都会以 39,000 港币的价位售出。

一个东非商人买卖中国内地生产的仿冒浴池，卖给生意人

和政府官员，他说这些人有足够的钱买浴池，里面还安装了电视机和 CD 播放器。

一个肯尼亚服装商住在中国内地，每三十天就会来香港更新中国签证，同时购买她认为会在东非热销的单件服装，然后拿到中国南方的工厂批量仿制，标上她自己的品牌标签，最后雇佣其他的肯尼亚同胞把服装运回东非。

有一个加纳商人自 2004 年后五次造访香港，他做的贸易是街头流行服装。他曾经去过许多不同地方购买服装，包括迪拜和越南，但最后发现香港销售的中国制衣服质量比较好。凭着旅行收益，他已经在 Accra 开了三家服装零售店。

一个来自马尔代夫群岛的商人进口 DVD 播放机，他说那个国家一共有三十万人口，他几乎认识岛上每一个人。马尔代夫对所有进口货物征收 5% 的关税，于是他将货物空运回去，货品在家乡的售价至少上涨 60%。

两名肯尼亚女商人从曼谷来到香港，然后去中国内地和迪拜，最后回到内罗毕，她们在每个地点停留两三天。她们去固定几间商铺订货和拿货，然后马上去往下一个目的地。她们说自己正在做服装生意，因为“女人选衣服比较有眼光”。香港和中国内地是最好的进货地点，印度则是买皮包的地方，迪拜是买鞋子的地方，不过那些鞋子也产自中国。她们自从 1997 年就一直在这门生意。

有一名牙买加商人，我一开始不信任他，认为他只是一个会讲故事的避难者，看起来像是商人。他的飞行旅程很简单——香港至伦敦，伦敦至金斯顿。他买卖中国内地的电子产

品、手机和一些其他商品，然后不仅在牙买加销售，也卖去危地马拉、尼加拉瓜以及其他中美国家（他能讲一点西班牙语，我问他问题的时候发现他不太会说）。他说墨西哥曾经是这些商品的货源地，但是今日不比往昔，中国已经成为新宠。

一个阿拉伯印度尼西亚混血的商人——父亲是也门人，母亲是印度尼西亚人——曾通过船运把手机拿到印度尼西亚贩卖。他说货物运到目的地的时候，15%的手机因为受到海风侵蚀而无法运作，所以现在他用空运发货。他还做一些其他生意，包括进口美国威瑞森手机到重庆大厦——他从美国进口手机，然后从中国购买所有手机配件，打包卖到印度尼西亚。

一个法国人到香港参加交易会，主要买卖MP4播放器——如果他要买一大单商品，就会去中国内地进货。他说质量不是最重要的，法国人会买各种档次的中国商品：“中国已经占据了全世界，二十年内，我们全都要说中文啦！”

一个冈比亚商人在中国南方批发服装，一提到自己的生意，他就苦起脸连连摇头：“广州人真是吸血鬼，不过总的来说，这样还是比我在冈比亚当农民好一些。”他问我知不知道哪里有更便宜的旅店，因为他想在香港多留一段时间——每晚150港币对他来说太贵了。

一个坦桑尼亚商人和另外一个来自刚果金沙萨的人开始谈起生意，把英语和斯瓦希里语夹杂在一起讲，以便让我听懂。坦桑尼亚人在香港购买二手汽车，然后将车通过达累斯萨拉姆、马塔迪，绕过好望角，最后在刚果销售。从大西洋海岸的马塔迪开始，汽车通过公路运到金沙萨，那条路是刚果唯一能够使

用的高速路。他说：“我这里有三辆车，你准备好了，我明天就能把车运出去。”他说包含空运及其他所有费用，能保证盈利300%。

一个津巴布韦商人曾经做服装贸易，不过现在开始进口香港二手汽车的轮胎。他用美元做生意，穆加贝政府不顾一切地需要美元，所以海关经常骚扰他。他通过英国做贸易，因为他有亲戚在那里。由于津巴布韦的货品通胀情况令人骇然，所以他必须每天早上打电话到津巴布韦询问最新货币兑换率，以便修改商品价格。然而，货运集装箱几周后才能到达津巴布韦，所以他必须进行协商。他小心翼翼不涉足政治，说：“如果你支持一个党派，结果另一个党派当权，你就死定了！”他已年过三十，养着家里八口人。

以上只是我与研究助理听说的数百个故事中的几个，商人们按照他们来自的国家、贸易的商品以及商品流动的方向来划分。超过90%的商人进行贸易有一个大致模式，来自较穷困国家的商人来到香港或中国内地，购买货物运回家乡。我们在不同贸易中见到这种情况，包括手机、服装、建筑瓷砖、家具，还包括把商品通过行李箱、空运和集装箱运回非洲及一些其他地区。不过，也有一群商人以相反的方向进行贸易，非洲的宝石商和黄金商就符合这个模式：他们不是把成品从中国带到非洲，而是从非洲带原材料卖到香港和中国内地进行再加工。

这种情况符合依赖理论：边陲国家提供原材料，加工成品又出口至边陲国家，这是较富裕国家剥削较穷困国家的经典模

式。^①其他商人，特别是印度人，并不太符合这个模式——例如，销售 Leica 相机的商人利用了印度科技水平较低的实际情况，从印度造的老式相机中获取利润，迎合现代西方或中国相机爱好者的趣味。Verizon 手机也揭示了这种互动的复杂性：发达世界和发展中世界的象征符号比一般人的假定更复杂。无论如何，重庆大厦显然是商品和信息的交换场所，香港本身也如此。

我曾经听说关于哥伦比亚毒贩的故事，他们在重庆大厦中存放货品。传说重庆大厦是华语国家中唯一一个白人和棕色肤色的人融合在一起的地方，他们的生意不受监察。这个故事也许是真实的，但是我抱有疑问。我还听过关于军火商的故事，他们买卖 AK47、地雷及其他类似商品，然而我并没有看到证实这个传言的证据。香港警察在 2008 年拘捕了一名在重庆大厦逗留的美国人，怀疑他涉足恐怖主义；他最终被认定拥有几支警棍和电击枪，是一个游手好闲的特别爱好者，结果入狱了。

一个避难者朋友告诉我一个关于加纳黄金商人的奇特故事，他本人跟这个故事有关，而且他发誓这是真事。他在重庆大厦门口遇见一个男人，满嘴都是金牙，那个男人想要吃饭，于是他带其去重庆大厦高座一家无牌经营的加纳餐厅。他在一天后又遇见那个男人，惊讶地发现其又有了一口正常的白牙齿。

他问他那男人什么会这样，那个商人犹豫了许久，才道出他的故事：

^① Ghosh 2001。

我从自己的国家走私黄金。我来自一个十口之家，是最小的儿子，父母在我幼年已经去世，我们在贫困潦倒的环境下成长。有一天，哥哥建议我们做黄金买卖，于是我们开始从贫穷的非法矿工那里买进黄金，然后贩卖给中间商。很快我们意识到我们在做徒劳之功，只不过令那些中间商越来越富有。哥哥告诉我，如果我能到香港贩卖黄金，那么我们就能够赚更多钱；他认识一个愿意出好价钱买黄金的客人，哥哥告诉我发财的唯一方法就是打掉牙齿。于是我去诊所把所有牙齿拔光了，一个月后装上你现在看到的牙齿，那就是开端。通常，哥哥和他的朋友把黄金牙一个一个安装在我口中，一共有三十二颗，然后我直接来到重庆大厦。我首先找到客房，然后打电话给中国内地的客人，他在两个小时内来到这里，然后把我的牙齿摘下来……兄弟，你知道我们非洲人要用尽所有办法脱离贫穷，不然我们都会饿死。

这真是一个奇特的故事，还有许多类似的故事在重庆大厦中流传。这个商人认为必须换牙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不经过持牌商家交易黄金在香港是非法行为，香港海关有可能会检查他是否携带了金条，但是不会检查他嘴巴含着的黄金。

但让我们从这些故事中退一步思考，这些商人一般到底是谁？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偶尔有一些带阴暗色彩的描述，比如上诉故事，贸易大部分是合法的，所以这些商人可以亲近。过去几年来，我在重庆大厦的小食摊和走廊见过无数陌生人，我问他们：“你来自哪里？做什么生意？”只有极少数情况下，对

方不愿意回答（一般情况是，他们因为语言障碍无法回答）。更常见的是，他们花上几分钟，有时几个小时，谈论他们的工作和旅程——他们遇到的麻烦，工作的快乐和险境，以及他们赚的利润。在香港的主流想象下，也许还包括西方世界整个背景下，这些发展中世界的商人迷信而且躲在阴影之中，但这在重庆大厦并不适用，许多人对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保有开放和自豪的态度。

商人之间的代沟

就算不提香港，重庆大厦所有的商人在他们祖国多多少少还算富裕，这一点在重庆大厦背景下很容易被忽略，人们常常见到非洲人在吃住上讨价还价——尽管重庆大厦已经很廉价，但是它在这些发展中世界游客的眼中，仍然代表了发达世界的价格水平。与我聊过天的一些老一辈非洲商人，对年轻非洲商人的粗野行为哀叹不已，但实际上，这些年轻商人代表了他们祖国的上流阶级，他们付得起飞来香港的机票钱，这令许多同胞梦不可及。

一个坦桑尼亚商人跟我讲：“在我的祖国，普通人很难买得起去香港的机票，即 13,000 美元。许多非洲人，特别是西非人，总会用某种方式告诉你，‘我舅父是总督’，‘我侄子在军队里是上校’，这就是关系。”正如两个中非商人告诉过我：

商人甲：我在 2004 年第一次来香港。

商人乙：我 2003 年第一次来。

商人甲：我舅父掌管着我所在的公司。

商人乙：我爸爸拥有我工作的公司，所以他们当然会教我怎么做事。

商人甲：父亲问我这一辈子想要做些什么，他说：“我会给你钱，不过你有什么计划吗？”还有个朋友建议我们一起去香港

和中国内地，那个朋友说：“如果你给我钱，我就带你做生意。如果你有1万美元，你可以去迪拜，然后去香港买手机。”

商人乙：假如我家里有什么麻烦事，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打电话给父亲，他会打电话给另一个人——任何事情都可以通过关系解决。

确实，有几个商人告诉我，说他们的舅舅是伊迪·阿敏的农业部部长，或是加纳监狱委员；有些商人无疑夸大了他们的人脉，但是有的人不一定。许多商人是非洲上流阶级和中上产阶级的后代，拥有踏上香港之路的能力和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能赚到钱——他们往往会失败。

我采访的商人大部分是三十多岁、四十多岁和五十多岁的男人，他们从事贸易已经有几十年经验，只不过他们全都是最近几年才来到香港和中国内地。很大程度上，他们掌握了面对海关及其他不确定因素的生意技巧。这些人往往在中国拥有广阔的人脉，看起来对自己所作的事情了如指掌。在对待中国和祖国的海关的时候，他们一般也倾向于合法交易，如果可能的话，他们经常在常规程序上避免贿赂。有几个人告诉我，做生意的关键就是不求横财，而是应该在每次旅程中获取少量但稳定的收益。许多商人已经在香港与祖国之间来往不止一百次了。

年长且有经验的非洲商人常常瞧不起年轻商人，认为他们能力不足，商人之间有明显的代沟。对年轻的加纳商人来说，

去香港是一个成人礼，以及能在家乡赢得地位的方式。^①对尼日利亚的伊格博人来说，年轻人在香港创业成功，在某种意义上仿佛“毕业”成为羽翼丰满的企业家，不仅在国内还是世界各地都能赚钱。^②一个尼日利亚商人告诉我：“我如今在中国赚到一些钱，乡亲们对我也另眼相看，他们尊敬我、仰望我。”另一个年轻的坦桑尼亚商人跟我说：“我在这里必须成功，我的家人完全指望着我。我要成为一个男人，不能失败。”

失败似乎意味着一大笔损失随之而来，正如 Christian Lo 描述一群不成功的加纳商人留在香港非法打工。^③我访问了一个年过三十的坦桑尼亚商人，他滔滔不绝地对年轻商人进行评论：

为什么这些小商人还要来香港？我问自己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就他们大多数人来说，你今天会见到他们，然后就再也见不到他们的踪影。他们在这里不超过六个月，一些人只来一次，好像这是一种时尚：“香港那里有生意，有人正要去香港，所以我一拿到钱，也要到香港去。”如果他们家人卖掉位于达累斯萨拉姆一个上好社区的物业，也许能兑现 15,000 或 20,000 美元，然后他们来香港，以为自己一定能发财。我认识两个这样的商人，每人损失了 15,000 美元，他们从家族遗产和捐献中拿到这笔钱——这笔钱给他们的时候，承载了家人全部的希望。

① Lo 2006, 52。

② Rojas 2009。

③ Lo 2006, 52。

结果他们回家的时候只剩下几百美元，那时能说些什么呢？

他们有时候来问我建议，我告诉他们：‘不要去中国内地，就在重庆大厦进货，然后直接回家。’他们根本不清楚什么是仿冒品——他们不知道，如果你在中国内地买到一件阿玛尼西服，它不可能是真货，香港海关官员也不会允许其过关。有的非洲商人完全不清楚这些东西。

另一位年长的尼日利亚商人评论道：“有些年轻商人十分傲慢，我记得有一个去过广州的男人，告诉我他想搭地铁去日本。难道他以为日本就在下一条街道吗？他们太急于离开尼日利亚，不知道自己落入一个什么样的境地。如果你在海外没赚到钱，这是非常耻辱的事情。”这些老一辈商人常常认为他们光靠自己就学会了做生意，按照有个人的说法：“就算是最开始的时候，我刚来到香港，就已经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说那些年轻人在获得这些经验之前，可能就已经消失了。

与我交谈的年轻商人对这种看法表示同意，但似乎并不知其所以然。一个二十出头的肯尼亚商人坚持向我表示，自己一定可以把六百件 BOSS 西装运过中港边境，因为“香港如今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好比是父母，香港是孩子，孩子永远不会伤害父母，所以香港一定会允许仿冒品过关；不然，它会损害中国经济”。我向他暗示，他能够通关，不被没收货品，已经是万

幸，但他不相信我。^①

这些年轻商人中有些人，或许大部分人，都会无影无踪——我听说有人估测，初次来港的非洲商人中只有 40% 的人能再来港——其他人最终无疑也会成功，继承老一辈的传统。有好几次，我在重庆大厦遇见年长的非洲父亲及他们年轻的儿子——还有一次，是一位母亲和她的儿子——前者教授后者贸易技巧，然后把生意交接出去并退休。

^① 他有一部分分析是正确的：只有很小比例的仿冒货品在边境被没收。但是，与其说是因为忠诚，倒不如说是因为香港的新自由经济主义，而且位于罗湖和落马洲的中港边境可谓是最繁忙的关口，所以大部分货物未受检察而顺利通过。

商人的技巧

重庆大厦中的交易十分简单快捷，令人赞叹。我曾遇到一位印度男人，他第一次来香港做贸易，刚踏入重庆大厦的时候，我恰好遇到了他。他找到一间旅店客房后，我就跟着他回到大厦底座做生意。

他第一件事就是在重庆大厦逛一圈，看看所有正在出售的商品——特别是手机和电子产品——然后他立刻打电话给印度的生意伙伴，了解商品在那边对应的最新价格。接着，他在重庆大厦找到最合适的商家，问他们在哪里进货，商品来自中国内地的哪个地方。这些商家是中国工厂的出口店，所以他们不介意把这些信息告诉他。然后，他计划去中国南方深圳的旅程，访问制造他想买的商品的工厂。紧接着，他返回印度。

在旅程中，由于他可以使用手机，轻而易举就能发家——他刚来重庆大厦的时候一个人也不认识，但几个小时后就开启了生意。确实，尽管一定有受骗的可能，但这是做生意的入门经——坐飞机抵达，立刻在重庆大厦询问价格；马上打电话回国，找出对应的商品价格；然后和工厂建立关系，将差价最大化。这在二十年前也许很难达到，但现在完全合情合理。廉价的手机通讯以及便宜的跨国交通，所以令重庆大厦低端全球化成为可能。

商人做贸易的方式多种多样，这里描述几个典型模式，首

先是手机，接着是服装。小商人一般从重庆大厦不同的店铺中购入几百只或几千个手机，取决于买家的订单数额或家乡顾客的需求。货品中通常混杂了许多不同种类的手机，有的是十四天手机，有的是二手手机，有的是中国制造的新型手机、伪劣手机、重组手机或仿冒手机，当然也有一些商人专门买卖这些手机中的一种款型。

所有商人都说他们仔细谨慎地检查商品，正如一个加纳手机商向我解释：“我检查了所有手机，每一支都检查了。我打开手机壳检查电池和型号。不，我不会细致到检查接线处——我们碰不到那个部件。”他就像其他手机买家，会退回自己不满意的手机——当他退货的时候，手机商铺总是会说他们自己也被误导了，受到批发商的欺骗。重庆大厦的手机卖家给他九十天保质期，一个标准期限，但他仍然需要小心检查，因为不敢确定自己是否会在接下来几个月再回重庆大厦。

检查过后，他如同其他商人一样，将手机打包并以一定方式裹好，行李检查机才不会测出手机中的电池，因为这违反了一些航空公司的规定。商人们一般计算自己每公斤可携带七八个手机，或是十个中国制造的手机。因此，他们在允许携带的行李重量规定下可以运送 250 至 300 个手机——行李重量限额一般是三十公斤，另有大概几公斤的灵活性——如果他们愿意付费获得额外重量配额，就可以多带 400 至 500 个手机，或者通过空运服务携带更多货物，甚至可以跟其他商人朋友讨价还价，使用他们空余的行李重量配额。

这些商人乘机场巴士到达机场——在重庆大厦的街对面就

有一个巴士站，但是这些巴士的司机经常拒绝携带大量行李的商人登车，于是这些商人也许会乘坐南亚人安排的小货车，它们就停在重庆大厦的后巷，收费比出租车便宜，还附带搬运服务，帮助商人搬运重庆大厦高座或低座的箱子。

以上描述当然不适用于在中国内地南方购买手机的商人——地点在距离香港两个小时车程的深圳、广州及其他中国内地城市。大部分人都说这是更高风险的生意，因为中国内地手机，特别是仿冒手机信誉更低，也因为中港边境的海关可能没收仿冒商品。这种情况很罕见，特别对于那些通过个人行李进入香港的商品。但是这种情况有发生的可能，这种可能性令贸易蒙上了一层阴影。香港海关不检查那些空运离境的货物，所以在行李中携带手机离开香港的商人无需担心，至少在他抵达祖国的海关之前是如此。

只有一小部分留宿重庆大厦的服装商人在大厦里买衣服，尽管大厦有几个面向非洲市场的服装批发商。商人们大部分更愿意在深水埗进货，因为那里的许多批发商不仅仅贩卖服装——在商店里，商人们不是买了货就能立刻拿走；实际情况是，所有东西都要先预订，然后才被制造出来。深水埗批发商根据非洲商人的需求，马上打电话给中国内地工厂，确定服装设计 & 预算成本。

实际上，这些非洲商人不仅仅是买家，还是设计师：他们来到深水埗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特定想法，他们选择材料、图案、钮扣以及其他细节设计，保证他们所购买的衣服符合最终消费者的口味。一旦样本得到确认，他们的订单一般几天内就

能落实。需要订做大批量服装的商人，可能自己亲自到中国内地购买，而那些只需要买几十件或几百件的商人坚持去深水埗。

值得一提的技巧是，许多服装商人寻找吸引人的正牌服装，然后再仿造相应的衣服。也有人稍微在细节上作一点改变，令商品非洲化，以顺应千变万化的非洲本土时尚。有的商人在香港搜索好设计，或去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找到设计，然后再回重庆大厦的批发店中，预订想要的衣服尺码。店铺接着联系中国内地的服装厂，将成品运送至尼日利亚、肯尼亚或其他商人的家乡。

商人们通常赚多少利润？几个小商人向我表示，他们每次旅程赚 400 至 1300 美元，包括了频繁飞行中获得的飞行里程数收益。另外，拥有公司的商人赚得更多，他们的利润空间很大：从 20% 至 100% 甚至更多。

由于旅行成本很高——东非商人每次旅程至少花费 1000 美元，西非商人则需要付更多钱——有人会问，为什么这些商人费这么大工夫来香港，他们就不能打电话下订单吗？有的商人确实在来香港之前已经下了订单，以便货物在他们来到之时准备妥当。还有的人，特别是与供应商已经建立相对长久互信关系的商人，他们留在家乡，通过其他要来香港的人下订单。但是我听说绝大多数情况是，他们必须亲自来这里——在非正式经济中，一个人不会相信不面对面打交道的商人，也不会相信一笔不能逐一检查商品的交易。

中国内地的诱惑

大多数商人觉得，在香港比起在中国内地更容易做成生意，主要因为语言。一个买卖电子产品的肯尼亚买家，反映了许多其他人的意见，他告诉我：“在重庆大厦，我讲话别人能理解我……我可以讨价还价。这些事情在中国内地太难做到了。”

然而同时，如果要追求更大的利润，就要去中国内地，一个坦桑尼亚服装买家说：“钓大鱼就要去中国内地，我们钓小鱼的留在香港。中国内地规模很大，适合大鱼，而不是小鱼。小鱼留在香港，它们需要香港。”另一个在中国内地做生意的尼日利亚商人也使用海洋的比喻：“中国内地和那边做生意的商人好比一个海洋，而香港只不过是一湾池塘……不过那些在池子里的人，也可以从海洋中得到好处。”

许多商人跟我说过在中国内地遇到的麻烦事，印证了之前几个商人提到的事情。正如一个西非手机商告诉我：

我在中国内地购买了200个手机，但是有100个质量不好。我跑回中国内地告诉厂家，他们说会查看，六个月内会把钱退给我，最后他们却只给我50个手机的钱。我再也没跟那家公司做过生意，在那之后，我没再在中国内地购买手机，我宁愿在香港买。在香港，如果手机质量不好，我可以把手机拿回去，它马上就被修好，在中国内地就不可能。

聪明的商人对这些问题一清二楚，也有相应对策。一个买卖办公用品的东非商人告诉我，在中国内地与他做生意的公司，向他展示每一道工序。当货品被装进集装箱时，他会拍下照片，包括拍摄中国公司负责人——一位年轻女性——这些照片制成光碟，双方各持一份，以保证双方对装箱货物有精确纪录。另外一个例子，一个商人最近才发现，给他供货的中国内地工厂开出的价码是给外国人的价码，比给华人的价格高。他在中国内地坐飞机的时候，从一个新加坡男人那里知道此事，他没有生气，而是雇佣了那个新加坡人，利用其普通话水平和华人身份替自己做生意，并给他一定回扣作为报酬。

我采访过的最成功的商人，住在中国南方、会说普通话并且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这往往得益于他们过去超过十年在中国内地的学习生活。他们往往不仅是商人，尽管他们一定有贸易活动，而且也是中间商，处于中国制造商和来找厂家的非洲商人之间。一个问题是，在非洲文化背景下，中间商不能直接索取服务酬劳，特别当这个商人是他家人的朋友时。一般来说，假如中国内地工厂给中间人回扣，这笔生意又足够庞大，那么中间商能获益颇丰——尽管他也对工厂运出的产品负上一定责任，因为是他将工厂推荐给非洲买家。

一个主要的贸易模式是，非洲商人与中国公司之间的竞争——后者拥有更多资本，也许会挤兑前者，影响非洲商人的策略。一个来自马达加斯加的宝石商说，他一开始做服装贸易，然后是海鲜，最后是宝石。他开始先做服装贸易，因为马达加

斯加的市场供不应求，但后来中国服装商人移民到马达加斯加，提供更便宜和更多的产品，令许多本地人放弃这门生意。

他听取了一个顾客的意见后，转行买卖海鲜干货（显然是鱼翅，被人们认为是壮阳补品），短期内成功了。然而，中国人很快意识到本地人对这些商品很感兴趣，也开始进口这些产品，结果他又一次被迫找另一种贸易商品。一个朋友介绍他加入宝石产业，从非洲带蓝宝石进入中国，这是一个中国人还未开发的市场，不过他们可能迟早也会打进来的。

一位非洲商人告诉我：“中国人十分聪明。如果你两三次把货物送到同一个非洲地址，他们就会记下来，然后派公司代表去那个地方，以比你更便宜的价格销售商品过去。”最终，重庆大厦的非洲商人与中国商人及公司进行竞争，中国人会获胜，不过这种况还未发生而已。

海关险境

商人一回到祖国，海关官员成为他们面对的主要问题，也是他们获利的最大障碍。^①

一些大商人——他们做一种货品类型的贸易，货物价值在托运证明上有正式记载——多多少少能合法通过不同国家的海关，不需要进行贿赂。不过以发达世界的标准，有时即便对这些商人也要采取特别措施。一个坦桑尼亚商人告诉我：“把集装箱整夜打开，放在一边，绝对是疯狂的行为，因为你再也见不到任何东西了。我有一次尝试解决所有问题，甚至包括付钱给加班的海关官员，我必须站在那里，直到他们全部做完检查，结果他们还是慢悠悠的。”他为货物付了12%的标准关税。

其他商人，特别是贸易不同商品的商人，除了贿赂别无选择。一个来自西非的商人说：

如果我交关税，可能失去所有利润，所以我不能全交。如果你买了100个手机，必须交50%的税，那还不如把两个手机作为礼物送给海关人员。你必须非法行事，别无选择，这是唯一出路。我有一个朋友，他父亲是政府部长，所以他买任何东西都不用交税，就是因为有一个在政府上班的父亲。假设某人

^① 见 Chalfin 2004。

是部长的儿子，那么没人敢惹他……有时海关人员来到我的店铺，说：‘哦，这个手机多少钱？’因为他们想要钱了。你没办法阻止他们，如果不给他们钱，他们就会滋扰你，所以你得贿赂他们。你回国后，非洲的海关不像香港或美国海关，他们什么都要检查一番。他们永远想要金钱，所以最好给他们一点礼物。

他向我展示了一系列钱包皮夹和手机，他用这些作为礼物，有些送给姐妹，其他则送给海关官员。他说，这就是他的国家运作的规则。

他认为腐败与人脉关系相辅相成，也就是说，一个商人的人际关系越好，他就越不会受到海关人员的骚扰。如果海关中有人向他寻求过多的钱财，他就会找到高一级人脉以缓和局势。另一位来自东非的商人提到，他必须托运五十公斤的货物作为礼物送出去，因为有太多政府部长和官员想从他那里要东西。他带回去许多西装——他瞄了我一眼，立刻能说出我的腰围，准确无误。

贿赂的方法有好几种。在一些地方，比如刚果金沙萨，商人只需分出一些钱财和货物，作为过海关的费用或是贿赂。这种行为在其他地方必须更加隐晦。在尼日利亚，机场的官员经常暗示商人把行贿财物放在指定地点，以便于他们能在商人离开后拿到，不让他人起疑。由于法律的执行越来越严格，这种相对间接行贿的方式更安全，也不会留下太多罪证。

在某些国家，包括一些非洲国家，商人仅仅被看作是提供

礼物和金钱的来源，能填满某些人的口袋。国家税务部门的官员除了获得海关的正式薪水外，也能拿到一些更私人的礼物。在其他一些国家，商人或许会因为国家问题遭遇不好的待遇：他们被认为损害了祖国本土产业。

这种情况在印度也存在，在尼日利亚也如此。带我去印度的临时工，在行李箱中携带中国制造的服装，海关人员就鄙视这些人。加尔各答的海关只在下午两点至五点允许商人及其货物通过，其他到达的旅客优先通过。如我在第二章的讨论，商人们有时要日复一日来往于家和机场之间，等待海关官员最终屈尊处理他们的案件，好像是等待官僚的恩惠。这不仅仅体现在服装贸易，一个买卖电子产品的印度商人说：“你带来任何电子产品，他们会试用，并要你交税，尽管印度没有什么说得出来的电子工业。这是几十年前社会主义和保护主义政府的遗留问题。”

为促进本土服装产业的发展，尼日利亚政府已经禁止所有服装进口，但却导致所有尼日利亚的衣服通过走私入境，令所有商人变成非法人士。这是许多国家自由贸易学说反对保护主义的一个理由，《经济学人》等报刊也谴责这一现象，提倡高于一切的开放市场，这种观点直接影响到商人生活。

一旦商人回到祖国，就会踏上不同的路途。我们很难知道其中的细节，因为我的研究主题是人而非商品，我认识的人往往不过是一个复杂分销链上的一个节点。遗憾的是，我未能一路追踪一个商品，从中国南部的产地一直到它在非洲或南亚的消费者家中，我知道许多商人完全不清楚他们卖的商品的最终

去向。以上所述的印度商人只是把服装打包，带到加尔各答机场，递给在那等待的批发商并拿到酬劳，我只知道“服装被卖到印度的各个市场”。尼日利亚手机商贩经常把托运的货品卖给拉各斯的手手机市场中心；通常情况下，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那些手机零售商，质量不好的手机也不再与他们有任何关系。我认识的许多商人属于一个较大的实体，要么是商人的非正式团体，他们为“老板”买货，要么属于更加正式的公司，多少受到一定保护，个人不需承担直接风险。

另一方面，有的商人直接面向零售顾客做商品销售。我曾经与赞比亚的服装商交谈，他把衣服分成几包，然后乘巴士去村庄里贩卖，他说：“时间掌握得必须恰当——必须要在农收之后，那时人们兜里有钱。”有时他以物换物，以衣服换来人们农收的食物。不过他现在在卢萨卡开了一家商店，所有村里的批发商来他那里买东西。

的确，曾与我交谈的许多商人在市区都有商铺，地点包括内罗毕、阿克拉、达累斯萨拉姆或坎帕拉，他们购买的货品放在自己的商铺里。毛里求斯一家电子商店的老板说，顾客都明白他远赴国外进货，他们都想从他那里拿到最新款的产品，因此等待他归来。他告诉我，前一天打电话给毛里求斯的妻子，妻子说：“这里的客人都想见你，你为什么不改一下航班？不要星期四才回来，明天就回来吧。”

通常的规则是，贸易的性质越个体、规模越小，风险就越大，因为海关可能针对剥削缺乏人脉的商人，也因为国内外全球市场不可预见的变幻，很容易击垮那些没有公司或赞助商的

商人。我遇过一个尼日利亚商人，他被2007年12月20日的一场火灾击垮了，火灾可能由一个地产业的投机分子纵火导致，当时拉各斯最大的服装市场被夷为平地。由于他的买家主要活跃于那个市场，他们也失去了大部分的钱和货物，他突然发现没有买家会买他在香港的服装，于是瞬间一贫如洗。我提到过一些商人受到签证的挫败，或因为2008年底经济萧条造成货币兑换率的动荡而受到打击。他们所遇到的问题也许也发生在高端全球化的商人身上，但是低端全球化的这些草根战斗者要面对更高的风险。

这里有几个我在重庆大厦遇见的商人的口述故事。

James Frimpong

我曾经做手机进口的生意，但由于市场过剩，没再继续做了。现在我买卖电子产品，特别是电脑配件，比如硬盘和接线电缆。我是加纳人，在加纳拥有一家大型鞋厂，但是也没有做下去。我的妻子是加纳和德国混血，她过去十七年生活在德国。我仍然考虑是否应该去德国生活，现在已经开始寻找相关机遇。

我已经来过香港四五次，加起来不过一年而已。我一直是生意人，买卖过咖啡，在尼日利亚生活了数年，还做过鞋业生意。作为一个商人，总会有风险，但是我能计算风险，我会根据价格因素改变买卖的产品。上一次旅程中，我购买了一些女性用的手帕，特别是给穆斯林的，手帕的平均价格是9元人民

币，只比1美元多一点。在我家乡，它能卖到5美元，差价很大。我走访加纳的市场，询问一些商品的价钱，发现市场需求手帕和可系在腰上的围巾。我从不依赖单一商品，而是根据见到的市场需求不断变化策略。我不卖东西给市场里的零售商，而是直接卖东西给消费者，货物就很快脱销了。我曾经在旅行中损失金钱，有一次，我发现有人大甩卖我正在卖的一种商品，结果我也被迫以他们的价格出售商品。

不，我一般看不出自己买的商品是不是仿冒品，但是我可以根据价格判断它是不是。年轻的商人不懂规则，他们不知道怎样玩这个游戏，所以才惹上麻烦。你可以去加纳任何一个有领事馆的地方，查查贸易条例上进口货品的税款细则。但是大部分年轻人不这么做——他们单是把东西拿回来，根本不考虑要付什么税款，这就是问题所在——这些人接着也许要行贿或者做其他事情，以便不用支付所要求的税款。对我来说，这很简单，因为我已经有一张携带物件的清单，而且事先查看了条例，知道自己要付多少钱。

我到香港的时候，一般想留在重庆大厦，这个地方有许多非洲人。这里是香港的心脏，活动在这里进行。你在这见到和你一样的人，可以获取大量信息。如果你和华人打交道，可能会被欺骗，但是别人会给你提醒：“喂，小心……。”中国内地的种族歧视情况比香港严重，那里有一些非常愚蠢的人，我是说真的！你坐在公交车上，有时没人坐你旁边，这种情况在香港发生过几次，但在中国内地，那个座位就像真空了一样。他们对你没有任何尊重可言，但这对我不构成问题：我做完生意就离

开，不允许因为某些事情贬低自己。

我母亲有九个孩子，父亲在另一个婚姻中有另外三个孩子。其中两个小孩在意大利，一个在南非，三个在美国，三个在加纳——没错，我们散布在世界各地。我不常见到他们，但是我们用电话联系彼此。合法居住在美国的兄弟姐妹各自有绿卡，一个曾经在新泽西的石油公司工作，还有机械工程的文凭，现在他在加纳是一位大人物。我还有一个兄弟正尝试在意大利开电台。我们过得都不错，对，任何地方都可以是家，只要我们能在那里赚到钱。我父亲上世纪四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在伦敦生活，我们从他那里继承了探险的爱好！我离开加纳的时间比其他人的晚得多。我爷爷是加纳引进现代制鞋技术的第一人，他还帮助我父亲拿到攻读皮革制造的奖学金，这也就是我做的行业。

人生的变化好比海岸线，你可能今天境况好，明天又差了。我曾经出口咖啡豆到欧洲，生意蒸蒸日上，还借了一大笔款项用于扩展生意，但是那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咖啡豆市场价格崩溃了。我失去了这笔生意，用了四年才还清债务；银行当时要拍卖我的物业。我现在的人生过得很好，全仰仗父亲。我在加纳不算特别富裕，许多人比我过得更富足，我还要工作。做生意有风险，就像人生。所有人的人生都有风险，你必须做好功课，探究一切事物。

Ernest Msika

我来自坦桑尼亚，在过去五年中不断造访香港和中国内地。我做建筑材料贸易，因为我的国家现在正在迅速发展建筑业。坦桑尼亚政府对工厂管理不善，生产的商品质量不好，价格却很高。我们的经济在1995年到1996年开始逐渐对外开放：政府那时决定允许人民从商。屋顶材料、用于抹墙的水泥、瓷砖瓦、石膏板——我从中国进口这些产品。

不，我没在坦桑尼亚见过海关官员秘密收取贿赂。我把货物从中国运出之前，邀请他们的一个驻华人员对货物进行检查，确认实际价值。达累斯萨拉姆的海关人员接受处理，进行检查的公司也证实物品价值，就没有问题了。大部分情况下，那些有欺诈行为的商人会惹来麻烦。如果你欺骗他人，一旦海关人员发现了，就会利用这个机会从你这里捞钱。但是如果你申报自己的货品——比如三百平方米砖瓦，检查后确实是三百平方米的砖瓦——一切很清楚，就不会有麻烦。

现在的东非——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你可以事先计算货品关税。不过，我的西非朋友总是告诉我他们不这么做，他们无法提前计算。上星期，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去了刚果的金沙萨，结果不用付任何关税——他到达机场的时候，一位海关人员也没有。但是在另一个场合，他为价值2,000美元的货物缴纳了4,000美元关税，他根本没办法计这笔帐。

不过你要知道，这世界上大部分商人都不喜欢交税，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取得更多利润。多数在发牢骚的商人做的都是小生意——他们把货物混杂在一起，比如五十个手机和二十条牛仔裤。这让人很难计算他们要交的税款，海关人员对此很头痛，因为他必须计算每一样物件。大部分做小生意的商人不花时间研究此事，仿佛他们单凭运气做生意：“如果我能通过海关，那就谢天谢地！如果我被堵住了，这一天运气就很差。”他们不知道自己应该付多少钱。海关人员和这些小商贩之间有很多贿赂问题。

这些小商人的数量减少了，因为大商人对市场的控制力量越来越大。大商人不需要担心能不能把三四个手机卖出去，你的贸易规模越庞大，越不会担心固定成本，比如交通。而且，这些巨头比任何其他人更会逃税，比如，他们能拿到一个集装箱，买下一部二手汽车，将其油箱切掉，塞满手机；不会有人检查这个地方，海关人员将只看到一部汽车。小商人必须携带手机上飞机，而机场的海关人员很容易发现他们。没错，我做的每件事情都合法，所以我不怕跟你说话。我们昨天交谈之后，有一个人跑过来跟我说：“你认识那个男人吗？他问了你好多问题。”

中国内地有语言交流的问题。我参加过一个为期两个月的中文课程，会说普通话。我决定将中国作为今后十到十五年做生意的第二个家。然而，我仍然强烈感觉到坦桑尼亚才是真正的家，我想为社会作贡献，改变它。香港的人们辛勤工作，看看香港现在是什么样子！我总是告诉非洲同胞：“如果你逃离家乡，那还有谁来建设非洲？”他们总是爱抱怨。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喜欢抱怨，不作任何贡献来建设家园。我在英国和美国有朋友——

我告诉他们：“如果我们联手起来，可以做出一些改变，可以做点什么！”是的，政府可能很差劲，但是政府也是由人操控的。

在香港海关，他们常常从人群里叫非洲人出来，搜查他们。这种事情在我上次来香港的时候发生了，我跟海关人员说：“你以为我很笨吗？如果我要走私毒品，就不会把它们放在行李中，只要找一个华裔女孩带进来就可以了。”

Kofi Nyame

我来自加纳，已经来过香港四次。有时候我可以赚到50%的利润，也有时候一点也赚不到，但是我至少总能捞回成本。有时，你会在加纳的海港或机场被截停下来——你的货物价值可能遭受损失。有的人想要欺骗海关，如果你骗了他们并被发现，就会有麻烦。不过如果你合法行事，货品关税有时又比较高。

如果我要做个抉择，我更想骗他们。但有时比较难，因为那里不只一个人——那里也许有两个、三个或四个人，所以不容易行贿。不过有时也是可能的。加纳的法律很严格，但总有一些人愿意收取贿赂。如果你有一个集装箱，很难越过海关。你可以贬低申报货物的价值，但是你不能让整个集装箱躲过检查！

我买卖电子产品，包括荧光灯管和配件。我不一定要回到香港和中国内地——可以聘请一个代理人去付账。对，我可以信任代理人——他是华人，与非洲人一起做事，当然也是一个代理人——如果他们想操控你，他们完全可以！如果我有流动

资金，就购买手机；手机卖得很快，两三个星期就能清货，我就能做其他事了。我有时卖东西给店铺，但也有时候卖给街头小贩。我尝试自己谋生，但必须环顾四周寻找能让我营生的东西，探索任何可能的收入来源。

我毕业于1994年，接着到以色列做体力劳动，在那里生活了一些年。但是我不想留在那里——他们不是我的同胞，我也不喜欢留在别人的国家。以色列的薪水高得多，我在那里做体力劳动赚钱，但在加纳做正经工作却赚不到钱，所以我闭着眼睛在以色列工作。我能在加纳找到更好的工作，但那时我们受到军队统治，生活很艰难，现在就好多了。我现在才开始旅行，因为要赚钱。

没错，我在香港住在重庆大厦。旅店十分昂贵——我必须每晚支付100至120港币，食物另计。所以我留宿五天或一个星期，然后就必须回去。我认为香港是一个有许多各地人聚集的都市，但在重庆大厦，非洲人去固定的地方、固定的旅馆，印度人则去另外一些地方——情况就是如此。

我每次来这里，身上都有现金。一般来说，一个非洲商人可能携带5,000至20,000美元钞票。也有一些大商人，购买许多箱货品运回去——他们通过银行付账。有一些人在旅店要两张床，两个人睡。但我不喜欢这样，我要一间单人床房间，如果有两个人，你不知道是否能信任他们。我的钱从未被偷过，有人说在中国内地，小偷会骑摩托车抢包，你一定要小心。我已经多次听说中国内地发生这种事，在香港就不会发生。

我在加纳建了一座房子，有两个正在上学的小孩。没

错，加纳是我的家，没有其他地方像家一样。非洲人就像犹太人——不论我身在何方，我仍然是非洲人。第一，我是加纳人；第二，我是阿散蒂人。我把其他阿散蒂人看作自己的弟兄，但在国外我是加纳人，正如出了英国的苏格兰人一样。我为自己是加纳人而自豪。如果你来非洲，加纳应该是第一站，其他非洲人把我们看作是标兵。我们非洲人一定要集中力量发展我们非洲中国内地，这里有太多污名和困境，只有我们自己能克服。所以即便我离开家乡这么远，我还是想回去。我为自己和身负的文化、祖国而自豪，为自己是非洲人和加纳人而骄傲。

Abraham Idowu

我是尼日利亚人，一半时间在广州，一半时间在拉各斯，我来香港是为了处理签证。我去过世界各地，但没有一个地方像重庆大厦一样。重庆大厦是一个混合体，每个人都可以来。我第一次来重庆大厦的时候，有些生意伙伴问我：“你在那个地方做什么？那是一个贫民窟。”

我在2004年第一次离开尼日利亚，到中国做贸易。在那之前，我获得了硕士学位，在尼日利亚的一家银行工作了八个月，但我不安于现状，不想每天都做一样的事情。当我提到中国，朋友们问：“中国？你要在那里做什么？”我了解到一些廉价商品的信息，和一个较有经验的朋友一起来中国，我一到这

里就不知不觉爱上中国了。在那之后，我从未回头，一路向前。刚开始我在语言沟通上遇到问题，找了一位翻译。有一些卖东西给我的中国人告诉我，我不需要翻译，因为她多拿了回扣。现在我使用翻译软件，已经足够。他们笑话我会说的一点中文，不过这些中文也够用了。

我给尼日利亚政府供应电脑。至于配件，我当然订做仿冒品。不过大单生意，也就是电脑，我从不求次，如果电脑坏了或是不好用了，政府人员就会很生气！这样对生意不利。我不是主要的电脑供应商，不过是个小商人。在尼日利亚，一般大人物才能拿到合同，然后会把一小部分卖给他人，你必须做好，他下次才会再给你多些生意。我在这个年纪算成功吗？我已经尽力而为了，我很幸运，已经开始得到正确的信息。假设我惹上麻烦，可以打电话找人帮忙，人脉可以是素未相识的人，比如说一个朋友的舅父。由于你的朋友认识你，所以他可以替你做主。部落也有一定帮助，到处都可以帮忙。

尼日利亚的新政府尝试摒除贪污腐败。与其要行贿，为什么不付应给的钱回馈社会？但是贪污不可避免。我托运电脑给尼日利亚政府，要为货物支付5%的关税，但是我不能单托运一样货物，我不申报电脑以外的其他商品，因为申报商品就要缴关税给政府。然而，如果海关见到你不申报，腐败就溜进来了，也许他们要一些给朋友的礼物——海关人员也许见到我的衣服和西装，说：“我想要三件这些衣服。”如果你申报了一件商品，它可能被认作是假冒伪劣，你不能带回国，所以必须把它藏在托运物件中。

我生意中最困难的事情就是和海关打交道，有的海关人员要拿 50 美元，也有的要 200 美元或 1,000 美元；有的需要一件西装，有的要鞋子，之后才执行公务。他们会说“我特别喜欢手表”，或“我没有皮带”——你就知道他们要拿什么东西了。这是一种公关，能让他们记住你的名字——当政府开始收紧政策，你可以打电话给他们，他们会帮助你。我提前打电话告诉他们：“我这个星期六回国。”如果那里有麻烦，他们会说：“这次不要飞回来。”没错，这是腐败，但是他们不称之为腐败，而是还一个人情。从 30 美元利润的货品中，政府要抽 10 美元的税；海关人员拿 10 美元放在自己的兜里，而我也就得到 10 美元利润。

中国令世界各地的工厂纷纷倒闭，因为这里制造的商品太便宜了。尼日利亚制造产品的成本比进口商品还贵。比如你要在尼日利亚买柴油机，价格太高了，为什么还浪费时间和金钱买那些？还不如出国，中国可以在几星期内制造出你想要的产品。这样做很疯狂，但确实更便宜。

我还没结婚，也许明年会结婚，我不知道会娶谁。中国女孩太情绪化，她们不相信自己的男人。如果我要结婚，我想娶一位旅行者，她不一定要是尼日利亚人，可以是任何一个人。我爱我的国家，我希望事物变得更美好，政府也能更有责任感。不过，我认为自己是一个黑皮肤的中国人——我不介意接下来的二十年生活在中国，我可以适应任何地方！

我在中国总是很忙，有许多想办事的人打电话给我。在非洲，我们看重家庭关系，如果某人想办事，他通过熟人找你帮

忙，可能是通过你的姐妹、母亲、兄弟或父亲，你就必须帮忙。我很喜欢香港，因为不需要跟那些打电话到中国内地找我的人打交道，我告诉他们：“不好意思，我在香港，现在真的没办法帮你。”尼日利亚的事情太多了，要四处奔波，到不同办公室拿文件等等，最费时间的就是交通堵塞。我太累了，只有在香港才不累。

商品和商人的意义

这些商人之所以存在，正因为他们离开祖国后跨越半个地球，能在中国购买到更便宜的商品，比如建材、家具、服装、电子产品和手机，即便要加上机票、货运和海关费用。与我交谈过的商人，比如 Abraham Idowu，提起他们国家的电力系统很不可靠，或是税收过高，以及“没有人信任非洲制造的产品，产品必须来自国外”，因此商人的行为非常合理，他们至少在家乡能有很舒适的生活。

然而，另一些商人在这个问题上更多是哀叹非洲本身，正如另一位尼日利亚商人所说：“为什么我的祖国不为人民制造任何东西？为什么电力系统这么不可依赖？为什么我的国家拥有那么多自然资源，却仍然穷困潦倒？非洲出了什么问题？”他苦闷地发问，他的答案是这是殖民的遗留问题，尽管他也知道殖民主义在五十年前已经终结。“为什么我们如今的领导者如此差劲？为何有那么多腐败问题？”他无法回答这些问题。

我经常问非洲商人及官员，商人对于他们的消费者和祖国起到正面还是负面影响，他们是否仅仅用质量低劣的商品欺骗消费者。有些商人承认有剥削行为，一个西非商人告诉我：“我替住在城市的家人朋友买来质量好的手机，但是我把廉价仿冒品卖给村民，反正他们也不知道有更好的东西。”一位非洲商业官员直截了当地评价道：“这些商人是罪犯，他们没有帮助买他

们产品的非洲人民，基本上只是在欺骗顾客。货币流失出去了，买来这些质量低劣的产品。”一位对贸易颇有见地的东非立法委员向我说了下面一段话：

我保守估计，大约 65% 到中国贸易的商人有欺诈行为。他们总是尝试逾越国家系统，避免缴纳关税，造成社会问题。当他们到达市场，就利用消费者的无知，不告诉他们那些产品是仿冒伪劣或二手产品，还是按照原价销售。一个稍有点知识的顾客会知道拿到的诺基亚手机不是原产品，但是无知的顾客会直接买下来。两个星期后，手机耳筒坏了，然后你要花费 5 美元维修；又过了两个星期，话筒也坏了，再次花掉你 10 美元；一个月后，手机电池用尽，你必须付 15 美元……本质上，你已经买了两次手机，相当于质量好的原产手机的价钱。

无疑，这常常是事实，但也许只反映了事情的一面。许多商人表示，不论他们如何赚钱，还是远远比不上他们国家政府无止境腐败的数额。即便他们带回的商品是仿冒品，尽管大部分都是廉价货，也不一定全部质量低下。大多数仿冒品能正常运作一段时间，特别是服装、大多数手机及电子产品，高质量仿冒品往往与原产品不相上下，而且价格只有原产品的一小部

分而已。^① 他们的消费者同胞为这些货品付出价钱，反映了商人的全球路径及他们追求利润所产生的成本，不过，因商人数量众多，相互竞争压低了他们在许多方面给出的售价。

我见过的大多数商人认为，他们基本上扮演了积极的角色。这并不让人意外，这些人事实上在维护自己的生计，他们的理由不一定没有价值。一位加纳手机商人说：“我们通过贸易给祖国做贡献，过去只有很少加纳人有手机，但是现在每个人都有了，因为我们给他们带来了手机。”一个知识分子型的刚果商人认为，像他一样的商人们“扩展了穷人的想象”，通过向他们展示什么是高质量的商品——给他们看到美好事物，让他们不再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的周遭必须是破烂不堪的。一个自省过的肯尼亚商人告诉我：“在我祖国，没人能买到正牌西装，或是著名企业制造的原产手机，它们太贵了。不过，这些仿冒品可以向他们展示好的东西。商人在把世界带到非洲，把好的事物带回家！”

① 原产商如何看待仿冒品？一位诺基亚公司的职员私下告诉我，诺基亚也许并不反对他人仿冒其手机产品，因为仿冒品消费者现在买不起原产品，只能望梅止渴，如果他们以后的消费水平能满足购买欲望，可能最终促使他们购买真货。这个问题很复杂，如果仿冒手机被当做原产品销售，诺基亚和三星等公司完全可以反对这种行为，因为仿冒品损害了其品牌形象。然而，如果仿冒品被作为仿冒产品销售，就没有那么多理由反对。Jose Rojas 与一个贩卖正牌诺基亚的尼日利亚手机商交谈，问他关于市场里销售的仿冒手机，据说消费者十分清楚买到的是什么货色，几乎从不混淆仿冒手机和正牌手机。不过另一方面，我在一个东非城市与一位诺基亚手机商聊天，他恼怒于有许多顾客拿着仿冒手机到他的店铺寻求维修服务，他认为那些人根本分不清仿冒手机和正牌手机。在 2007 年和 2009 年，诺基亚开始对重庆大厦中售卖仿冒诺基亚手机的商店采取法律行动，至少摆出官方态度，即诺基亚公司不会对仿冒其产品的行为坐视不理。

不论是好是坏，确实是这一批商人及其商品通过中国内地和香港，把世界带到非洲。按照商人的说法，尽管中国产品遭到一些商人和海关人员的轻视，但它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即便许多产品质量低劣，但它让贫困的非洲社会尝到非洲以外大千世界的味道，虽然是仿冒的、残缺的或二手的，它仍然是外界的真实滋味。这就是商人的终极意义：他们至少将全球美好事物的摹本，带到了世界上最贫穷的中国内地。

这些商人的未来也许会受到局限，正如我之前的讨论，中国公司正在进驻许多非洲国家，在未来十年或二十年内可能逐渐代替这群商人。学者们早已有长篇论述中非之间不断增长的贸易和政治关系^①，渐渐地，这不仅是政府或大型企业关心的事，还牵涉到中国小型企业以及个体商人。中国进入非洲，象征着一个重要的全球趋势：中国逐渐取代西方，特别是取代非洲过往的欧洲殖民统治者，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主要贸易伙伴及赞助方。

从一个更加微观的角度来看，身在非洲的中国人，因为他们拥有资金和规模的优势，很可能会渐渐取代来中国的非洲人。当非洲最后完全融入全球环境的时候，也许不再需要非洲商人来往于非洲与中国之间。但就现在而言，这些商人如同骆驼队，或昔时的商船（当然现在迅速很多），把中国制造的全球商品带回祖国。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令发展中世界全球化的马可·波罗。

^① Alden 2007 ; Rotberg 2008 ; Tull 2006。

法律

law



无处不在的法律阴影

正如我们所见，如果重庆大厦门口没有商品进出，它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屹立在此。然而，那些商品贸易违反了背后的一整套法律系统，逾越法网需要承担一定风险。餐厅经理为重庆大厦的不法形象而担忧，持旅游签证的非法劳工希望被看做是普通游客，商人带着可能被缴获的仿冒商品，游客担心兜里现金的安全，还有这章的焦点，即避难者渴望在异国寻求家园，以上皆昭示着重庆大厦中存在的法律体制，它表现在治安方面，无处不在。

毒贩经常被逮捕，惯偷也会受到起诉，逾期逗留人士也许要入狱，在重庆大厦门口走道上兜售仿冒手表的小贩偶尔会被起诉，性工作者也如此。但总而言之，香港社会对这些生意和工人来说相对安全，他们可以在法律之外做他们要做的事情。对于大部分低端小商贩，如果他们在全球各种事务上完全遵纪守法，那么无疑是经济自杀——法律限制了他们旅程中迈出的每一步。对于重庆大厦的商人以及其他职业人群来说，他们至少可以忽略某些法律法规。

有一个事例让我了解到重庆大厦中法律的无处不在。在研究初期，一个报社记者联系到我，希望采访一些在重庆大厦工作的人。交谈半小时后，我信任她并提供帮助，但我接着发现在重庆大厦熟识的人没一个能接受采访，至少不能在公开姓名

的情况之下受访。有的人是避难者，他们的姓名和身份不能公开；有的是持旅游签证的非法劳工；还有一些是餐馆或旅店经理，雇佣了非法劳工，有的无牌经营生意，或是触犯了一些杂七杂八的条例，可能会被人发觉，所以也不能公开姓名，也不可被引用。没人愿意谈话被记录下来，这也许更让这位记者加深了“重庆大厦是藏污纳垢之处”的印象。

读者应该已经非常清楚，重庆大厦并非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我的采访对象触犯法律，与其说是道德问题，不如说是法律技术问题。富裕的店主和经理严重压榨贫穷的工人，但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重庆大厦中，还发生在香港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重庆大厦的角落里存在着严重的不公正：我曾在混乱中目睹一位印度尼西亚佣人丢了工作，因为她被要求提供性服务给出价最高的客人。我曾经在被人推开之前，与一位被老板当奴隶使唤的巴基斯坦避难者聊天，他害怕自己一旦略有声张，就会被送到警察局遣返回国。我还见过一位非洲人喝完饮品后不省人事，然后被一个认为受到侮辱的尼泊尔人用木棍不停击打头部。不过这些都是例外，重庆大厦大致是一个文明、和平，甚至是有道德的地方。

我认为这有可能归功于伊斯兰教，它延伸出各种规矩，管理着重庆大厦的人口，加上香港本身对多元文化的宽容，阻止了从巴基斯坦等地带来的对非伊斯兰信徒的不容忍态度。我也相信这归功于香港政府的新自由主义——它对商业的重视大于一切——而我认为这对大厦有很大的正面影响。再次重申，我

的采访对象所参与的非法活动是技术问题，而不应是道德问题。不过，这些非法行为塑造了他们日常生活的环境，提醒着他们要小心什么，就法律对他们人生的潜在威胁而言，他们不能忘记法律。

法律界线里外的冲突

重庆大厦中较为有趣的一面是，生意大多不受警方干预。事实上，警察总在重庆大厦附近的某处，一旦发生公开抢劫或暴力事件，他们就立刻现身。但是据我在重庆大厦看到的许多冲突事件来看，警察活动显然被排除在外，或者毫无用处。

确实，法律不是只为那些满腹抱怨的人服务，我知道的好几宗个案中，重庆大厦的业主将争论搬上小额索赔法院，但并不常见。除了重庆大厦业主以外，重庆大厦很少有人会到法院寻求判决，一个原因在于买卖双方可能都不是香港居民，另一个原因是重庆大厦中的交易有时根本没有文本记录。

一个印度背景的销售商（同时长期以来也是香港居民），告诉我他遭遇的麻烦事：他去年从香港华裔朋友那里借了钱，与一位东非商人合伙投资，非洲人卷走了他的钱，他有那个人在非洲的手机号码，但是电话打过去后，接听的人说：“不好意思，他不在家。”后来回答变成：“他不见了，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这个印度人在中国新年时见到了香港华裔朋友，这时按传统应该还清债务，他被提醒仍未还钱。他现在一想起自己还没还欠人家的钱，感觉糟糕透顶。他告诉我：“我已经吸取了教训，我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好人，但是我明白自己不能再做好人了。”

鉴于重庆大厦内，许多商人来港一两次或五六次后便不再

出现，无疑有许多欠债不还的现象。正如第二章的 Ahmed，他所有钱财都被生意伙伴卷走了，他对此却无能为力——法律和警方都不能帮他讨回损失的金钱。

我与在重庆大厦管理小食摊的巴基斯坦店主共进晚餐，他向我讲述了一件发生在 2005 年的令人费解的事件：他投资了 120 万港币，与重庆大厦另外一个巴基斯坦店主一起做生意，那位店主偿还了 5 万港币，然后在接下来的一次会面中，给他了一张后来被退回的 120 万港币支票。债务人逃走了，店主再也没见过他，他首先去找了香港警方，他们说：“我们不能干预，这是一宗民事案件。”后来他去找了律师，律师说：“你必须预付 10 万港币，还不一定能赢这个官司。”

他说自己认识几个人愿意去巴基斯坦杀掉那个欠债人，他也知道那个人身在何方，并且发现负债人的父亲已经与那个人断绝父子关系，以免为儿子的巨额债务负责。巴基斯坦店主说：“我不想杀他，但只想绑架他，然后把我的钱要回来，之后再考虑如何处置那个人。”他去巴基斯坦，用了三个月寻找那个人，但是一无所获。他说在那段期间，自己在重庆大厦的餐馆损失了 40 万港币，血压升高导致心脏病突发。医生告诉他：“你不要想这么多这种事情，对你身体不好！”他仍然受这股怒气的侵蚀，但是他告诉我自己不至于做出杀人的犯罪行为：“尽管我可以轻而易举雇凶杀掉他和他父亲，但是那样我就拿不回钱了，我要把钱追回来！”

另一个事件的最终结局较为和睦，是我最喜欢的巴基斯坦小食摊暂停营业时得知的。几天前，一群巴基斯坦男人走进

小食摊点菜，没有付钱，香港警察被叫了过来，威胁要逮捕那些男人，所以那些人最后还是付了钱。但是几小时后，他们又回来吃东西，再次拒绝付钱，我的那位厨师朋友抱怨起来，他们抓起一个啤酒瓶砸向他头顶，而且袭击了一个餐馆托儿。我的这位厨师朋友不愿让警察介入，因为他害怕警察会发现他的托儿是非法劳工，于是选择了用亲戚关系解决争端。他认识的一个熟人是那帮袭击者其中一个人的叔叔，那帮人在这位叔叔的陪同下回到餐厅，并说不会再骚扰他了。他觉得这种解决方式比法律措施更安全，而且后来那些人再没滋扰他（不过几个月后，这个餐厅被毗邻的餐馆买了下来，所以我就再没见到他了）。

我另外一个朋友是印度旁遮普的锡克人，他与一个故事有关：他手机店的走廊对面，有一间有竞争关系的手机店，由一个巴基斯坦的穆斯林经营。巴基斯坦人常常召唤锡克人的顾客：“来这里！我们会给你更好的价钱。”他对此的回应是降低价格——他说对每个 500 港币批发的手机，他开始只收 510 港币。接着对方又威胁他，威胁他店铺里的基督教妻子，那些人心怀不轨地接近他的妻子，拍下照片。他告诉我，他曾向那群人挑衅刀战，结果对方找来警方审问他。他知道巴基斯坦店铺有非法用工，所以将此事告知警察，但是警察到访时那些非法工人不在店内，巴基斯坦人清楚他可能以此报复，于是给工人们放假了。

几个月后，巴基斯坦店主给他捎来了一些糖果，明显想达成和解，但他拒绝吃糖，说：“我不知道糖里有什么东西，也许

他们想向我下毒！”这名锡克人最终向距离十英尺的对手表明：“不要报警，让我们用宗教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一起去你穆斯林的庙宇和我的锡克庙宇，我们与那里的权威人士谈话，听取他们的裁定。这就是我们解决矛盾的方法，你可以带上我的小儿子，我带上你的小儿子，然后一起去彼此的庙宇。”虽然这个提议未得到执行，但大致上化解了困局。这种紧张关系到底来源于宗教，还是以宗教作掩饰的商业冲突，尚无定论（虽然我猜想是后者）。无论如何，宗教被认为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因素，而非警察或法庭。

当法律被真正调用的时候，它也许对那些寻求其帮助的人并无效用。我认识一位南亚店主，他在重庆大厦的后巷遭到几个南亚男人的袭击，他们挥舞曲棍球棒将他打至重伤，需要入院治疗。他要求警方逮捕打伤他的人，警察拘留了那些人，但由于他口说无凭，也没有目击者愿意作证，警方释放了袭击者，他激动地说：

他们怎么能放那些人走？他们曾要杀我！他们有可能再回来的！香港法律没用，警察说无法使用我的证词：“我们需要相片或监视录像作为证据。”有人犯法，我可以指出是谁把我打伤，我认得出他们，但警方不帮我。

在个人角度来说，他有理由对此生气，但从法律上讲，他除了证词及伤口外没有证据，所以警察无法将案件提交法庭。我听说袭击他的主脑人物最终被遣返回尼泊尔，但是他对法律

没能惩戒袭击者的事实深感不快。

我认识的商人中，几乎无一人寻求法律解决商业争端，部分原因在于商人们在港逗留时间很短，不可能打官司。此外，如果这些商人买了仿冒品，他们已经处于法律暗区。并且，商人有时要以造成最低影响的方式，卖冒牌货给客人，即便受骗了，仍然可以避免经济损失。最后，许多商人并不知道自己被骗了。

总而言之，除非金钱被直接偷走，没人会呼叫警察。一个商人告诉我，他曾经在预订的600个手机上损失了一大笔钱，他把自己不要的300个手机放在另一堆，区别于想要买的300个手机，两堆手机距离几英尺。店铺职员偷偷把60个有缺陷的手机放进那堆较好的手机里，他在付钱后才发现这些手机无法使用，但是他毫无办法——他甚至不肯定是不是自己被骗了，还是因为自己粗心大意。

不过，商人也会有与警方交涉的时候。尼日利亚商人依赖于非正式汇钱系统，特定的人从尼日利亚商人那里带几十万美元现金到香港，然后把钱分配给香港的收件人，并收取一定费用。一位昵称“钱主”的人是这个系统的老板，2008年他在香港的办公室遭到两个非洲男人抢劫，对方戴着头罩掩盖身份，携带着玩具手枪。事件发生之后，一群香港的尼日利亚商人立即组成队伍，搜寻罪犯，因为他们害怕这会影影响尼日利亚人在香港的形象，导致签证规管更加严格。他们在几天内就找到了被盗的钱财，还给钱主，同时还把罪犯交给警察。这个案件中，人们为了挽回尼日利亚人在香港的声誉，与香港警方合作——

尽管我后来从一位警察那里听说，将罪犯交给警方的人，其实是想替自己的违法行为寻求豁免。

我在第三章中讨论了许多商人面临的法律上最大的挑战，即从中国内地和香港运输仿冒商品，以及通过他们祖国的海关。除了较大的企业家外——大商人宣称自己完全合法，但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无疑涉足较高层次的贿赂——这种挑战法律的行为常常让商人被阴影所笼罩，由于法律或官员（不论是否贪污），商人可能瞬间损失商品或利润。这再次表现出法律的无处不在，商人的脑海里也摆脱不了，尽管这层阴影大致上不包括商人们在重庆大厦内的担忧。

结束此篇章前，我列举两个调用或规避法律的事件，二者均涉及海洛因。一位替香港入境处做翻译的非洲人，告诉我他有一次在重庆大厦附近的 7-Eleven，突然被叫去机场为一名东非女人翻译，她被抓到通过胃里藏匿安全套的方法带毒品到香港。这是他工作的一个正常部分，但这次他发现自己两个月前曾经在那间 7-Eleven 与那女人闲聊。他暗中尽力与她商议，然后才正式翻译她的话，结果她还是被判入狱十六年。

我的一位巴基斯坦朋友在重庆大厦非法打工，一天下午他惊慌失措地打电话找我，说警察逮捕了他。我当时身在大厦内，在接到电话五分钟之后立刻找到了他。大约有二十个人在警察面前站成一排，当时警察在地上发现了一包海洛因，于是将周围所有人都围捕起来。这个朋友一见到我，偷偷在我兜里塞进 12,000 港币，幸好当时未被警察发现。他担心警察搜身，会发现他本不应该有的钱财，从而将钱没收，因为他是一名非法劳

工。而我当时害怕的是，如果他的行为被警察发现，我的照片将出现在本地媒体，“大学教授在扫毒行动中被捕”。警察离开后，我向他大喊大叫了一分钟，并把钱还给了他，不过之后我们又畅怀大笑了数分钟。我非常清楚，他在非法打工，与海洛因毫无瓜葛。然而这些案件都显示，通过毒品或其他犯罪活动赚快钱的行为，总是潜伏在重庆大厦周边。

警察的角色

重庆大厦中有两个权力层，即大厦保安和警察。重庆大厦本身有一队保安，有的驻守在大厦入口附近的岗位，有的在电梯繁忙时维持排队秩序，有的在大厦周围巡逻。这些保安并不持有武器，他们的角色在于保持电梯间秩序，以及在大厦中溜达，确定没有什么地方出差错。他们偶尔阻止一些犯罪行为（一位保安在2007年获得嘉许，他阻止了一个企图行窃的嫌疑犯，嫌疑犯切断闭路电视线路，以防自己的行为被录像；保安没有报警，直接阻止其行为），一旦有严重的事情发生，他们几乎都会叫来警察。

这些保安的一个作用就是守在保安室，其中有一大面的闭路电视屏幕，监视着重庆大厦的过道和楼梯。一旦出现犯罪，闭路电视摄下的镜头就能派上用场，受害者及警察经常审查这类镜头。我听说警察每个月有四五次来到保安室，调查已经发生或潜在的犯罪行为，也有一些重庆大厦的住户这样做。这令人想起米歇尔·福柯对于圆形监狱的描述，以及杰里米·边沁想象中囚犯不断受到监视的架构，在架构中“所有人都被观察着”^①。然而，这里的人们好像很少因此有什么不同行为。没错，摄像头为重庆大厦维护了秩序，盗窃或暴力犯罪的镜头可以被

① Foucault 1995, 116-31。

调出来看，大厦中多数商人都感谢摄像头的存在，不过多数情况下摄像头都被忽视了。我有时在楼梯间路过正在打针的瘾君子，那里显然有镜头在拍摄他们，但却没有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任何影响。

直接施用法律的是警察，也许令人惊讶的是，警察也受到重庆大厦多数人的尊重，这一部分归功于警察的专业行为。有一次，我认识的一个避难者声称无缘无故被警察打伤，其他避难者警告他不要一派胡言，他们不相信他的话：“香港警察才不会那样做，你肯定是先打了警察。”这也因为香港警察与商人家乡的警察的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家乡的警察也许每天都在接受贿赂。我曾经告诉一位刚来到香港的刚果商人，即便他遇上麻烦也不能贿赂警察，他一开始不相信我说的话，贿赂对他来说是第二本能。

事实是，警察并不想涉足重庆大厦的事务，正如第一章 Andy Mok 在采访中坚持的观点。为了更加了解这方面信息，我在 2007 年用几个小时采访了一名警察。以下是他对我说的话：

Billy Zeng

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警察对重庆大厦的印象很差，因为有许多投诉来自那里。事实上在过去几年，这里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但许多年轻警察仍然认为重庆大厦很危险，因为固守旧观念的老一辈警察训练过他们。对警察来说，重庆大厦最大

的麻烦就是逾期逗留者，他们的签证早已过期，^①但这不仅仅因为他们逾期逗留香港，而是因为有坏人利用他们进行性和毒品的交易。让逾期逗留者做这些事情很容易，因为他们已经身处法律之外，不会自己跑去警察那里。

没错，有些毒贩是尼泊尔人，但他们常常雇佣逾期逗留者。一个持香港身份证的尼泊尔人也许雇佣六个逾期逗留者——这些人中很容易就能找到性工作者。对尼泊尔人瘾君子来说，问题不仅在于毒品本身。假设这些人每月领取4,000港币津贴，这些钱并不能满足毒瘾，所以他们必须尽可能拿到更多钱。上个月某天，重庆大厦内发生四起抢劫，就是这些瘾君子犯下的案子。

至于性工作者，一个基本事实是，香港警察不能随便拘捕某个站在街头的人，你只能在有人投诉后作出行动。但即便有人投诉，警察可以做的只是察看身份证件，看看这些女人是否是合法逗留香港。对于仿冒商品也是同样道理：除非有投诉，否则香港海关不会做出行动。只要欺诈行为发生在非洲，而非重庆大厦，那么警察就可能不会行动，因为要操心更迫切的事务。

在众多人群中，尼泊尔人比较容易打架，原因在于尼泊尔的文化背景，打架证明你是一个真男人。重庆大厦中的许

^① Billy所说的逾期逗留者主要是避难者。在采访当时的2007年，避难者没有法律保障，一年后他们才获得颁发文件，表明其合法避难身份。现在，虽然重庆大厦中仍然有一些逾期逗留者，大厦中几百名避难者并不在其中，他们尽管不能工作，但可以在香港合法居留，我在下文会继续讨论。

多滋扰事件似乎都与尼泊尔人有关，比他们人数还多。巴基斯坦人也爱打架，但是他们更多为个人利益打架，与面子没太大关联。

重庆大厦曾经有一些巴基斯坦团伙，数年内由一个男人领头将团伙与华人黑帮联系起来。几年前他因勒索被捕，被遣返回巴基斯坦——他走之后，再也没有团伙了。由于重庆大厦现在有一套保安系统，没有人会跳起来声称“我是重庆大厦的老大”，那不过是几年前的情况。即便是那时，他们一般也不会索取保护费，而是通过毒品等其他方式赚钱。

对，年轻警察会拘留像避难者一类的人，老一辈的警察会说：“你为什么要给我们找麻烦呢？”很多年轻警察想按规矩办事，而较年长的警察则认为罪行应该主要是谋杀、强奸、抢劫等行为，这些行为严重扰乱公众秩序。而逾期逗留等行为是非常低级别的罪行，它并没有对公众秩序造成威胁。

重庆大厦业主立案法团主席林小姐一直以来做出不少功绩，部分原因在于她在重庆大厦以外有许多人脉。她尽心帮忙将印有各种语言的传单发送出去，包括乌尔都语、印地语、法语、尼泊尔语，告诉大家：“你也是香港的一部分，所以如果发生任何犯罪事件，请上报。”保安亭有一些罪案资料表格，供人匿名填写。比如，假设一个逾期逗留者遭到雇主强奸，她就可以将这份报告交上去；也许她不想公开自己的姓名，但资料仍然会被递交给警方。由于报告是匿名的，警方不能采取行动，但是会将其记录在案，该女子填写表格匿名邮寄出去，也不会陷入危险境地。

警察每周大概接到十五宗有关重庆大厦的案件，大部分是小案件，比如投诉噪音太大，也有一些投诉逾期逗留者的案件，比如“这间餐厅的某个洗碗工肯定是逾期逗留者”。不过很多类似的投诉是虚假情报，有的顾客觉得自己被招待不周，或者在账单上有争拗，这类投诉至少有一半是虚构的。每隔一两个星期，偶尔也有抢劫和打架事件的报案。

如果避难者或任何其他人士见到警察后逃跑，那么他们一定会被抓住，所以千万不要跑！如果你只是冷静地待在那里，警察很可能不会查你的证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重庆大厦门口派发传单的餐馆托儿，需要学会如何按照香港的方式做事，而不是按印度的方式。如果你派发传单，合法性就比较模糊，大部分情况下警察会忽略此事。但如果你太咄咄逼人，扯路人的衣服，那就是个问题。

警察只在投诉基础上行事，但这条规定不适用于毒贩，警察不需要接到投诉才调查他们。很多毒贩因为互相竞争而被捕——身在不同社区的毒贩，匿名举报在重庆大厦工作的毒贩，以便甩掉竞争者。也有些情况下，便衣警察会跑来逮捕他们。

警方其实希望与非华裔人群建立良好关系。对所有这些人来说，关键在于不要害怕警察，要填写罪案资料表格，警察不会将表格置之不理，他们会有所行动。

这次采访后，我立刻遭遇了 Billy Zeng 所说的现实问题。在餐馆工作的一名巴基斯坦厨师和另一名持旅游签证的雇员遭到攻击，我从保安亭替他拿到一份罪案资料表格，但由于表格

上要求填写名字和地址，他拒绝填写。他说自己在受攻击时曾经三次打电话叫警察，但是警察根本没出现，重庆大厦的保安也没有提供援助。他对寻求警方帮助持怀疑态度，因为这只能令他的雇员陷入困境（而且我认为他作为雇主也会有危险），雇员也许因非法打工而入狱。

后来我打电话给 Billy Zeng，他很不情愿地说，警方在这些情况下不能提供帮助。尽管 Billy Zeng 有理想主义的想法，当这一间巴基斯坦餐厅受到流氓威胁时，香港警察却毫无用处。这也是这名巴基斯坦厨师不找警察的原因，而是寻求亲友的帮助——正如我们所见，他的朋友是一名袭击者的叔叔，这样就可以解决矛盾了。

各种不同类型的警察来过重庆大厦，有的是戴着警帽的普通警察，一般并不关心非法移民，而是关注诸如抢劫和袭击等罪行，以及维持公众秩序，Billy Zeng 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名。还有的警察专门寻找触犯入境条例和其他条例的人，他们头戴贝雷帽，很容易在重庆大厦引起人们的恐惧和戒心。另外也有便衣警察，主要负责搜查毒贩，但有时也逮捕在弥敦道上兜售假表的贩子和非法劳工。

我有一些兜售假表的朋友，他们教我如何辨别便衣警察，有的人还告诉我他们认得那个地区便衣警察的模样。经过他们的一番指导，我也开始能轻易认出便衣警察。我不止一次向便衣警察打招呼，他们羞怯地笑笑，这些人显然无意成为一名高超的便衣警察，不过在重庆大厦的背景下，或许也是

件好事。^①

人们对警察和重庆大厦中不同商业的非法活动抱有多种意见，这些不同意见取决于其生意与相关非法劳力市场的立场。大厦高座有好几间高级（以重庆大厦标准来看）印度餐厅，拥有大批本地香港华人顾客，其生意依赖于重庆大厦是否被本地人视为一个危险重重的大厦，还是说它被视为一个“另类且吸引人”的地方。

这些餐馆有的雇用了持旅游签证的工人或避难者，让他们做托儿、洗碗工或侍应，尽管经理大多否认此事。按一位餐馆经理的话说：“我们没有聘用任何持旅游签证的人。一旦因此被捕，店主要付 20 万港币的罚款，以及被监禁六个月。这样的风险太大，我们只会聘用本地香港人。”尽管他这么说，这间餐馆其实聘用了非法劳工。不过像他这样的餐馆经理认为，警察的存在对生意有好处。正如另外一位餐馆经理告诉我的：“我把警察看作朋友，他们为大厦的形象作出贡献，我们需要吸引本地市场，而本地市场害怕重庆大厦，警察的所作所为是好事。”

旅店老板和经理也许有不同的看法。重庆大厦在其多样文化混杂的背景下，被视为安全、干净和吸引人的地方，对于这些人来说是必要的，特别是那些较为昂贵的旅店，它们依赖于中国、日本和欧洲来的旅客人群，而不是非洲商人。不过他们

^① 在 2009 年 11 月，两个非法打工的避难者雇员在一楼餐馆被捕。我听说两个便衣警察事前连续三天在那间餐馆吃饭，说明此类拘捕需要花费许多精力，以收集足够的法律依据。

不做香港本地人的生意，所以不需在意本地人对重庆大厦的负面观感。

此外，许多旅店都有要向警方隐瞒的东西。一些旅店拥有无牌经营的客房，在主要客房满员时供应给顾客。另外有的旅店聘菲律宾“家庭佣工”打理，理论上她们在家庭外不可以打工（家庭可能是重庆大厦同一栋大楼中的某个公寓，房主就是他们的香港华人雇主）。还有一些旅店聘请非洲避难者作帮工，以此吸引非洲顾客，特别是那些主要做非洲客生意的旅店。这些旅店店长和经理欢迎警察的存在，因为他们让重庆大厦有条不紊，不过他们也对警察出现在自家旅店门口感到不安。

警察每隔数星期或数月，就会对重庆大厦进行突击搜查，跑到高座检查身份证或护照。他们偶尔搜查大厦中的每一间公寓，不仅仅是持牌经营的旅店，这有一定原因。我从街头小巷听说，有一次搜查是因为一些巴基斯坦人涉足人口贩卖，从境外带进多为蒙古国籍的女人做性工作，该事件吸引了本地媒体的关注。另外一次搜查源于一名印度裔加拿大女人的失踪，她最后所在地点是重庆大厦的一间旅店。^①更常见的情况是，警察例行突击搜查，以搜寻逾期逗留者。

旅店老板和经理也许抱怨此类突击搜查给客人带来的不便，但显然他们更加担心非法劳工的下场（往往不是那些持过期签

^① Michael Connelly, "When Fact Meets Fiction, the Cases Are Harder to Solve" CNN, 2009年10月29日, <http://edition.cnn.com/2009/CRIME/10/29/michael.connelly.fact.fiction/index.html> (2009年10月30日查阅)。

证的人，而是避难者或持旅游签证的员工，这些人的证件只能让他们在香港合法居留，而非工作)。然而，重庆大厦中的消息很灵通，正如一位旅店经理告诉我的：

如果我们这里有一个菲律宾佣人在打工，入境处警察突击搜查重庆大厦的时候，没有人会打电话告诉我们。但由于我们位于大厦高座，在警察到来前我们会一早知道，因为他们会逐层搜查。警察不能在旅店内地逮捕菲律宾人，我总是可以辩解说“她十分钟前才刚到这里”，不过不免还是有些麻烦。

至于聘用避难者，一个旅店经理说：“如果警察来到时，他们睡在旅店门口，经理总可以说‘他们需要地方休息，但却付不起房钱，所以我们让他们睡在门口’。反正入境处警察不可能证实其说法。”当我问起为什么这些旅店要雇用非法劳工，他们很直白地答道：“我们不雇用他们，生意就没法做了。”不论非法劳工的消失会带来生意破产，还是利润减少，似乎重庆大厦的众多旅店确实依赖于这批工人。

重庆大厦中偶尔有人说，香港警察是种族主义者，偏袒华人，比如第二章中 Johnny Singh 和 Fahad Ali 所讲的。我从一位底座店主那里听说：“几天前，在外面经营报纸摊的华人男子用铁棍打了一个尼泊尔人。警察对这个华人没做什么，他被带到警察局两个小时后就被放了出来，继续工作。这是不对的！”其他人则说警察尽管有一些语言上的隔阂，但几乎从来没有过种族主义行为。不过这一类关于种族主义的说法几乎都针对重庆

大厦中的警察。

在重庆大厦内非法打工的人们一旦被捕，就要面对严厉的制裁。上文提到的假表贩子随时要提防便衣警察，如此警惕当然有理由，因为他们被捕后就要面临罚款，可能还要入狱和被遣返，护照也会被没收。然而大多数工人对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抱有轻松态度，在一天午夜时分，一个旅店的非法打工者到重庆大厦门口拉客，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笑着说自己尽管在非法打工，但是不可能被逮捕，除非有我这样的人向入境处举报他。确实，偶尔有工人被捕，但很少见。**总而言之，重庆大厦的警察以新自由主义的放任态度行事：只要香港公众不受到伤害，就不会侵扰生意，因为经济是香港最重要的方面，这种态度才会让重庆大厦能够继续存在。**

签证与居留权

生活在重庆大厦的人，共同关注着香港和中国内地的签证和居留权问题。人们在重庆大厦见到的许多商人，主要活动于中国内地，他们来香港更新签证，这在2008年尤为明显，当时中国在奥运会前收紧签证政策。这件事萦绕在多数商人的脑海中，因为他们的未来取决于中国内地和香港官员是否给他们签证。

在中国以外的商人经常想办法拿到最长期限的签证。一位肯尼亚商人确信自己能拿到最长期的签证，他不理会重庆大厦和其他地方提供中国签证服务的旅行社，而是直接去中国驻香港的领事馆。他告诉我，自己当时直接跟中国官员说：“我告诉他们，我需要旅游签证，但是我不是游客，我要用它做生意。我不能要求太长时间，如果要两个星期，他们就会给你两个月，如果你要三个月，他们会只给你三天。”

一旦商人到达中国内地，就必须到公安局进行注册。我不断从心烦意乱的非洲人妻子那里听说，就算非洲商人娶了中国老婆，也不能留在中国，最多只能获得三个月的商务签证，不保证有永久居留权。

许多商人因为香港政府越来越严格的签证条例感到困扰。一个加纳商人提起，他在加纳历尽波折才拿到香港的签证，不像几年前他出现在香港机场即可。如果现在他要拿香港签证，

就必须到阿克拉的中国使馆申请，对方会把所有文件传真至香港入境处。他说自己必须每天跑中国使馆，整个办理过程耗费了一个月时间。重庆大厦的一个店主告诉我：“香港政府制定如此严格的政策，应该考虑到像我这样的商人，不然我会破产，然后就要依赖政府津贴了。”

一个巴基斯坦手机贩子说，他多次代表三名巴基斯坦顾客到香港入境处，询问是否已经批复他们的签证申请，官员的回答是“仍在审核中”。顾客未能到来影响了他的生意，他只能满腹怒气和无助。一名中国表商代表他的加纳老顾客打电话给入境处，这名客人被耽搁在加纳，无法与他达成交易；他说虽然能拿到进入中国内地的签证，却拿不到进入香港的签证。在2008年和2009年，重庆大厦越来越多商人对此表示抱怨，但他们询问入境处的时候总是得不到任何答复。

可以在重庆大厦见到的大多数人，其国籍背景与他们是否能在香港机场拿到长期逗留签证相关。举一个例子，大厦里常常有大约三十名来自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性工作者。不像其他非洲国家的女人，她们之所以能够参与此交易，是因为她们到达机场时能够获得九十天免签证的政策，令其工作成为可能并且有利可图。很少一部分的女人想当性工作者，但是对那些做此工作的女人来说，长期逗留签证显然让生意更加可行。有的人还会成为避难者，以便能更长久地留在香港。我们之后会谈及到避难者，他们不像持旅游签证的工人那样，可以每一两个月回一次家，这些人无法回到祖国，不然他们的申请就会作废，于是只好无限期地留在香港。

某些国籍的人士无法获得免签进入香港，他们可以拿商务签证来港，尼日利亚人尤其将此变成了一门艺术。办理商务签证一般需要香港公司的邀请函，第一次来港的人很难拿到。一些尼日利亚商人通过雇用经纪人解决了这个问题，经纪人是一些已经与赞助企业建立个人关系的经验丰富的商人，经纪人提供香港公司发出的信件，收取 50 至 400 美元不等的费用，数额取决于他们与新来商人的关系亲疏。他们一旦到达香港，就会找一家香港贸易公司作赞助商，这些公司通常会答应，因为他们想扩展客户群体。获得进入中国内地的方式也是如此，中国南方的工厂以 300 至 500 美元的收费标准提供邀请函，由于每家工厂发出信函的数量有限——我听说每月只有一封——所以尤其是尼日利亚来的商人会争相索取，而且听说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会伪造邀请函。尼日利亚克服无法进入香港的另一个方法，就是持有另一个国家的护照，他们通常选择赞比亚和南非，因为持这些护照，可以拿到更自由的来港政策，有好几个人告诉我，只要花费几百美元就可以轻易获得这些护照。

持旅游签证的工人，是重庆大厦中另外一群不停为签证问题操心的人，主要来自印度。他们在最近几年办理续签时，问题变得更加严峻，我认识的一个工人说，他曾经能在香港逗留四十二天，但到了 2007 年，他只能留二十五天了。后来他又再次获得四十二天，不过由于他不能确定能每次有多少天数，令自身情况越发困难。

有些工人开始声称自己是避难者，我问一位新来的工人/避难者：“但是你如果变成避难者，就不能回家了。”他面无表情地

看着我说：“没关系，钱才最重要。比起能够看到我回家，我的家人更关心我汇去的钱。”选择成为避难者的人，赚来的钱与他们用旅游签证赚的钱相比，大致一样，或者稍微少一些，但他们不再需要买机票回家，尽管回家的路费大致可以用来回运货的钱作补贴。

另一个留在香港的办法，就是和香港永久居民结婚。我认识一名工人，他说自己已经在加尔各答结婚了，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还向我展示他读二年级的儿子的相片，但是他还是与一位女性香港华人登记结婚，为了获得香港居留权。我认识好几个持旅游签证的单身工人，他们想娶自己的香港华人女朋友，从而获得香港居留权，即便得不到居留权，至少可以间接得到在香港无限期逗留的保障。

对于那些已经拥有香港居留权的南亚人或中国内地人来说，他们可能关心如何将家人带来香港。我经常听说，重庆大厦的经理希望把巴基斯坦的子女或兄弟姐妹带到香港，正如一位较年长的男人告诉我的：“我有四个儿子在巴基斯坦，两个在拉合尔，两个在卡拉奇。我已经申请让他们来香港，我想有两个会来，不过文件处理时间非常长。”我还知道一些其他情况，比如一个巴基斯坦人拥有香港居留权，但他另一个兄弟却拿不到，有居留权的这个人每个月赚 7,000 港币，而没有居留权的兄弟每个月只赚 3,000 港币，真是天壤之别。

还有些人是逾期逗留者。这些人从官方角度看是非法的，不仅因为他们不能工作，而更在于他们的存在。非法工人在重庆大厦很难被捕，因为他们总可以说自己“给朋友帮一下忙”。

然而，逾期逗留者却比较容易被抓，因为一看他们的护照，或者有些人连护照都没有，就知道他们的非法身份了。

据闻重庆大厦在任何时候，应该都不会有多于一百个逾期逗留者。逾期逗留的一个人群是尼日利亚人，首先他们也许以商人身份合法来港工作，几个月后，他们到尼日利亚领事馆宣称自己的护照被盗。有时，非洲人和南亚人的面孔彼此相似，所以回家途中共同使用一个护照。有人告诉我“对华人而言，多数非洲人看起来差不多”，因而令这种行为有很高的成功率。诡计每隔数月又会有所变化，但一般来说，这些机灵的商人好像总能走得比警察和法律快一步。

比起香港和重庆大厦，广州有更多来自尼日利亚及其他非洲国家的逾期逗留者，不单单因为那里有更多非洲人提高了这个数字，而且因为那里的警方控制较为模棱两可和不全面。逾期逗留者在广州生活多年，显然比在香港更可行。不过这种做法危机重重，因为这个人可能被捕并遣返回国，失去一切，在海外多年拼搏后没能赚到任何东西，回到家时颜面扫地。

2009年7月，广州有一位逾期逗留的尼日利亚人在被查证件时跳出窗外，传闻因此毙命。几百名愤怒的非洲人群起抗议，包围了一个公安局，要求伸张正义。^①在这方面，中国内地和香港有一个关键区别，一个人可以在香港申请避难身份，但在中国内地却不可以。我认识重庆大厦的一个逾期逗留者，他被警

^① Ivan Zhai and Fiona Tam, "Africans Protest in Guangzhou after Nigerian Feared Killed Fleeing Visa Check"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09年7月16日。

方发现在旅店打工，拘留了数周。他申请成为避难者后再次回到旅店工作，冒着自己再次被捕的风险。我最后听说他仍然在那里打工，每个月给身在尼泊尔的家人汇钱。

避难者与法律

现在让我们谈谈避难者，本章余下部分将描述这个人群，不仅因为他们在重庆大厦的总人口中占很大一部分，还因为他们最容易被法网捕捉到——他们被困在国与国之间，很难逃脱。避难者由于遭受政治、种族或宗教上的迫害，离乡背井到另一个地方寻求新生活。有的避难者则主要出于经济原因，尽管这不被大众认可。避难者往往留在香港多年，等待自身案件的仲裁；同一时间，他们贫困潦倒地生活，多多少少像是活在地下一般，靠自己孤身一人。

全球有许多关于避难者的文献，包括最近几本引人注目的书籍，描述了避难者在美国、西欧和澳大利亚的境遇。^① 这些记录显示，香港的政策与许多其他社会一样，希望减少入境的避难者数量。香港与这些社会不一样的地方是，它几乎不允许任何避难者在香港永久居留，而是坚持要他们去第三方国家定居。另外的不同在于香港拥有更加开放的签证政策。

重庆大厦中有不少避难者，但是很难得出一个具体数字。只有很少一部分的避难者活动于非政府组织，比如重庆大厦E座十六至十七楼的基督教励行会，它主要为避难者而建立。更多避难者在底层或一楼工作，甚至在整个重庆大厦，但许多人

^① 见 Gibney 2004 ; Nyers 2006 ; Brennan 2003 ; Ong 2003 ; Moorehead 2005。

并不公开自己的避难者身份。

我有时问店主们，有多少来过重庆大厦的人是避难者，听来的一个大概数字是，“来过重庆大厦的每一万人中，两千人是避难者，四千人是持旅游签证的非法劳工，另外四千人是商人或合法工人”。这些数字也许被夸大了，不过仍然反映了大家对无处不在的避难者的看法。我自己的粗略计算是，基于我在重庆大厦中认识的人来讲，重庆大厦每天任何一个时刻，大约有三百名避难者，以及五百名持旅游签证的工人——这仍然是可观的数字，不过比我听说的数字小许多。人们在重庆大厦见到的是商人和游客，这群人大部分是合法的，尽管理论上这些商人并不应在香港参与商业活动。有的人确实是以旅游签证打工，或是避难者，包括底座和一楼的一些店员，以及高层旅馆和其他生意的雇员，不过也许大多数人属于合法香港居民。

正如之前所提，避难者有一个不需要回国办理更新签证的优势，因此聘用这些能混入人群不被察觉的避难者，特别是南亚裔的避难者，对店主具有极大的诱惑力。然而，许多避难者遵循不许在港工作的法律条文，并不工作。他们一旦将自己交给入境处官员并从拘留所出来，不仅每月能直接得到 1,000 港币的租房津贴，还能通过国际社会服务社——一个香港政府委托的非政府组织——获得每月 900 港币的杂费。他们靠这些救助在香港维持基本生存。

避难者旨在被纳为难民，然后被派往一个第三国定居，比如加拿大或美国。然而，只有很少一部分避难者可以达成心愿，成功案例大多来自局势混乱的索马里等国家。有的避难者确实

拿到了难民身份；有的则与香港人或其他外国人结婚，从而拿到居留权；有的人返回家园；还有的人被遣返。不过，我认识的大多数人年复一年在香港维持生计，无法去到其他地区，无止境地寻求其个例得到解决。

有些避难者打工赚钱并汇钱给家人，他们不属于那些大多数不合法的群体。他们大多挣扎在最低收入水平上，只有很少人才能在生意场上占据一席之地，他们往往通过出口商品到家乡，或是在商人和店铺间、零售商与批发商间充当经纪人，为远在祖国的家人汇钱盖新房子。

还有一些避难者不工作，他们是理想主义者，是坚决遵循法规的人，当然也有些人只是很懒惰，这些人替那些不付工资的慈善机构做事。如果其中某些人能够打工，反倒可以令香港受益——他们在自己的祖国是持不同政见者，拥有很高的智力和洞察力。不过他们同时也是最遵循法律条文的人，因为他们一旦打工被捕，就会被遣返回国，面临入狱、酷刑甚至死亡。

大部分避难者不住在重庆大厦，^①而是不时造访大厦，尽管重庆大厦及其周边对许多人来说是社交中心地带。在2006年5月，香港大约有1,600位等待审核的避难者，这个数字在2007年跳至2,600。^②如今，避难者人数已经急剧上升，因为很多避难者通过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向香港政府进行申请，我在下

① 在2009年，国际社会服务社开始拒绝向住在重庆大厦的避难者提供每月租房津贴，坚持要让他们搬去其他地方，也许是为了禁止非法劳工现象。

② Davis Mompard, "No Man's Land: Asylum Seekers Endure a Grim Waiting Game as their Fate is Decided"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07年7月20日。

文会详细说明。直至2009年8月底，香港入境处一共收到5,638宗还未处理的受酷刑案例，^①另外还有几千宗案例正通过联合国难民署处理，大部分申请人会在这两个机构同时申请。香港如今大约有超过六千名避难者。多数来自南亚国家，还有少部分来自非洲，余下零零星星的来自其他国家——没有哪个避难者来自中国内地，香港本是中国的一部分。

香港人口主要由过去六十年中离开中国内地的人组成，在某程度上与如今的避难者相似。^②但是，非洲和南亚来的避难者对香港来说是一个新现象，香港过去曾经因非法移民而经历多次恐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人对越南来的船民提出强烈抗议；^③近年来也有很多人担忧中国内地孕妇到香港产子，令其后代成为香港居民。^④

在千禧年初，如今这批南亚和非洲避难者逐渐到港。他们与重庆大厦其他外籍居民一样，多数是家乡的中产阶级，生活属于小康水平，这也体现在他们至少能够来到香港。有的人从中国内地抵港，有的通过船只入境，大部分人能够负担来香港的机票费用。我认识的索马里避难者及难民往往有一种平和、甚至过分讲究的风度，他们在摩加迪沙曾经是教师和会计。乡下人与这些人就不一样了，他们逃离索马里的暴虐，经过亚丁

①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2009.

② Mathews, Ma, Lui 2008, 25–26.

③ Chan 2003.

④ Daniel Altman, “Bypassing Barriers for a Passport”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naging Globalization, 2007年2月7日。

湾时几乎因翻船而被淹死，最终买通一个中介，乘坐商用飞机来到香港。正如第二章所提，多年来我每周替避难者开一门时事课^①，就像一堂活跃的大学研讨会，充满了激烈辩论，议题包括非洲殖民主义、同性恋与异性恋、其他地球上生命的可能性网络的未来以及神的本质。

如果这些避难者通过联合国难民署申请难民资格，必须让人相信他们曾受到种族、宗教或政治上的迫害，或者当他们通过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寻求庇护的时候，必须证明自己曾经遭受或面临酷刑。接受他们申诉的机构必须辨认案例的真伪，但这常常难以达成。发展中国家发生的施刑和迫害也许没有留下记录文件——这些证据远不是谷歌能搜索到的东西。

因此，面试官在避难者的口述中寻找内在的一致性，但是曾经遭受酷刑和迫害的人，也许没有达到面试官标准的逻辑或陈述能力，也许他们再也没有这种能力了。孰真孰假，这仿佛一场以避难者人生作赌注的游戏，仅仅在不足几个小时或几分钟的面试中进行，^②只有极少数人在游戏中胜出。在2008年，联合国难民署审核了1,547宗难民申请，只有46宗被认定为真实个案^③，所占比例不足3%。香港政府迄今为止只判了一宗为酷刑案例，成千宗其他个案仍在等待审核。

① 有些避难者来上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教的本科课程。我与他们进行热烈的课堂讨论，内容从帝国主义到巫术等；我们讨论的时候，许多中文大学的学生似乎被吓到了，他们不习惯这种热烈的讨论。

② Essed 和 Wesenbeck 2004, 53。

③ Barclay Crawford 和 Yvonne Tsui, "Reopen Refugee Camps, Say South Asian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09年3月8日。

“真假” 避难者

“真”和“假”两个字眼有时被用来描述避难者，有时避难者自己也这么用，重庆大厦中的店主也用此嘲弄他人。一个显然有真实申诉背景的避难者告诉我，大约80%的避难者虚构了申报内容。

这是一个可观的比例，然而，一个人如果长期了解避难者的“真假”问题（与第三章讨论的商品“真假”一样），就越明白个案情况复杂^①，“真假”的划分也就更模糊，几乎无法辨别。^②有些避难者显然是真的，但也有一些人不是因为受到威胁迫害才逃离祖国，而是为了经济利益。这些人申请避难身份，因为这样能让他们留在香港赚钱。还有很多避难者不属于以上两者，而是处于两者之间。

即便某人曾经遭受暴力或威胁，仍然很难达到联合国难民署或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的要求。一位加纳避难者告诉我，他家附近有一个家族想夺取他们的土地，在一次激烈争辩之后，对方家族的一个成员威胁要杀掉他。还有一位塞内加尔避难者

① 见 Daniel and Knudsen 1995；Wilson 2009，214-15。

② 一名阅读此章节的避难者，强烈反对使用这些字眼，因为其区分非常不清楚。他说：“你认为有些人完全是真的，其他人完全不是，现实才不是如此。”他的说法正确，但是由于重庆大厦中人们经常用这些字眼，我只能将其保留使用，不过用双引号标明罢了。

说，他曾经撞毁了自己经营的船只，有人因此淹死了，一个死去了丈夫的女人誓言要杀他。还有一位巴基斯坦人，我们之后会再听到他的故事，他说自己的婚姻糟糕透顶了，但是亲戚们警告他，如果他离婚就会杀死他，因为这样做会令家族蒙羞。一个印度男人跟我说：“我卖T恤衫的时候生意垮掉了，债主说：‘如果你不还钱，我要你死！’我的母亲说：‘你是我唯一的儿子，跑去其他地方吧，任何地方都可以！’”

这些人逃跑都有一定道理，因为他们的生命面临危险。然而，尽管这些个案牵涉死亡威胁，但却与酷刑或要挟无关，与政治、宗教或种族上的迫害也没有关系，而是个人纠纷。在发达国家背景下，受到这种威胁的人可以申请禁止令，或者通过其他法律渠道摆脱困境，但这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却没有这类选择。他们的申诉个案也许会失败，除非他们能编造不同的故事，因为他们并不符合难民身份的标准。

我认识几个避难者，他们身上直接带着申诉证据。一位是个南亚男人，他的大腿骨上有一颗子弹，他向我展示了无时无刻不带身边的X光照片，声称自己被政府军射伤了，并且依然处于险境。另一个人在第一章中提到过，他总是戴着一副墨镜，说自己在监狱中瞎了，因为狱卒将他的眼皮掀起贴着，强迫他数小时盯着太阳。然而，这些说法如果没有相应的证据，无法令人信服。第一个男人如何才能证明自己是被政府军射伤，而非意外事件？第二个男人又如何证明自己是在监狱中变盲的？尽管这些避难者的申诉证据在身体上，但并不足够。他们只能期盼能有公共记录（也不过搜一下谷歌而已）与身上的证据能

共同证明。

有的避难者满口谎言，十分夸张。一个西非人曾经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他年幼时被迫加入了一个宗教团体，他长大以后才发现教派要在他二十一岁生日之际将他阉割，令他不会受到女人的吸引，以便无条件地爱他们的神。他急忙逃离，跑入了丛林深处。在躲藏中，他遇见两名澳大利亚人，他向他们展示了母亲给他的一小瓶钻石，然后他们同意帮助他，给了他一种有药性的饮料，结果他失去了知觉。一段时间之后，他在一个黑暗的密闭空间里，时而醒来，时而昏厥，他推测自己在一艘船上，那些人不断让他喝更多的饮料。最终他头脑清醒过来，起身发现自己在香港的一块空地上，身边没有钻石、钱财、护照，而且完全不清楚怎么到那里的。我告诉他没有人会相信这个故事，他看了太多粗制滥造的探险电影了，而他却坚称是真的。

我听故事的时候费了好大劲才忍住不笑出来，联合国难民署的职员曾经告诉我，他们在讲得天花乱坠的避难者面前，也有难以板起脸孔的时候。一个职员向我描述了一个尼日利亚或其他西非人流行的故事：“我的父亲是酋长，大家期望我在他去世后吃掉他的心脏，以便让我继承他的衣钵。我母亲是一位基督徒，拒绝让我吃他的心脏。我的子民和神灵都因此怨恨我，我的生命也受到威胁，所以不能回去了。”这位职员说这个故事一遍遍被人重复：“每次我们听到类似的故事，都必须忍着不笑出来。”

不过即便是这样的故事，也很难确定其真实性。一个西

非避难者给我看网上的一段文章，描述酋长儿子肩负的压力，以及他们中某些人遭受的迫害，特别是那些投身基督教信仰的人——这段网络文章折射出他自己的经历。他的个案被联合国难民署驳回，也许那些人听了故事笑岔气了。于是这个人转为通过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申请资格，现在仍然等待其判决。他最近给我看了几封英国和其他地方学者发给他的邮件，那些人替他的申请合理性做了认证。也许他在联合国难民署那里是一类受害者，因为他的故事与其他人讲的假话太类似了。

我认识的避难者，有时认为可以向联合国难民署或香港官员说谎。我经常听到别人说，不应该胡编乱造一个毫无真实性的故事，但是大家往往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事实，为了让故事更加清晰和容易理解：“情况其实非常复杂，你必须将它变得更加朴实简单，说给那些人听。”大家觉得这很必要，因为大家认为联合国难民署的职员缺乏经验及愚昧无知：“她根本不清楚我的国家在哪里！她怎么来判决我的个案？”在更加广义的程序层面看，由于联合国难民署不像香港政府，不会允许避难者更正自己，甚至不允许避难者看一眼社会工作者写好的笔录，出错是可能的——因此有些避难者更加认为要撒谎。

然而，美化或简化故事也有风险。联合国难民署和香港官员十分注重避难者口述的一致性，说谎的危险在于，如果此人说漏嘴了，讲了一些与之前故事不相符的东西，就会断送自己

成为难民的机会。^① 这种情况严重伤害了我认识的几个避难者。

我在上文提过，“假”避难者有时被定义为那些打工的避难者，而“真”避难者是那些不打工的避难者，因为一旦打工时被捕，就可能会被遣返、入狱或被杀。这种情况有一定真实性，但也有各种灰色地带。有些避难者十分担心家人的境况，愿意冒极高风险汇钱回家。

有些活儿很难受到政府当局的追踪，比如将货物运到家乡可靠的伙伴手中，并获得相应款项。只要有一定预防措施，比如汇款至朋友名下的账户，当局就很难发现。但是一个人涉足此类工作，必须有值得信赖的非洲联系人，这也许有些困难，因为避难者无限期地被困在香港。我听说非洲人往往以为香港的避难者很有钱（“他们给了好多钱让避难者生存下去！”），因此避难者给家里汇去用以投资的钱，也许只是被家人用来缓解各自的急需。

无法经商的避难者可能尝试做其他低风险工种，比如替初次来港的非洲商人作向导，希望能得到佣金。有一次我给避难者上课时，一个打工的避难者发表长篇大论，认为避难者应该“放勤快点，开始工作”。他讲述自己去过垃圾场，用手机拍下汽车零件的照片，然后回到重庆大厦向非洲商人展示可供应的产品，以获得部分收入，他说：“谁都能做这行”。课堂中有一些避难者回应道：“那是非法行为！我才不会去做呢！我认为应该守法。”那个人离开后，一个人还说：“我不相信他，我认为他在

① Knudson 1995, 22.

替香港政府做事，想让我们掉入圈套。”

有些避难者走投无路，可能去做会暴露自己身份并可能因此被捕的工作，例如在重庆大厦周边人行道上兜售假表。据我观察，此类工作的避难者确实多多少少是“真的”。另一方面也有不打工的避难者，他们每个月只是轻松悠闲地畅饮重庆大厦低廉无比的酒精。上一段所讲的正在打工的避难者，后来叫嚷道：“多数避难者生性懒惰，他们不想打工！他们宁可要别人的施舍，也不愿意自己工作，这就是为什么非洲这么贫困，被白人掌控的原因！”不过正如我们所见，香港大部分避难者是南亚人，而不是非洲人，而且他们多数是有工作的。

有趣的是，“假”避难者因为经济原因来港，被“真”避难者鄙视，而不工作的避难者又被重庆大厦的商人看不起。一位东非商人问我，重庆大厦中是否有任何避难者，我告诉她确实有，结果她嘲笑道：“那些人都是假冒的！他们只不过是懒骨头！他们只想靠政府过活！他们的生活比我还好，因为他们可以休闲度日，而我还要工作！”其他人更多地对避难者表示憎恨，^①一位店主跟我说：“正是因为有这么多避难者，所以政府才限制对非洲国家发签证，阻碍了非洲人到这里来做生意。”^②

我熟识好几个自称是“假”避难者的人，他们来港纯粹为了经济原因。我们之后会讨论到一名巴基斯坦男人，家人让

① 他们花了我们的钱，应该全部都被法律取缔！”

② 我无法印证这一点，但由于香港的避难者人数越来越多，他的这个观点也许是正确的。

他投奔已经成为香港居民多年的叔叔，帮忙打理这个叔叔的生意。如果这个香港人脉是他父亲，那么他就有可能获得香港居留权，但因为是远房亲戚，就没有这个可能。因此他别无选择，只有编造申请个案以便成为避难者。这个模式在南亚人中很普遍，也许他们来香港替重庆大厦的亲戚打理生意，然后申请做避难者，以便获得合法逗留香港的权利，否则就要非法打工了。

一个避难者曾经告诉我，如果某人遭受酷刑或曾目睹家人被杀，他们的脑海里一直会记得，不会忘记。他说自己不断做噩梦，梦见在索马里见到的骇人事件。他认为许多西非或南亚来的避难者一定是“假”避难者，因为他们看起来太喜悦了。

我不知道这种说法的真实性有多高。一个避难者在我的课堂中，以非常轻松愉快的口气描述酷刑，令我怀疑他的人生是否真的曾经遭受过强烈痛苦，但后来我知道，他最近才从香港的一家精神病院出来——他也有心魔，尽管不是他选择展示给我看的心魔。我认识的避难者中，有多少人确实有过可怕经历，还把那些经历隐藏在内心，又有多少人从未经历过这些事情？我不知道，也许更不应该问这个问题，但我却忍不住想问。我特别记得一个午夜后，一名来自中非的避难者向我吐露心声，他采用了兄弟的名字，因为兄弟的死亡是他的责任。政府当局曾经搜寻他，他躲藏起来，于是他们杀死了他的兄弟。他难以抑制地抽泣了半个小时。那晚之后，我再也没见过他。

避难者的生活

避难者在香港生活的最大难题，就是不确定性、无聊以及漂泊感的结合，一种人生停滞不前的感受。我偶尔给身边的避难者上一堂道德课：“没错，你曾经吃过苦。但是你有时间，如果你觉得打工不对，可以不去做，但至少可以学习。每天去图书馆读点书吧！”有些人多多少少听了我的意见，但他们的善变仍然是一个难题。

许多避难者在机缘巧合下来到香港。一个避难者告诉我，他曾经在网搜索去世界上哪个地方生存不需要办签证。他找到了萨摩亚，但是他到达香港后才知道，还是需要签证才能去萨摩亚，结果他无限期停滞在香港。许多避难者喜欢开一个玩笑，香港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因为人们很容易进去，但是却很难再出来（除非避难者同意返回祖国）。

由于避难者可能要用数月时间才能拿到提供住处或房租救济的必要文件，有些人曾长期露宿街头，栖身在香港旅游景点天星码头周边。文件批核的过程中或许还包括多次电话谈话和反复哀求，接下来避难者的基本生活物质多多少少受到照料，但其他的担忧依旧持续。一些避难者确信，祖国会派来秘密警察跟踪他们，这种害怕也许过于离奇，但有时却不一定。重庆大厦中的商人几乎来自所有避难者的祖国，有些避难者害怕商人认得他们的面孔，向政府举报，接着政府人员可能会折磨

其家人。

我认识有一些避难者，很难理解自己的人生为何陷入如此奇怪的境地。我曾与一个孟加拉男人促膝长谈，他说自己以前是富商，直到最近，由于他支持错了政治党派——另一个党派的支持者把他打了一顿，结果他弃下家中的妻女，离开了孟加拉。他向我展示自己那张环球 VISA 卡，信用卡已经在不到一年前过期了，它曾经是令他通往世界各地的门票，但现在已经毫无用处，只能让他想起过去的自己。

我还认识一些重庆大厦的避难者，他们因午餐或晚餐时等着坐上 E 座电梯而感到羞愧，那里有两个基督教慈善机构给避难者提供食物，他们宁愿走上那一段长长的楼梯，而不想被人看到他们领取免费食物。我还认识一位避难者，他虽然从香港政府那里拿很少的救济金，但是生活却比隔壁华人家庭要好，因此感到惭愧：“他们的床上有可怕的臭虫，我从他们拿出来要洗的衣物中就能察觉到。”他希望那些人永远不要发现香港政府在救济他，因为他们没有拿津贴，尽管以香港一般标准来说，他自己也穷困潦倒。

这些避难者会变成什么样？一方面来讲，幸运的人能拿到难民资格。我认识的几个索马里人获此资格，有一个人说了让我深思的话，索马里是可怕和充满骚乱的国家，但他却如此幸运。我问起他的家人怎么办，他是否常打电话给他们，他说没有，他从来没打过电话给他们——他们已经消失了。每个人在恐慌中逃跑，他大致上知道他们身在何处，但却无法与他们取得联系，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再见他们，因为在这种乱局中，

回家对他意味着死刑。而他很快要去另一个国家展开新生。

另一方面来看，还有大部分避难者的申请被拒。我曾问两个避难者学生，他们如果拿不到难民身份怎么办，他们说自己会自杀，其中一个说：“我会用最后剩下的钱买一张船票，然后在没人看到的时候跳下去。”另一个说：“我会回到自己的房间自杀。”我并不知道任何自杀的避难者，但这些言语显示了申请失败给他们带来的绝望。就算他们没被遣返回国（大部分确实也没被遣返），他们的人生仍然没有着落。

避难者尽己可能想要获得难民资格，这并不让人意外。有一次，一个信基督教的尼泊尔避难者生气地找到我，说：“今天牧师给一些尼泊尔人施行洗礼，这些人来到香港才五天，他们根本不了解圣经，也不知道基督教是什么，他们只是想通过变成基督徒，获得其他地方的难民资格！”相比非基督徒来说，大家普遍相信西方国家更愿意接受基督徒。他感到受了冒犯，因为自己一直以来不断学习圣经，那些人却只因机会主义才皈依此宗教，而牧师等人更教唆他们做出这种行为。

避难者有另一个办法逃离摇摆不定的生活，即娶一个有香港居留权的女朋友。只要能维持婚姻，避难者就不会被遣返。许多避难者的女朋友是菲律宾或印度尼西亚家庭佣工，她们受合同限制不能结婚。其他类型的男女关系较难形成，因为一般需要金钱投入，而避难者大部分都没钱。我认识一位有香港女朋友避难者，好多人都渴望有这一把金钥匙，但他却不想娶她，说：“万一结婚后关系破裂呢？在最初四年，妻子需要每周写信给人境处，证明他们仍然处于婚姻状态。我宁愿自己拿难

民身份。” 避难者有时会向女朋友撒谎。曾经有这么一件事，一位避难者因心脏病而暴毙，他那穿着考究的菲律宾女友哭着说：“他一直在向我说谎！他说自己是生意人！”

香港避难者的生活水平高低，很大程度在于他们是否打工。我个人观察结果是，打工的避难者更能应付心理问题，因为他们每天有需要忙碌的事情。一名境况较好的巴基斯坦避难者说：“不论香港政府怎样对待我都没关系，因为我赚足了钱，我很满足，可以回巴基斯坦。” 他一开始工资非常少，但他小心翼翼地存下钱，接着用几千港币做商业合资，幸运地赚到足够利润，让他能继续扩张生意。

不过刚开始做生意是很危险的。我知道有一位避难者，好不容易积攒下几个月的收入，买下八个摩托车头盔运到尼日利亚销售，因为 2009 年 1 月施行新的法令，规定所有摩托车驾驶人员必须戴头盔。他预期能赚 100 美元的利润，足以提供下一笔生意的资金，但正如常常会发生的厄运，政府条例规划失误，他的尼日利亚伙伴携款逃走——他最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自己遇上的麻烦事。

不以赚钱为目的的避难者有另外一些关心的议题，正如一位避难者告诉我的：“我是真的避难者，不像其他人，但是联合国难民署一直让我俯首帖耳地做人。” 他认为联合国难民署只会嘲笑他证明自己合法性的努力，他没完没了地担忧自己的处境：“为什么他们不听我说的话？为什么他们不明白我是真的？” 另一位避难者曾指着重庆大厦后巷中的尼泊尔瘾君子说：“我不明白，他们每个月可以拿香港政府 4,500 港币的救济，不想工作就

可以不工作。我却没有拿香港政府一分钱，而且渴望工作，只要香港政府允许，我就会去工作。”

尼泊尔瘾君子是廓尔喀在香港的后代，因此拥有重要的香港身份证，难民者没有获得这种证件的机会，香港政府便以有限的人道考量对待他们，同时也与他们保持一段距离。除非难民者与香港人有婚姻关系，不然香港永远不会成为他们的家。

政府的做法在其立场上完全可以理解，香港无法承受难民的泛滥，但是对于个人来说却是悲剧。这些难民者拥有极好的才能，但香港没能了解和运用这些才能。其中有一些难民者通过各种义工活动，让自己多多少少有些事情做，还有的去图书馆，有的只能活在焦虑中。许多难民者虽然遭受蔑视，却形成了重庆大厦的知识分子阶层。

以下是几位难民者的口述：

John Mukasa

我出生在中非（我不能告诉你具体是哪个国家，这样做太危险了），家里有七口人，而我是年纪最小的儿子。我的母亲是政客。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我部落的人们遭受政府的屠杀。我的母亲很有名气，她暗中资助一个反政府组织，结果政府知道了这个消息。朋友们到我们家里，叫她赶快逃跑，但是她拒绝了，说自己要为祖国而死。几天后她被逮捕，那些人带走了她，将她放在敞开的车子上游街示众。我当时年纪很小，还不清

楚，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来我家里。但是我看到哥哥姐姐在哭泣……那些人带走并杀害了母亲，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后来，祖母把我带到她的村庄。父亲没有为家庭作任何贡献，我的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将我带大。后来我的大哥知道了母亲身上发生的一切事情——他不能上学，开始酗酒，接着去世了……

对于应该是父方还是母方的家人照顾我们，家族中掀起很大争议，事实上他们在争夺我母亲的遗产，连警察也被叫来解决问题。我被送到父方家中，那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我发现那并不是我的家，于是日夜以泪洗面，他们只好把我送回母方家中。

我成长的过程中，并不清楚母亲被杀，直到后来才知道。我在村里上学，早早起床照顾羊群，带它们出门，把它们绑好，然后跑去离家三四公里以外的学校。当我考试成绩好的时候，舅舅带我进城与那里的中学生竞赛。但是，另一个反政府组织来到，把我们从家里赶走了。很多人死去，很多人被杀害。那天晚上，舅妈驱车把我们带到了她家。

我哥哥获得去美国学习航空工程的奖学金，他跟我说：“我要你像我一样，成为一名飞行员。”于是我申请南非的飞行学校，并被录取了，但后来我遇上摩托车事故。我姐姐有艾滋病，当时我骑着自行车，心想“我会失去姐姐”，结果一辆车从我身上碾了过去。我本来没办法活过来，但那时我意识到其他人对我的爱。我的锁骨和许多其他骨头都断了，我知道以后不可能再成为飞行员，我不够资格。

当时出现越来越多的叛军，如果你是我当时部落的成员，你就不可能拥有住所和工作，你什么东西也不会有。假设政府的支持者在街上见到你，会把你放在轮胎中，倒入石蜡，把你活活烧死。如今难民营中还有成千上万来自我部落的人。

我在2001年第一次涉足政治。我从小到大知道政治不是好东西，但还是加入了政治，因为……好吧，我相信我们必须做些什么改变政府！我被某个地方选举为总统竞选人，我当时根本不会讲当地语言，我到总统竞选人的办公室，动员底层民众。即便到现在，仍然有人称我为“主席”。政府间谍盯上了我，因为我处事风格与别人不同，能很好地动员民众。他们想激怒我，让我成为他们的一分子。我的顶头上司被逮捕了，直到现在仍然不清楚他身在何方……

亲戚们跟我说：“拜托，不要这么做，远离政治，就是因为政治你失去了母亲。政府可是有三头六臂的。”反对派的选民获胜了，他们接着开始在晚上找我。有一次我去了一间酒吧，还见到他们掏出枪放在台面。为什么我没有放弃政治？因为只要有人民的力量，我们就能改变政府。我知道只要有一个新政府，我部落的民众就能回家了……后来，舅父打电话悄悄告诉我：“你有生命危险，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吧。”他从钱包里拿钱给我租下一块地方，远离我曾经的住处，还派车送我去那里。联合国难民署完全不能理解这一切！他们没有合适的知识背景，还以为我祖国的政治与发达国家政治一样，但事实上完全不是。

我意识到自己最好是离开。我收到一封美国的会议邀请函，

这是我寻求避难的机会，但是我没能及时拿到签证。我询问一家旅行社：“我离开这里后，最易到达的地方在哪里？”答案是中国，于是我乘上飞往香港的航班，在机场与一名黑人聊天，他叫我去重庆大厦。我在那里听说有一间联合国难民署驻香港的办公室，于是我去了那里申请个案。那一年是2006年。

香港是一个不赖的地方，很安全，这是最好的一面，你可以去往任何一个角落，不需要左右防备。当我第一次到达香港时，这里存在华人对非洲人的歧视问题，但这种情况慢慢消失了。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不论你是不是香港人，都会依法受到对待。对，我感觉自己在香港受到不错的待遇，我理解如果香港允许避难者工作，香港人的工作机会就会更少。

我来到香港，感到最失望的是联合国难民署，因为他们的办事不透明。他们会说你之前面试时“说过这个”，但他们也许完全弄错了，而你却毫无办法。由于香港没有签署日内瓦公约，联合国难民署独立行事。你动不了他们一根毫毛，也不能找律师挑战他们。我的底线是寻求庇护，我因为生命受到威胁而离开祖国，但是现在应该保护我的国际组织说不能保护我，我该怎么办？联合国难民署不可信，他们坐在空调房里，对非洲毫无了解，我希望那间香港办公室工作的人也成为避难者，然后他们就会理解了！

我每隔一段时间会和哥哥通电话，他能让我联系上妻儿。不，我不常直接与他们谈话，因为所有海外来电都受到监听，所以有风险。我爱我的妻儿，我每一天都想念他们。我也爱我的民众。但是我不能回去，我知道政府可能做出什么事情。

不，我从未在香港工作，这是违法的。一位在中国内地开工厂的男人曾经想找一个非洲合伙人，他向我提供这个机会，但我告诉他我是一个避难者。我给他介绍了另外一个东非人，他可以替他工作，而我不能。即便现在我跟你聊天，我清楚政府知道我的所在。两天前，我听说加拿大的一名避难者被发现是间谍，他们受到我国政府指使。我非常小心，他们也许要毒死我，所以我不会和陌生人一起吃喝。

如果我回到十年前，是否还会涉足政治？如果我见到民众受苦，就仍然会参政。不，我没有遗憾。不过每天都有人受难——如果你尝试去做什么，结果并不成功，还能怎么办？

Muhammed Hasan

我年幼的时候，并不想离开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是我的祖国。上了大学后，我非常喜欢玩板球，是一名很棒的板球手，本来可以加入巴基斯坦国家队。但是父亲只想让我学习，他抱着陈旧思想，认为我只能通过学习创造人生。如果他愿意另外在我身上花些钱，我也许会成功。不过你在巴基斯坦必须遵从家人的意愿，我大学毕业后，开始在所住的城市经营一家运动品商店。

我念大学的时候，每天去舅父家，还会见到表妹。我对她没兴趣，但是舅妈总是告诉我：“你应该娶她，你今天见过她了吗？她看起来多美。”如果你每时每刻告诉一个男人另一个女人

很美，他有一天会开始感兴趣，这事就发生在我身上。

表妹做人很虚假，她告诉我她爱我，但其实她爱的另有其人，她不过是想替自己的兄弟开一条道路。她的家族穷困潦倒，香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梦想，我这个巴基斯坦的表妹想让我娶她，以便让她的兄弟娶我香港舅舅的女儿，那个女孩有香港身份证。不然，当时我会迎娶那位舅舅的女儿，自己去香港，舅舅本来要将女儿许配给我，他回到巴基斯坦时还坚持要这么做。但是这并没有发生，因为我娶了这个表妹，爱上了她，我当时真傻。

我立刻知道自己做了错事，她在结婚前已经有一个男朋友了，我发现她仍然爱着他。她对我说：“我嫁给你是为了让兄弟能得到更好的生活，所以不要碰我。”我惊呆了，说：“你现在说‘不要碰我’，然后又去告诉别人‘我不是男人’，所以我还是要做。”然后我就做了，所以我现在有一个六岁的女儿，她出生于2002年。

我没有与妻子离婚——我做不到，因为如果我离婚，亲戚们会以死威胁我。她也想离婚，但亲戚们也对她施加压力，不让她离婚，因为离婚会令家族蒙羞。我不能上法庭打官司，这些亲戚就是那里的地主！如果我在巴基斯坦没有后代，家族就会消失，从一个巴基斯坦人的角度来说，我需要有一个儿子。我爱那个姑娘！但是她玩弄了我……

在那之后，我过度抑郁，无法打理生意。父亲于2004年去世，我决定离开去国外，我无法在巴基斯坦生存——叔叔和舅父是地主，即便我去了大城市，他们也会给我找麻烦。我想去

国外，因为我想结婚和建立家庭。我从巴基斯坦去到伊朗、土耳其、希腊，接近边境时乘坐公共汽车和走路，因为军队掌管着边境。

四个月后被发现了，希腊的边境警察让我“滚”回土耳其，结果我成功躲进一片太阳花丛。我到了伊斯坦布尔，但是有人报警，于是我被拘禁了起来。然后他们把我们送去伊朗，我们受到小偷和绑架者的袭击——是库尔德人——我们与他们打架，有两个人被枪射死。不过我们一共有八十个人，而他们只有十个人，我们追赶并抓到他们，打断他们的骨头，将他们扔到山下。后来我们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因为库尔德部落会来捉我们，我们整夜逃跑，寻找任何军事站以便投降。

回到巴基斯坦的时候，我的身体状况很差，站在母亲面前，她居然会不认得我。我康复后开始工作，不过肩上担负养活全家人的责任，包括母亲和残疾的兄弟，我在巴基斯坦没办法赚到钱。于是在2006年9月，我来到香港工作。舅父打电话告诉我：“你去申请中国签证来深圳，然后我会给你办香港签证。”不过我到了深圳后，他说：“不要告诉别人你是我的侄子，要说你是我弟弟。这样你可以不受骚扰地在我店铺中工作。”舅父带我到联合国难民署，我必须成为避难者。

舅父接着把我前妻在巴基斯坦的兄弟带来店铺，他们给了他一张香港身份证，然后打算把我送回巴基斯坦。于是我到香港警署投案，因为这是我唯一能留在香港、不用回到巴基斯坦的办法。我赚够可以跟这些人抗争的钱，才会回巴基斯坦！

我被送到香港的羁留所。每间牢房里有四个人和一个厕所，

你要在所有人面前使用厕所，这在香港是最令人羞耻的事情。你不会受到肉体上的折磨，他们会让你在所有人面前多次脱掉衣服，这就是他们让你为越过边境感到羞耻的方式。他们有权这么做，因为你非法进入他们的家园。

我离开羁留所后，舅父拿走了我的手机和一半的钱，大概是400港币，甚至包括我从他那里借来的一件球衣。不过我心里仍然觉得这是神的恩赐，因为至少我现在可以打工了。接下来的一个月，我生活得很艰苦，因为没有钱，后来我开始一点点赚到钱。我对金钱的保存地点很小心，我与其他几个人一起住，不能完全信任他们。我要将钱汇给家里的母亲。最近这两个月，我每次能给家里汇去1,500港币，能给家人汇钱让我感到自豪。如蒙天佑，我会成功的！我已经将塔利班要杀我的事情告诉给联合国难民署。这是真的。

我赚来的钱仍然不多，还需要时间。我是家中唯一一个挣钱养家的人，我已经尽力了……没错，我如今的遗憾是没有娶香港舅父的女儿，因为当时被骗了。他们早在十五年前，已经计划好谁应该娶谁，他们多年前就已经计划好我的婚姻。我的前妻当然知道这个计划，她是一个重要角色，她曾经每天和我讲两三个小时的电话，全是骗人的。我曾爱她！从她的角度看，她牺牲了前一段恋情，并假装爱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她兄弟的香港身份证。她牺牲了自己的爱情，但又不愿意接受和我一起生活的事实。

假如她接受自我牺牲的事实，也许对她和我都好一些，我也许能在巴基斯坦有一个快乐的人生，才不会来香港。但在那

件事情发生之后，我再无法继续生活在那里。我被亲戚们逼得死去活来，我知道自己必须去国外生活。

Hasid Adan

我出生于1981年，我在2006年3月28日离开了索马里的摩加迪沙，当时家族部落之间不断发生冲突。对，我有许多家人被杀害了。从1991年开始，索马里的每个人至少有一两个家人遇害，也许他们还目睹了事件的发生。在现在的索马里人杀人不需要理由，你没任何办法，因为那些人来自最有权势的部落。如果你还击，杀死了杀手，他们会除掉你全家人。我的大哥和母亲仍然身在摩加迪沙，希望神能保佑他们。我真想哭。但就算他们今天死去，我也不会感到太悲伤，因为他们在我心中仿佛已经死了，那里的每分钟都可以发生任何事情。我只能向神祈祷让我做些什么帮助他们，我的母亲就是将我送去国外的人。

在1994年，我还是一个小孩。他们杀死了我的父亲和姐姐，因为他们说父亲是举报人。我认得杀死他的三个人，其中两个人后来也被杀了。我从来没有碰过枪支，我不会碰它。我的家族没有权势，我们只不过是生意人。你目睹过一些事情，并不想告诉其他人，而是深埋心底。在索马里，如果你不祷告，有些人就会杀死你；如果一个女人不戴头巾，他们会杀你；如果你念古兰经的时候出错，他们会杀你。他们不是真正的穆斯林，因为他们使生灵涂炭。

我有两个姐妹在 1996 年遇害，一支火箭弹炸毁了她们的住所。我的哥哥吸毒，不太可靠。舅父对我母亲说：“你可以把 Hasid 送去国外。出国后会有人照顾他，你付给他们 6,000 美元或 7,000 美元就可以了。”他们向我母亲承诺会把我带到美国，但他们却带我到了香港。他们向我解释关于联合国难民署的事情，说政府会替我付房租，如果我拿到难民身份，就可以去美国了。我认识一些直接去美国的索马里人，他们直到现在还不能工作。我在入境处监狱中待了一个月零六天，当时我多么开心，因为我知道自己不会死！而且那里没有人会打我，我受到尊敬，入境处待人很好，会说“好的，先生”、“好的，太太”。完全不像索马里，那里一个十一岁的小孩都可能会杀掉你。

那次之后，我曾经两次在香港入狱。第一次的情况是——好吧，我在家乡从来没喝过酒——我到香港一个月后，一天晚上第一次喝了威士忌，我不清楚自己做了什么事情，完全昏了头脑，醒来的时候已经在警察局了。我喃喃自语“天哪，这只不过是一场梦吧”，但却是事实。他们向我解释说，我与一帮尼泊尔人发生肢体冲突，显然我打破瓶子敲向了某人的脑袋。有目击者看见我的所作所为，尽管我自己不记得任何细节。后来他们判我入狱七个月。没错，我很幸运，因为他们没有将我遣返索马里，联合国难民署和香港入境处都帮了我，因为他们明白索马里的局势。如果我回去，索马里的人会杀掉我。

联合国难民署给予我难民资格，帮了我很多忙。索马里人可以去美国、加拿大、欧洲工作，不过根据入境处文件，我们

不可以在香港工作。但是我有打工，我在狱中认识了巴基斯坦人、印度人、孟加拉人，他们都打工，在重庆大厦和其他地方的店铺及餐馆中做帮手。他们有的人每月能赚 5,000 港币，还有人能赚 9,000 港币！我出狱后开始明白，如果外国人做华人的工作，警察会逮捕他们。但是华人不会在重庆大厦打工，所以我觉得警察不会在意。

我出狱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重庆大厦的一间旅馆打工。他们付的工资不高，每个月 2,200 港币和每天 40 港币膳食津贴。我在那里只工作了一个月零二十天，因为有顾客投诉，一个白人男子声称自己的钱包不见了，但是这个人第二天早上六点才回来提起这件事，他有可能在其它地方丢了钱包。他投诉报警，于是我逃走了。几个星期后，一个尼泊尔人又投诉说，他放在房间的手机不见了，我可没有偷手机。这个丢手机的人是尼泊尔人，我的老板也是尼泊尔人，所以我选择离开，说不定他们两个串通一气演戏！

后来，我开始替一楼的马里人工作，帮他们把手机发送到非洲。他们付给我 20 港币或 50 港币，让我把手机装进箱子里，手机商逐渐与我熟络起来。如果我带来一个顾客，他们每售出 1 个手机就给我 1 港币，也就是说，如果顾客买了 50 个手机，我就能赚 50 港币。我渐渐赚到更多回扣，每个手机我能获得 3 港币：如果顾客要购买 300 个手机，我可以赚 900 港币。一旦有人认识和信任你，这种生意就很好做了。

接着我开始结交索马里的朋友，一些会去内罗毕做生意的人。他们有肯尼亚护照，在肯尼亚经商——没有人在索马里经

商，除非每一两个月发送一个集装箱的货物，并且有五十个持枪的人保护，才有可能。索马里人很有生意头脑，有的人曾经在美国工作过五年或七年，积攒下5万美元，然后开始在内罗毕经商，我就替在香港的这种商人工作。我赚到的最大一笔钱有18,000港币，当时卖车给马达加斯加的商人，我帮他们做了所有事情，因为他们不会说英文。后来，我将钱汇给索马里的母亲——把钱先转给英国的一个人，然后通过他们用非正式的途径，把钱送到索马里。

我又遇到一些纳米比亚人，他们说：“我们都是黑人弟兄，需要你帮忙。我们有一些钻石，但是没有相关证书，所以想通过黑市交易。”我和朋友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我们对这种生意毫无所知，但抱着也许能捞到一笔可观的佣金的想法，大家在一间咖啡店见面。他们给我们看了一些钻石样品，我分辨不了钻石真伪，心想，在香港没有人会不测试而直接买钻石。

我的任务是寻找买家，我打电话问了懂行的非洲朋友，他们说不会有人携带七十颗货真价实的钻石。我们找到了一些中国买家，我告诉他们：“你瞧，我对这些石头没有多少了解，也不信任这些卖家。你确定要购买吗？”他们说钻石是真的，而我们会得到15万美元的佣金。第二天，我们把中国人带去见黑人卖家，那些中国人事先已经报警，见面五分钟后，五十名警察来到我们面前。

我是唯一的联络人，虽然我对钻石生意没有任何认知，但他们还是逮捕了我，我当时害怕极了。最后，我在高等法院受审，法官是一个好人，愿意让我讲话。这件事发生在2008年10

月，香港法院撤销了案件并将我释放，还说：“如果你想投诉，可以照做。假如警察拘捕了清白的人，他们会因此付罚款。”我回答说：“如果你释放我，我会感谢警察和香港法律。”于是他们给了我自由！

这件事发生后，我停止了工作，想去美国。我在这里的美国领事馆做了两次面试，向他们解释自己在香港有犯罪记录，他们说我仍然有机会去美国。其实，问题是我总想做些什么事情，我们避难者在香港有80%的空闲时间，所以我现在开始学习语言，学普通话或粤语，还有西班牙语或意大利语。我曾经将所有精力放在工作上，但现在我想按规矩做事。你要知道，神已经在香港帮助了我两次。如果我再第三次胡来，就证明我疯了或很愚蠢！

避难者的待遇变化

过去几年来，避难者在香港受到的待遇有显著变化。2005年以前，主要由联合国难民署及其香港办公室处理避难者的个案，香港政府将避难者的案例都留给联合国难民署解决，而后者人手不足，无法应对2005年之后陆续来港的大批避难者。

2006年至2007年之间，联合国难民署不再签发正式信函，只给予面试回条，而回条不足以提供法律保障。在这段时期，避难者经常遭到香港警察拘捕，我认识的避难者一旦见到警察就会赶快跑开，因为避难者被拘禁时期不确定，从一个月到六个月或以上不等，甚至无限期。亚洲和非洲来的避难者在香港是一个新现象，显然香港政府还未制订相关政策，而是把他们无限期关押起来，以便阻止更多人来港。我认识许多避难者，特别是非洲人，他们的外貌在香港很显眼，所以担心被捕，因此日复一日待在房间里。

不久，香港媒体开始讨论这种不公，特别是英文媒体，正如《南华早报》的社论：“香港对避难者的待遇令人汗颜。”^① 避难者发起抗议，在联合国难民署香港总部外游行，还有大约三十

^① “HK’s Treatment of Asylum Seekers Shameful”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Editorial, 2006年7月7日。

名非洲避难者被监禁数月，他们通过绝食抗议。^①各方香港议员和香港入境处处长都探访了这些人。

由于这些抗议示威，香港政府缩短了避难者的监禁期限，变为少于一个月，更多是一个多星期的期限。监禁是惩罚触犯香港入境条例的措施，避难者在监禁后会得到身份证明纸，这是一张过塑纸片，是让所有避难者用以替代护照或香港身份证的文件，以免再次因触犯入境处条例而入狱，至少在他们的个案得到决议前可以如此。

自2007年以来，避难者在香港人权律师的建议下，开始通过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的渠道寻求难民资格，而不仅仅通过联合国难民署。香港政府签署了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因为它不是一条关于难民资格的联合国公约。由于联合国难民署难以处理积压下来的个案，而且对许多避难者的困境漠不关心，因此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应该求助于香港政府——尽管不能通过香港政府获得第三方国家的难民资格，香港政府也从未向境内避难者给予居留权。

正如我们从 John Mukasa 的话中得知，联合国避难署不像香港政府那样会被起诉，也不需要听命于香港任何一个人，显然这在世界各地都如此，不仅仅在香港。Harrell-Bond 写道：“正如一位……联合国避难署的管理顾问承认的，‘我们并不效命任何政治、政府或商业范畴并缺乏判定公民或消费者满意度的组

^① Kang-chung Ng, “Asylum Seekers on 3-Day Hunger Strik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07年10月17日。

织。”^①

我多年来与避难者打交道，很难听到一句关于联合国难民署的好话，众多避难者将其视为无能和随便判案的组织。而另一方面，香港警察和政府被大家看好。我曾与一位联合国难民署的职员谈话，得知难民署不得人心的原因在于，避难者将联合国太过理想化，因此其错误被看作是不可原谅的。香港警察则被与避难者祖国的警察相作比较，他们觉得不收受贿赂和相对公平的香港警察十分了不起。

2009年，避难者仍然需要通过坐牢拿到身份证明纸，从而能在其个案判决前合法逗留于香港，以及从香港政府委托的慈善机构国际社会服务社获得房租及生活用品补贴。许多避难者不愿入狱，认为监禁一定是可怕的经历，正如过去几年一样。然而，我曾在2008年问过一些避难者，让他们告诉我监禁经历，他们都说：“还不错。有独立的厕所间，他们还给我们报纸看，还有一个电视机。”违反入境条例而受监禁的各国人士，被配备相同的设施。我在重庆大厦多次看见，非洲人和南亚人彼此拥抱，原来，他们在监禁后变成了好朋友，如今在牢房外获得自由并再次邂逅。

正如我们所见，尽管现在避难者可以通过联合国难民署和香港政府两个机构获得个案判决，他们拿到难民身份并到第三方国家定居的机会仍然十分渺茫。但是，个案判定失败一般不等于遣返回国。避难者中传言被拒的申请人可能会被迫送回家：

^① Harrell-Bond 2002, 53。

“如果你的申述失败，他们会直接把你带走，给你注射镇定剂，然后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把你遣返回国。”不过据我所知，香港政府并不会强迫申诉失败的避难者回国，而是试图促使他们同意回去，而且香港政府显然还要负担遣返费用。正如一位避难者告诉我的：“警察也许让你坐牢，连续几个月把你留在那里，不过他们不会让人入境处遣返你回国，除非你自己要求。”

这条规则的唯一例外，就是犯下严重罪行的人，不过即便如此，遣返的例子也并不多见。由于极少申请人获得难民资格，而且极少人被遣返回国，因此避难者人数不断增加，暂时没有解决方法。人权律师不断将案件提交至法院，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出现如今的情况，这种情况不可能持续下去，终究需要让步。

那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香港想通过给避难者提供刚刚好可以忍受的人道主义环境，以达到避难者人数最小化。我在重庆大厦认识的避难者，首先希望能够合法在港工作，但这又会导致成千上万的避难者涌入香港。

的确，这种情况发生在了2009年3月至11月期间，3月，法院裁决避难者可以合法工作，但其雇主仍会被检控；^①到了11月，避难者工作行为再次变成非法，可被判入狱三年。这几个月内，大批新避难者入境，他们中有许多人是南亚人，夜晚从

① Yvonne Tsui, "Asylum Seekers Allowed to Work"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rch 3, 2009.

中国内地乘船进入香港，结果政府急忙修改法律。^①接着五百名避难者举行示威游行，反对香港政府此举。一个不久以前来港的巴基斯坦避难者告诉我：“在香港盗窃或吸毒的人只要坐几个月牢，但是没有正当文件的打工仔却要入狱三年！太不公道理了！”他当然也加入了抗议示威，但却无济于事——他最终停止了工作，因为害怕被捕和受到起诉。

香港政府对避难者的问题十分担忧，一位高级官员将不断增加且无身份证的避难者称为“定时炸弹”。^②香港无疑能接纳比官员愿意承认的数字还多几千名的避难者，特别是许多避难者有较高知识水平的情况下（他们可以成为优秀的中学英语教师和文化使者）。香港避难者议题的讨论变幻莫测，但一个可行方案是，政府可以允许已在港的避难者工作，同时大幅缩紧签证政策，这可以解决避难者的问题，不过也会关闭未来申请人士的门路，也会改变重庆大厦的本质。重庆大厦的存在主要依赖于香港愿意给多个发展中国家的访客提供免签证入境政策，而且不骚扰经商或受聘的这些人。

香港政府为了解决避难者问题，却摧毁了重庆大厦，这将是很讽刺的事情。本文写作之时，香港政府正计划落实及加快筛选避难者的进程。^③许多人推测香港政府近年会签署

① Clifford Lo, "Ruling Blamed for Influx of Asylum Seeker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09年5月14日。

② Phyllis Tsang, "Torture Claimants 'A Ticking Bomb': Refugees Without ID Difficult to Remov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09年11月29日。

③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2009。

1951年难民地位公约，令香港从联合国难民署接受并承担避难者的全部责任，显然这也是联合国难民署香港办公室主任的目标。^①

假如此事成真，香港避难者的处境将发生急剧的变化：如果香港政府的调查人员接受适当训练后，加快判决避难者的命运，香港似乎不再会是经济避难者的避风港。另一方面，也许在判决避难者资格方面，香港政府的调查人员和联合国难民署的援助不过半斤八两——如果避难者被遣返和杀害，香港政府将无法承受媒体曝光。事情将如何解决，还有待观察。

如我们所见，重庆大厦在人权背景和更广的经济发达世界背景下，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地方。^② 一个关键矛盾是政治人权和法律及经济权益之间的差距，前者是人们寻求避难的原因，但后者却不是：为什么这条界线要如此明显？另一个矛盾在于，口才好、思维敏捷或能够唤起面试官同情心的避难者，最容易拿到难民资格，口才好或不好的人也许都受过折磨，但是能表现智慧和情绪的人拥有极大优势，因为他们能说服别人相信自己经历的真实性。

第三个矛盾在于，与循规蹈矩不打工的避难者相比，违反规则并工作的避难者几乎无一例外地更加开心。假如一名

① Phyllis Tsang, "HK Asked to Unify Screenings for Torture, Asylum"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09年11月29日。

② Englund (2006) 描述了人权活动也许反而增加了对贫困人民的压迫；Verdirame and Harrell-Bond (2005) 描写了发展中世界人权机构和难民救济政策夺取了难民的人权。

避难者非法打工，那么这人在香港就可以拥有更好的生活，还能汇钱给家人、支持家人和建立未来的居所，而且这个人也可以忙于处理新事物。那些守原则（或懒惰）不愿意工作的人们没有此类机会。总而言之，成为一名遵纪守法的避难者是一个可怕的命运，违反规则也许会带来还算不错的新生活，特别是对于那些可以做私有贸易经纪人，或做生意的精明人士来说。

当然，对于避难者和重庆大厦中的其他人来说，法律的制订是为了受到遵从，只要一个人不贪心或不明显藐视法律，就不会被捉拿，这正是重庆大厦的规则，正如我们在此章节可见。我认识的一些避难者的悲剧在于，尽管他们因为非法移民身份触犯法律而被监禁，他们却是重庆大厦中少数认为应该完全遵守法律的人。

这就是最后的矛盾，即遵守法律，这些避难者不仅是重庆大厦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弃儿。



未来



future



重庆大厦不断变幻的想象

本书显现不同人群对重庆大厦抱有的不同看法。许多香港华人依旧想象它是一个黑暗和充满罪恶的地方，来重庆大厦住宿的很多游客，事先只是在网上按价钱选择了旅馆，等来到大厦才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也许会感到震惊。我们之前还看到，有些游客认为重庆大厦是“第一世界安全城市中一块另类的第三世界地区”，这种形象让他们感到刺激或害怕。

另一方面，许多南亚和非洲发展中国家的人们，继续想象重庆大厦是梦想的指明灯，一个能让人赚大钱、不再穷困潦倒的地方，而非邪恶的地狱或异域。但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实现这个梦想，大部分人只能继续做白日梦。对于印度临时工来说，重庆大厦折射出他们想要成为中产阶级的努力，他们渴望比加尔各答的白领赚到更多的钱。对于许多年轻的非洲商人而言，在重庆大厦或更广阔的中国南方获得成功，表示他们长大成人；如果他们失败了，就会受到羞辱，但是他们一旦成功，就会成为父老乡亲所尊重的人。对于很多避难者，重庆大厦象征家园的诱惑和危险，不仅因为他们能与同样离开原先那个世界的的朋友共餐，也因为有些人认为自己必须提防商人中的间谍，那些间谍也许会把他们的行踪报告给政府。

这些关于重庆大厦的想象，在一定程度上不断变化着。对

于许多非洲商人而言，中国内地已经替代重庆大厦，成为实现梦想的宝地，重庆大厦反而成为一种休闲之地，一个让他们需要更新中国签证或放松的地方，因为他们在中国内地的工作太忙碌了，无法在那边休息。重庆大厦基本上是这些商人的一个度假地。香港的种族不公现象在过去几年中已经明显减少，香港因此增加了对某些人的吸引力，相比作为生意地点，更多是休闲去处。对于一些主要在中国内地活动的非洲商人来说，重庆大厦已经成为发展中世界的绅士俱乐部。

旅客的观念似乎也有所改变。我在2009年遇到一些旅客，他们向我表示出对重庆大厦的失望，按一个法国游客的话说：“我九十年代来这里的时候，这里非常疯狂。现在它看起来太正常、太资产阶级了。”一名二十年后回到重庆大厦的美国人告诉我：“如今重庆大厦比以前漂亮多了，这些电梯非常好！……但是你要知道，以前的重庆大厦更好！现在它已经很中产阶级了！”虽然最近几年大厦已经被刷新了几次，人们还是不会将它与外面闪亮高档的重庆森林购物商场弄混，二者有天壤之别。不过，大厦相比几年前确实更盛装打扮了，底层有许多电子屏幕不断播放鼓舞人心的信息。**重庆大厦仍然是世界各地人们的混合“异域”，但它也许开始一点点变得“正常”了，因为世界本身渐渐变得越来越“异域”，世界上不同文化宗教背景的人都能在普通场景互动交流。**

过去几年来，对重庆大厦的想象变化最大的就是香港人。从我开始研究重庆大厦以来，媒体几乎没有发表过任何关于大厦的负面消息，而在那之前的媒体报道几乎总是负面的。媒体

也许仍旧承认这里有非法劳工和仿冒商品，但不再玩这些文字游戏了，媒体传递的主要信息在于，重庆大厦大致是一个友好的地方。香港中文媒体的餐厅点评也让人们觉得，可以把家人带到重庆大厦用餐，大厦底层保安的存在再次加强了这一印象。于是，我渐渐看到年轻的香港华人走进大厦，有时还与南亚人和非洲人谈天，这种景象在几年前难以想象。

2009年初期有两个例子，可以证明以上观点。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遇到一名香港华人中学教师，带着二十几个学生的团队，她让学生们尽量访问来自各国家背景的人们。学生们在重庆大厦底座散开，向可能回答他们问题的人发问。这些带着新鲜面孔和热诚态度的香港青少年问：“在你的国家，人们吃什么样的早餐？他们午餐吃什么？晚餐呢？”不论这些问题有多么幼稚可笑，我仍惊奇于这种良性的文化交流，居然能发生在昔日罪孽重重的重庆大厦。从那以后，我偶尔还会见到几位教师，后面跟着鼓噪的学生。

第二个例子更令我意想不到。一个情人节的午后，一个旅店的西非职员看见眼前有一对年轻害羞的香港华人情侣，岁数大概二十左右，他问：“你们为什么来这里？你们想找餐厅吗？”男孩鼓起勇气，结结巴巴地说：“我们想要一个房间。”开了房间后，他们马上进去并关上房门。我随后问了好几间旅店，发现这种情况日益常见。未婚的香港情侣住在父母家，往往没有隐私，也负担不起昂贵的酒店房间，于是越来越多人来到重庆大厦。几年前，人们无法想象年轻的香港情侣将重庆大厦作为爱巢。如果男友向女友提议去一个如此黑暗荒废的地方，任何思

维正常的年轻女性都会火冒三丈。但是如今，这至少不是一些年轻香港人的心理障碍了。

较有冒险精神的年轻人，对于重庆大厦的观念似乎有所改变，或许整个香港华人群体亦如此。我暂时作出这种假设，因为三年多的田野考察太过短暂。任何一个突然发生在重庆大厦或世界上的事情可以改变一切，也许是令人咋舌的罪行、一场全球大萧条或是一个地产策划，这确实已经小规模发生了。侦探小说家迈克尔·康奈利在最近的畅销书中，以一个黑暗和不现实的角度描写了重庆大厦，也许会影响人们对重庆大厦的看法。^①2008年11月，一个名为 Ani Ashekian 的31岁加拿大游客在香港消失，这与康奈利的小说在某程度上相呼应。^②但是没有证据显示她的离奇消失与重庆大厦有关联，她最后一次被看见身处远离大厦的一个购物区。不过无论如何，重庆大厦的主流形象仍然是我之前描述的那个样子。

① Michael Connelly, "When Fact Meets Fiction, the Cases Are Harder to Solve" *CNN*, 2009年10月29日, <http://edition.cnn.com/2009/CRIME/10/29/michael.connelly.fact.fiction/index.html> (2009年10月30日查阅)。

② Christopher Shay, "U.S. Crime Writer Tackles a Real Hong Kong Cold Case" *Time*, 2009年11月10日, <http://www.time.com/time/world/article/0,8599,1937140,00.html> (2009年11月12日查阅)。

重庆大厦如何改变人们

如果关于重庆大厦的想象正在变化，在其中生活的人们的想象也会变化。重庆大厦如何改变了那里的人们？当然，对于只在那里住几天的游客，和对于多年生活在那里的人，重庆大厦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交错其中的还有那些受到重庆大厦文化多样性改变的人们，以及那些似乎没有受到文化多样性影响的人们。

有的人并未受到重庆大厦任何影响。我曾经问一名尼日利亚商人，他在重庆大厦和中国内地的经历，是否在任何方面改变了他。尽管他愿意跟我这个外国人长达几个小时谈论他的商人人生，他还是答道：“当然没有，我来到世界的这个角落，一心一意为了赚钱，不是来交朋友的。”他坚持说自己在海外的经历没有影响他对世界的理解。我在第一章曾经提到，有些在大厦工作生活的香港华人，在大厦里没什么朋友或熟人，一生也不曾吃过南亚菜，他们也许比其他香港华人更能包涵种族多样性，因为他们与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共用一块紧凑的空间；不像其他香港人，他们在物质层面进入了更广阔的世界，但他们心里仍然认为这与自己的人生毫无关联。

这些人声称自己不受重庆大厦、香港、中国内地的环境所影响，简单说来是为了宣称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即他们是伊格博人、巴基斯坦人或华人，这些身份不因他们在海外的所见

所闻而改变，其他人则有意识地拒绝香港或中国内地。重庆大厦中最不受欢迎的种族当然就是香港华人，如我们所见，南亚人与非洲人往往对华人表示反感。^① 一个来自西非的年轻商人有点喝醉了，生气地对我说：“香港人会因为他们的种族主义而全部下地狱！”2008年，一名印度穆斯林男性告诉我，他本来在第一次旅游签证过期后就会离开重庆大厦，再也不回来，而且以后如果自己再次出国生活，会去沙特阿拉伯，因为那里没有令香港腐败的歪风邪气，我后来真的再也没见过他。对这种人来说，香港不是一个中立且不影响他们人生的世界，而是一个应该受到谴责和回避的邪恶世界。

然而，还有许多有同样背景的人们并不厌恨香港和中国内地的新新世界，反倒为其着迷（或蛊惑，按照前几段描述的那些人的话来讲）。我目睹两位东非商人，一个在中国内地经商，另一个在香港经商，他们醉酒后挑起关于这两个地区的争议。生活在重庆大厦的那个人大叫道：“香港比中国内地更有人权意识，香港人也看不起中国内地人！”另一个住在广州的人则宣称：“香港所有东西都来自中国内地！如果没有中国内地，香港根本无法生存！”这种争论也许会发生在坦率的香港人和中国内地人之间，但这次是发生在两个非洲人身上，二人不遗余力地护卫自己暂住的家园。我还认识一些彻彻底底迷恋上中国内地的非洲商人。我曾经与一个加纳商人聊天，他去广州时会与供货

① Wong (1997) 描述了重庆大厦居民对香港人的负面看法，这种描述如今仍然存在。

的工厂老板及其家人一起住，我问他：“那个人是你的朋友吗？”他回答道：“嗯，不是，他更像是我父亲。”

撇开大家是喜欢香港还是喜欢中国内地的辩论，重庆大厦还孕育出一种世界主义的氛围。一名年轻的印度穆斯林，在2006年夏天第一次来香港，他在我经常用餐的一个小食摊工作。一天晚上，他看见两名裸露后背和编金色发辫的东欧性工作者，她们从离他一米远的地方走过。^①他看到我盯着看，立刻用手遮住我眼睛不让我看，说：“先生，她们是坏女人，你不应该看。”但是，我从余光发现，他自己也偷偷盯了很久。一个月后，这些女人又回来了，他已经习惯了这类场景，我问他为什么这次不遮我的眼睛，他耸耸肩说：“她们也要生活，跟我一样。”重庆大厦的这一个月已经改变了他，他道德上变得更加宽容，或者按穆斯林的标准，他的道德更松懈了。

在重庆大厦，来自敌对关系国家的商人和避难者有时能成为好朋友，超越国家或种族间的冲突——比如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或卢旺达与刚果金沙萨。这种情况特别出现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南亚人身上。我认识一些人仍旧不喜欢彼此，有一个替巴基斯坦店打工的中年印度人，我问他是否不喜欢巴基斯坦人，他想了想说：“不，我不是不喜欢巴基斯坦人，我只是很讨厌他们的行为！”他接着——数落巴基斯坦人的坏毛病。两

^① 我不认为重庆大厦当时有任何东欧性工作者，尽管确实有一些在美丽都大厦工作。这些女人显然只是来重庆大厦买电话卡，或者秀秀身材罢了，不论她们走到重庆大厦哪个地方，都有十几个目送秋波的男人跟在身后，她们显然知道，且对此露出微笑。

年后，在2008年底发生了孟买恐怖袭击；一个香港华裔研究生在即将飞往巴基斯坦考察前，向重庆大厦外的托儿询问意见，一个印度餐馆职员仿佛有点兴奋地告诉她：“不要去那里啦！那里除了恐怖分子外什么都没有！他们会杀掉你的！”站在一旁的巴基斯坦托儿生气地盯着他。我为了防止发生斗殴事件，赶紧让印度人向巴基斯坦人道歉，结果他和我一同道歉了。

但是，也有一些人的民族主义反感情绪，受到重庆大厦的改造。一天晚上，我见到几个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熟人互相开玩笑聊天，我问他们：“你们怎么会这样？”他们说：“在印度和巴基斯坦，我们憎恨彼此，但这是国外，我们就是朋友！”孟买恐怖袭击事件后，我听说重庆大厦有许多人担心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会爆发战争，但这不一定会影响到他们在重庆大厦和香港的人际关系。一名印度经理说：“战争是政治家的事！”他那来自巴基斯坦的助理也说（也许某程度上是迫不得已，但我没有察觉到这种态度）：“即便是发生战争，我们也依然是朋友，这在香港没有任何区别。”事实上这究竟是否真实，只有一场战争才能揭晓谜底。无论如何，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在他们祖国的敌对态度，在香港有所减少，因为香港、尤其是重庆大厦允许并需要一定程度的相互包容。

2008年的一个晚上，我来到九龙清真寺，享用斋月中结束了一天斋戒的晚餐。我通常不会进入清真寺，但我站在门外的时候，被一个熟人拉了进去。我跟着他来到斋戒沐浴的房间，按照他教的方法洗手、脸、尤其是脚。事实上，去清真寺的两个小时之前，我在一个离重庆大厦不远的酒吧里使用电脑工作，

还喝了一瓶啤酒。如果清真寺里有人事先在那间露天酒吧见到过我，我担心自己会受到严重的袭击，但这并未发生。当大家享用扁豆、水果和其他食物的时候，我坐下的餐桌旁都是皱着眉头的巴基斯坦陌生人，不过有几个巴基斯坦和非洲的熟人朝我走来，兴高采烈地欢迎我。

后来，我问一个巴基斯坦朋友：“为什么清真寺的人对我这么好？”他说：“他们在那里更加心胸宽广。在巴基斯坦，他们是纯洁的穆斯林。来到香港，你必须得心胸宽广。如果你在巴基斯坦也这样，可能会被杀。”在2009年9月，我又去清真寺参加斋月晚餐，几个重庆大厦的巴基斯坦朋友高兴地招呼了我。

我在重庆大厦从未遇到穆斯林引起的宗教纠纷事件。有一次，我与大厦一楼伊斯兰书店的店主长聊，告诉他我的感觉，重庆大厦中的穆斯林比基督教徒或不信教的人更有宽容心，似乎也有更高的道德标准。我想与他做朋友，于是愚蠢地说：“喝酒嫖妓的人一般都是基督徒，不是穆斯林。”^①他看起来很震惊，回应道：“先生，你错了。伊斯兰的第一条戒律，就是不要批评任何其他宗教。所有的宗教都有各自神圣的方面。”受到教训后，我表示抱歉，他是对的。我之前以为穆斯林比基督徒更加宽容（非洲基督徒有时向我传教，警告我如果不接受神，可能有下地狱的危险），也许因为我是一个白人，所以别人假设我生来就

① 这不仅是我的个人观点，有一位华人店主反映了许多其他人的观点，说穆斯林顾客比基督徒更好，因为前者出于宗教信仰，认为自己不应该骗人，而后者则因推迟付款而臭名昭著。不过，重庆大厦中也有不少喝酒嫖妓和做其他坏事的穆斯林，可以断定并非所有人都遵从伊斯兰的道德要求。

是基督徒。

总而言之，重庆大厦以及整个香港，确实给世界带来一股包容多样性的力量。重庆大厦能够如此，正是因为它在狭小的空间中，有如此多不同国籍和宗教的人群，不可能接受不宽容。如果一个人不接受不同的文化、教义、道德准则的存在，就无法在重庆大厦生存和经商。香港社会能够如此，则是因为其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最为强调对金钱的追求，正如我们之后会讨论到的。暂且不论这种宽容态度能否延伸至人们在重庆大厦以外的生活中，至少这在重庆大厦内是主流态度。

文化身份认同

一些重庆大厦居民的态度转变，最终牵涉到他们的文化身份认同——即他们文化上认为自己是谁，认为自己属于什么地方。我经常加以提问的是：“你宁愿在家乡生活，还是在香港？”继而收到了各种不同的答案。

例如，我曾经和两个二十多岁的西非商人聊天，其中一个人说：“我喜欢我的国家，因为家人在那里。但是我也喜欢香港，因为这里很安全，你可以花钱，不需要担心。没错，如果可以，我愿意离开祖国搬来香港。”另一个人说：“我不会那么做，我爱祖国！我想在祖国居住，也许有时不安全，但那是家园！”我多次听到此类异议，一边的人希望离家去诸如香港等更加富裕的社会，另一边的人则因为爱家而想留在祖国。对前者来说，重庆大厦的世界主义很美好，而后者认为这是必要之恶。以上论点包含了安全感的因素：你在哪里能够平平安安地生存，不需要担心别人拿走自己的钱财？而你又会把哪里当做自己可以归依的家？

有些商人的答案完全取决于现实考虑，即生意。一个来自中非的商人，以一种重庆大厦里常见的口吻说：“我爱祖国，但任何能让我赚钱的地方就是家。”一个巴基斯坦商人给出了另一个典型答案，他说自己不喜欢香港，因为所有事情总是可行且处于狂热状态，不过他在香港比在巴基斯坦赚更多钱，所以有

理由留在香港工作。这种策略就是在海外赚钱，然后回到更加休闲和熟悉的家园——不过当然，也许在离家几十年后，家已经不再是那个家了。

与我交谈的时候，许多人带着一种不论他们行到何处都会一直爱国的态度。让我最惊奇的是某些避难者也有这种态度，而他们往往是受到迫害才远离家乡，按一位巴基斯坦女人的话说：“没错，有的巴基斯坦人痛恨我这种信仰阿赫迈底亚教派的穆斯林，^①但我仍然深爱祖国。那些恨我们的人只是祖国一部分人，不能代表整个国家。”也许正是因为许多人被迫离开祖国，无法回家，导致他们以深深的爱国情绪作为补偿。至少对一些人来说，尽管祖国政府曾经企图杀害他们，他们仍然爱着祖国。

对其他一些人来说，爱国看起来并不是很高尚的情感。一位非洲商人对我发表长篇大论，似乎他的爱国情感来源于他在那里坐拥的财富和强权，这些东西和其他特权令他肆无忌惮地摧残女人，以及享受金钱带来的权力：

我：如果可以的话，你想在香港居住吗？

B：我怎么能留在香港呢？我在祖国有家人，我有房子、汽车、所有一切，我怎能不要那些？

我：让我假设一下，我给你签证，允许你带所有家人来这里。

^① 阿赫迈底亚的穆斯林，是一群十九世纪宗教运动产生的信徒。在广义来说，阿赫迈底亚和伊斯兰的关系，类似摩门教与基督教的关系。巴基斯坦已经宣告阿赫迈底亚信徒是非穆斯林，因此迫害他们。

B: 不, 不行, 我不会这么做。我不能住在这里, 这里太贵了, 家乡更好, 我可以用母语交流……我在祖国有自由, 不像香港, 在我的国家, 你可以打女人, a 你可以杀掉女人, 没人会在意, 我在这里就不能这么做! 在家乡, 如果有女人打我, 警察会打那个女人! 对, 在我家乡生活更好, 能做我想做的事情……我爱我的家人, 我爱祖国。没有人敢动我, 因为我有权力。不, 警察不认识我, 但是警察认识钱! 你有钱就有权力! 对, 因为我在祖国有钱, 我想住在那里, 那是我的家园。

我在第三章提过, 许多非洲商人在他们的国家属于上流阶级。以上访谈表明至少对有些商人来说, “杀人不偿命”的特权和能力是令祖国吸引人的一大因素。

其他来自非洲和南亚的商人, 对祖国没有这么强烈的归属感, 正如上一节所讨论的, 他们是世界主义者。一位曾经来港数年的印度临时工与 Gusto 聊天, 说老板带他去中国火锅餐馆和日本寿司店, 他叹了口气: “我真希望能居住在香港, 可以一直尝试新鲜事物! 我爱重庆大厦! 这里有这么多种人! 我每次在印度的时候, 都一心想着回到香港, 回到重庆大厦来, 我想学习新事物。”

我在重庆大厦邂逅的一个尼日利亚商人说: “我不想总待

① 他讲这话之前, 我们在重庆大厦拐角的 7-Eleven 店外, 目睹一个菲律宾人打了一个非洲男人一巴掌。我在过去几年见过好几次这种打人巴掌的事件, 但这件事令他十分震惊。

在一个地方。”一个年轻的加纳商人也说：“我喜爱旅游和探访不同的地方，我已经去过西班牙、意大利、美国和印度，不仅仅是为了做生意……这不仅与赚钱相关。人们到世界各地旅游，对人生会有不同的理解。”我们第三章提到的尼日利亚商人 Abraham Idowu，称自己是“黑皮肤的中国人”，愿意二十年后还幸福地住在中国内地，他说：“我可以适应任何地方！”这类人的身份认同是世界公民，我认为他们在重庆大厦属于少数。

世界主义不一定是一种选择。一位年过四十的索马里商人，背井离乡到瑞典居住，现在在中国内地生活，他告诉我：“我有50%的身份是中国人，25%是瑞典人，25%是索马里人……你每次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就会失去旧有的身份。我离开索马里已经有26个年头，我没有根，我不知道自己属于什么地方。”他叙述自己在1982年离开索马里，来到中国内地上大学：

当我来到中国的时候，祖国陷入内战。我拿到学位后，在一个位于瑞典的难民营进行注册。瑞典并不承认我在中国的学位，所以最后我还是回到中国……中国最好的地方，就在于每个人都想赚钱。我的姐妹住在美国的明尼阿波利斯，所以，如果可能我也愿意去那里，但她也没有根！没有根不是一个小事，我宁愿有根，宁愿和朋友们一起住在祖国，帮助我的同胞，但是我回不去了。自从1982年以来，我再也没回去过，那里一片混乱，处在绝望的境地。

他不像我见过的其他大多数商人，他认为世界主义和无根

的状态是一种不受青睐的人生状态。比如说现在，他觉得自己无家可归。

人们也许被迫成为无根的人，但这种结果对于重庆大厦中的许多南亚人来说并非悲剧，特别是那些已经成为香港永久居民但仍不将香港看做是家的人。正如前几章提到过的，有些人通过媒体沉浸在家乡的气氛中，尤其是通过重庆大厦的节庆活动和电视频道。我曾经目睹，一位旁遮比店主看到电视上播放家乡省份发生爆炸袭击，居然潸然泪下，尽管他已经多年没有住在那里。香港是他物质上的家，但他通过选择看媒体，仍然把心存放在印度。

有的南亚人觉得自己无法回到印度或巴基斯坦生活，他们认为自己属于香港。我认识一位年轻的巴基斯坦商人，他希望能迎娶自己的香港华人女朋友，并且为是否应该为了女朋友放弃伊斯兰信仰而挣扎，因为她的父亲坚决反对他的宗教。他也许会为了香港的爱人，牺牲自己文化身份认同中的关键部分。

我们在第二章中看到，重庆大厦中更多的南亚人，多多少少认为自己只是暂时住在香港，尽管他们拥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因为他们觉得香港是个华人地区，所以不是他们的家；他们的梦想也许不是回到南亚国家，而是移民到一个新的国家。这也是一种不得已的世界主义：这些人也许感觉自己是世界公民，但那是出于苦涩的文化需要，而非世界主义的选择。

重庆大厦中许多居民的世界主义与外面香港人缺乏这种世界主义的境况形成鲜明对比。讽刺的是，香港人近年来经常抱

怨自己不属于任何地方，不中不西，如同流浪汉一般。^①重庆大厦中很少南亚人只针对香港华人的歧视问题，他们认同香港华人和自己一样，也许二者都苦于不得已的世界主义。

因此，我们在重庆大厦能得到关于世界主义的不同观点。有的人避开世界主义，以彰显对自我文化家园的热爱；有的人以“世界公民”的姿态拥抱世界主义，希望能尽量多地体验这个世界；有的人采纳世界主义，因为他们被扔进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没有多少选择。

我在重庆大厦中认识的很多人，他们对世界主义的态度反映了他们对“全球文化超市”的观感，我在之前一本书中提到这个名词。^②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文化元素，从食物、音乐到宗教，每个人自由选择超市中的东西，从而塑造自己的人生。文化超市被视为与一个人从小经历和想象的文化根源相反的领域。在世界各地，有些人热爱文化超市，有些人则看不起它，重庆大厦在这点上与其他地方一样。接受文化超市的人们，喜欢混杂着世界文化的重庆大厦；不接受文化超市的人们，以不道德等理由鄙视重庆大厦，盼望能离开大厦，回到自己的宗教文化根据地，或者在大厦内将自己与文化差别间隔开来。

重庆大厦反映的全球文化超市，不一定只受到发达世界富裕消费者的欣赏，它也延伸至发展中世界——大厦中的一些商人和临时工喜爱眼前的文化宝藏，以其塑造自我身份，尽管更

① Mathews 2000, 121-65, 192-93。

② Mathews 2000。

多的人对此表示抗拒，不过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是如此。重庆大厦表现的全球文化超市从高端全球化延伸到低端全球化，这是世界的一部分，尽管大厦中许多人似乎对在全球文化超市中选择文化身份保持着一定距离。

在全球的意义

重庆大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改变人群，也在于帮助我们理解低端全球化的世界，重庆大厦正是其中心枢纽。大厦中买卖商品的人们受到中国新兴产业的吸引，特别是中国制造的商品如此低廉，而且经过香港可靠的商贸环境的过滤。

为了更全面地掌握重庆大厦在全球的位置，我们可以回顾世界体系分析。^①世界体系分析包括世界经济核心国，即最具经济实力的美国、西欧、日本；还有正在崛起的半边陲国，它们希望能加入最强的经济圈子（也许几十年后，它们能对抗或取代如今身居高位的社会），比如中国、印度和巴西；极端的边陲国，则是发展中国家中最贫困的社会。非洲大部分国家和一些南亚等国，代表了极端的边陲国，它们“没被标在任何地图上”，^②特别是全球化的地图上。中国有效地将非洲再次拉进地图，通过让非洲人到中国内地，或去中转贸易站香港（甚至有更多中国人也去到非洲），购入非洲同胞负担得起的商品。

重庆大厦象征中国的全球化商品发送到发展中世界的一个大中央车站，本书中的具体故事，就发生在这个世界经济背景之下。人们有理由批评世界体系分析，因为它注重强调全球化

① Wallerstein 2004 ; Arrighi 2005 ; Hall 2000。

② Allen 和 Hamnett 1995, 2 ; 也可见 Ferguson 2007, 25-49。

的轨迹，没有考虑国家以下和超越国家的全球化进程，本书内容显然包括了此进程。^①然而，世界体系分析给出了一个简单扼要的描述，让我们能有效地分析途经重庆大厦的商品与人的轨迹，因此我使用这个理论。

我们在第三章讨论了为市场带来世界商品的商人，到底是帮助还是损害了其祖国及消费者，这些商品经过半边陞国家的仿冒制造或遗弃，然后通过商人输送到边陞国家。证据可能比较杂乱，但似乎重庆大厦的商品是那些贫穷消费者最能接近全球化的果实，也许这是许多极端边陞国家人们一生中唯一能体验到的全球化。虽然这些商品的质量很要紧，但也许其存在更为重要：在低端全球化中，几亿人能够获得这些商品及其象征。

重庆大厦及其经济活动，不太符合现代全球资本主义的理论。人们有时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是资本从核心国家流向边陞国家，而廉价劳动力导致廉价工厂的产生。^②这在世界范围确实是真的，美国和日本制造商关闭工厂大门，被墨西哥、中国、马来西亚或印度的工厂所替代。这同时也是广东省为何成为经济发动机的原因：香港和台湾几十年前的工厂都转移到了广东。

然而在重庆大厦内部，我们看到与以上情况相反的趋势：不是制造商从核心国家转移到半边陞国家，而是商人从极端边

① Sassen 2007, 57, 81。

② Santos 2004, 297。

陞国家来到半边陞国家，购买核心国家废弃或仿冒伪劣的商品。极端边陞国家的非洲几乎没有什么制造业，那里的商人来到重庆大厦，在这个世界的低端制造中心进行采购。

也有人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全球化的经济体中，资本、贸易和投资是流动的，而人们被限制在地区与国家的束缚中。”^①这在世界上大致上也正确：金钱可以通过点击鼠标瞬间转移地点，而人们留在室内，通过办公室或客厅的电脑屏幕监控这个过程。不过，重庆大厦能够吸引四面八方的商人，正是因为人们大致信赖其中的低端全球化和面对面的人际关系。可信赖的资本、贸易及投资，需要投资者的实体在重庆大厦出现，所以人们跨过半个地球来到这里。在这个情况下，低端全球化与高端全球化的运作一致，规则却截然不同。

如果说重庆大厦的商品是从核心国家转移到半边陞国家、再到极端边陞国家（比如重庆大厦的十四天手机被销售到非洲或南亚），或者商品从半边陞国家转到边陞国家（比如中国制造的商品，也是大厦中交易量最大的商品），重庆大厦中的大多数人移动的方向则相反，即从边陞到核心——基于人均收入的考量，香港代表了核心，而中国内地不是。这种由边陞至核心的移动，不仅发生在商人身上，也发生在重庆大厦的其他不同人群身上。

正如我们所见，来到重庆大厦的非洲商人，在其祖国几乎是中上层阶级的贵族，但来到香港表示他们需要承担一定的赚

^① Tehranian 2004, 22.

钱压力，因为有的人在重庆大厦的小吃店数着硬币给钱，还有人在 7-Eleven 吃泡面解决正餐。他们还把家乡与香港作对比，一个东非商人问我：“为什么我的国家不能像这里一样？”我又回问了他这句，他回答：“也许几年后吧……也许一百年后。”对有些商人来说，香港代表了他们对发达国家的初瞥，有的人也许在对比自己原来的世界后，脑子里一片混乱。

在重庆大厦拥有生意的许多华人店主，从边陲地区来到香港这个核心地区，最后还是留在重庆大厦这个香港自身的边陲区域，尽管许多人在过去几年从中获益颇丰。巴基斯坦经理和印度经理，或者还包括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也从边陲转移到核心，但也有些人想到更加核心的国家，比如英国或美国，家族中几代人不断移民出去。

持旅游签证的印度工人，以劳工身份从加尔各答的边陲地区来到核心地区。他们在香港赚到的工资，远高于在家乡的收入。有几个人告诉我，尽管工作令人感到羞辱——因为他们是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却要来香港做洗碗工、托儿或货物搬运工，但他们能比加尔各答人赚取更多的钱，因此自己在加尔各答拥有“大人物”的地位，所以不虚此行。

避难者来香港的原因在于，他们迫切需要离开祖国，而香港比其他发达国家与地区更容易进入。正因为他们能来到离家万里之外的香港，而不是去其他周边地区，印证了世界上避难者移动的典型模式，也证明了他们有相对不错的境遇。他们有足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才知道“应该去哪里”。他们没有沦落至肮脏的难民营，而是到了香港——无论这里对避难

者来说是多么艰苦的地方，它还是提供了发达世界的简朴待遇，而非发展中世界避难者较差的境遇。

另外还有游客。那些来自贫困国家的游客，想花费最少的钱，体验富裕的核心社会的环境，因此住在其中的发展中世界巢穴。他们同商人、临时工、避难者的路径一样，不过游客并非想从核心地区获得金钱，而是在尽量少花钱的情况下进行体验与享受。另一方面，来自更加富裕国家的游客，则与以上所提到人群的所有路径相反。这些游客并非从边陲地区转移到核心地区，而是从核心地区到“想象中的边陲地区”，一个让他们也许在核心地区能体验到边陲地区的刺激的地方。尽管重庆大厦多年来有一些负面新闻，但它在香港的地理位置令它成为中心地带，仿佛是一个能让人们在比较安全的环境下，体验南亚和非洲文化的地方。

我们通过世界体系分析，观察重庆大厦中来自边陲地区和核心地区的不同社会团体，以及其表现出的不平等情形，从而更能理解重庆大厦。重庆大厦提供了一扇观察多种移民模式的独特窗口，也许反映了介于贫富之间的当今世界。

我们所讨论的不同人群中，大部分人千辛万苦想从贫穷的领域转移到富有的领域。有些人也许能成功，但是在围绕着他们的尖沙咀地区，那些高楼林立的富有领域或许永远不会让他们进入。重庆大厦给许多人提供通往发达世界财富的窗口，以及至少能获得一些财富的可能性，但是这堵墙壁很高，天花板也让人够不着。即使这种情况不适用于所有人，但多数人只能一瞥身边的香港财富，赚取少量金钱，然后多多少少认命并接

受自己获得的东西，除此之外他们并没有多少选择。

新自由主义是塑造我们所讨论的现代全球不平等现象的一个中心思想，它强调市场作为价值的最终主导力量，倡导国家对市场的最小限制。新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的中心原则，^① 不仅被西方市场民主所采用，也被一些憎恨它在社会层面施加影响的政府所接受。^② 由于一系列复杂的原因，新自由主义成为英国政府在殖民统治末期藉此强调商业以巩固其正当统治的愿望，从而也成为香港的主导意识。现在让我来探讨新自由主义如何塑造重庆大厦。

人们很容易进入香港，这令新自由主义显而易见。尽管香港政府近年来缩紧政策，但相比起其他发达地区，香港仍然没有限制访客入境。重庆大厦中的商人和非法劳工，被允许以游客身份进入香港，尽管入境处职员看见这些人盖满章印的护照，知道他们不太可能是游客，但却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来港并将要去重庆大厦的商人和临时工，往往不避讳把自己的目的告诉入境处，也没有受到处罚。确实，也许他们不应该受到处罚，因为他们一般不会夺走香港居民的饭碗。诸如美国等社会对待移民就没有如此以市场为导向的态度，尽管许多人说，如果美国禁止非法劳工，美国许多产业将会崩溃。

香港一般会更加严格削减来自内地的非法劳工，我觉得入境处明白南亚人和非洲人主要去往重庆大厦，因此在法律上不

① Harvey 2005 ; Saad-Filho 和 Johnston 2005。

② Ong 2006。

是一个太大的问题，这些人并没有与香港人竞争岗位，而是在重庆大厦中做托儿、洗碗工、职员、旅店帮工或商人。^①过去两年中，香港入境处显然越来越限制非洲商人入境，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重庆大厦的经济活力，如今更多的非洲商人去中国内地了，因为他们无法获得香港签证。不过相比其他几乎所有发达世界社会，香港依然在签证方面比较开放。避难者也拥有相对自由进入香港的机会，尽管此事对香港造成一些麻烦，^②但却证明了这个地区希望保持边境大致开放的态度。

此外，警方很少因为打击非法劳工、仿冒商品、卖淫或重庆大厦中任何违法行为费心，只要没人投诉即可。我们在第四章了解到了这种情况，警官 Billy Zeng 说过，只要香港企业或个人没有投诉，警察不在意仿冒手机的贩卖。如果买卖双方都知道手机是仿冒品，并且对交易很满意，那么警察大都不会进来干涉。

正如我们所见，他说警察也不愿意介入处理各种非法移民的问题。一个印度朋友告诉我，曾经有一名警察在重庆大厦对他说：“你没做什么坏事，对吧？除了非法打工之外，只要你没做任何坏事，你就很安全。”警察打击毒品交易、抢劫和暴力争执，有时逮捕逾期逗留者，但他们不追究其他方面的违法行为。生意照做，不论是否合法。他们不愿意在重庆大厦内执行法律，

① 令我遗憾的是，我没能找到愿意就此事接受采访的香港入境处人员。

② Phyllis Tsang, “Torture Claimants ‘A Ticking Bomb’: Refugees Without ID Difficult to Remov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09年11月29日。

在媒体施压或法律改变时例外，通常他们顺其自然。

香港新自由主义的第三个迹象在于，香港的自由边境推动了商品流动。我在重庆大厦中认识的许多手机卖家，近年来从中国内地带仿冒手机进入香港销售，但贩卖手机对公众健康的影响绝对比不上毒品或其他有害商品，因此香港政府对此的态度似乎十分宽松。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深港海关可谓世界上最繁忙的关口，不可能严格检查所有从内地进入香港的货物。这种宽松的执法包含了一种理念，香港政府象征新自由主义的精髓：让商业活动畅通无阻。

人类学的著作一般将新自由主义描写成一个邪恶之物，它代表猖獗的全球资本主义摧毁反抗者的力量。^①从宏观的角度看，新自由主义确实对世界造成了负面影响，但在重庆大厦的小世界中，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基本算是良好的。

正如我们所见，这栋也许是世界上最全球化的大厦，它是非暴力的，因为那些栖身于此的人们共同追求利益。在重庆大厦，新自由主义积极的一面显然可见——来自世界上相互敌对的国家的人们，往往没有发生争执，比如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他们追求利益的诉求没有受到国家的影响。我常常在重庆大厦听到别人说：“我没有时间跟别人打架！我来这里是为了赚钱！”这句话也许会宽慰世界上许多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

重庆大厦不仅象征了第三世界的领地，也代表了第三世界地区中上层阶级的人们，他们拥有家乡多数同胞所远远不及

① 比如 Harvey (2005) 持有这种观点。

的财力和教育水平。重庆大厦的和平氛围不仅来源于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因为重庆大厦中的每个人都有较为成功的人生——从他们的来到大厦即可表现出来。在新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式的竞争环境下，这里的大多数人多多少少算是成功人士。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比如尼泊尔瘾君子。讽刺的是，一座在香港臭名昭著的大厦，除去几个角落外，事实上却是坚定的资产阶级分子的资本主义商会所在地。

重庆大厦如此廉价，正因为穷国中的富人在富国成为穷人，他们多数人只能负担这里的价格。然而撇开其表面的奇异色彩，重庆大厦的资产阶级特性是其最突出的面目。不论大厦中的人们正处于何等境遇，比如避难者、性工作者或瘾君子，他们每个人在一定程度上是人生的赢家。重庆大厦依旧是一个边缘地带，因为它与香港其他地方在种族组成上不同，受到大部分香港华人的歧视或恐惧。然而，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边缘地带，甚至是一个世界主义的边缘地带。^① 它的世界主义是周边香港环境所不能想象的。

我们在第二章结尾讨论了重庆大厦新自由主义的一个结果，即巨大的贫富差距。这种差距存在于大腹便便的印度店主和他的临时工之间，旅店店主和打理生意的佣人之间，富有的非洲商人和来自同一国家却一无所有的避难者之间。但是大厦并没有发生阶级斗争，因为每个人都盼望并相信，他们有朝一日能变得成功和富足。也许这些想法主观并值得怀疑，但这是他们

① 见 Nashashibi 2007。

的信仰。

这种信仰甚至超越了伊斯兰教，将重庆大厦联合起来。在重庆大厦的资本主义边缘地带中，在香港的新自由主义环境下，以及在全球巨大贫富差距标识出的世界核心和边缘的氛围下，人们依靠这个信念挤出收益，挤出足够让他们和家人创造美好生活的收益。鉴于他们能用收入买到加尔各答、伊斯兰堡、拉各斯、蒙巴萨的新房子，这种梦想的力量显而易见。

香港的新自由主义可以继续发展下去。最近有一些作家讨论，是否应该停止全球各国的护照管理方式，让市场自己决定全球工人去哪里寻找工作和赚钱的机会。^①如果这种激进措施被实施，世界会出现类似重庆大厦的情况：富裕的城市中会出现国际化的边缘地带。但由于这种情况尚未出现——部分原因在于发达世界中只有香港拥有如此高度的灵活性——重庆大厦在世界上仍然有一定的独一无二的地位。

这正是重庆大厦的全球意义。这是一座位于核心城市的边缘大厦，一个位于发展中世界制造枢纽和最贫困底层地区之间的城市。这是一个中产阶级在另一个更加富有的中产阶级的城市中打拼生活的边缘地带，他们作为外来者被他人恐惧和嘲笑，却照常做着生意。在重庆大厦这个地方，来自世界上最贫困地区的有志之士希望变得富有，即使他们几乎永远不可能像那些高楼大厦中真正的有钱人一样。在这里，穷国中境遇较好的人们混杂在发达世界的边缘地带中，希望其财富能与门外的人们

① Pecoud 和 Guchteneire 2004 ; Hayter 2004 ; Marfl eet 2006 ; Bacon 2008。

一样多。只有理解了重庆大厦在香港和世界环境下的位置，一个人才能读懂本书中的个人故事，本书及其故事正在于这一特定的地点。

重庆大厦的未来 / 世界的未来

那么，重庆大厦究竟有怎样的未来？经过本书的讨论后，有一件事显而易见，即它在当今社会经济局势下的脆弱性，它很容易被摧毁。假设中国政府继续放宽对内地非洲人的签证限制，更多来自非洲的航班直接到达内地——这已经发生了，那么在重庆大厦进货的非洲人就越来越少，大厦底层和一楼的店铺也许面临结业。我们把目光放远一些，假如中国内地的公司派更多的代表去非洲，那么香港和中国内地的非洲商人人数会急剧缩减，这也必将影响到重庆大厦。

如果香港入境处厌倦来港的避难者，也许会选择执行像澳大利亚、日本或美国一样的签证条例，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不再获得免签入境政策，他们被发现没有签证后，被送上下一班回国的航班——有一定证据显示这正在发生，因为避难者所带来的压力显然不断攀升，对香港入境处来讲，这种压力超过了来自发展中国家旅客的收益。入境处在2009年11月打击重庆大厦中的非法劳工，也许正是未来发展的一个预兆。

另一方面，如果重庆大厦业主立案法团决定大举提升重庆大厦的环境，其价格的攀升将令非洲商人和南亚店主迁离，使重庆大厦成为另一座二等的香港购物商场。如果有足够多的中国内地人相信大厦有一定的经济潜力，华人店主和顾客也许会成为主流人群，驱赶其他人群，最终将大厦变成一个中国内地

人的集市。如果香港市区重建局，都市中无所不能的“沙皇”，认为这块地产远远比留作“重庆大厦”更值钱，那么大厦也许很快被下令拆毁，给另一间毫无特色可言的大酒店让位。这种境况说明了重庆大厦的不稳定性。由于变化迟早会发生，这个地方不能永久持续。不过它究竟会变成什么样，我们拭目以待。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见，重庆大厦在其历史上经历过多次变迁，这种变迁无疑终将发生。

我询问了许多重庆大厦的业主，他们如何看待大厦的未来，他们对大厦被拆有什么样的感受。一位店主的亲戚告诉我：如果大厦在接下来二十年间被拆毁，一定会结束这里的未来。今后这一定会发生，因为大厦越来越旧。这是个黄金地段，他们也许拆掉它，然后建一座大酒店……对，很难联合所有的业主。但是我确定，如果所有人都能拿到好的售价，他们一定会把业权卖出去。谁人不爱钱！这一定会发生，不可避免。

另一位业主说：“这个物业太旧了，也许有人会重新改造它，我真希望是这样！如果他们拆掉重庆大厦，他们会给我不少钱！”

香港过去几年的报纸消息和网络文章，经常表达出希望拆掉大厦的愿望，^①但由于业权组成的条件，拆除十分困难。在2001年之前，法律规定如果未能获得90%业主的同意，大厦不

① 比如 Kevin Sinclair, “A Disaster Lies Waiti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97年9月22日; BWG, *Chungking Mansions*, 2002年4月16日。http://www.bigwhiteguy.com/archive/2002/04/chungking_mansions/(2010年6月25日查阅)。

得拆毁。2001年之后，这条法律不再占据主导地位，香港市区重建局在必要情形下，不需获得这种同意而可以直接拆毁楼宇。

不过，重庆大厦的庞大体积，削减了替代大厦可获得的潜在收益。一位研究香港地产的学者对我说：“重庆大厦还没被拆，虽然曾经有几个大型发展商考虑过，但是因为它的楼层和楼层中的空间太大了，不可能拆掉它。”一般来说，五六层的楼房被拆后会建成二十层高的大楼，以便大规模增加可供销售的楼层空间。但是由于重庆大厦已经拥有十七层楼，所以拆毁它后并不能大规模增加可售空间。

此外，尽管大厦多年来已经破旧老化，它还是产生了巨大的效益。1993年，一位香港政府高官说重庆大厦无法被重建，因为“即便在现在的环境下，大厦对业主来说依然是一个金矿”。^①这对如今的业主来说更是如此。经常有商铺结业，但很少有店面长久空置，拐一个弯就有另一位满怀梦想的生意人。尽管现在许多业主有投诉和苦恼，重庆大厦的金矿依旧耀眼夺目，金钱满袋的投资者继续源源不绝。因此大厦未来应该会继续生存，至少暂时如此。

我猜想重庆大厦作为低端全球化的中心，或许在今后十年或二十年间继续存在，但它终究会被拆毁，不可避免。它现在已经是尖沙咀地区最古老的建筑之一，虽然有定期整修，但它的末日迟早会来临。

^① Joshua Fellman, "Eason Calls for Faster Approvals" *Hong Kong Standard*, 1993年8月4日。

不过，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看，重庆大厦会留下来。在未来，会有更多发达世界和发展中世界交汇的节点。从巴黎、纽约到内罗毕，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将相互碰撞和杂居。越来越多发展中世界会出现在发达世界，将文化超市在全球展开，我预测今日的重庆大厦，就是明天的世界。

尽管重庆大厦目前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它也将逐渐成为我们生活的世界。低端全球化不是世界的过去，至少在某些方面它是世界的未来。重庆大厦在其特定环境下必然消失，但就更深层意义来看，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也许不久将成为整个世界。

参考书目

- Alden, Chris. 2007. *China in Africa*. London: Zed Books.
- Allen, John, and Chris Hamnett, eds. 1995. *A Shrinking World? Global Unevenness and Inequ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ppadurai, Arjun. 1996. *Modernity at Larg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Arrighi, Giovanni. 2005. "Globalization in World Systems Perspective." In *Critical Globalization Studies*, ed. Richard P. Appelbaum and William I. Robinson. London: Routledge.
- Bacon, David. 2008. *Illegal People: How Globalization Creates Migration and Criminalizes Immigr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 Bestor, Theodore C. 2004. *Tsukiji: The Fish Market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lommaert, Jan, James Collins, and Stef Slembrouck. 2005. "Polycentricity and Interactional Regimes in 'Global Neighborhoods.'" *Ethnography* 6 (2): 205–35.
- Bodomo, Adams B. 2007. "An Emerging African-Chinese Community in Hong Kong: The Case of Tsim Sha Tsui's Chungking Mansions." In *Afro-Chinese Relation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ed. Kwesi Kwaa Prah. Cape Town: Centr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African Societies.

Brennan, Frank. 2003. *Tampering with Asylum: A Universal Humanitarian Problem*. St. Lucia, AU: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Browne, Katherine E. 2004. *Creole Economics: Caribbean Cunning under the French Flag*.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Chalfi n, Brenda. 2004. "Border Scans: Sovereignty, Surveillance, and the Customs Service in Ghana." *Identities* 11 (3): 397–416.

Chan, Wai-kwong Ocean. 2003. "From Refugee Camp to City Street: The Different Lives of Young Vietnamese in Hong Kong." Master's thesis,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onstable, Nicole. 1997. *Maid to Order in Hong Kong: Stories of Filipina Worker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Daniel, E. Valentine, and John Chr. Knudsen, eds. 1995. *Mistrusting Refuge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Economist. 2009. *Pocket World in Figures*. 2010 edition. London: Profile Books. Englund, Harri. 2006. *Prisoners of Freedom: Human Rights and the African Poo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Essed, Philomena, and Rianne Wesenbeck. 2004. "Contested Refugee Status: Human Rights, Ethic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In *Refuge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s of*

- Societies: Agency, Policies, Ethics, and Politics*, ed. Philomena Essed, Georg Frerks, and Joke Schrijvers.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 Fallon, Steve. 2002. *Hong Kong and Macau*. 10th edition. Melbourne: Lonely Planet.
- Ferguson, James. 2007. "Globalizing Africa? Observations from an Inconvenient Continent." In *Global Shadows: Africa in the Neoliberal World Order*.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Foucault, Michel. 1995.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Frelick, Bill. 2007. "Paradigm Shifts in the International Responses to Refugees." In *Fear of Persecution: Global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Law, and Human Well-Being*, ed. James D. White and Anthony J. Marsella.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 Ghosh, B. N. 2001. *Dependency Theory Revisited*. Aldershot, UK: Ashgate.
- Gibney, Matthew J. 2004. *The Ethics and Politics of Asylum: Liberal Democracy and the Response to Refuge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offman, Erving.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Anchor Books.
- . 1967. *Interaction Ritual*. New York: Anchor Books.
- Hall, Thomas D., ed. 2000. *A World-Systems Reader: New Perspectives on Gender, Urbanism, Cultures, Indigenous Peoples, and Ecology*. Lanham, MD: Roman and Littlefield.

- Hannerz, Ulf. 1996. *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 London: Routledge.
- . 2003. “Several Sites in One.” In *Globalisation: Studies in Anthropology*, ed. Thomas Hylland Eriksen. London: Pluto Press.
- Harper, Damian, and Robert Storey. 1999. *Hong Kong, Macau, and Guangzhou*. Hawthorn, AU: Lonely Planet Publications.
- Harrell- Bond, Barbara. 2002. “Can Humanitarian Work with Refugees be Humane?” *Human Rights Quarterly* 24: 51–85.
- Harvey, David. 2005.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yter, Teresa. 2004. *Open Borders: The Case Against Immigration Controls*. 2nd edition. London: Pluto Press.
-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2009. “Panel on Security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orture Claim Screening Mechanism.” LC Paper No.CB(2)2514/ 08–09(01). <http://www.legco.gov.hk/yr08–09/english/panels/se/papers/se0706cb2–2054–1-e.pdf> (accessed November 16, 2009).
- Incorporated Owners of Chungking Mansions. 2008. *The Thirteenth Management Committee: Special Brochure*.
- Inda, Jonathan Xavier, and Renato Rosaldo. 2002. “Introduction: A World in Motion.” In *The Anthropology of Globalization: A Reader*, ed. Jonathan Xavier Inda and Renato Rosaldo. Malden, MA: Blackwell.
- Jaggi, Marcel, et al. 2008. *Chungking Mansions: 3D [In]formality*.

- Basel, CH: ETH Studio, Contemporary City Institute.
- Knowles, Caroline, and Douglas Harper. 2009. *Hong Kong: Migrant Lives, Landscapes, and Journey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nudsen, John Chr. 1995. "When Trust is on Trial: Negotiating Refugee Narratives." In *Mistrusting Refugees*, ed. E. Valentine Daniel and John Chr. Knudse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Ku, Hok-bun, Kam-wah Chan, Wai-ling Chan, and Wai-ye Lee. 2003. *A Research Report on the Life Experiences of Pakistani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Centre for Policy Studies, Department of Applied Social Sciences.
- Le Bail, Helene. 2009. "Foreign Migration to China's City-Markets: The Case of African Merchants." *Asia Visions 19*. Paris: Centre Asie IFRI. http://www.ifri.org/files/centre_asie/AV19_LeBail_GB.pdf (accessed November 24, 2009).
- Lo, Christian. 2006. "Making It at the Chung-king Mansions: Stories from the Bottom End of Globalization." Master's thesis, Department of Social Anthropology, Norweg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rondheim, Norway.
- MacGaffey, Janet, and Remy Bazenguissa-Ganga. 2000. *Congo-Paris: Transnational Traders on the Margins of the Law*.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Marcus, George E. 1998. "Ethnography in/ of the World System: The Emergence of Multi-Sited Ethnography." In *Ethnography*

through Thick and Thi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arfleet, Philip. 2006. *Refugees in a Global Era*. Houndmill, UK: Palgrave MacMillan.

Mathews, Gordon. 2000. *Global Culture/ Individual Identity: Searching for Home in the Cultural Supermarket*. London: Routledge.

———. 2007. “Chungking Mansions: A Center of ‘Low- End Globalization.’ ” *Ethnology* 46 (2): 169– 83.

Mathews, Gordon, Eric Kit-wai Ma, and Tai-lok Lui. 2008. *Hong Kong, China: Learning to Belong to a Nation*. London: Routledge.

Moorehead, Caroline. 2005. *Human Cargo: A Journey among Refugees*.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Nashashibi, Rami. 2007. “Ghetto Cosmopolitanism.” In *Deciphering the Global: Its Scales, Spaces, and Subjects*, ed. Saskia Sassen. New York: Routledge.

Nordstrom, Carolyn. 2007. *Global Outlaws: Crime, Money, and Power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Norman, Henry. 1895. *The People and Politics of the Far East*. London: T. Fisher Unwin.

Nyers, Peter. 2006. *Rethinking Refugees: Beyond States of Emergency*. New York: Routledge.

Ong, Aihwa. 2003. *Buddha is Hiding: Refugees, Citizenship, the*

- New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 2006. *Neoliberalism as Exception: Mutations in Citizenship and Sovereignt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Pecoud, Antoine, and Paul de Guchteneire, eds. 2007. *Migration without Borders: Essays on the Free Movement of People*. Paris: UNESCO Publishing;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 Ribeiro, Gustavo Lins. 2006. "Economic 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Etnografica* 10 (2): 233–49.
- Ring, Laura A. 2006. *Zenana: Everyday Peace in a Karachi Apartment Building*.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Rojas, Jose. 2009. "I'm in Hong Kong: I've Graduated: The Igbo Apprenticeship System and Hong Kong's Role in Informal Educ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December 2–6,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 Rotberg, Robert. 2008. *China into Africa: Trade, Aid, and Influence*.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Saad-Filho, Alfredo, and Deborah Johnston. 2005. *Neoliberalism: A Critical Reader*. London: Pluto Press.
- Sandhaus, Derek. 2010. *Tales of Old Hong Kong: Treasures from the Fragrant Harbour*. Hong Kong: China Economic Review Publishing.
- Santos. Boaventura de Sousa. 2004. "Transnational Third Worlds." In *Worlds on the Move: Globalization, Migration, and Cultural*

- Security*, ed. Jonathan Friedman and Shalini Randeria. London: I. B. Tauris.
- Sassen, Saskia. 2007. *A Sociology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Smart, Josephine. 1988. "How to Survive in Illegal Street Hawking in Hong Kong." In *Traders Versus the State: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 to Unofficial Economies*, ed. Gracia Clark, ed.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Smith, J. J. 1883. In *Eastern Seas; or, The Commission of H.M.S. "Iron Duke," Flag-Ship in China, 1878-83*. Devonport, UK: A. H. Swiss. [http:// manybooks.net/ titles/ smithjj2792627926-8.html](http://manybooks.net/titles/smithjj2792627926-8.html) (accessed April 3, 2010).
- Stoller, Paul. 2002. *Money Has No Smell: The Africanization of New York C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tone, Andrew, Piera Chen, and Chung-wah Chow. 2010. *Lonely Planet Hong Kong and Macau*. Melbourne, AU: Lonely Planet Publications.
- Tam Sin-yu, Ophelia. 2007 "South Asian Students in Primary School: Minorities and Education in Hong Kong." Master's thesis,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Tehrani, Majid. 2004. "Cultural Security and Global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Negotiations of Identity." In *Worlds on the Move: Globalization, Migration, and Cultural Security*, ed. Jonathan Friedman and Shalini Randeria. London: I. B.

Tauris.

- Tsang, Steve. 2004.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Tull, Denis. 2006. "China's Engagement in Africa: Scope, Significance, and Consequences." *Modern African Studies* 44 (3): 459–79.
- Ulysse, Gina A. 2007. *Downtown Ladies: Informal Commercial Importers, a Haitian Anthropologist, and Self-Making in Jama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Velho, Gelberto. 1978. "Stigmatization and Deviance in Copacabana." *Social Problems* 25 (5): 526–30.
- Verdirame, Guglielmo, and Barbara Harrell-Bond. 2005. *Rights in Exile: Janus-Faced Humanitarianism*.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 Wallerstein, Immanuel. 2004. *World Systems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Weber, Max. 1976.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 Welsh, Frank. 1993. *A History of Hong Kong*. London: HarperCollins.
- Wheeler, Anthony Ian. 1981 [1975]. *South-East Asia on a Shoestring*. Victoria AU: Lonely Planet Publications.
- White, Barbara-Sue. 1994. *Turbans and Traders: Hong Kong's Indian Communit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ilson, Richard. 2009. "Representing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Social Contexts and Subjectivities.” In *Human Rights: An Anthropological Reader*, ed. Mark Goodale. Oxford: Wiley-Blackwell.

Wong, Eve F. Y. 1997. “Foreign Eyes on Hong Kong People: The View from Chungking Mansions.” *Hong Kong Anthropologist* 10: 32– 37. [http:// www.cuhk .edu.hk/ ant/hkas/pages/old%20 series.html](http://www.cuhk.edu.hk/ant/hkas/pages/old%20series.html) (accessed May 2, 2010).

Wordie, Jason. 2007. *Streets: Exploring Kowloo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Xuxi. 2002. *Chinese Walls / Daughters of Hui*. 2nd edition. Hong Kong: Chameleon Press.

译后记

在人类还未发明互联网的1953年，科幻大师阿西莫夫描述了一个未来世界：地球人口达到八十亿，住在八百个钢罩城市里，大家吃同样的食物、说同一种语言、穿行于地下通道，机器人负责所有前线工作。这些科幻场景跟当今世界有些类似——我们学讲英文和普通话等通用语，身边有一个个麦当劳和星巴克的连锁餐饮店，地铁等现代交通工具缩短了地理距离，电脑和机械代替了烦琐的工作……许多人觉得这就是全球化。全球化让我们越发相似、越发依赖数字化工具。但麦高登教授在此书中，描绘了另外一种低端全球化：多元文化甚至互相冲突的文化和平并存，人们依赖现金而非银行做大笔生意，大家吃家族式餐馆的美食，而不是去星巴克。

全球化在传播和融汇强势文化外，也衍生出求同存异的多文化格局，《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就写出这种格局如何浓缩于一栋大厦之内。华人读者对重庆大厦的了解，也许主要来自王家卫的电影《重庆森林》，银幕中的重庆大厦充斥着阴暗走廊和非法勾当，而现实中的大厦也被香港人视为都市探险和吃印度咖喱的地方。寸土寸金的尖沙咀矗立着高级购物商场和酒店，中间却安插了较为破旧的重庆大厦，穿行其中的人也多来自非洲和东南亚国家。重庆大厦对这些少数民族群来

说，是通往发达地区致富的另类枢纽——它承载了低端全球化，来自经济不发达背景的小商人搭上国际贸易的顺风车，在这里为家人和祖国牟取福利。

世界各地还有很多类似的枢纽，比如阿联酋的迪拜黄金街、巴西的巴厘早市，甚至美国华盛顿的东部市场，中国广州和义乌也开始名列其中。我与麦教授从2011年开始研究在广州的非洲、中东、印度商人，发现这些人也熟知重庆大厦的店铺和生意，他们中的许多人先在家乡做学徒，然后飘洋过海来亚洲创业，各自有酸甜苦辣的故事。正如麦教授所言，国际贸易不再是跨国公司的代名词，越来越多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也开始参与其中，重庆大厦也许就是未来世界全球化的一个缩影。

感谢麦教授给我翻译这本书以及一起研究的机会，感谢麦教授的妻子洋子一直以来的支持，另外也感谢我的父母杨凯旋先生和张望英女士。另外，我在重庆大厦有一帮非洲避难者朋友，他们让我了解到香港完全不同的社会面貌，我向他们所有人道谢。

杨珺

2013年于沙田

这座被评为“全球化最佳案例”的大厦，收容的住客来自一百多个不同国家，这些住客在这座“小联合国”如何互动，亦可成为一个“另类联合国”的田野调查。虽然重庆大厦就在香港的闹市中心，但内部运作自有其规律，和尖沙咀仿佛属于两个世界，成了特区中的特区。在重庆大厦活动的人，缩影了三千宇宙，那些寻求庇护的人，各有其传奇出处，慕名而来找廉价旅馆的游客，会发现香港对第三世界最包容的地方；依靠重庆大厦地下经济生存的异乡人，则往往有着比狮子山下更励志的故事。这些背景，令不同学科近年都对“重庆大厦学”趋之若鹜，令这座大厦在王家卫的《重庆森林》后，得到另一个身份被重构的契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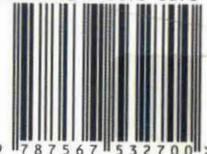
——沈旭辉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明报》专栏作家

重庆大厦是全球化的一个缩影，但有种不同的味道：它收容和养育了生存在跨国资本主义底层的微不足道的玩家。香港仍然是手提箱商人的平台，他们环游世界以牟取利益和业务联系。在经营香港的巨头们眼中，这栋大厦也许看起来危险破旧，但正如麦高登指出的，这是一个人们以最低预算进行商务旅行的天堂。任何想要探索全球资本主义软肋的人都应该阅读此书。

——GUTTA KRISHNAN 詹姆斯·李琛，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上架建议：社会学/人类学

ISBN 978-7-5675-3270-0



9 787567 532700 >

定价：42.00元

www.ecnupress.com.cn